

詹绪佐 朱良志 著

中国古代



测字术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测字术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丽莉
封面设计：张仁华
内文设计：益 文

益州软科学研究所策划
(川)新登字 014 号

中国古代测字术
詹绪佐 朱良志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四川省计经委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mm 32 开本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210 千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5614—0748—3/G · 121

定价：5.90 元

前 言

测字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方术形式，它将记录语言符号作为预测命运、占卜吉凶的工具，从而形成专门的测字术，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流布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和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

测字是一种迷信活动，它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糟粕，不论测士们说得多么神奇，辩得多么巧妙，它都是一种骗人的行为。但是，方术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测字又是方术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对测字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风貌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我们应以清醒理智的态度对待它、研究它，最终达到消灭它的目的，而不是讳莫如深，这样反而会增加这门“秘术”的神秘度。

前人有一首打油诗形容测字的特点：

测字先生造字手，
字里字外翻筋斗。
测字先生神仙笔，
增点添划不费力。

2AL 75/04

这里是就测士们如何对待汉字而言的，汉字犹如一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测士们尽情地在汉字的天地中“翻筋斗”，纵来横去，云里雾里，谁翻得最神奇，就被视为测术最高。

若说到测字术的欺骗和荒诞的特点，我们可戏仿上一打油诗来一首诗打油：

测字先生槽字手，
字里字外翻筋斗。
测字先生甚仙笔？
增点添划白费力。

下面我们就来看测字先生是如何翻这筋斗的吧！

目 录

第一章 汉字的名称和源流

第一节 测字的名称	1
第二节 测字的源流	4

第二章 测字产生的原因考察

第一节 独特的文字体系是测字产生的基石	12
第二节 剖文析字的习惯是测字术的土壤	20
第三节 文字崇拜是测字术产生的心理依据	30

第三章 求测方法

第一节 以字求占	37
第二节 以物求占	57
第三节 以梦求占	65

第四章 占断方法（上）

第一节 断字的基本方法	75
第二节 字貌占断法	101
第三节 字迹占断法	113
第四节 字音占断法	126

第五节	字义占断法	133
第六节	断字的辅助方法	144

第五章 占断方法（下）

第七节	易卦占断法	156
第八节	阴阳五行占断法	168
第九节	天干地支占断法	181
第十节	六神占断法	187
第十一节	占断定式	198

第六章 测字类型

第一节	国家大事类	208
第二节	科举名第类	216
第三节	婚姻六甲类	225
第四节	日常生活类	232

第七章 测字的广义形式

第一节	字梦	245
第二节	字谶	265

第八章 测字的价值评判

第一节	测字的负价值	305
第二节	测字的正价值	311

第一章 汉字的名称和源流

第一节 测字的名称

测字，在古代又称拆字、相字、破字，有时也称析字。近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

拆字，亦作测字，拆则有分拆之意，

测则有推测之意，为占法之一种。……古亦谓之破字。

徐珂的这段话中，就提到了三个名称：拆字、测字、破字。

这些名称虽然都指的是同一种占法、同一种方术，但其意涵却不大相同，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大不相同。这样一来，我们就很有必要来辨析一番了。

先说破字。

破字是测字的较早名称，《隋书·经籍志》卷三《历数类》就载有《破字要诀》一卷。破字，我们顾名思义，也就是破解文字，指分拆字形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完全等同于拆字、析字。因为拆字也就是分拆字形，析字也还是把

字形破开。从使用情况上看，拆字最为常见，破字、析字次之，《古今图书集成》中就有“拆字”一类。

用这样的名称来概括测字现象，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测字作为占法之一主要是分拆字形。但这样的名称又具有两点明显的不足：首先，从测字方法上说，虽然分拆字形最为常见，但字音占断法、字义占断法、字迹占断法、字貌占断法等也并不鲜见，它们都无关于字形分拆，因而，用破字、拆字、析字来指称测字显然并不全面。

其次，拆字、破字、析字在古代可泛指一切分拆字形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字谜、酒令、对联、文字幽默中也运用得十分普遍，而这些文字游戏显然就不是迷信活动。因此，用拆字、破字、析字来指称测字也多少显得有些大而无当。

下面我们看相字。

相字是宋人的称谓。宋何遵《春渚纪闻》卷二云：

谢石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相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便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拆而言，无不奇中。

也正因为如此，《北梦琐言》上说测字之术“唐末已有之，宋时则谓之相字”。

宋人为何称测字为相字呢？原来，测字在宋代已有重大发展，出现了许多以相字为生的“专业户”。这时，求测者很多，他们大多“随意书一字”，让术士“就其字离拆”，然后再占断吉凶休咎。由于是“随意书一字”，相士就必须先“相”字（即仔细观察字形、字貌），再“拆”字（即分拆字

形)。其难度也相应大多了。也正是基于“求相者”的这一特点，宋人便由相人、相马等名称，推衍出了相字。

相是仔细观察的意思，相字也就是对“随意书一字”细加审度，辨其字形、笔迹、字貌等特点。用相字来指称测字现象，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宋代开始，求测者一般均自书一字来求测，术士一般也少不了“相”的功夫。但相字本身还仅仅是测字方术的开始，而不是测字方术的全部，因而这一名称也多少显得“名不副实”，更何况测字中还不乏以物来求测的情况呢！

接下来就是测字了。

测字的测，正如徐珂所说是“推测之意”，测字也就是据求测之字而加以推测。这个名称起得十分虚活，其好处在于它既可涵括相字，又可包括拆字。但也惟其虚活，测字现象本身的许多重要特点反而隐而不彰、彰而不显。试想一下，据字推测叫测字，但它究竟推测的是什么？是字形还是字貌，是字貌还是笔迹，是字的本身还是人事吉凶？我们说不出。

我们说不出，根子就在测字本身说不出。从这个意义上看，测字反倒不如拆字、相字更能切入测字这种方术的本身。

由此可见，测字名称种种，各有其合理的一面，也各有其偏颇之处，它们或是顾此失彼，或是大而无当，相对于它们的事实，这些名称都未免有些“受之有愧”。

我们之所以对它们“斤斤计较”，悉加辨析，揭其“短处”，捣其“痛处”，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后面的表述，另一方面也想顺带制造一下“戏剧效果”，因为测字本身就是戏，一出出令今人感到荒唐滑稽的戏。

为了便于后面的表述，我们倾向于选择测字这个名称，因

为它毕竟涵括的面广一些，和今人也毕竟“面善”一些。

在测字的“大名”之下，我们把相字视为测字的开端，它特指术士端详审度字迹、字貌和字形，我们又把拆字视为测字的一种最主要的方法，即分拆离合所测之字。这样，由求测——相字——拆字便大致构成了测字的全部。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测字中无论是分拆字形也好，还是据音占断也罢；也不论是字貌占断也好，还是字义占断也罢，都不过是一种“魔术”般的形式，预言人事吉凶才是它的目的和内容。从表面上看，人事吉凶休咎是从文字中来，但实际上吉凶休咎并非测字的结果。恰恰相反，一个字如何测正取决于预言内容的需要。测字先生所蛊惑人的恰是这种倒果为因的伎俩。

这种伎俩后患无穷，体现在名称上，就给人一种错觉，仿佛他们“测”的是“字”，而不是事。

这，才是“测字”名称的最大荒唐。

下面，我们就循名责实去审视一下这一重要方术的“发迹史”吧！

第二节 测字的源流

要将测字的发展描绘出一个清晰的线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宋之前，关于测字方面的记载寥若晨星，但是测字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着。

测字作为一种方术活动，从史料记载上看，始于《隋书·经籍志》，其卷三《历数类》载有《破字要诀》一卷。破字也就是测字，证明在隋时就出现了这种方术活动。关于唐代

测字情况目前尚未发现有什么具体的材料记载。唯有北宋时孙光宪《北梦琐言》载有唐人以字占卜之一事：

五局观老道士崔无教有算术，杨德辉欲赴妖人李黑，举事以叩。崔令画地作字，德辉书“北千”二字。崔以“千”插入“北”字内，曰：“去即乖耳。”杨遂不赴。

“千”插“北”为“乖”，崔无教为杨德辉占断，实际上就是一种测字。说明唐时测字术并非没有产生，同时也说明宋时测字术的极盛也有个基本的过渡时期。

狭义测字术的盛行在宋代，但若论及广义的测字则远在这之前。像字梦、字谶这些形式，同样是利用汉字来占测人的命运，它在根本上与测字术是相通的。^①只不过不是测字先生特意摆着个摊儿为别人算命。因此字梦、字谶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测字术。

字谶和字梦大致都产生于汉代，尤其西汉哀、平之后，谶纬方术之风渐浓，这两种方术也随之兴盛起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此风更炽。关于字梦、字谶的发展因后文要谈及，这里就从略了。这里单来谈谈狭义测字术的发展。

宋代是一个迷信风气很浓的时代，各种方术活动竞相涌起。测字术在此时发展成独立的算命活动，测字先生也靠干这一行养家糊口。人们常喜欢占上一字来预测自己的未来命运。

① 其异同我们将在后文详加论证。

谢石是中国测字术的开山人物，有“测字圣手”之称，其测字经历多见史料所载，有关他的传说也很多，他的测例成为后代测字先生可望而不可及的范本。

谢石，字润夫，成都人，大约活动于两宋之交时期，以测字为生。关于他的生平史料各家所记大同小异，实际上主要记载的是几个测例。传说他在以测字谋生之前曾得神人相助，神人授予其天书一本，从此他走上了测字的路。他于宋徽宗宣和年间来到京都汴梁，以测字为生，终日奔于市井官府，京中达官显贵、三教九流都请他测过字。凡所测者均称灵灵灵。一日皇上托宫中人求谢石为之测字。谢石测得准，徽宗于是就将其招入宫中，为宫内嫔妃随从测字，宫人祸福均奇中，他的一个关于“也”的测例令宫中举座皆惊。从此他名声大振，宫廷内外也以找到他测字为荣。据说他曾为徽宗测一“春”字，谓“秦头太重，压日无光”，要皇上警惕秦桧，得罪了这位奸相。秦桧将其放逐，后死于途中。

谢石一生测字，虽为皇上所重，结识当时许多显贵，但是他仍是地位卑微，没有捞到一官半职。但据《夷坚志》等书记载，谢石确实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测字大师。他的出现，带来了测字术的兴盛。他测字的一系列方法成为后代测字术的基本方法。从现今所见的谢石十多则测例看，后代测字术的大量方法在他那里已经率先使用。从应对的快捷、解说的巧妙、剖文析字的方式等方面看，他都不愧为这门邪道歪术的第一流高手。

由于谢石的影响，南宋时出现了许多测字先生，宋人笔记小说中已开始大量记载测字的事例。测字术在宋时实在成了文人之雅趣、穷人之生途了。谢石的几位徒弟也不辱师门，

光大邪术，颇为迷信者所重。

谢石高足朱安国，新安（今属安徽）人。关于朱安国测字事，洪迈《夷坚志》也有记载，朱安国还去拜访过洪迈，并为洪迈弟弟测过字。看来洪迈所记颇为可信。他关于“飛”的测例更是蜚声测坛，他居然从此字中拆出“二九而升”之字，而且据说还算准了，看来也绝非是个等闲之辈。他和老师一样，测字神神鬼鬼，谢石能算出人家妻子怀中所孕为小蛇，朱安国也能从一个求占者所写字的字势“偏左”中，判定他有“左脚跛壁之疾”。当然这都是骗人的，但也说明宋代测字术在这方面是何等的自由，又是何等的放肆。

南宋时新安还有另一测字高手汪龙，此人早年双目失明，人称“瞎龙”。据说瞎龙测字比正常人还灵。史籍中所载其测事也颇详。从其盲人测字看，大概与盲人算命相仿。因眼失明，不需要外在的观风使舵，居然能算准，这不啻为操此行当的人壮了胆，打了气，同时也为测字术平添了一些神秘色彩。汪龙测字丰富了测字的方法，大量采用八卦、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学说，将测字术和中国古代其它算命术接上轨。他还首开了以物测字的先河，一人以象棋占能否生子，他以棋子无生气，判其身后必无子。一人求占，急忙中打翻墨水，他就由此联系到“乌台重案”，占得头头是道。“大批量”的使用谐音法，更是他的“绝活”。

南宋时还有一位张九万，可以和上述三人并列为宋代四大测士。汪龙、谢石为人性情耿介，不巴结权贵，痛斥邪魔，以测字为名抒发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患，这反映了中国士人的一些优秀品质即使在一些方术活动中也并没有消失殆尽，但正像文人中也有许多媚世媚俗之士一样，“测

坛”中也不乏这样的人。张九万虽然名声很大，但说到底他就是这样的人。传说张九万为秦桧算命，秦桧当时已经是红透了半边天，且劣迹斑斑，人皆恨之。但张九万为秦桧测字却极尽阿谀之能事，据说当时秦桧用扇柄随意在地上画一横，张九万马上说：“‘土’上加‘一’为‘王’。秦丞相将要为王。”此事若真，也透出秦桧的野心，因为在地上画一，在他之前已有人这样做过，秦桧仿人画一，意在借天借神成全他称王之心。

元明之交到明中后期又出现了何中立、张乘槎、马守愚、郑仰田等名测士，薪传了谢石们的香火。其中以马守愚、郑仰田最为著名。

马守愚为明中后期人，专攻宋谢石测字之法而有得，因而支起测字摊干起算命的营生。他虽终生布衣，但却因测字而名闻遐迩。他测字的方法更加灵活多样，集前人之所长，只要有利于占断的均拿来运用。如一官吏退职后，拿一“休”字去请他占测，他面对此字，不言不语，竟将它对着太阳照了半天（看来是从正面解说已解不通了），少顷，他说：“怎么这个字反过来看则是个‘兵’字，看来国家军队中可能要重用你。”那退职老者不信，后国家起兵事，果然征召他统帅一路军马。马守愚之灵活已经“灵活”到字的反面，也“灵活”到“守愚”而“不愚”的地步。

郑仰田为有明一代最有名的测字先生，惠安（今属福建）人，终生以测字为生，身当明代后期，那个时代是明代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郑仰田的测字大有谢石之遗风，多出入官府豪门，他测字不是阿谀权臣，而是面对淫威从容测断。

传说他曾为奸巨魏忠贤测字，魏忠贤写一“囚”字，郑仰田说：“此乃当国之人。”意思是魏忠贤独揽大权。后魏忠贤又写一“飢”字请测，郑仰田说：“此不凡之人，也是不良之人。”他这一结论完全是通过拆字拼凑起来的，“飢”，右为“几”，像“凡”不是“凡”。“飢”左上为“人”，下面像“良”又不是“良”。郑仰田这一测机智之至，实际上他并非为这位奸臣贼党算命，而是借字投匕首，语中含讥讽。郑氏此举颇为后人所称道。

从他的一些测例看，他的测字以构想奇特而著称，如一人以“全”字测当朝宰相，他能从中推出四个人的名字。这种测例可谓是“异想天开”，史籍上皆说其“验”，但究竟是由字测出，还是由“世”测出，看来还是以后者居多。

总之，测字术发展到元明时期，已诸法皆备，而且测字的范围越来越大。如果说隋唐是测字的发轫时期，宋代为测字的极盛期，那么元明则是其持续发展的时期。

正是有了这一坚实的基础，清代便成了测字术的集大成时期。

清人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了测字术：

一是测字理论方面。清时有三大测字理论专著，一是程省的《测字秘牒》，一是周亮工的《字触》，再就是《古今图书集成·拆字部汇考》。它们对古代测字术的方法，理论依据以及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关系作了总结，还汇集前代大量的测例，为测字迷信活动提供了可以依赖的材料。

中国古代测字泛滥无归，但在清之前，有关测字的理论著作却很少，且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破字要诀》一书，但唐以后只知其名，不知其书。北宋哲学家邵雍

在测字术上颇用心力，著有《易数一撮金》，将《周易》和相字联系起来。同时相传他还著有《五行六神员诀》，将五行六神引入测字。邵雍丰富了测字术的内容。所以后代有点名堂的人，经常搬出邵子之言，对其顶礼膜拜。宋时谢石精测字，据说得力于一本叫做《心易秘占》的书，不过后代谁也没见到。

景齐乃南北宋之交的人，他在测字界是个神秘的人，据说他得力于仙人之助，弄起测字营生，写了一本《神机相字法》，是代天代神授言，当然是一派胡言。不过他的这本书对宋以后的测字界影响颇大，此书已失传了。

元明时期，尚有邵居敬的《龟鉴易影皇极数》和《相字心易秘牒》等。

清代的《测字秘牒》、《字触》、《拆字部汇考》三部著作，从各个方面看，都超过了前代，三书完成了对测字理论的总结。是我们今天研究测字秘术的重要的材料。

程省的著作以理论见长，全书体系庞大，俨然有为测字理论作总结之势。其内容有测字十法、心易六法、测字取格大法、双句格法、测字散格法、杂占赋、至理测法等，论得头头是道，是一部了解测字术的重要材料。

周亮工的《字触》乃测例汇集，虽亦涉理论，但也不多。周氏为测林高手，他所选的测例代表中国测字术的最高水平。这本书尤其对测字和汉字的关系作了剔发。当然和所有测字著作一样，其中笼罩着神秘主义色彩。

《拆字部汇考》分为《拆字数》、《新订指明心法》和《测字部纪事》三部分，基本上是前人的理论和实践的汇纂，确有“集成”之特点。不过它所收测例较少，而理论汇集较多。

这三部书均有刻本传世，为了解测字提供了方便。

二是测字实践方面，著有测字著作的程省、周亮工均精于测字，此外尚有范时行、陈钟年、大不同、沈衡章等人，其测法和前人大同小异。测术虽亦称高明，但难与谢石、郑仰田等抗衡。此不赘述。

以上对中国测字的源流发展作了简单的描述，欲了解这秘术之“秘”、骗术之“骗”，下文将有详述。

第二章 测字产生的原因考察

测字测字，实际上是以汉字来预测命运。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中，我们虽不能完全考察，但从掌握的主要民族语言中，还没有产生像我们这样以文字符号作为占卜的工具并发展成具有广泛影响的算命术。为什么在我们汉民族会产生这种现象，其原因很多，它和中华民族的宗教观念、思维方式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关系，但是若究其极，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源于汉字。独特的文字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剖文析字习惯以及对汉字根深蒂固的崇拜观念，这三者构成了测字形成的直接的原因。

第一节 独特的文字体系是测字产生的基石

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汉字是测字术形成的根本。它在如下三个方面为测字术形成提供了土壤。

一、象形与观字貌

如果把山东大汶口出土文物上的刻划数算作文字的话，汉字至今大约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大量的材料证明，汉字的

产生是以像形为根本的。汉字一开始叫做“文”，后来叫做“字”，文者祖父，字者子孙。^①什么是文和字呢？许慎说：“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字是从文的基础上滋生出来的，先有文后有字。文是本于物象而产生的，即是说它是在仿效外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先民造字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大量的汉字形体均是摹仿物而成。姜亮夫先生说：“像形字是全部汉字的基础”，“因为每个字不论它有几个部分，或二合，或三合，或四合，而每个字溯其原始，都必然是一个像形。即使是表音部分，也是以像形所应有之音为音，而不是单纯作音标用的符号，至多只有几个作象征符号用的‘文’。”^②他的这一判断基本上是符合事实情况的。

像形字是汉字的母体。“像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即是说，它是按外物的形状而加以追摹的。它所追摹之对象，一是自身，二是自然，三是人所创造的器物。汉字像形符号虽简括率略，但却神情毕肖。汉字在楷化以后，渐渐失去了它原先的像形特征，以至在现代汉字中有时你很难看出它所像之物，如“日”字，基本上脱离了外物的特征，许多像形字已成了一种较为抽象的符号。

但是现代汉字并没有完全割断符号以及它本来追摹的外在物象的联系。我们从许多方面均可以看出。一是类化转移，“日”虽不能直接窥出，但是它的以形表义的功能并未丧失，它可以通过“日”部字表现出来，如旭、昏、昭、暗、旦、晓等。“日”在这里起到意义规定作用，使人一看到日旁，就会

^① 见张怀瓘《文字论》、《书断》。

^② 《古文字学》，第18页。

自然联系到太阳、光明之类的东西，所谓“秀才认字认半边”，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个原因。二是抽象提示。许多字虽不是直接像外物，但仍可窥出一点影子，如“木”字，任何树木可能都不会长成这个样子，但是在“木”中我们又依稀见出树木的踪迹，又似，又不似，这似与不似若从艺术心理角度看，恰是最容易引起人注意的。如“休”，人也不像，木也不像，但见此字，丝毫不影响我们联想一人正在树下乘凉的画面。

汉字的像形特点，或者说是“准像形特点”，给测士们大开方便之门。测字中如果仅仅限于语言符号自身，那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尽可能牵涉到更多的对象，这样也使测士们此路不通改走他道，有一个选择的余地。有了这种像形文字，测士们就方便多了，它可以由此字直接联系到它所像的物，物象世界是复杂的、有趣的，因此测士们一触及到具体的物，马上就如鱼得水，断起来也就头头是道了。

如清陈钟年为人测字，一人以“榮（荣）”字占其妻病，陈说：“你妻病已无救，‘榮’上有两火，即两根蜡烛，中为一墓台，下为木，棺木也。合而言之，乃死葬之象。”如果没有像形这一法宝，陈钟年是再也无法作此种联想的。

测字者流行的观字貌的方法，所根据的仍是汉字的像形基础。如一人以“午”字占病，测士说：“病将难好，上面为一睡人。”如果是拼音文字这种联想也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测字中对汉字像形之法，尽量使用，而且在很多地方别出心裁，另有发挥。一般来说，测士们是根据像形的原有规律去联想，如见“日”想太阳，看“木”联树林。但在许多情况下，测士们完全不顾汉字的原有像形特点，任意发挥，胡

乱牵扯，为其占断服务。如见“日”字它可能想到风箱，想到站立的石碑，想到烽火台，想到一切竖立的长方形的东西。这就只能是测士们心目中的“像形”了，与原汉字了无干涉。不过他联想所使用的方法仍是像形，求测者有时也乐于相信，因为他们知道，本来大量的汉字就是像形的。

二、会意的泛化

会意字在汉字中也是一个“旺族”，是汉字构成的重要途径之一，所谓“比类合谊，以见指撝”。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合而表达一观念。如“思”，上为大脑，下是心脏，合而表示思维的意思。“然”，上面左为肉，右为犬，下面是火，以火烧狗肉，就是一个燃烧的燃的意思。会意字大多是通过形象符号的组合表达一抽象的意思，合众体而为文，从而表达造字时代人们约定俗成的文化观念。

若论其有意思，会意字乃汉字中最为有趣又最吸引人的一种形式。因为会意字合众体而为文表达一种思想观念，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引发后人思维想象的空间，造字的时代过去了，后人心中的“文化密码本”有所不同，对于前人的会意字有可能“会”出新的意思来，甚至完全不问原先的观念，全凭自己的心灵去创造。在中国古代，会意字惹出的麻烦最多，胡朴安在《中国文字学史》中说：“自来研究文字者，每患此病。”许多人包括一些文字学家常常把本来不是会意字当成会意字，如把像形字当成会意字，《鹖冠子》将“天”解为“一而大者为天”，实际上天本来是像形字。更多的是把形声字当成会意字来看，表面看来言之凿凿，实际上荒诞不经。如王安石所犯的那种毛病（详见后文）。

清方文在为周亮工《字触》所作的序中说：

六书之学，莫妙于会意。会意之妙，在合众体而成文。如止戈为武、力田为男、背私为公、一勺为与、十口为古、大可为奇之类……古人岂不识字哉！仁智异见，拟议无方，此会意之所以妙也。

我们说文字符号的凝定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而这里却说文字可以“仁智异见，拟议无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说你的；我听我的，这就不成其为文字了。但问题是在一些术士的眼光中，本来就不把文字当作语言符号，而当作捣弄方术的符码。神鬼多变，命运屡迁，术士们就是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出阴阳不测之神，如果文字符号只是一种固定的意思，只能有一种解说，他那种神神鬼鬼的方术也就捣弄不起来了。术士们是这样钟爱会意之法，就是因为汉字原来的会意法，给他们提供了掩人耳目的幌子，塞进私货的契机，使他们“会”出神来，引出命来。

会意之法给测士们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他们把什么字都可以当作会意字，就像上面方文所说的，他居然将“奇”视为“大可”的会意，“与”乃为“一勺”二字相会，给你一勺饭，这就算给予了。“古”被说成“十口”，十口相传，时间就长了，岂不古哉！这跟汉字的原有特点了不相类。测字中大量的测例都在无限扩大会意的范围，只要有什么要表达的“意”，都可以在文字中“会”出。

一人以“示”字占六甲，他已有一男孩，想占妻子此胎所孕是男还是女，测士说：“又是男孩。”问其由，测士云：

“‘示’乃从二小，二小即两个小子。”俗将男孩称为小子，女有男样为“假小子”。这里将像形解为会意。

一人生病，求测士为之一占，拈得一“槐”字。测士云：“恐怕无救了，‘槐’为木旁鬼，人为树下之鬼，岂能生乎？”槐本是个形声字，在这里却被理解为会意。

测士们利用汉字六书中的会意方法，去创造会意字，在字物会占中，这一点表现尤为明显。如一人卷入一官司中，不知命运到底如何，拈得一“言”字，测士正想为他算命时，旁边有两狗叫，于是测士断道：“这件官司可能对你不利，因为你刚才拈‘言’字时，旁有二狗叫，合则为‘狱’字，你将有牢狱之事。”又如谢石为那位神秘的老者占卜，那老人立山旁，谢石说是个“仙”字。这都是利用字物或物物的关系重新构置会意字。

胡宏的那个测例最为著名，如二人知胡宏深于算术，相约去请他为其一占，一人妻病，就请占妻病，拈得有一“立”字，胡宏说：“你妻病将难好。”另一人也拈得“立”字，脸吓得惨白，以为也要遭不测，他是求占科举的，胡宏笑道：“足下将高中无忧。”二人退后，旁边有一人知其详情，便问二人同字何以有不同结果。胡宏说：“前一人占时，有人汲水而过，‘立’旁加‘水’，岂不是个‘泣’字？后人占时，有一人立其旁，恰是个‘位’字，所以有此不同结论。”问者方悟。这里利用的也是汉字的会意法来重构字。

三、形音之活力

汉字是从像形基础上胎生而来，当西方许多民族都相继弃去原先的像形文字，而改为拼音文字时，汉字仍然保持着

它原先的总体特征，没有走拼音文字的道路。这使得汉字迥别于世界上所有的拼音文字，而具有十分独特的形体构成特点。

英语只有 26 个字母，通过 26 个字母的不同组合来构成字词，因此它的变化只是字母组合的变化，字母自身除了有几几种写法之外，没有什么变化。因此英语的构词变化可以说是外部的变化。而汉字远没有这么简单，汉字的形体构成有两级形式，大多数汉字（除了独体字）均由不同的偏旁组合而成，各个偏旁又由不同的笔画组合而成。因此汉字一拆可以拆成偏旁部首，二拆又可以拆成笔画。因此汉字形体构置的变化是一种内部的变化，这种内部变化丰富复杂，既有规律性，又有内在的自由度。这一形体特点成了中国人喜欢剖文析字的基础。

汉字的形体特点又具有潜在的滋育化生能力，当然作为文字符号的汉字，它的组成具有严密的规定性，但若撇开文字符号不谈，只把它当作一种文字游戏的工具，当作任意分拆以进行方术活动的媒介，那么它的奇异的再生能力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请看褚人获《坚瓠十集》卷二关于“田”字的解说：

论田之名，士庶为恒产、撰田之实，利害也兼呈。民以食为天，故“田”如两“日”之并扇。食以田为本，故“田”如四“口”之相乃。君王非田，则禄米无资，故田以二“王”为象。户口非田，则生养不遂，故“田”以十“口”为文。山川非田，则秀气不贯，故旷野错综，如四“山”之环抱，平畴

绵亘，似两“川”之纵横。

一个“田”字，按照汉字的构成规律来看，它是一个像形字，它本身是不可拆的。但这里为了论述重“田”之思想，竟然从小小的“田”中拆出两个“日”字，四个“口”乃至十个“口”字、两个“王”字、四个“山”字、两个“川”字。由此亦可见汉字形体的化生能力。

测字的基础是拆字，拆字就靠的是汉字的这种形体化生力。在拆字中，测士们可以任意调遣形体，在汉字形体内部玩出如神似鬼的游戏来。详见后文所论。

汉字单音孤立，一字一音。它们这种标音特点也对测字术产生很大的影响。

由于汉字单音孤立以及其它一些原因，汉字的同音字极多，如同一个SHI音，就有市、柿、世、事、七、是、逝、势、嗜、侍、恃、室、视、式、示、拭、轼等等，这一点在世界文字体系中是非常独特的。

不但汉字中同音字多，而且中国还有一种声音的迷信，如讨口彩就是其中的极端表现，以至发展到今天的拍卖电话、汽车号码这类事。“10888”这个数字对许多人来说，就可能意味着“一年发发发”。从前一个家庭老是不顺利，后来他四处找原因，原因总算找到了，就是家中墙上挂得一幅画，那画上画的是一幅梅花，枝干虬节，枝枝倒放，这是一幅倒梅，因它和“倒霉”谐音，所以被视为祸乱之根。时下春节人家贴“福”字，有意将它贴倒了，意欲获取“福到”之利，“福倒”和“福到”音同。至于中国人关于声音的忌讳那就更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同音字甚多的汉字以及中国人对声音的迷信，也给测字术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测字中利用声音的联系来占断的比比皆是，如你占得一“全”字，如果字形上分解不敷使用，那么就可以联系声音，声音占断来得更简捷，更省事。测士可以说你将有水患，因为“全”和“泉”音同；也可以说你以后官运亨通，因“全”与“权”音同；你要占病，测士可以说病将好，因为“全”又与“痊”音同；你若是占官司，他有可能说有新的麻烦，“拳”也与“全”音同。这上面还是一些同音字，测字者若有兴趣还可以联系近音字，这范围就更广，越说面越宽，越说越离谱。只要你信这一套，你就别愁测士无话可说。

汉字在形音两方面的特点，使得汉字成为测士取之不绝、用之不竭的材料。

第二节 剖文析字的习惯是测字术的土壤

测字之所以能产生，还与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一种剖文析字的习惯有关。

测字是以汉字来预测命运，但是它主要是通过拆字这种方式来达到测字的目的，因此，测字有时候又可称为拆字。俗话说，测字是“字里字外翻筋斗”，翻来翻去，云里雾里，爱怎么翻就怎么翻，翻上翻下，翻左翻右，谁翻得高妙就可高明的“筋斗手”。小小的汉字到了测字者的手上，嘴里虽说重视，但也折磨得可怜，任他分啊拆啊，拿这块，拼这块，大卸八块，鲜血淋漓。汉字原来的构造特点早已置之脑后，剩

下的就是自己的随心所欲，测字者居然能将“也”字拆成“三十一”，将“朱”字拆成“失”、“木”，将“田”字拆成两个“日”、四个“口”、“十口”，将“用”拆成两个“月”字，将“干”字拆成“二、十”，等等。汉字供他任意摆弄，随心所欲打扮，这就是测士真正的“内功”，离了这一点，测字将无所谓测字，一切测字迷信均无所着落了。

测士们为何面对人们使用的好端端的语言符号而如此“放肆”呢？为什么他们对祖国文字如此的破坏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愤怒呢？这个问题回答实际上非常简单，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剖文解字的习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们都这么干过，皇上、大臣、下民也这么做过，剖文解字早就成了论述自己思想的根据之一，成为人们寻欢打趣的佐料之一。也成为认识汉字的途径之一。对测士们的放肆完全不必大惊小怪，他们只不过把剖文解字这种习惯推向更猖狂的境地罢了。

对于中国人喜欢任意剖解文字的习惯，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一、一般剖字习惯

这里指不遵循六书关于汉字结构的基本原则任意肢解汉字，望文而生义。

在先秦这种现象就有产生，如《左传》中所说的“止戈为武”，《韩非子》上所说的“自环者为私，背私者为公”。但是那时这种现象还比较少。剖文解字习惯的流行泛滥是在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就曾批评过像“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这类现象。当时纬书正史这方面的现象都泛滥

不绝。

桓谭《新论·辩惑》第十二云：“道人作金银云：‘钅，金与公，钅则金之公；而银者，金之昆弟也。’”钱钟书在《管锥编》第三册中批评这种现象说：“此道人乃据字体之偏旁立论，望文而臆生义，复取义而臆变文，尽废六书之形声、指事、象形，乃专用会意。”

钱先生的批评当然很中肯，但这种方法只是任意扩大会意的范围，还没有损伤汉字的原有形体。汉时流行的大量字说已不是会意的泛化，而是纯粹的肢解形体。

汉时所传的一些孔子的拆字例，如“推十合一为上”，“一贯三为王”、“禾入于水为黍”等，显然不出于孔子。借孔子之言，是为了替剖文之习找到经典的证明。

汉时的典籍多有拆字之作法。如董仲舒《春秋祭露·天地无二》：“止于一者谓之‘忠’，二‘忠’谓之‘患’。”这显然是拆字。

汉世纬书，拆字之习最盛，兹举数例以证：

《春秋元命苞》：

水立字，两人交，一从中出者为水。一者，数之始。两人譬男女。阴阳交以起一也。（据《五行大义》引）

地者，易也。言养物怀任交易变化，含吐应节，故其立字“土力于乙”者为地。（据《开元占经·地名体》引）

日者，口合共一。（据《太平御览》引）

两口衞士为喜。（同上引）

屈中挟乙而起者为史。(同上引)

仁者，情志好生人，故其为人以仁。其立字二人为仁。(同上引)

八推十为木，八者阴，合十者阳数。(同上引)

罔言为罍，刀罍为罚。(据《广韵》引)

刑字从刀从井，井以饮人，人入井争水，陷于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惧以全命也。故从刀从井也。(据《一切经音义》引)

《春秋说题词》：

星，精阳之荣也。阳精为日，日分为星。故其字日下生也。(据《艺文类聚》引)

天合为太一，分为殊名，立字一大为天。(据《法苑珠林》引)

西米为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阳精。(据《太平御览》引)

《春秋说》云：人十四心为德。(据《颜氏家训·书证》引)

汉纬中充斥着大量的以字占解的现象，为了敷衍自己的纬说，不惜损害汉字的原有结构，作出完全背离汉字结构意义的发挥。汉纬这种解字以说义的风习在后代影响甚大，许多人明明知道此类解说不符合汉字的特点，但为了确证自己的观点，只能委屈这小小的符号了。魏晋南北朝时，谶纬术中多喜拆字，如将“大亨”拆成“一人二月了”，将“天正”拆为“二人一止”，将“天保”拆成“一大人只十”，将梁末帝萧瑱之“瑱”拆为“一十一十月一八”，如此不一而足。

唐时此风不绝，当时人将“李”拆为“十八子”，将“唐”拆为“元吉”，将“仝”拆为“人王”，将“太和”拆成“一人十八口”。

宋代的文字崇拜达到空前热烈的程度，剖文析字的风习也比前代更普遍。王安石的《字说》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穷数年之力，成《字说》二十四卷，他对此自视甚高，并上表皇上，“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可见影响之大。王安石《字说》一反《说文》六书之法，力求创新，在六书中，仅取会意一法。他说字的目的是为了推陈自己的观念，文字符号变成了一种教育的工具。

王安石是一位诗人，他在剖文析字上也体现出他诗人的想象力，请看下面他对一些文字的说解：

人人为之谓伪。

位者人之所立。

讼者言之于公。

分贝为贫

伶，非能自乐也、非能与众乐乐也、为人所令而已。

歃血自明而为盟。

二户相合而为门。

蔗，草之庶生也。……

王安石把所有汉字都当作会意来解。他的《字说》虽在分拆字形上表现不甚明显，但在取义上则体现了空前的随意

性。因此他的解字方法对宋时的测字术影响甚大。测字中实际上有很多方法与王氏字说很类似。如一人以“贵”字问科举，测士说“中一目人”，即独眼人可得中。一人以“易”字问归人，测士说：“今日勿归。”他将“易”字拆为“日、勿”，然后再以会意方法将其串解。读这些字例，真疑是王安石之《字说》。

说起王安石和测字的联系，还有一则有趣的神话，《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引景齐《神机相字法·自序》云：

偶信步山石，忽见一异人，箕踞于盘石，询某曰：“子非景齐乎？”仆惊其预知姓名，疑是神人。异人曰：“此乃《东华洞文》。上卷《奇篇》，尝付安石，今日以中卷授于子。”密窥乃阴阳秘记、释字神机之书。

看来人们早就把王安石《字说》和测字术联系在一起，若细审王氏之字例，这种联系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离合诗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出现一独特的形式：离合诗。离合诗主要特点是以四句或八句等诗歌形式，隐喻几个汉字，从而表达诗人的基本思想内容。它含蓄、隐晦、耐人咀嚼，颇能解文人之技痒，亦能助读者之诗趣。它作为一种文字游戏，自汉代产生以来，后代许多诗人都玩过这“劳什子”，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大诗人。

离合诗中的绝技就是肢解汉字，就是将汉字先“离”，然

后再“合”。它在分解文字上，全没有“六书”那么多规矩，想怎么分就怎么分，只要离得痛快，不惜离得离奇，如果读者读后“合”不起来，那是读者的知识和领悟能力的问题。离合诗实际上是中国人喜欢肢解文字的习惯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它也为测字的出现提供了滋养。

较早的一首离合诗是汉末的一首古诗：

藁砧今何在，山上复重山。
何时大刀头，破镜飞上天。

这首诗非常隐晦，很难理解。“藁砧”是一种石砭，“砭”谐音“夫”。“山上复重山”，出也。大刀头，称为刀钗，谐音为“还”。破镜上天，隐半月也，即月初。整首诗暗含五个字“夫出还月初”。

有一首孔融的离合诗流传甚广，诗云：

渔父屈节，	水潜匿方。
与时进止，	出行施张。
吕公钓矶，	盖口渭傍。
九域有圣，	无土不王。
好是正直，	女回于匡。
海内有裁，	隼逝鹰扬。
六翮将奋，	羽仪未彰。
蛇龙之蛰，	俾也可忘。
玫瑰隐耀，	美玉韬光。
无名无誉，	放言深藏。

按轡安行， 谁谓路长。

整首诗暗含六个字：鲁国孔融文举。前四句是“渔”去“水”加“日”为“鲁”。下四句为“國（国）”字，上两句为“口”，下两句“域”去“土”为“或”。“好是正直”四句隐“孔”字，上二句“好”去“女”为“子”。“六翮将奋”四句为“融”字。“玟璇隐耀”二句含“文”字。最后四句则含“举”字。

魏晋南北朝时做离合诗已成为一种时尚，如谢惠连有一离合诗云：

放棹遵遥途，方与情人别。
啸歌亦何言，肃肃凌霜节。

这首诗如无作者提示，可能谁也不知其为离合诗，全诗含一“各”字，前两句“放”去了“方”剩下反文，后两句“啸”去“肃”为“口”。隐喻巧妙，意象也很鲜美。

著名诗人谢灵运也是作离合诗的高手，他的一首离合诗云：

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
加我怀缱绻，口咏情亦伤。
剧哉归游客，处子勿相忘。

全诗含一“别”字，前两句含“口”、中二句含“力”，末二句含站刀。将外在诗歌的别意和所含之“别”字和谐地融

合在一起。

从以上所举数例可以看出，离合诗的主要特点就是分拆汉字，这与以拆字为主的测字术颇为相似，所以古代测士们都颇重离合诗，他们有时在占断时，偶尔还吟上一首离合诗来助趣，同时也示其高明。古代的测字专著也都注意到离合诗对拆字术的影响。

三、字谜、对联等中的字形分拆

字谜和对联之中的字形分拆现象更为普遍，由于它们和测字术同属民俗形式，因此它们对测字术有更为直接的影响。

先说字谜中的字形分拆情况，这里仅举几例：

四山相对顶相连，横也川，竖也川，团团一家
共十口，只有四口不周全。（谜底为“田”）

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一山又一山，三山
皆倒悬。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
室，两口不团圆。（谜底为“用”）

花谢化火烬，流水水无踪。（谜底为“荒”）

倚阑干东君去也。霎时间，红日西沉，灯闪闪，
人儿不见，闷淹淹少个知心。（谜底为“门”）

字谜中的拆字法和测字基本上没有区别，它们都是不论汉字的构造特点，任意肢解，任意组合。只是结果不同，一

猜出谜趣，一测定命运。

拆字联也是对联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例子也极多，兹举数例为佐：

海晏河清，王有四方当作国；
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

人曾作僧，人弗可作佛；
女卑为婢，女又可为奴。

半夜生孩，子亥二时难定；
两家择配，己酉二命相当。

二人土上坐；
一月日边明。

人从门内闪；
虫向水边浊。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所谓测字也好，还是拆字联也罢，在致思途径、分拆技巧上几乎是同一机杼，差别仅在于一把人玩得如醉如痴，一被人玩得走火入魔。

第三节 文字崇拜是测字术产生的心理依据

我们不但有独特的文字，而且有对文字符号独特的态度，这也是导致测字术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没有对汉字的崇拜态度，拆字这种方术活动也不可能产生。

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字崇拜心理，这种心理大致产生于汉代，随着历史向前推进，汉字的神秘色彩越加浓厚，人们对汉字的崇拜心理也日益加深。

这一情况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正好相反。在世界早期的造字传说中，一般都将文字归之于神的创造。腓尼基人奉 Cadmus 神为字母的创造者，诺尔斯人奉 Odin 神为 Rune 字母的创造者，希伯来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字母的创造者。

而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人将汉字归之于仓颉的创造。造字传说认为，上古无文字，人们只靠结绳记事，遇到大事就打个大结，遇到小事就打个小结，借你五斗粮就打五个结，还你三斗就打三个结，如此处理方式不知经历了多少万年。到了黄帝时代，出现了一个非凡的人，他生下来就与众不同，长着四种眼睛，长大后更是威风凛凛，龙颜侈侈，四目灵光，普照大千世界，洞察幽微，俯仰广袤，贯通天人，心领神意，懂得人间的一切奥秘，于是他“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①。

他创造汉字的那些日子真是神异至极的时光，据传他的

① 张怀瓘《书断》

创造感动了天地，使得“天雨粟，鬼夜哭”，龙羞愧地藏起了自己的身子，青云围着太阳袅袅作舞，整个宇宙都放射出这文字所进射的奇异的光。因为真正的文明诞生了。中国民族从混沌走向清明，从野蛮走向文明。

在西方民族，造字神话随着历史的演进其神秘色彩日趋淡化，而在汉民族这种情况却恰好相反。在先秦，有关仓颉造字的传说只有极简单的记载，《韩非子·五蠹》中只说：“仓颉之初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吕氏春秋·君守》：“仓颉作书。”根本没有什么神秘的意义。仓颉的神话是汉人创造起来，一方面是那迷信时代的特有产物，另一方面汉字的神话创造恰恰也是为了政治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因为人们需要来自汉字中的所谓神灵的支持。仓颉一步步被推向神坛，造字传说中神秘色彩也愈加浓厚。人们不是要创造一个造字神，而是要创造一种神灵的符码汉字。

据史书记载，汉以后几乎历代都有崇拜仓颉的活动，并设有仓颉庙，供人们拜祀。东汉武梁祠中就有仓颉的画像，人们当时称他为仓精。汉熹平六年《仓颉庙碑》是这样描绘仓颉的：

仓颉，天生德于大圣，四目灵光，为百王作宪，
以垂万利。

大约在汉武帝以五经取士以来，河南省南乐县吴村（古称吴娄村）就被人们认为是仓颉的故里，在这里修过仓陵、仓庙。据《南乐县志》、《读史方輿纪要》等记载，西汉时人们就在此大兴土木，营筑仓陵，“周围数里，敕建御祀。”后代

仓陵、仓庙的规模越修越大，每朝每代几乎都续有建筑，不仅在吴淞村，在全国各地都修有仓庙，供人们拜祀，古人将此称为“圣庙”，每年阴历正月二十四为仓神庙会。

这种情况到了宋明发展到了极至。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记载宋时的情况：

京师百司胥吏，每至秋，以醪钱为赛神会，往往因剧饮终日。苏子美进奏院，会正坐此。余尝问其何神，曰：“仓王”。盖以仓颉造字，故胥吏祀之。

当官者大都是科举的路子上来的，他们都是靠认读文字而渐渐获得知识的。这种崇拜心理还奠定在实用的基础上的。

仓颉地位的突出，神而明之，光辉灿烂，这样也就使他所创造的符号更具有神秘的特点。造字的神话传说，不仅造出一个仓王、仓圣，而且造出了千千万万的神灵的符码。因此人们在崇拜仓神的同时，又将其一瓣心香奉献给汉字符号。别的不说，我们就此一些民俗形式中就能看出这一点。

中国人对文字符号始终有一种神而明之的心理，这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如我国古代有惜字的习俗。人所聚居的地方，常常放有一个“惜字篓”，要人们敬惜字纸，孔庙前就有敬惜字纸的牌匾，旧时的私塾也多设有惜字篓，人们写过的废纸不能乱丢，否则会得罪字神，从而影响了自己的前程，至今在民间这一风习尚有存在。“惜字篓”的名字透出一股虔诚，今人叫做废纸篓，古人却不敢这么说。既然有惜字篓，收满了字纸又怎么办呢？还是不能乱丢，古代又设有所谓“惜字冢”，它是专门供给人们埋废字纸的地方。掩埋字纸

时，有些虔诚的私塾教师还要让学生跪叩，行敬字神礼。另外，古代还有“惜字会”的习俗，集会照例还是为了歌颂造字者的功德，歌颂汉字的神秘作用。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有清时惜字会的情况，时间多在早春二月：

香会，春秋仲月极盛。惟惜字文昌会为最。俱于文昌祠、精忠庙、金陵庄、梨园馆及各省乡祠献供乡会，功聚千人。

中国人的神话汉字的努力不仅体现在神话企盼、崇拜汉字方面，还体现在神化汉字的来源方面。汉字不仅由神灵所造，而且它还和另一个比它更神秘的符号八卦符号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八卦为伏羲所创，据说此符号可囊括天地，包括神人，“以能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被一般认为是孔子所作的《易传》中，易卦符号就被彻底神秘化，神无方而易无体，易道幽微洁净，难以厘测，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每一个符号都可上通神灵，下通人伦，它是神传授给人的神秘符号。

为了和易卦攀上亲，古代许多学者一直在试图证明：八卦就是八个汉字，汉字是八卦的起源。《易纬·乾坤凿度》就认为，☰，乃占天字，为乾卦；☷，占地字，占地作☷，为坤卦；☴，古风字，为巽卦；☶，古山字，为艮卦；☵，古水字，为坎卦；☲，古火字，为离卦；☳，古雷字，为震卦；☱，古泽字，为兑卦。

后代许多著名学者如陆德明、郑樵、杨万里、黄宗炎等

均附和其说。至近仍有刘师培、梁启超、郭沫若大张其说，这样，易字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就成为学术界一般认同的学说。汉字也因此获得了易卦的所有神秘内容。它们二者的联系，还在其它一些方面得到体现。如许慎就完全摹仿《易传》确定汉字的创造方式、汉字的内在体系，这便更加强了易字之间的深层联系。

汉字的发展历史始终伴随着人们围绕它所进行的神化的历史。这样使得汉民族中的许多人在接受汉字时，常常有一种错觉，总以为其中有什么神意妙理，有什么机吉凶吉的内容，人的命运似乎都包容在其中。

这样围绕汉字所产生了许多神秘的方术活动，这和对汉字的神化不同，汉字的神化是为了造一种神秘的符号，而汉字方术活动则热衷于直接从这一神秘的符号中掘取神意了，它已经把汉字不当作记录语言符号，而当作蕴含神意的密码。没有这个前提，一切汉字方术活动便无缘产生。

这种汉字方术活动，内容十分广泛，如字符、字梦、字讖、符应等，测字是汉字方术的最重要的形式。测字和其它汉字方术一样都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其它汉字方术活动的流行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测字术的发展。

字梦、字讖，符应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测字的内涵，这我们将在后文讨论，而符篆却是与测字迥然不同。符篆主要产生于道教，它是将汉字加以彻底变异，弯弯曲曲，龙翻雾卷，即所谓“鬼画符”，画得越离奇，可能就越神秘，所以制符者虽不离汉字，但却尽量画得让你看不懂，只有细细辨析才有汉字的影子。据说这种字符作用非常大，贴在门上可避凶神恶神，贴在床上可保你岁岁平安，如果生了病，不必去看医

生，而是吞字符，让人写好一张符，烧后其灰烬和于水中，然后一口服下，这叫“服符水”，因为符大都用红字来写，又称“丹书吞字”。据说符水可以包医百病，无不灵验。《太平经》卷一〇八云：“欲除疾病而大开道者，取决于丹书吞字也。”这种吞符水的习俗在民间极为普遍，至今在一些地方还有存在，当然它害得人也不会太少。清褚人获《坚瓠五集》卷四载：

宿州天庆观，雍熙中，回道人访观主不遇，题二诗于门。其一云：“时传丹篆千年术，口诵黄庭两卷经。鹤观古坛槐影里，悄无人迹户长扃。”乃玉柱篆，往往为人刮去，煎汤治病，而字迹复生。

玉柱篆是写字符常用之体，所以人们把它当作字符，刮去治病，由此可见文字的功效

另外，字符还能除妖灭邪，如有妖怪作祟，贴上一张字符，也可以使妖魔云消雾散。这里我们再引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二上的一则记载：

山行念“仪方”二字，可却蛇虫；念“仪康”二字，可却虎狼；念“林兵”二字，可却百邪。夜行念主夜神咒曰：“婆珊婆演帝”，可避恶梦。赌博时念：“伊谛弥谛”、“弥羯罗谛”万遍，则赌博必胜。又渡江河者，朱书“禹”字佩之，免风涛。这里所引有的是咒语，有的是字符，如大红之字“禹”。

在字符中，汉字的神秘作用被极度膨胀，一字治百病，一

字除千邪，一字得万顺，在人们心目中如同一威严的神殿，它牢牢主宰着人间一切的变化。当我们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赋予字符那么大的作用时，也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许多人为什么会迷恋测字，小小的汉字既然能含有能恢复人间安宁的力量，那么它也应该能够预测着人生命运发展的轨迹。对于一个迷信者来说，他的思维立脚点不正是如此吗？

就这样，测字术便在汉字的神秘的天国中浮突而生了。

第三章 求测方法

测字的出现，在民间方术活动中，确实别具一格。它简便易行，行之有效，利用汉字天然的“神”性、或天生的“谜”性，便可使求测者迷而信之，信而迷之，进入一片神奇的小天地。因此，从宋元到清代，测字先生的队伍愈来愈大，人数也愈来愈多，只要头脑活泛、能言会道、粗通文墨的人都可加入此行列。他们中有的穿梭于乡村野陌，出入于豪门大户，做起了“流动贩子”；有的则写些字片，支一小凳，竖一测牌，或挂一小旗，做起了“定点买卖”。测字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绝好的谋生之路。

这条路走起来确实很方便。求测者来了，或拈上一字，或写上一字，再说明自己的来由，测字便开始了，白灿灿的银两于是便流入了测士的腰包。

测字这场戏，术士唱的是主角，求测者唱的是配角。配角求测有哪些方法呢？这，便是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

下面谈三点。

第一节 以字求占

以字求占是测字方术中最为常见、也最为“正宗”的一

种求测方法，它简单易行，人人可为，不论是学富五车的高人雅士，还是穿裘乘肥的达官贵人，抑或是目不识丁的草民野夫，只要感到前途无“亮”、吉凶未卜，均可通过这种简便之方式在测字先生那儿得到你所需要的“答案”。

这种方式之所以盛行，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还在于人们对字充满着难以言尽的迷信心理。在古代，文字被视为功侔造化，惊神泣鬼，“启文明而有象，衍圣教于无穷”^①的神圣符码，这种符码潜藏着天机命数，涵茹着人事吉凶，因而人们才对它崇而敬之，敬而仰之，并把它推上了神圣的“祭坛”。

对古人来说，“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他？”（《二刻拍案惊奇》卷一）是的，古人太“贵重他”了，测字之所以产生正恰好体现出人们对它的“贵重”，对它的迷信，相信它具有“一字可以决万物，片言可以正彗身”（程省《测字秘牒·自序》）的巨大功能。从此意义上说，以“字”求占也实在是势所必然、理所当然、情所宜然的事了。

以字求占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若细加甄别，又有多种，常见的有拈字求占、指字求占、书字求占、说字求占、画字求占等等。下面我们就挨家挨户作一番“家访”：

一、拈字求占

拈字求占是以字求占中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

测字先生常备有一个口袋，里面装有预先写好字的纸片，或折叠好的纸团，求测者来后，从口袋中任意取出一个，便

① 清罗允猷《惜字炉碑文》

可以让测字先生来占断。

这种求占方式，对测字先生来说，自然是再简单不过的方式。因为测字先生对袋中之“物”早已心中有数，一个字该如何测，其方方面面的可能性在他心里不知“预演”了多少遍。如一个“天”字，有多少种拆法，占婚姻怎样说，占官事怎样讲，等等，其吉凶两方面的各种可能性都事先预想好了，这样占断起来岂有不从容之理？！

从求测者这一方来说，拈字求占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随意性强、偶然性大，这里就有人们所讲究的机遇、命运的作用，而古人相信的也恰是这一套，故何乐而不为呢？！

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大学士张之万在未中进士之前，曾寓居在杭州。一次，正赶上一个节日，他来了游兴，就和友人一道随着游客去游玩吴山。途中，遇一测字摊，他颇想一试，看看自己前途如何，便上前拈一纸团，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个“死”字。他大惊失色，想丢下纸团就走。测字先生忙叫住他，问他欲测何事，张之万答道是科名。测字先生便把“死”字仔细地端详了一会，于是提笔把“死”字的一钩抹去，在旁边批上“癸卯一人”四个字，向张之万拱手祝贺道：“你拈得这个字，真太吉利了，把它一拆开，便是‘癸卯一人’，这分明是预示你癸卯年当大魁天下啊！”这时，旁边的友人见他所拈之字如此吉利，心中也想试一试，就让测字先生用这“死”字为他占一下婚姻如何。测字先生皱了皱眉头说：“你以此字来求测，大不吉利啊！你看，‘死’上面是‘一’，下面是没有心的‘怨’，合起来是说怨偶无心，昙花一现，恐有亡妻之痛啊！”这位朋友本来就没有妻子，听他

这么一说，觉得很荒唐，就一笑了之，不把这话放在心上。第二年，正赶上癸卯年，张之万果然考中进士，其友人也娶了个娇妻，两人关系十分和睦，但这位朋友心里总不踏实，希望测字先生的话纯属无稽之谈。但不久，他的妻子竟因病作古，他也真的饱尝了亡妻之痛。

同书又有这样一例：

浙西陈钟年善拆字，名噪一时。有巨贾吴某者，苏人也，久商于浙。某日得家书，以妻病危笃，促之归。吴忧甚，即访陈就之卜。至则门已闭，吴叩之急，陈乃推窗而询知来意。时方有一犬在旁狂吠，陈即语曰：“死矣。”吴厉声曰：“字尚未拈，焉知生死！”陈曰：“顷者吾之口与汝之口交谈，则为两口，又加一犬，则成一‘哭’字也。”吴懊恼归，然未之信。

由上面这两个测例，我们大致可以明白这样两个事实。其一，拈字求占的程序一般是先去测字先生那儿，任意拈取一字，拈取之后，或说明求测内容，或由术士询问测事内容，然后方可占断。这其中，拈字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最后一个测例中，那位吴某厉声叫道：“字尚未拈，焉知生死！”就足以见出拈字的重要。也惟其如此，当陈钟年断他妻子“死矣”时，吴某尽管很懊恼，“然未之信也”。其二，拈字求占随机性大，而人们也就相信这种机遇。它正如易占中求占者分蓍草一样，这随意一拈，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正因如此，张之万拈得一个“死”字，就大惊失色，想弃之而去。也因

为如此，当术士断出张之万有大吉大利，“癸卯之年当大魁天下”时，其友人立刻就拈同样的字来求占婚姻。更有意思的是，当这位测字先生断言他将有亡妻之痛时，他固然一笑置之，但此后又总感到心里不踏实，希望术士所断乃胡说八道。这就表明求测者十分相信机遇，也异常迷信测字。

拈字求占一般是求测者主动上门去拈字、再求测，但有时也可让术士前来，再拈字求占。请看下面明代术士马守愚的一个测例。

某官吏退休后赋闲在家，有一次把马守愚请到府上。他信手拈一“休”字，求占日后前景如何。马守愚把字拿到太阳下面，从反面对着阳光，凝视了好一会，说道：“奇怪呀，怎么‘休’字一反过来看就成了‘兵’字？莫非兵部长官尚有缺额正等您去呢？”官吏一听，笑了笑说：“我已经好像是长安城里的尘土一样，是个老朽不中用的人了，朝廷哪里还会用我呢？再说我已好久没有再去当官的念头了。请先生不要这样说。”谁知过了不久，边境战火再起，这位官员因有治理边境的才能，被举荐为少司马。

在这个测例中，这位官员的求测方式是把术士请来再求占，与前面那种主动去求测的方式是不尽相同的。

二、指字求占

在古代测字中，指字求占也较为常见，而且门道也还不少。先请看《说海》中的一段记载：

（谢石）每肆中以牌写千字，不识字者，任其所指，祸福俱应。

根据这一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指字求占至少在宋代时就相当流行。它之所以流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求测者、占断者双方都很有利。

从求测者一方说，你想测上一字，就用不着为“不识字”而犯愁。同时你任指一字，其随意性也很大，正可试试你的运气如何，前景怎样。

从占断者一方说，指字求占虽然很随意，但只要是测字牌上所写的字，你还能不“胸有成竹”吗？！

也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指字求占的方法便一直沿续下来了。

下面，就请看明后期测字高手郑仰田的两个测例，它收录于《字触》中：

天启初，将卜相，南乐指“全”字为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画，当相四人。”问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画为‘土’，当有姓带‘土’者；省四画为‘丁’，当有姓‘丁’者；省两画纵横为‘木’，当有名属‘木’者。以所省之文全归之，当有名‘全’者。”南乐曰：“木非林尚书乎？”曰：“独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莆田、贵池、元城、涿州四相，俱一如其言。

晋江李焰，与奄党吴淳夫有隙，指“吞”字以问。仰田曰：“彼势能吞汝，非小敌也。从‘天’从‘口’，非其人吴姓乎？”“然则何如？”曰：“‘吴’，

以‘口’为头，彼头已落地矣，汝何忧？”逾年而吴伏法。

上引两个测例，求测者都用的是指字求占法。但这两例，其所指之字是写好带去的呢？还是在术士那儿，在术士所摊开的字当中任挑一个的呢？因无明证，难以坐实。但我们不妨这样来推测，假使是求测者写好带去的，那么，对求测者来说就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对术士来讲，占起来难度就大一些。假使是在术士那儿任指一字来求占，那么，对求测者来说，其随意性大，而对术士来讲，占断准确的概率也大一些，因为这些字早已在他心里不知过了多少遍。

但有意思的是，指字求占有时确实比拈字求占的随机性更大一些，因为指的是什么字，对求测者和占断者来说都是个未知数，这样一方随意指字。另一方据字来断都十分偶然，对相信碰运气的人来说，此法似乎就更道地一些。我们不妨来看这样两个测例：

王友家人妇，晨出市物未还，指册中“叁拾”二字乞占。断曰：“此人走矣，当速追寻。”又开册指“陆拾”二字问方向。断曰：“太平。”遣人追，果得。王请其故，曰：“‘叁拾’为‘大三十’，‘大三十’合成‘奔’字，故知其走也。‘陆拾’为‘大六十’，‘大六十’三字乃‘太平’二字也，故知其地在太平。”

先生过京口，有旧交于姓，以讼事在镇江候所亲不至，乞占，随于方书中指得“湾（泻）”字。断

曰：“人因中途有阻，今已到。”问几时，曰：“刻下。”

茶未熟，人果至，因路染霍乱来迟。喜谢曰：“~~悉~~闻

字中理。”曰：“‘瀉’头如门，字形如马，三点水

借作镇江江字用，马呈已到江门间，所以知其到之

速也，字中有‘且’字，故知中途有阻。”友深服。

此二例均载之于《字触》。在这两个测例中，一是指牌册中的字求占，一是指方书中的字求测，其偶然性都很大，随意性都很强，这就把求测者碰碰运气的心理给突现出来了。

也有时，指字求占并不需要去术士那儿，而是“请君入室”，再随手指出一字来求占。这种方式更需要测字先生有随机应变的本领。《清稗类钞》中就载有这样一个例子：

苏州上津桥朱某以家贫，困入山自尽，遇仙，授测字一书，其验如神。惟求之者必预定，日仅测一字，取银一两。悬牌门首，某日测某人字。吴三桂将反，向苏藩库借饷，时慕天颜方为藩司，踌躇莫决，延朱测字。告以故，朱曰：“请大人命字。”适几上有残柬，慕即翻转，指“正”字为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乱。且柬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即反之兆也。”慕即拒之，果应其言。

此测例，慕天颜并未去求测，而是“延朱测字”。测字时，所指之字也很偶然，慕天颜当时恰好见到几案上有一些残柬，他信手一翻，恰好看到“正”，遂指此字求占。这样一来，术士

的难度就相应地大多了，因为他对求测之字并没有像所拈之字那样心中有数，要想占对断中，还得见机行事。但朱某毕竟不是凡庸之辈。他很会相机行事。从他的断辞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机遇把握得恰到好处，这个“机”也就是断辞中的这句话：“且柬正面合儿上，正而反矣，即反之兆。”由此，我们不能不说他极具相机应变，当机立断的本领。

下面一个测例更有意思：

刘常心有所欲占，延槎（张乘槎）而不言其事。试令书之以验其术。槎曰：“书一字方可占。”适有小学生存傍，正写习《千字文》，至“德建名立”。刘就指“德”字令占之。槎曰：“子欲占行人耳。”刘曰：“然。何时当至？”槎曰：“自今十四日必来。”刘曰：“恐事未了不肯来。”槎曰：“一心要来。”后果如所占。刘问故，槎曰：“‘德’字双立人，乃行人耳，故知占行人。傍有‘十四’字头，故云十四日。下又‘一心’字形，所以云一心要来也。”（《拆字部纪事》）

此测例，求测者颇“狡猾”，请来术士偏不说欲占何事，让他书字却偏又信手指出一字，这显然带有考考术士身手怎样的意味。因而，对术士来说，要想占对不出茬子，难度可真不小。但张乘槎居然据字分拆，还一一“对上了号”。我们固然不排斥这里面可能有附会，有“水分”，但它足以表明，指字求占所追求的就是那种猝然相遇，默然相契的效果。

三、书字求占

以字求占中，书字求占最为常见，它始见于宋，后代仍广为使用。

宋代是测字术繁荣时期，这种繁荣的突出标志之一就是此时出现了许多以测字谋生的“专业户”，诸如谢石、朱安国、汪龙、胡宏等等，莫不如此。他们或摆摊竖牌，“定点营业”；或行游四方，“流动作业”。这样一来，书字求测的人就多了起来，有时甚至会演成“四方求相者，其门如市”（《蓼花洲闲录》）的盛况。

书字求测本身也有多种情况，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自书字求测。

自书字求测对测字先生来说，难度要大一些，因为求测之字可能会出于意外，是他事先没有准备的字，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说中断准，就完全取决于随机应变，“临场发挥”的本领了。

那么，这种方式对求测者来说又该怎样呢？

由于这种方式是自书，选择什么样的字，就有了一定的主动性。所以求测者在选择字的时候，便会有意无意地去选择那些吉利的字眼，而避免选用那些可能会遭灾惹祸的不吉利的字眼。请看下面几个测例：

新安朱安国善相字，绍兴三十二年六月，至鄱阳。是岁壬午，当举场开，士人多在州学，从之占问。段毅夫示以“飛（飞）”字，朱书其侧曰：“二九为升”。扣其说，对曰：“飛”之为字，从二，从

九，从升，但据笔画言之，不能知其义，未可便决祸福。”及秋试，以第十九名荐选，朋友贺之曰：“十九者，二九也，君必正遇。”已而省试失利，乾道元年乙酉再举，复中十九名，遂登第。始悟二九而升者，两次十九方成耳。

四五举子赴京，共写“贵”字问（汪）龙。曰：“好，必中。”其中有一独目者，临去留之，私语曰：“今此去，只中相公一人，余俱不中。”问故，曰：“不见‘贵’字，乃‘中一目人’乎？”果然。（均见《字触》）

在这两个测例中，求测者所书之字均是吉利的字眼，这显然是精心选择的，因为对举子应试而言，最大的吉利自然是能中举而腾“飞”、名显而身“贵”了。但从所断的结果来说，段毅夫固然“飞”起来了，但“飞”得并不顺利；四五个举子共写“贵”字，但真正“贵”起来的也只有独眼龙一个。这表明，人生显达与否、吉凶如何，往往并不取决于字眼的好坏。测字先生的“绝招”之一就在于吉处说凶，凶处说吉，谓予不信，有诗为证：

问喜何曾喜，问忧未必忧。

问乐何曾乐，问愁何曾愁。

问死何曾死，问生不曾生。

问官官不谐，见财财不成。

——《拆字部汇考》

也许正有鉴于此，许多有经验的求测者，常常反其意而用之，为求吉利，有时偏去选择一些凶险字眼去求占。据《草木子》上记载，魏忠贤有次让术士给他占断，先写一个“囚”字，后又写一“饥”字，这两个字都是凶险字眼，他之所以如此胆大，显然是知道这凶险字眼有可能会给他带来好运。

《字触》中另有一例，求测者胆子更大：

有以“哭”字问病，曰：“是兄何人？”曰：“父也。”曰：“止生足下一人耳。”曰：“然。”曰：“不妨。”问何故，曰：“上面两口双全，下面一人，以时而论，戌日便好，‘哭’为水，戌土制之。不但如此，还应得一子，以‘犬’字傍有一点也。”

此测例，儿子为父亲的病求占，却用了极不好的字眼——“哭”，这也是针对术士有逢凶化吉的“特异功能”而有意选择的。事实本身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术士不仅断出其父病重会好，而且断出他还有添子之喜。

但不论是凶险之字、还是吉利之字，都显得有些刻意，反不如信手写上一个字来得自然随意，因此，对相信随意中有机遇的人来说，就倾向于避开吉凶两极，而采用随意自书以求占断的方法。这种方法相对于写吉字或凶字来说，使用得更普遍。具体来说，又有这样两种情况：

其一，求占时自书一个不吉也不凶的中性字，此字略带一点意义的指向性，与求测之事多少有一点关连，但并不那

么具体。如有人曾写一个“子”字让周亮工给测一下自己将得男孩还是女孩，周亮工见后，占道：“‘子’字拆开来，就是‘一个丫头’，看来你将有个女孩。”又一次，有一姓闵的人，妻子得了病，很久未见好转，他甚是着急，便写一“闰”字请周亮工给占一下。周亮工知道此人姓闵，求占的却是“闰”，就笑了笑断道：“你姓闵，却以‘闰’求占，这是以‘玉’换‘文’。玉者素（白）也，文者采也，以素易文，乃逢丧素服之凶兆。再说，‘闰’这个字，当中是‘圭’字去掉了头，所谓‘闰’中不全啊！不仅如此，‘闰’这个字，其中又有门内一土之象，这也不吉利。据此为断，贵夫人的病恐难痊愈，她将不久于人世。”这两个测例，前一个是以“子”字求占六甲（生育），后一个是以“闰”字求占疾病。相比之下，“子”与六甲虽有一定联系，但并不具体；后一例，“闰”与“闵”也仅仅具有一点点关连，其意义指向却相当模糊。

其二，求占时随手写上一字，甚至连与测事相关的那一点意义指向性也没有。这种情况的随意性最大，也最能体现碰运气的心理。例如，曾有一人，在外面得了病，他的家人十分着急，遂写一“彤”字，去请汪龙占一下吉凶。汪龙断道：“这一定是远方的人病了。”家人感到很惊诧，忙问道理何在。汪龙说：“‘彤’字音为同，形状却像‘彤’，‘彤’是祭祀的第二天，如果是在家里的话，哪有已经祭祀了才来测问的道理呢？再说，杉木从‘丹’，说明棺木已涂上红漆；按时间来推断，一个月之内，当用船载尸体而归。因为‘彤’左边像‘舟’，右边如‘帆’。”后果然。此测例中，“彤”与求测的疾病了不相涉，风马牛不相及，显然是信手所书。再请

看一例：

乾隆戊子，纪文达（纪晓岚）以事获谴，狱未决时，伴守之军官精拆字，乃书“董”字叩之。军官测曰：“君必远戍，‘董’字似‘萬千里’也。”又书“名”字，军官曰：“下为‘口’字，上为‘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为夕，其西域乎？”又问将来能否遇赦，曰：“字形类‘君’字，亦类‘召’字，必赐还。”又问遇赦当在何年，曰：“‘口’字为‘四’字之外围，而中缺二笔，殆不足四年矣。”已而果遣戍乌鲁木齐，以辛卯六月赐还，一如军官所言。

在这一测例中，纪晓岚先书“董”，后写“名”，都是漫不经意，信手所至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见不出其意义的指向性。这方面的例子最为习见，这里就不再举例了。

书字求占一般说来是求测者自书自问，但有时也不尽然。据记载，宋代谢石就遇到过这样两个测例，一是某人妻子怀孕过月，尚未生产，其妻“手书一‘也’字，令其夫持问”（见《蓼花洲闲录》）；二是某人妻子丢失了珠冠，遂“书‘失’字，命厥夫请肆”，找谢石求占见（《夷坚志》）。这两个测例，求测者虽自书，却没自问，而是由丈夫去“代劳”。这倒并非由于女人在古代不便出门，因为我们在测例中还可发现许多并非女子却让人“代劳”的例子，清代测字高手周亮工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测例：

冯公失厮养儿，书“走”字于仆掌上视栢公（周亮工），时一仆同至。公曰：“双人加‘走’为‘徒’字，覓之徒然耳。然是人更不须覓，不久即亡，以‘走’字离合之为‘土下人’也。”后日，见厮养儿死大堤下（《栢公笔记》）

在周亮工的这个测例中，求测者冯公也是让仆人去“代劳”的，而且其写字的方式也很独到，他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仆人的手掌之上。

总而言之，书字求占的方式相当灵活，既可主动选择，又可信手写来；既可自书自问，又可他人“代劳”，这或许也正是它最为求测者所乐以使用的一个原因吧。

这里值得附带一提的是，对一个求测者来说，使用哪种求测方式，本来是相当自由的；术士对此也不强行规定。但就术士本身而言，求测方式的选择，有可能关系到他是否能自圆其说。就拈字求测和书字求测的方式而言，术士更倾向于接受前者，因为拈字求占尽管随意性大，但所拈之字毕竟是他所熟悉的字，故而占断起来更省事一些。《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测例，正可见出这一点：

大不同，某拆字者之别号也。光、宣间，寓常州城隍庙，设摊营业，名噪一时。有某店伙之纱帐被窃，薄暮始觉，往来拆。时大不同已收摊矣，因令随举一字以拆。店伙写“の”字。大不同曰：“无妨，君所失为纱帐，今已有人悬于他处。君观‘四’字之形，固悬挂之像也。速见或可得。”店伙

曰：“否，否，君所拆者为真体‘四’字，而余所举者为草体‘四’字，无乃误乎？”大不同曰：“若然，则脏已难觅，仅可购备蚊烟一圈以御蚊矣。”蚊烟一圈，亦像草体“四”字之形也。

又有一尼姑拈“青”字，令拆之。问何事，曰：“终生。”大不同曰：“清不清，静不静，出家恐不利。若立定主意，择人而事，则尚有生育之望。”盖“青”字之上半截似“生”字，而下半截则“育”字之底也。尼怩怩而去，有知其事者，则谓尼固不守清规，久有还俗之意也。

这实在是可供比较的两个好例。在前一测例中，店伙书字求测，大不同前拆后拆“大不同”，连店伙也疑其有误，连称否否；在后一测例中，尼姑是拈字求测，大不同对所拈之字早已了然于心，故断起来头头是道，致使尼姑“忸怩而去”。由此，我们分明可见，拈字求测与书字求测对术士来说，其效果有时是“不大同”的。名噪一时的大不同尚且如此，其他测士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说字求占

求测者去测字先生那儿，有时既不书字，也不拈字，而是信口说出一个字来让他占断，这种方式就是说字求占。

说字求占的随意性很大，它常常是求测者事先根本没想而脱口而出的。因而它同样也需要测字先生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据载，有一次，某人孩子得了重病，心里焦急如焚，便

想求术士给占一下，他信口说一“六”字，让姓李的术士占断。术士知道他乳名叫“六十”，又口占“六”字，便灵机一动，断道：“你叫‘六十’，又口占‘六’字，把‘六十’二字一拼合，便是一个‘卒’字。‘卒’字去掉一点，又是一个‘平’字，平者平安也，以此为断，你的孩子可望平安。但是，很不幸，你的孩子恐怕又有来年之忧，因为‘卒’字看起来很像是个‘来’字。”

在这个例子中，求测者信口说一“六”字来求测，但术士机灵得很，他由求测者乳名叫“六十”，而巧妙地拼成一个“卒”，又由“卒”说到“平”，从而断出求测者之子平安无事。这里就显示出极强的应变能力。

在徐珂《清稗类钞》中，这方面的例子收了不少，如下面的一例：

鄂人方某慕游在外，一日接家书，以妻病笃，促归，方犹豫不决。有友善拆字，往觅之。友曰：“试道一字，以定行止。”即应声曰“粉”。友曰：“粧台留半面，红粉已分离，可速行，迟恐不及见也。”方急治装，及抵家，櫬已在堂矣。

在这个测例中，善拆字的友人让方某试说一字，以占行止。方某未及思考，脱口说出一个“粉”字。这“即应声曰‘粉’”就突出体现了说字求占快捷、随意的特点。

也正因如此，说字求占就需要术士以快对快，大脑灵光，具有相应的应变能力。《清稗类钞》另有一例，又恰可从反面见出这一点：

乾隆己亥，江南乡试题为“巍巍乎唯天为大”二句。胡元音望捷心切，同人守榜。汪某在座，见其神情迫切，戏之曰：“吾为君拆一字，如何？”元音口报“巍”字。汪某沉思良久，指画再四，曰：“得之矣。上为‘出’字之半，半出学也。偏旁有‘禾’无‘乃’，‘秀’字半出也。有‘女’无‘子’，是半好也。加以‘魁’字，有‘鬼’无‘斗’。其必中副车无疑。”越三日，揭晓，果以副榜第五名报雋焉。

此测例极有意思，它虽是戏拆，汪某也非道地的术士，但从其“沉思良久，指画再四”来看，正反过来表明“正宗”术士恰恰需要的是很强的应变能力。这次戏拆，竟然拆对了，这也表明测字一道多多少少带有“瞎猫遇死老鼠——碰巧”的意味，由此可足见其诓骗人的本质。

五、画字求占

画字求占在古代也较为流行，而且别具一格。从书写工具上说，它可以用手指，也可以用拐杖，还可以是扇柄等等；从书写“地点”上说，它可以写于地，也可以书于空，还可以写在膝盖上。

先请看见之于记载中的最早一例：

李嵩叛，有书招杨德辉赴斋，有老道士崔无咎，自言患聋，有道而论算术，往往预知吉凶。德辉问

曰：“将欲北行，如何？”崔令画地作字，杨乃书“北千”两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去即乖（乖戾、不顺）耳。杨遂不果去。而李嵩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祸。杨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这段记载始见于孙光宪《北梦琐言》，其事发生在唐末五代时，可见这种求占法早于其他求占法。

另据《说海》记载，宋代谢石也遇到过这种求占法。一次，谢石在途中遇上一个求测者，此人妻子“不能产”，心里很着急，他在地上写了一个“日”字，让谢石给占一下。谢石断道“日出地上，得男矣。”后来果然应验。此测例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求测者据地作书，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寓意，仅仅是因为在路途中巧遇术士而已。其二，占断者占断时，常讲究见机行事，随机应变，此测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谢石断其人必生男孩，既巧妙地测了字，也巧妙地融入了“地”的特点。

明乎此，我们再请看这样一个测例：

杨王沂中，闲居微行，遇一相押字者，王以所执拄杖就地作一画。相者惊拜曰：“阁下宜自爱。”王愕然，问其故。相者曰：“‘土’上‘一’画，乃‘王’字也，当封王无疑。”

此测例，杨王是巧遇术士，遂以杖就地作一画。术士断他“当封王”，也显然是见机行事，融“土”为“一”。

《瑞桂堂暇录》中又载有这样一例，也很有意思：

绍兴中，张九万以拆字说吉凶，秦桧一日独坐书阁，召九万至，以扇柄就地画一字，问曰如何。九万贺曰：“相公当加官爵。”桧曰：“我位为丞相，爵为国公，复何所加？”九万曰：“‘土’上‘一’画，非‘王’而何？当享真王之贵。”其后竟封郡王，又封申王。

此测例，秦桧求占，并没有行走途中，巧遇相士，而是召他前来，这表明画地作字并非一定要限于途中才可使用，其书写工具也并不一定要强求一致，相反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占断者一方说，张九万断秦桧“当享真王之贵”，又用的是融“土”为“一”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术士在朱元璋称王前也用过，这就不能不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何那么多称王称帝的人都遇到过如此巧事，这分明是有人在为他们上台大造舆论啊！不过，这已稍稍有点“偏题”，我们还是就此打住话头吧！

我们再请看《字触》中这样一个测例：

方楼冈先生问一来人，以两指在膝间虚书“行”字。先生曰：“来人必兄弟行，非二即三。”时太翁先生同在座，骇问曰：“何以知之？”先生曰：“两指在膝间写字，乃膝前手足之象也。写字未曾及第四指，所以断在二三也。”公曰：“奇！果系问三舍弟归期。”先生曰：“‘行’字乃‘吾’已出‘衞’之象，今当在途间。”未几如断。

此测例，求占方式奇特，占断方法也很奇妙。从前者上看，方先主不实书，却虚写，且写于膝间，这表明画字求占确有其不拘一格的随意性。从后者上说，术士断来人，不深究字理，却“触景生情”，巧加生发，把“两指”、“膝间”一一融入断辞之中，体现出极强的应变能力。此测例倘不是后人附会出来的话，我们还不能不佩服这位术士见机行事，巧加占断的本领。

第二节 以物求占

与以字求占的方式相比，以物求占的方法要少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自来对文字有一种极为深刻的迷信心理，他们总以为文字中蕴藏着什么天机妙理，也涵摄着什么命运的隐微，它能够左右人的生死，也可以主宰人的凶吉，因此人们才颤巍巍地写上一字去求测，对所测之字抱有期待和畏惧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以字求占的方式，而较少去选择以物求占的方式。这样一来，和其他求占方法相比，以物求占的方式多少显得有些“孤家寡人”了。

以物求占的方法虽说有些“孤家寡人”，但它既然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也必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也还是值得谈一谈的。

大致说来，求占之物种类不一，它可以是棋子、骰子、瓜子，也可以是鱼、雁、小鸟，有时还可是求测“舞台”上的某个人或某一物。种类一多，方式也显得多样，求测者或携

物求占，或指物求占，或取物求占。下面我们就结合一些具体测例来加以考察。

一、携物求占

携物求占是事先备好物，以供占断时用，因此，所携之物以小为宜，这样才便于携带。它可以是特意准备的，也可以是随手携带的，两者相比，后者居多。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假使求测者携来鱼雁之物，显然就含有鱼雁传书的寓义，因此他所求测之事多半是朋友的音讯或“在水一方”的绵绵情意，正如《元黄克应歌》中所说：“倘是携来鱼雁物，友朋音讯写相思。”可这样一来，求测者的心理就“暴露无遗”了，测字一道又何神奇玄妙之有呢？所以，求测者一般是不大携带那些特意准备好的物去求占的。

而随手携一物去求占，显然带有偶然性，但也惟其偶然，才带有“碰碰”运气的意味，不言而喻，这是很合高深莫测的测字一道的“口味”的。也因此，随手携一物去求占，在古人那里出现得更多一些。

请看下面一个测例，它出自周亮工《字触》之中：

以瓜子问父病，曰：“死期近矣。合瓜子为‘孤’字，固知必不生矣。”

这是求测者本人随手携带一物去求占。

有时，求测者本人并不去求占，而是让人携一物去求占，这一“转手”，就多了一道“弯子”，对占断者来说难度就大

了一些，因为他至少失去了对求测者本人观颜察色的机会。而对求测者而言，有意“转手”绕个“弯”，也正好试试测字先生的身手。请看这样一个测例：

有一权贵无子，知（汪）龙名，以门生袁姓者
——补南工员外——寄一白围棋子，托问后嗣。袁至，微服付棋子占之。龙曰：“公姓袁否？”曰：“然。我何如人？”龙以手周围摸之曰：“员外。”曰：“我所占何事？”曰：“此白物也，应自北来，必自北京当局之贵人。其第一著所卜者，惟其子乎？”曰：“有无何如？”曰：“此物非木非石，经水火锻炼而成，全无生气，安得有子？以理而推，亦当谢局，须急下官著可也。”已而权贵卒于任，竟无子。术之奇确如此。

在这个测例中，某权贵“转手”让袁员外携一白围棋子去求占，结果断为“无子”之凶兆，而且据说还竟然应验了，可见汪龙身手不凡。

《字触》另有一例，也用的是让人随意携一物去求占的方法：

顾邻初家居，遣侍持象棋中“車（车）”往。郑（仰田）语来人曰：“此非子所持，必大贵人遣来者。”问其故，曰：“一甲一名，非贵人而何？合局中惟‘車’纵横如意，此人文章事业必大显。但可惜今在局外耳。”曰：“得复起乎？”曰：“虽欲出山，奈半

身不随何？盖‘车’既取出，则不合棋，是以知其有废疾也。”

此测例，顾邻初不自行去求测，却让侍人携着棋子“車”去求占，结果亦得凶兆，至于是否灵验，则不得而知了。

二、指物求占

和携物求占相比，指物求占的偶然性更大，随意性也更大，因而更能体现出“碰”运气的意味。

有时，求测者有心去求测，但并不携物前往，而是到了术士那儿以后，信手指出一物，让术士占断。此物可以是“静”物，如桌、椅、扇子等等；也可以是“动”物，如天上飞过的鸟、雁等等。信手指物求占，对求测者来说自然是碰碰运气，而对占断者来讲需要有相机行事、随机应变、当机立断的过硬本领。倘相“机”不准，所断定为无“稽”之谈；若当断未断，也定然反受其乱。所以一般术士是不大乐意这种求占方法的。

下面我们就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它出自吴崧《几神验存》中：

一人指飞过之鸟曰“鸟”字，问家中吉凶。先生曰：“尊夫人病。”其人駭曰：“敝室原有恙，不识近日何如，故问。”先生曰：“重矣，当速归。”问大命妨乎，先生曰：“恐难保，不日即有信至。”越明日，计音至。问所断之理，先生曰：“鸟者，禽属也。‘禽’乃‘内人凶’三字，故知其妻病危笃。‘鸟’乃

‘鸣’无‘口’，病难生矣。飞过之鸟，音必速。”

在上引这个测例中，求测者亲临测字“现场”，用的正是指物求占的方法。

也有时，求测者有身份、有地位，虽也有意测字，却不屑挪动贵体，反而让术士亲临自己的“现场”，然后再信手指物求占。如下面一个测例：

明朝崇祯时，术士郑仰田在南中行测。当时政局很乱，形势岌岌可危。一次，临淮侯让人召来郑仰田，让他给眼下局势占测一下。临淮侯说：“北方张大司马入援北京，能行吗？”当时他恰好与人对弈，遂指棋子“马”让郑占断。郑仰田断道：“棋子‘马’行日步，可今天却碰上下雨，可知张大司马入援北京是不行的。”临淮侯又问张大司马眼下身体如何，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并指手中犀杯来求占。郑仰田打量了一下犀杯，从容断道：“‘犀’字有‘尸’附在身上，尸者死也，可知他已经死了。”临淮侯又问：“假使张大司马离位出走，也会死吗？”郑仰田答道：“他就是出走，也为时晚矣。因为‘犀’字加一走之旁，就是‘遲（迟）’啊！”后来这些断辞一一得到了“落实”。此测例，临淮侯并不“登门”，却让术士“来访”，他接连两次指物求占，居然被郑仰田一一占中，可见其身手不凡。

周亮工《字触》中另有一个郑仰田的测例，求测者也用的是指物求占的方法，但结果还是被断准占中了：

张庄节镇东省时，其子遣将往定省，因叩休咎，随意揭案上一书，得《太平御览》五十二卷终。郑

曰：“此一人乃大人也，曾为国平贼而名登御览者，其责无疑。但卷终文尽也，文尽则纵之以武，其以武显乎？”复揭最后一页，乃五十三卷神仙，因问尊夫人寿几何，时五十二矣。曰：“异哉！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其急流涌退，寻神仙之学乎？”次年值变，庄节殉难于太平楼，而寿恰五十三，其奇中如此。

此测例，求测者张庄节“随意揭案上一书”来求占，其偶然性、随意性都很大，但郑仰田并不慌忙，而是相机而断，巧加附会，两占皆中，其奇如此。

与郑仰田的测例相比，下面一例更有意思：

徽州守见（汪）龙之门如市，恐其惑众，意欲处之。一日召至，问：“我手中何物？如合则释尔，不合毙杖下矣。”龙求指一物示之，方好卜决。时堂下有少妇诉冤，守即指此妇为数。龙曰：“一麻雀耳。”守惊曰：“生乎？死乎？”龙曰：“生死在老爷掌握中。”守曰：“此譬可与语数也。”盖曰生则毙之，曰死则出之。守已知其喻意矣，但问何以云“麻雀”。曰：“此妇年少佳人，又穿孝服，以意解之，为麻雀云。”

此测例，求测者徽州郡守有意要处置术士汪龙，遂使这次测断意义非同一般。汪龙请他“指一物示之，方好卜决”，郡守就信手指一诉冤少妇为“物”，让他占断，结果还是被瞎子汪龙断对了。

以上几个测例表明，指物求占重在偶然，妙在随意，因而对占断的一方来说难度更大，它需要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三、取物求占

取物求占的方式和携物求占大体相同，差别就在于求测者一是“取”物，一是“携”物，前者更具有“临场发挥”的随意性。

先请看周亮工《字触》中这样一个测例：

有一世家子临场，出袖中汗巾与卜 曰：“君家三代进士邪？”曰：“然。”“君思中邪？奈肚里没货何？”盖“汗”字从“三”从倒“士”，而“巾”字少“中”字下一画也。

取汗巾求占，同书中另有一例，但所断结果并不相同，请看原文：

一人以汗巾问府取有无，曰：“不但府取，兼入泮，定有衣巾。”盖“布”为“有”字形，“汗”为“泮”字形也，“巾”者，衣巾，布色新泽，必有更新之意。

也有时，求测者并不亲临测字“现场”，而是偶然情况下遇到测字先生，然后才临时起意，取物来求占。据载，明代官员倪鸿宾任国子监祭酒时，与人合不来，遂萌退隐之意。一天恰好遇上术士郑仰田，双方没有互通姓名，倪鸿宾遂取骰

子中的“红四点”让郑占卜未来。郑仰田看了看，说道：“京官四品而掌印者，只有大司成。阁下莫非就是祭酒倪公吧？”倪点头称是。郑仰田说：“你一定与某人合不来，此人姓名中可能带有骨字。因为骰子是骨头做成的，四面棱角分明，不能圆转自如。阁下眼下是想告退吧？因骰子体方像‘口’，加上四点正是回乡的‘回’。”后来果然如此。

总之，以物求占的方式，不论是携物、取物，还是指物，都十分强调偶然性、随机性，从而凸显出求测者讲机遇、碰运气的迷信心理。同时，这一求测方式和以字求占相比，又似乎更带有一些“谜”性，因为求测之物毕竟不像字那样具有可拆性和意义指向性。对术士来说也毕竟不像“测字”那样可以任意拈弄、“纵横驰骋”，这样既可试试术士身手如何，也可能会避免一些胡扯瞎说的机会。从这一点上说，求测者的心理还有点“狡猾狡猾的”呢！试想，倪鸿宾巧遇郑仰田，不出字，却取物；徽州郡守想整治汪龙，也偏偏不出字而指人，这显然都带有一点“考”的意味，换句话说，正带有一点“哪壶不热提哪壶”的意味。从另一方面来说，测字高手更是“狡猾狡猾的”。他们对所测之物，或从物的属性上加以附会，或巧妙地把所测之物，“引渡”到代表它的文字上，再加以分拆解说，占断吉凶。不过这已是后话，留到占断法中再去说它。

当然，以物求占，最终都过渡到文字的说解上，因此它是一种测字的独特形式。

第三节 以梦求占

梦是世界的“异化”。

梦也是人生的“幻化”。

它恍兮惚兮、扑朔迷离，似真似幻，若虚若实，或划然飘来，又缈然而去……

梦具有天然的“谜”性，人们对它也天然具有某种“迷信”。

于是，很早很早以来，便有了“梦的解析”；很早很早以来，也有了以梦求占的方式。

《诗经·小雅·正月》上说：“召彼故老，讯之占梦。”这是周王召唤故老、占梦官来占梦。

《诗经·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维熊维黑，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这是占梦官在为天子占梦。

《诗经·小雅·无羊》：“牧人乃梦，……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惟丰年；旒维旗矣，家室夔夔。”这是牧人请求占梦。

以梦求占的帷幕就这样徐徐拉开了。

占梦与测字本来“道不同不相为谋”，但随着占梦术的世俗化，尤其是大量字梦的出现，使得占梦与测字“联姻”，它们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彼此相挽相助，共同前进，把汉字推向了一条神秘化、神圣化的道路。

从史料记载来看，以梦求占实际上是后来测字的“前奏”，或者说就是一种“前形式”。正因为如此，前人认为

“测字的权舆”就在字梦之中。^①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古人在蒐集测例时，曾对字梦例广加收罗，以示其“亲密无间”云云。^②

下面我们就谈谈以梦求占这种十分重要的求测方式。

古人迷信甚深，把梦视为神的谕示，故每作一梦，常左思右想，百思不得其解，便产生求占的渴望。从此意义上讲，以梦求占的本身就表明古人生活在“梦”中。

梦是晦涩的，又是多彩的，帝王有帝王的梦，臣子有臣子的梦，百姓也有百姓的梦。梦之于人既虚幻又真实，既神秘又实在，于是人人都想“破译”它，以获得神灵的启示。

据史书上记载，汉高祖刘邦就有过一个帝王之梦。那是在他任沛县亭长之职时，曾恍然遁入梦境。在梦中，他见自己拼命在追赶一只羊，好不容易才赶上，就一下子拔掉了它的角和尾。此梦将预示什么呢？有占者断道：“羊去掉角，拔掉尾，岂不是一个‘王’字？！”后来刘邦艰苦创业，果然成了汉王并统一了天下。

类似的帝王梦在史书中并不鲜见，请看《吴祚国统》中这样一个例子：

吴王孙权，尝梦北面顿首于天帝，忽见一人以笔点其额。举以问征士熊循。循曰：“吉祥矣，大王必为主。王者人之首，额者王之上，王上加点，‘主’字之象也。”

① 见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四“测字”条。

② 关于字梦和测字的关系，详见第七章。

十分凑巧的是，点额之梦并非吴王孙权的“专利”，其他想成为王并终于成为王的人也做过，于是又有了下面的一例：

高洋封齐王，梦人以笔点己额，以告王昙首曰：“我其退乎？”昙首拜贺曰：“王上加点‘主’字。”后受魏祥。

以上是帝王、君主以梦求占的例子，下面我们再看几个帝王“子民”以梦求占的例子。

十六国时，出了个索统，此人特擅为人占梦，而且总是巧妙地落实到文字之上。据载，功曹张邈，曾奉使诣州，临行前，作一怪梦，梦见一只狼死死咬住他的一只脚。他觉得此梦难解，遂向索统求占，索统占道：“脚肉遭狼咬，正是一个‘却’字。此番出使，看来不吉利啊！”张邈一听，果然没去。

另据《晋书·索统传》上记载，有一叫宋桶的人曾梦见“内”字当中有个小人穿着红衣服，他感到好生奇怪，便忍不住拿着两根木杖打来打去。梦醒之后，他觉得此梦难解，便向索统求占。索统听后，当即断道：“你乃口福不浅的人啊！‘内’中有个‘人’，正是一个‘肉’；小人穿红衣，正是肉之色。你手拿两根木杖，恰好是一副筷子；您又忍不住打来打去，岂不是说你一筷子一筷子地在大口吃肉吗？！”后来，宋桶果然口福不浅，三天去三家，顿顿有肉吃。

《朝野金载》中有一字梦例，也颇有意思：

洛州杜元，有牛一头，元甚怜之。夜梦见其牛

有两尾，以问占者。李仙药曰：“‘牛’字有两尾，‘失’字也。”经数日，果失之。

从上引诸例来看，以梦求占各具特色，内容涵括甚广，大到君主上台，小到失牛之患，都一一显之于梦、又求之于占，这就十分明显地体现出古人信梦、迷梦最终又被梦所迷的复杂心理。从占梦者的角度说，他们莫不善于化梦为字，据字圆梦，而且方式也十分多样，或离合，或衍义，或摹状，分明是测字先生的“先牛”，俨然是测字术的“前形式”。

在难以计数的以梦求占的例子中，许多求占者是因梦境难解而致惑，于是才需要去“解码”。这些梦一般有场面，有情节，以一种幻化的形式把自己融入梦境之中。这种梦有的较为简单，如上引各例；也有的则较为复杂，乃至于摇人心旌，动人心魄。对这样一些怪梦、恶梦，人们当然更需要求占了。

也有时，求占者之所以要求占，是因为梦中所见的不是人，也不是物，而是神人、仙人所示的莫名其妙的字。这说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原来，古人信梦、迷梦，总以为梦最真，最能显示自己命运的隐微、吉凶的根由，故而他们有梦就求占，进而又无梦去求梦。求梦时或去神庙，或上坟茔，带上衣被，携上枕头，蒙头就睡，祈盼能作个好梦，得到神人、仙人的谕示。神人、仙人说来也怪，他们捎来的礼物常常就是一字、两字，或一联、两联诗。在此情况下，求占者梦的是字，测的也是字，而圆梦者圆的自然还是字。这样一来，占梦和测字就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以至于我们很难研判其差别。

下面我们就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

据周亮工《字触》记载，有人为求婚姻美满，曾去九鲤湖求梦，梦中见一仙人飘然而至，为他写了个“婦”字，就渺然不见踪影。此人梦醒之后，虽然不胜欣喜，却又不知此“婦”为谁，来自何方，便去求占。占者说：“‘婦’上有个‘山’，若移到‘巾’字下，就是一个‘出’字。现在‘山’字是横写，这分明告诉你此婦就出自横山。”后果然。

《九鲤湖志》另载一例，也煞是有趣：

一士求梦九鲤湖，梦神以“戊”字示之，以为逢戊可捷。既而不验。识者曰：“‘戊’字逢丁而成，子其捷于丁岁乎？”果然。

我们再看一个神示两字的例子。据载，古代有一姓吴的人，颇想科名得中，遂特意去仙庙求个好梦。迷离恍惚之际，他遁入梦乡，见一仙人示以“牛田”二字。谁知此后两次应考均榜上无名。他好生懊恼，便再次赶去求梦，向仙人问个明白。说来也巧，他求梦梦到，求仙仙来，他还没开口，仙人倒首先说话了：“你为何不把‘田’加在‘牛’字之上呢？”他这才大梦醒来，恍然彻悟，原来，“田”加“牛”上，正好是“甲午”二字吗？这分明是预示我将于“甲午”年中第啊！据说后来，在嘉靖甲午那年，他果然一举中第。

在这几个例子中，求、占双方都紧紧围绕着汉字，因而以梦求占无异于以字求占，据字圆梦也无异于拆解文字，占断吉凶了。

但进而应当看到的是，梦中神授之字有时毕竟不如现实

中人们求测之字那么实在，它多少要沾一点仙气，带一些梦幻的色彩，也正惟如此，求占者对神授之字才更感到困惑，有时还会产生误解。像上面那位吴某误解“牛田”二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再来看《耳谈》中两个例子。

明弘治年间，长泰县有个叫戴侍郎的人，他赶考之前，曾去祈梦，梦见神人授给他一个条屏，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双天西日”。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左思右想，仍难解此中之谜。他去请人占断，也没人能破译。后来，他在癸酉年应试得中，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双天”者，“癸”也。“癸”字下面为“天”，上面是一个“双”字。“西日”者，“酉”也。“酉”像“西”、“日”二字的叠合。

同书又有这样一例：

兴化郡丞朱士容妇有娠，以子女求梦于仙。梦人以科举榜相视，惟一“魁”字，后生男，名魁山，谓必验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占：“‘魁’字二十鬼，吾其休矣。”果卒。

此例神授“魁”字，郡丞朱士容在科举榜的启发下，认为此“魁”必预示自己将得一子，此子也必将中举得“魁”。谁知事与愿违，他的儿子竟然二十岁时就早早离开人世。儿子临死前，终于悟出“魁”字的意涵，原来，“魁”字拆开来，就是“二十鬼”。

神授之字有时更神秘，它或而将字藏于话中，或而将字隐于诗内，或而将字嵌于物中，或而又把字巧加断连，真是无奇不有，“神”不可测。也惟其这样，求占者才愈是祈盼解

码，愈是希望有人能给他道破此中之谜，指出人生迷津。

先请看藏字于话的一个例子。有一叫郑启的读书人，临考前去求梦，梦见神来之后，附耳低语道：“今年解元，郑启莫言。”梦后醒来，他不胜欣喜，自以为此梦无需求占，其意已十分显豁，是说我今年得中解元，只是眼下切莫张扬出去。于是他加紧温习，积极应考。谁知发榜之后，赫然冠于榜首的却不是郑启，而是“郑启谟”。他这才明白，原来“郑启莫言”就是郑启谟啊！我真是太自作多情了。

藏字于诗有时更难索解。据《清稗类钞》记载，有个叫李文贞的人，自幼热衷功名，颇想有番作为，曾特意去九龙滩神庙求个好梦，想借“神”力实现自己的大志，成就自己的作为。算他幸运，他不仅梦到了神，而且看到了“神”来之笔，此神二话不说，但赠一联诗：“富贵无心想，功名两不成。”醒来之后，他左思右想，反复推敲，不得其解，又请人求占，亦一无所获。后来，他戊戌年中了进士，继而又当了丞相，这才勘破此梦之谜。原来，“戊戌”二字像“成”字而非“成”，“想”字去掉下面的“心”，就是一个“相”。这样一理解，那联诗才“圆”起来了。所谓“富贵无心想”，是说我可以成为富贵相；而“功名两不成”，也恰是说我戊戌年可成就功名。神啊神，你真是太“鬼”了，太“神”了！

嵌字于物，有时也极神秘，求占者为此有时大费心思，仍不解此中之谜。在此情况下，他就不能不“另请高明”，求占梦术士来为他圆一圆了。据记载，古代福州有个叫林廷楫的人，他在显贵之前，曾去神庙求梦。梦见忽然来一仙人，他在牌匾的上半部大书一个“司”字，下半部却搁下不写了。林某醒来苦思冥想，仍不解梦中之谜。于是他找术士求占。术

士推敲好半天，为他圆道：“上半是‘司’字，下半是空白，这恐怕是预示你异日将位至大司空啊！”后来果然如此。

将所书之字巧加断联，也是神人的“拿手好戏”，但这可坑苦了求梦者，常使他们为此而煞费苦心，又为此而误解误判。南宋时有一漳州人叫弓舆，乾道四年冬，他和同乡六七个读书人同去赶赴省试，经过宜春时，又同去仰山祠求梦。在梦幻之中，弓舆不知不觉来到了官府，见官府厅堂的柱子上贴着一张纸，上书“弓舆不得”四个字。在这四个字中，惟有“不”字写得漶漫不清，上下两部分连得不紧，断开处是一空白。弓舆一见，顿时意冷心灰，自觉此梦晦气，因而对那“不”字中的细微差别也顾不上细审慎思了。谁知此番赴省，他福星高照，应试中举，一“名”惊人，同去赶考的读书人却纷纷“落马”，榜上无名。他喜出望外，逢人告知，还告诫他人别信神，别信梦，自己差点上了当。这时有一善长圆梦的人说：“‘不’字一断开，就是‘一个’啊！神恰是说你一个得中，又岂能妄言神不灵、梦不验呢？！”他这才如梦初醒。

由以上各例，我们就不难看出以梦求占的这样几个特点：其一，以梦求占带有浓厚的虚幻性。梦中得字，多为神授，它虽然可识，却并不可解。“神”来之笔，变化很多，令人“神”不可测，或藏字于诗，或隐形于话，或嵌字于物，或巧加断连，或融字于场面、情节之中，变化一多，虚幻的色彩就显得十分突出了。也正因如此，求梦者才百思而不得其解，才需要去请术士给圆一圆。

其二，以梦求占带有很强的自觉性。梦中得字，尽管变化多，难索解，但它毕竟是非它莫属的“这一个”。因此，求

占时其目的性、针对性都很强，它要求术士圆的就是这个梦，这个字。相反，测字时求测者所书、所拈、所指的字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它要求测字先生具有很强的应变性。

其三，以梦求占具有极强的征验性。占梦、测字都讲究是否灵验，但其间又有不同，此所谓“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具体说，以梦求占因其目的性、针对性很强，所以圆梦者很难耍多少滑头，你圆得是否准确，虽然一时半载难见分晓，但来日他时定可验证。从上引各例来看，每一个字梦在日后都必然应验，绝无例外。由此反观测字就不尽然了。测字时，求测者随手写上一字，或信口说上一字，占断者据此为断，虽然有时钻了概率的空子，也能说准应验，但说不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且术士占断时为了“保险”起见，也有意把话说得很活，泛应曲当，让你怎样理解都可以。从这层意义上说，测字的虚伪性更大一些，而占梦的真实性也更多一些。也许恰因字梦讲究应验，所以一般人是不会敢问津此道的。占梦家在古代的“阵容”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测字“阵容”那么壮大。五代以后，在各种记载中，几乎很少见到占梦家的踪迹。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说：

占梦之术魏晋方技犹时或有之，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人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

“其学”为何“殆绝”，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占梦特重征验。常人不敢“留意此卜”。二是字梦与测字已联袂“成亲”，彼含互摄，因而以梦求占的“重任”已部分落在测字术士的“肩

上”。也是鉴于此，我们在求测方法这章里，才专门列了一节，来谈一下以梦求占，给它立了一个“户头”。

上面所谈的几种求测方法是古人使用最多的。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使用略少的方法，例如，求测者有时既不拈字，也不书字，而是去求字，术士授字之后，并不解说，而是让你“以观后效”。这种方法主要使用于宋代，它实际上介于测字和字谜之间，可以视为一种准测字现象。

宋郭象《睽车志》卷一中就载有这样的例子：

皇甫坦自言数百岁人，言人休咎，时验。……喜为人书字，亦多验者。汪国正远猷登第，已逾壮室，以未有子为忧，求字于坦，书一“湧（涌）”字。已而汪授吴江簿，到官而生男，乃悟（湧）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试，坦书“落”字与之，士人不乐。及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因视其字草头即二十，其傍从水不为点，而作三画，‘各’字右笔止作一点，乃‘名’字耳。

古人求测时，又时用黄鹄啄字，就是说把一些写好字的卡片放在桌上，让黄鹄去啄，据说啄出的字可以见出命运。

第四章 占断方法（上）

所谓测字，就是推测人们命运，因此占断是其核心，中国测字术的全部奥秘也基本上在占断上。古代许多测士殚精竭虑，积累了大量占断方法，他们从汉字内部、从测字时的诸种环境中，以及从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挖掘出许多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共同丰富这门方术活动。兹将其主要方法介绍如下。

第一节 断字的基本方法

测字是据字拆解预示人事吉凶的一种方术，它一般是先分拆字形，再据此分析解说，预言凶吉。前者是测字的基础，也是断字的基本方法，后者才是测字的目的和内容。

从表面上看，所断吉凶的天意妙理仿佛是从字形而来，实际上吉凶并非拆字的结果，相反一个字如何拆完全是取决于预言内容的需要。这种倒果为因的伎俩，正是测字先生蛊惑人心、障人耳目的地方。

一个字该如何大卸八块，或重新组装呢？对一个测字先

生来说，显然应当掌握两副本领，一是字外观颜察色、见风使舵、捕捉机遇、确定预言内容的本领；二是字内如何奇思妙想！自圆其说的本领。前一副本领是断得准不准的基因，后一副本领是断得巧不巧的要素；前者隐之于内，后者显之于外；前者属“心法”，后者则属“字法”。

既然是“字法”，就必须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方法，它是测字先生长期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要谈的断字的基本方法。

这种方法大致说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离，即把求测之字分拆成两字或数字；二是合，即把两字或数字合成一字或两字，这二者之间具有相反互逆的关系。

我们先谈第一个方面。

测字又叫“拆字”，叫“破字”，所谓拆指的是分拆，破指的是破解，可见把求测之字分拆、破解开来是占断方法中最最基本的方法。一个测字先生只要无愧于“测字”的称号，只要想保住自己的“铁饭碗”，“拆字”、“破字”的功夫是断断不可少的，你不仅要会拆字，而且还要拆得巧、破得妙，得有一副活学活用、自圆其说的本领。比如说，当看到“渔”字，就要想到“如鱼得水”；看到“淋”字，就要想到“楚汉相争”；看到“烟”字，就要想到“因风吹火”；看到“钞”字，就要想到“披沙见金”；看到“梳”字，就要想到“中流砥柱”；看到“域”字，就要想到“倾城倾国”；看到“秦”字，就要想到“枯木逢春”；看到“崖”字，就要想到“太岁当头，佳人有损”；看到“巢”字，就要想到“上宿鸳鸯之鸟，下生连理之枝”。有了这套功夫，才算拿到了“合格证书”，领到了测字的“门票”。

宋代是测字的成熟期，此时测士对分拆字形莫不玩得透熟。据《春渚纪闻》上记载，谢石来到京城后，“以拆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拆而言，无不奇中。”所谓“就其字离拆”，也就是把字形拆开来，大卸八块，再据此占断人事之凶吉。如有一宦官以“朝”字求测，谢石把它分拆成“十月十日”，据此断出写字的人一定是此月此日所生之天子。又如某人妻子丢了珠冠，写一“失”字让丈夫去找谢石求占，谢石把它拆为“二十八”，从而断定此人妻子家中定有人排行为“二十八”。还有一次，某人妻子怀孕过月，遂手书“也”字让丈夫去找谢石占断，谢石先把它拆为“三十一”，断出这人妻子“三十一”岁；后又把它拆成“十三”，从而推断这人妻子怀孕已有“十三个”月。其他测士如汪龙、胡宏、周生、朱安国也无不精通此道。在前面所引的例子中，汪龙把“贵”字拆成“中一目人”，从而断出应考中举的是独眼龙一人。朱安国把求测者段毅夫求测的“飞”拆成“二九而升”，又把求测者赵彦通求占的“易”拆为“从且从勿”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显例。

宋代以后，测字更是风行朝野，深入人心，张乘槎、马守愚、郑仰田、程省、周亮工、范时行、大不同、沈衡章等测字高手无不薪传了分拆字形这一测字妙法。例如：

“魁”被拆卸成“二十鬼”；

“槐”被拆卸成“木傍鬼”；

“成”被拆卸成“戊丁”；

“元”被拆卸成“二八”；

“因”被拆卸成“国内一人”；

“武”被拆卸成“一代无人”；
“春”被拆卸成“三日人”；
“解”被拆卸成“牛角刀”；
“干”被拆卸成“十一”；
“帛”被拆卸成“白巾”；
“笋”被拆卸成“两个尹（丞相）”；
“囚”被拆卸成“当国一人”；
“午”被拆卸成“人十”；
“子”被拆卸成“一个丫头”；
“走”被拆卸成“土下人”；
“今”被拆卸成“人一丁”；
“示”被拆卸成“二小”；
“天”被拆卸成“二人”；
“好”被拆卸成“女子”；

这些拆法除极少几例“尊重”汉字原有结构外（如“好”拆为“女子”，“解”拆为“牛角刀”），其他均是随心所欲，任意肢解，妄加附会，直使人“惨不忍睹”。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测例。

据《清稗类钞》上记载，有一次，一人拈得“義（义）”字，请范时行（清前期苏州人，乾隆时寓居德清紫阳观拆字）问终生大事。范时行问他多大年纪，那人告诉了他。范时行占道：“那么你是属羊的了。‘義’字拆开来，从‘羊’从‘我’，是只剩下一个属羊的我，终生孤寡一人，不能娶上妻子。妻子尚且娶不到，其他的还有什么指望呢？”

另据《几神验存》上记载，有一叫李昼公的人来到术士

那儿，信手写一“葉（叶）”字请他给占一下病情。测字先生看了会字，占道：“这个字拆开来是‘世’字落入‘草’‘木’之中，可知患病者将不久于人世而成为‘草中之鬼’。再说，此字又有‘棄（弃）’字形，这也是行将弃世的凶兆。还有，此字看起来又像是‘藥（药）’，而不成‘藥’，据此可知患病者一定是吃错了药而死去的。”没过几天，李昼公家果然传来噩耗，其弟李玉匙科考后得了伤寒，因吃错补药而猝然身亡。

这两个测例，均用的是拆整为零的方法，其牵强附会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拆字之法确有其不拘成法、随机应变的一面，它被测士拈弄得如此奇妙，又如此精熟，说得求占者纵然不信，也得心服。测士倘无这套纵横阖闾，左右逢源的“手上绝活”，恐怕就很难“生财有道”了。

上面这些测例，虽然已变化多端，令人眼花缭乱，但相比之下，这还算是比较“拘紧”的，更为“精采的节目”还没有开始。谓予不信，请看下面的“分解”：

有时，术士为了“拆”得痛快，对许多笔画繁多的字也想方设法绕着弯子来进行分拆肢解。例如：“楼字笔画多，不可分解，以楼取义乃重屋也，重屋拆开乃千里尸至。问字，人必有人死在外尸至。”（《拆字部汇考二》）这话的意思是说，“楼”笔画多，不可分拆，但可另辟蹊径，从字义上打主意。因“楼”是“重屋”（屋上有屋）之义，而“重屋”拆开来，就成了“千里尸至”四个字了。假使有人用“楼”字来求占，你就可以告诉他，此字不吉利，因它是“重屋”的意思，而“重屋”一分拆，就是“千里尸至”，据此为断，你家必有人

在外死了，尸首很快就到。由此一例，我们就可看出，测字先生测字时，只要有可能，对字的分拆肢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也有时，测字先生连弯子也绕不过去，于是就干脆把令他“难堪”的那部分一笔钩销，然后才分拆字形。《清稗类钞》中就有一例：

张文达公之万未遇时，尝客杭州，会元旦，逐队作吴山游，就日者以问前途。拈得一“死”字，大骇，欲弃去。日者叩所问，曰：“科名。”日者就字端详良久，因以“死”字之钩抹去，写“癸卯一人”四字，拱手贺曰：“大吉利，癸卯年当大魁天下。”

此测例，张之洞拈的是“死”，测字先生“就字端详良久”，觉得此字分拆有些麻烦，于是就“果断”地把“死”字的一钩钩去，这才勉强拆成“癸卯一人”四个字。这多少显得有些“无奈”，这也多少显得有些“无赖”。

与分拆字形恰好相反的是另一种方法，即把所求测的几个字重新组装，合成一字或两字，这也就是所谓的合法。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要少一些。这主要是因为求测者求占时以一字为常，有时即使出两字或数字，测士也只据其中的一个来占断，正如《相字心易》中所说：

凡写两字，止看一字，盖字多必乱；若谋事之类，亦必移时方可再看。这话口气斩钉截铁，十分肯定，可见测士确实更注重“定点爆破”，而不善于

“连续爆破”。

不过，合法既然存在，我们就不妨探讨一下，看看它的“为囊”如何，又有何妙用。从现有的测例来看，最早使用合法的是《北梦琐言》中的一例。在画字求占中，我们举过这个例子，它说的是唐朝宗室李嵩想举事谋反，欲召杨德辉从之，杨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便写了“北千”二字求占，老道崔无致将它合成一个“乖”字，就断言说此行必不利。后来果然李嵩被擒，杨德辉幸免于难。

类似的合法还有这样一例，有人书“女子”二字求占婚姻，术士一看，当机立“断”说：“你的婚姻很吉利，因‘女子’，相拼即是‘好’。但婚后却有不顺心事，因为你将得子无望，只能有个女孩。”

古人测字不限于以字求占，有时也以物求占，但术士测断时，常将此物巧妙地“引渡”到它所代表的汉字上，然后再根据文字来占断吉凶。如上所举的有人父亲病危，其子取瓜子去求占，术士断道：“你父亲死期近矣，因瓜子合成一字，就成了‘孤’，据此为断，你父亲一定活不成，你也一定会孑然一身的。”

以上两个例子，均是将两个字组合成一个字。但有时，也还可以将数字合成两字，这种组合相对来说难度就大一些。请看《字触》中这样一个测例：

王友家人妇晨出市物未还，指册中“叁拾”二字乞占。断曰：“此人走矣，当速追寻。”又开册指“陆拾”二字问方向。断曰：“太平。”遣人追，果得。

王请其故。曰：“‘叁拾’为大三十，‘大三十’合成‘奔’字，故知其走也。‘陆拾’为大六十，‘大六十’三字，乃‘太平’二字也，故知其地在太平。”

在这个测例中，求测者为寻妻子，先指账册中“叁拾”来求占，测字先生先把它解释为“大三十”，然后将这三个字拼合成“奔”字，由此断出其妻必出奔。求测者又指账册中“陆拾”二字求占出奔的方向，测字先生并不慌忙，而是“故技重演”，把“陆拾”解释为“大六十”，然后将此三个字组合成“太平”二字，据此断出其妻出奔，必逃往太平镇。在这里，前一次是将三个字合成一个字，而后一次则把三个字合成两个字，这两字占断，居然一一灵验，我们纵不“大惊”，也不免“小怪”，是“瞎猫碰死老鼠”偶然断对呢？还是测字先生故神其说，有意附会出来的呢？看来只有老天才知道。

但不管怎么说，测字先生离合字的本领是通天的，直令我们望而兴叹，想都不敢想。王力先生曾就此打趣说：“咱们千万别和江湖术士辩论，他们的唇枪舌剑决不是咱们所能敌的。”^①

事实也确实如此，上所谈论的离合之法对术士来说还仅是“基础课”，上起来有时还嫌太“基础”，不过瘾，于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又竞相开设了许多“选修课”，把离合之法发挥得灿如跃如，淋漓尽致。

这些“选修课”，大体说来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① 见《龙虫并雕斋琐语·迷信》。

一、对关法

这一拆法是把求测之字拆成某字头、某字尾，就好比门一样，关起来就只见门，打开来就可任人出入。字也是如此，拆开来就是某字头！某字脚，合起来（关起来）则依然是原来的字，所以叫对关法。

对关法是清初术士程省明确提出来的，他认为，“此法最简捷，其用最广，为字中第一要义。”（《测字秘牒》）所以我们首先来谈它。

先看最简单的一个测例。据周亮工《字触》上记载，有人母亲得了重病，就写了个“唐”字去求占，测字先生一见，立刻占断说：“‘唐’这个字，上为‘康’字头，下为‘居’之尾，由此推断，你母亲大人一定康居无恙。”

同书又载有这样一个例子：

文皇（明成祖朱棣）在燕邸时，尝微行诘一相字者，书“帛”字令相。其人即跪拜称死罪。上惊问故，对曰：“‘皇’头‘帝’脚，必非常人也。”又一人书“帛”字，曰：“是为‘白’‘巾’，君必孝服。”

在这个测例中，一个“帛”字两种拆法，前者拆为“皇”头“帝”脚，断为“非常人也”；后者径自拆为“白”“巾”二字，断求测者必有大丧之事，要穿孝服。可见，对关法和一般的拆法还是有区别的，它实际上是测字先生变通求活的一种体现。

据赵翼《陔余丛考》记载，赵翼曾亲眼见过这样一个测

例：

少时见一拆字者，一人踉跄来问其父之病，随手拈得“一”字。术者曰：“一者生之尽，死之初也。汝父殆不起矣。”

在此测例中，术士将“一”拆为“生”之脚，“死”之头，由此断出其人之父必死无疑。

周亮工《字触》中记载：

有以“字”字问六甲（生育），曰：“‘寅’头‘子’尾，非寅日即子日，应在丑时子寅之间也。是女，盖‘字’者，女子许嫁曰字也。”果以是日时生女。

这里，术士将“字”拆为“寅”字头、“子”字尾，据此断出生子时间“应在丑时子寅之间也”。

类似的测例还有很多，如“伯”为“伸”之头、“缩”之尾，“吝”为“交”之头、“合”之尾，“彦”为“龍（龙）”之头，“彪”之尾，“友”为“有”之头、“没”之尾，“找”为“拖”之头、“曳”之脚，“推”为“拦”之头、“截”之尾，“茆”为“花”之头、“柳”之尾，“砚”为“破”之头、“完”之尾，等等。这还是比较道地的对关法。

有时，为求拆得方便，测字先生又“大胆改革”，对对关法本身也做了不少的变通：以适应占断内容的需要。这种变通大体上说，有以下几种情况：

1. 仅取求测字的一部分，再施以对关之法，而对另一部分就“漠不关心”，将它拒之门外，冷落一边。如以下一个测例：

有以“陀”字问讼吉凶，曰：“此察院状词也。
以形而观，‘虎’头‘蛇’尾；以意而论，其庇在他；
又音与‘拖’同，不成‘完’，恐不能完结，扯长而已。”

此测例很有意思，求测者出“陀”字来问官司是吉还是凶，可术士倒好，竟把“陀”一分为二，只拆“它”而不管“它”的左边那部分，“它”虽然“对关”上了（“它”为“虎”之头、“蛇”之尾），但左边那部分却成了“闲散人员”，没人去关照它了。这实在是顾此失彼、虎头蛇尾啊！

测字先生可不管这些，在他们看来，怎么方便就怎么拆，有时也难免会顾此失彼嘛！

于是，为求方便，又出现了第二种情况。

2. 有时，某字拆成某字头、某字脚、不是头对不上，就是脚合不拢，就好比门关起来不那么严实，总会出现一些缝隙。在此情况下，测字先生便启用形近占断法来弥补其“缝隙”。请看这样一个测例：

纪文达（纪晓岚）于乾隆戊辰捷礼闈，未廷对时，在董文恪公座，偶遇浙士，乃善拆字者。文达书“墨”字，乞占殿试名次。浙士谓之曰：“一甲无望矣。‘墨’字上截似‘里’字，以‘里’字倒拆之，

为‘二甲’。四点为‘庶’字之脚，‘士’乃‘吉’字之首，必可得庶吉士。”果应其言。

此测例见于《清稗类钞》中。在这一测例中，浙士确实不愧为对关法的“改革家”。你看，他为了牵合自己所断的内容，先据形近测法把“墨”之上半部分和“里”字挂起钩来，再把“里”字倒拆为“二甲”，从而断定纪晓岚“一甲无望”，只能中“二甲”。为了证明纪晓岚“必可得庶吉士”，他又不惜将“墨”字下半部分倒过来对关，将其四点水断为“庶”之脚，而把下面的“土”断为“吉”之首。“土”断为“吉”之首也依然是依据形似的特点来勉强凑合的。

我们再看清代大不同的一个测例。一次，有位尼姑拈一“青”字，让大不同占测。大不同问她欲测何事，尼姑回答说测问终生。大不同说：“你拈得这个字，说它是‘清’又不是‘清’，道它是‘静’又不是‘静’，不清不静，出家恐怕不吉利。你如果打定主意，择人而嫁，那还是生育有望的。因为‘青’上为‘生’字，下为‘育’字底。”尼姑听后，羞答答地走了。据知情者说，这个尼姑本来就不守清规，很早就有还俗之念。

在这个例子中，大不同为了牵合自己断辞的需要，硬是把“青”一刀两段，上半截据形近的特点附会出“生”字，下半截则迁想为“育”字脚，据此断出尼姑倘能还俗，不守清规，就有生育的希望。可见，对关法在术士手中频频被启用，又每每被活用。

更有甚者，不仅汉字可以对关，就连构成汉字的点画也莫不可以对关。以前有一姓汪的读书人，天资颇高，亦擅测

字。有一次考试后去术士那儿求测。他举笔写了一点，问道：“我可以考中一等一名吗？”测字先生说：“你考一等尚有希望，但中前列则定然无望。”同去的友人说：“点乃文字之首，他岂能不名列前茅呢？”测字先生见他不服，也不申辩，只告诉他等发榜后再说。后来发榜时，汪某果然只取了一等末名。汪某自愧不如，便登门拜访，请测字先生说说字理何在。先生说：“你只知道一点为文字之首，却不知它还是‘等’字之尾呢！”此测例，汪某与术士各执一端，据点为断，结果点倒是“关”上了，但结论却迥然相“对”，妙哉！妙哉！

总而言之，对关法运用广，变化多，易操作，深得测字先生所推崇，他们认为，此法“为字中第一要义，学者更宜究心。”（程省《测字秘牒》）它可以全然不顾所测字的原有结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一切均从所断内容的需要出发，为“断”服务，为“我”服务。

二、增减法

增减法，顾名思义，指的是增加法和减损法的合称。这两种断法在测字中运用得也很多，是测字先生占断凶吉、预言祸福的两把游刃有余的“刀”。下面我们逐一述之。

1. 增法

所谓增法，也就是对求测之字有所增加而组成新字的一种方法。其增加的部分，可以是笔画，也可以是字，还可以是测字“现场”所见所闻之物。

很显然，术士启用增法，是由于求测之字和求测之事未能全然吻合，这就需要借助于添加的部分作为中介，使二者勾通圆融起来。这种方法的作用在于扩大测字的“面”，确定

占断的“点”，“面”愈大，“点”愈多，其断中说准的概率也就愈大。

在《古今图书集成·拆字部汇考》中，就有“当添亦添”一则，其原文为：

且如官员写“尹”字，乃“君”字首，断其人必在上位，定不禄而还，以“君”无“口”故也。如书“君”字，乃是“郡”旁，其人当得郡。

这里说的也就是以增法来断吉凶。

清初术士程省对增法颇为究心，研究也很是深入，他在《测字秘牒》中，把增法析为三种：

一是装头，即字头上添几笔，使一字变为他字。如：“非”可接头为“菲”、“扉”；“皮”可接头为“波”、“破”；“元”可接头为“玩”、“完”，等等。

二是接脚，即字脚上添几笔，使一字变为他字。如：“自”可接脚为“息”、“身”；“立”可接脚为“音”、“章”；“里”可接脚为“墨”、“黑”，等等。

三是穿心，即字中间添几笔，使一字变为他字。如：“弓”可穿心为“弔”、“弗”；“旦”可穿心为“里”、“车”；“文”可穿心为“吏”，等等。

在具体测例中，术士对增法的运用不拘一格，且大胆“革新”，遂使增法有“增”无减，妙用无穷。

下面我们援引几个具体的测例，去看看术士对求测之字究竟是怎么个“增法”的吧！

先请看这样一个测例，它见于周亮工《字触》中：

杨姓者偕友北游，舟抵邗关，偶鼻衄不止，友书“已”字问。先生曰：“是凶数也，难过明日。”友曰：“鼻衄遽殒命乎？”未信而去。次日来，昨归舟鼻流已止，不期夜半血涌而逝，厥理安在？曰：“‘已’加‘一夕’，则‘死’字也，故断难过明日。”

与此相关的还有这样一个测例，有人曾用“尼”字求占病情，术士汪龙断道：“‘尼’加‘一夕’就是‘死’，明日必死无疑。”

以上两个测例均于求测字的基础上添加了“一夕”，从而断出明日必死的结论。

较为复杂一些的又有这样一个测例：

聂善充被王姓见控，求和，弗允，书“元”字，断曰：“官讼欲和不允，后反胜矣，逢七遇八即结，子当高枕。”十七日讞，原控人醉，触讞者怒，扑逐之。聂大喜归，问字理。曰：“‘元’字加官字头为‘完’，故毕竟见官始完也。字如‘允’字不成，故欲和不允。王姓见‘元’字为‘玩’，彼姓王，故我反胜也。字乃‘六’头‘九’足，所以知逢七遇八，讼结在六九之间。”聂深服。

此测例见于《字触》，测字先生把“元”或解为“完”，或解为“玩”，均用的是增法中的装头法。

由以上几个测例，我们大致可以见出增法这样两个特点：

从内容上说，增法添笔加字并不完全是随心所欲的，其中有一些规律可以寻绎，比如说，“尼”加“一夕”为“死”，“一夕”就与“死”的时间有关，因为那人恰好是只活了“一夕”。又如，“元”加“王”为“玩”，所添之“王”字正是官司中涉及的人物。

从形式上说，增法可以一增、二增乃至更多，通过装头、穿心、接脚等方式扩大求测字面，每增一次，即构成一个新字，再据新字加以测断。如“女”加“水”成“汝”，加“子”成“好”，加“立”成“妾”，加“卑”成“婢”，据此便可断出“此人为妾可立，即居婢亦不卑”等结论。但有时，增法又可以先增后减，如“元”欲“允”（增）而不成（减），“女”似“如”（增）而不露“口”（减），据此便断出求和不允，此女寡言的结论。

这种增中有减的方法更为灵活，它比只增无减的方法至少增加了一种可能性，因此断中说准的概率就大一些。正因如此，测字先生对此方法运用得更为普遍。请看《清稗类钞》中这样一例：

有女郎将与人私，虑其未谐，而就拆字者问休咎，拈得一“口”字。问欲卜何事，女曰：“有一事，可得良好结果否？”拆字者曰：“依字而断，恐无圆满之望矣。欲成‘可’字，无‘丁’；欲成‘如’字，无‘女’，欲成‘何’字，更无‘人丁’。”

此测例用的全是先增后减的方法，从而断出求测之女郎“无圆满之望矣”。

《蓼花洲闲录》中载有一谢石测例，更是这种方法的极致：

有朝士其室怀妊过月，手书一“也”字，令其夫持问。石是日座客甚众。石详视字，谓朝士曰：“此阁中所书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书。尊阁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为‘三十’，下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当力谋迁动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挠耳。”“盖‘也’字著‘水’则为‘池’，有‘马’则为‘驰’，今池运则无水，陆驰则无马，是安可动也？又尊阁父母兄弟近身亲人当皆无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则是‘他’字，今独见‘也’字而不见‘人’故也。又尊阁其家物产亦当荡尽否？以‘也’字著‘土’则为‘地’字，今又不见‘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诚如所言也。”朝士即谓之曰：“此皆非所问者，但贱室以怀妊过月，方窃忧之，所以问耳。”石曰：“是必十三个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两傍二竖下一画为‘十三’也。”石熟视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则吾官所问正决此事，可尽言否？”朝士因请其说。石曰：“‘也’字著‘虫’为‘虵’（蛇），今尊阁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见‘虫’，蠢则不能为害。谢石亦有薄术，可为吾官以药下验之，无苦也。”朝士大异其说，因请至家，以药投之，果百数小蛇而身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挟何术也。

此测例所断内容之多，所用方法之繁，是鲜见其匹的。细加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增法的运用简直神乎其神，令人难以置信。你看，一个“也”字时而增为“池”，时而增为“驰”，时而增为“他”，时而增为“地”，时而又增为“虵（蛇）”。这其中，有的是只增不减，如“也”之增为“蛇”；更多的则是先增而后减，如“池运则无水”、“陆驰则无马”等等，据此断出朝土迁移、财产、家族等情况。尽管这些情况有许多是答非所问，断非所测，但“是日座客甚众”，谢石难免要大抖其测风，提高其“知名度”。

观乎此例，我们对增法运用之广、测面之大似乎叹为观止了。但，且慢，现在还不能“观止”，因为术士对增法还另有新招，那就是增到字外的万事万物上去了。

先请看《清稗类钞》中这样一个测例：

乾隆丁卯，福建乡试场后，士子谢廷光闻洪山桥有善拆字者，偕友人诣之，拈得“因”字，决询乡试之售否。曰：“国内一人，今科解首也。”友跃然曰：“我亦就此‘因’字拆之。”曰：“此科恐无分，后有恩科，可望得志。彼之因，出于无心；君之因，出于有心也。”旁有一人方握折扇，即以扇指“因”字曰：“我亦就此字一决之。”其人蹙然曰：“君扇适加‘因’字之中，乃困象也，其终于一衿乎？”后各如其言。

在这个测例中，一个“因”字三种拆法，其结果各不相同。谢

廷光拈得“因”字，术士拆为“国内一人”，这是普通拆零法。其友人亦就“因”字求测，术士将它加笔为“恩”，这是依据他“出于有心”而增加的。旁人用扇指“因”字求测，术士又根据他“扇适加‘因’字之中”，把“因”增笔为“困”。这第三种方法便是据眼见之物而增添的。

这种增法和有增无减或先增后减的增法有别，它借用的不是某些笔画、部件或某字，而是测字“现场”耳闻目睹的人、物或环境的某个部分。清代术士程省将这种方法称为“假借测法”，所谓“假借”，也就是借用外事外物的意思。

这种增法在古代颇为习见，宋代测字高手胡宏就精通此道。据载，胡宏有一次在途中遇到两个读书人赴乡试，两人久闻胡宏测字极灵，便请他占测一下此番应试运气如何。胡宏说：“你们两人中一人当高中，一人将有丧事。”这两个读书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后来果然一人丧父，不得应试；另一人却得中，榜上有名。有人就向胡宏讨教道理何在，胡宏解释说：“丧父之人问的时候，恰好有人从旁汲水而过，水与立成‘泣’字，所以我知道他将有丧事。考中者问时，正好有人立于旁，人与立成‘位’字，所以我又知道他必中无疑。”

周亮工《字触》中载有他本人的一个测例，其中也用了这种“假借测法”，请看：

冯公失厮养儿，书“走”字于仆掌上视栢公（周亮工）。时一仆同至。公曰：“双人加‘走’为‘徒’字，覓之徒然耳。然是人更不须覓，不久即亡。以‘走’字离舍之，为‘土下人’也。”后日，见厮

养儿死大堤下。

在此测例中，周亮工把“走”增为“徒”，正是将同来求测的两个仆人都融入字中。

融得更玄乎其玄的是《志异续编》中的一个例子，曾有三个少年，同去术士那儿求测，想试试他是否真的很灵验。他们拈得一个“鸿”字，求占今日将上演什么戏。先生说：“演的是《佛殿》（即《西厢记》中一折）。”结果确是如此。三少年问他是何以知道的，先生解释说：“‘鸿’左为三点水，添个‘去’，便是法聪的‘法’。‘鸿’字当中是个‘工’，‘工’加‘纟’便是红娘的‘红’。‘鸿’之右是个‘鸟’，‘鸟’加‘𪇔’又成了鸳鸯的‘鸳’。综合这三点，不是《佛殿》是什么呢？”三少年又问：“那么张生何在呢？”术士说：“‘鸿’之左是三点水，再加‘各’，就是洛阳的‘洛’，洛阳才子非张生又是谁呢？”三少年仍不服气，认为这是碰巧说对。先生解释说：“测字一道重在理数二字，它虽然是就字说理，却含有机数在。”少年请他说个仔细，先生便振振有词地断道：“机数就在拈字之时。我当时正想把字拆开，正好有人担水而过，只听他对人说：‘听明白了，快快去吧！’所以我灵机一动，断为法聪。因三点水加上‘去’，就是一个‘法’字；那人说‘听明白’，这岂不是法聪的‘聪’？！当时我又看店内工人，一手携着一个小女孩，一手拿着一束丝，所以我推知‘工’加‘纟’，就是红娘的‘红’；再说那小女，又怎可说不是个良女，既是良女，当然就合成一个‘娘’字了。当时我又见一家门上插着三炷香，其中熄了一炷，燃着两炷，我灵机一闪，‘门’上添着两炷火，不就是‘𪇔’字头吗？何况当时又恰好

飞过两只鸟，故我推知‘鸿’右边的‘鸟’，加上‘𠂔’字头，就是一个‘鶯’；二鸟飞过，也自然是‘鶯鶯’啰！再说你们几位吧，我见诸位都脱帽露顶，来到我这儿，又都是客人。三‘客’皆去帽，岂非三个‘各’？所以‘鸿’之三点水，加上一个‘各’，正好是洛阳的‘洛’。加之你们求测时，又恰好是太阳当顶，故我又知是洛阳了。张生既是洛阳才子，那么，不断为张生又该是谁呢？”经他这么一说，三少年才叹服不已。在这个测例中，“假借测法”运用得神乎其神，既融入了旁人言语，又化入了目见耳闻，突出体现出测字先生随机应变、当机立断的本领。

2. 减法

减法与增法正好相反，增法是“添油加醋”，减法是“偷工减料”，它把所有与占断内容无关的那些字的笔画、部件统统去掉。

《古今图书集成·拆字部汇考》中有“当减亦减”一条，其原文如下：

如“樹”字中有“吉”字写得不好者，则减去两边，只是言吉。

这正是减法的作用。

减法在测字兴盛的宋代就已经被相士所使用。据载有人得了重病，书一“申”字去请谢石占断一下。谢石见此字当中出现了枯笔，认为此人丹田已燥，必死无疑，但又不便讲出来，遂敷衍搪塞过去了。病人走后，谢石对人说道：“此人丹田既燥，真气不复凝聚，岂有不死之理？！”在这里，求测

者书的是“申”，可谢石断之以“田”，这，就是刨掉上下两头的减法。

另据《宋史》上记载：

曹翰兴国四年，从征幽州，率部攻城东南隅，卒掘土得螭以献。翰谓诸将曰：“螭，水物而陆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将至，不可进拔之象。况螭者解也，其班师乎？”已而果验。

在这个测例中，曹翰只选择了“蟹”字的一部分“解”来测断，而将其他部分刨掉不管了。

一般说来，减笔法只能减笔一次，它所测断的事相对单纯一些。但有时，测字先生为了扩大他的测字面，常在简单的离合之后，再频频启用减笔法。请看下面难得的一个测例：明熹宗天启初，朝廷拟选宰相，有人就写了一个“全”字去问大名鼎鼎的术士郑仰田，让他占测一下宰相当选是哪些人。郑仰田琢磨了好一会，占道：“‘全’字从‘人’从‘王’，‘王’字有四画，可知当选者共四人。”求测者又忙问四人姓名，郑仰田想了想，回答说：“‘全’字省去三画，就成了‘土’，四人当中定有姓中带‘土’字的人。‘全’字省去四画，就成了‘丁’，四人当中定有姓‘丁’的人。‘全’字省去两横，合起来就成了‘木’，以此推断，这四个人中，也一定有一个名字属‘木’的人。再把所有省掉的部分加在一起，又合成了一个‘全’字，据此为断，这四人之中，一定还有个名‘全’的人。”求测者问道：“你刚才所说的‘木’，莫不是指林尚书吧？”郑仰田摇摇头，说道：“~~那倒不是~~，因‘~~林~~’是

双木，独木岂能成林？我所说的‘木’是指人名，不是指姓。”后来，当选宰相的果然是四个人，他们是周如馨、丁绍轼、黄立极、冯铨。其姓名也一一证实了郑仰田的预测。何以见得呢？因“周”字中正有“土”，丁绍轼恰姓“丁”，“极”字中不离“木”，“铨”字中正有“全”。

在上述测例中，郑仰田把“全”离析为“人”、“王”，接着就多次使用了减笔法。

减笔法和增笔法相比，使用得要少一些。因减笔占断远不如增笔法那样可以任意扩大字的侧面，其占断概率相对而言要少得多。同时，传统测字理论认为，减笔法不能滥用，“非事之当而理不正，不可漫然用之也。凡当减时亦当略减方是。”（程省《测字秘牒》）既不可“漫然用之”，使用时“亦当略减方是”，其结果自然就“发育不良”，难以“茁壮成长”了。

以上我们较为详细地“展览”了术士增法、减法的机巧变化，据此我仍不难判定，无论是漫加推衍的增法，还是“固执一端”的减法，尽管外观上判若两极，但内里却融融相契，因为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设法弥补求测之字与求测之事不相吻合的缝隙，使占断时能摇头晃脑地自圆其说。

三、位移法

所谓位移法，就是指字本身各部件之间的相互易位，据此组成新字来占断人事吉凶。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离合之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具体说来，位移法本身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横向位移，一是纵向位移，容我们逐一述之。

1. 横向位移

先看周亮工《字触》中所收的这样一个测例：

建炎间，术者周生善相字。车驾至杭州时，金人惊扰之余，人心危疑，执政呼周生，偶书“杭”字示之。周曰：“惧有惊报。”乃拆其字，以右边一点配“木”上，即为“兀术”。不旬日，果传兀术南侵。

在此测例中，术士周生将“杭”之“亢”上的一点横移到“术”字之上，这样“杭”便离析成了“兀术”二字，据此断出金兀术将南侵，大宋江山岌岌可危。

徐珂《清稗类钞》中也载有一个范时行的测例，用的就是横向位移法：

又有一人以“風（风）”字问妻所孕为男为女，范曰：“移中间‘虫’字于右旁，则似‘虺’字。《诗》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所孕必女矣。”

在这个测例中，范时行将“風”字中之“虫”移到右边，组成新字——虺，再据此附会《诗经》中诗句，断出求测者的妻子所孕必是女孩。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横向位移法确有其独到之处，它不在字外讨饭吃，而在字内求生存。而且拆起来很灵活，或一字移成二字，如“杭”之于“兀术”；或一字移后另成一字，如“風”之于“虺”。它不求字形密合无间，只求大致相差不离，断起来也很灵便，或是据形而断，如前例，或是引诗为

断，如后例。有了这些好处，术士自然不废此道，而津津乐道了。

字可以横移，当然也可以纵移，于是便有了第二种情况。

2. 纵向位移

纵向位移较之于横向位移法更为方便，因而这方面的测例也更为习见。先请看宋代的两个测例。

据《铁围山丛谈》上记载，宋代测字高手谢石就有这样的—个测例：

徽宗令中宫索东宫（太子）书一字来，乃以“太”字进问石。石曰：“此天子也。”上询谓何，曰：“‘太’字点微横，此必太子也。他日移置诸上，岂非天子邪？”

此测例很有意思，宋徽宗让太子写一“太”字求测，谢石据“太”字一点写得有点像横画，便断出书笔者必是太子；再将此点纵向移到上面去，便成了“天”字，据此又断出此太子日后必为天子。由此可见，术士占断时连点画之微也绝不放过，倘能移位而成新字，自然更不会漫不加察的。

周亮工《字触》中另有一个测例，其纵向位移更为玄乎。据载，曾有一人，老大不小了，但仍未婚娶，他心里很着急，便特意赶到九鲤湖神庙，想在那儿托神之福赐个好梦。梦中他看到神人翩然而来，写了一个“婦（妇）”字，就渺然不见踪影。他不知此梦谓何，便请术士求占。术士听他如此一说，便肯定地占道：“你梦见的那个字，其实已预示了你所关心的一切。你想想看，‘婦’字上是个‘山’，若把此‘山’移下

来和‘巾’字相拼在一起，那就成了‘出’字。现在此‘山’是横写，表明你未来的夫人当‘出’自‘横山’”此人听后，开始不信，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可事后证明，他的妻人确实出自于横山。

此测例，术士先把“婦”上的“山”移下来，和“巾”相配；再把此“山”此“巾”调过来看，这才成了一个“出”；又根据此“山”字貌的特点，断出求测者未来之妻当出于横山。很显然，这一移位法较之上例要复杂一些，我们纵然认为此例未必是真，但也不能不佩服此术士善“测”字，会组字，演出这出饶有兴味的“天仙配”

术士本来就是拈弄文字的“魔术师”，对他们来讲，字怎么拆都可以，只要能自圆其说，不留把柄就可以了，纵向位移不过是他们常吃的一道“小菜”而已。

它虽是“小菜”一道，但术士不仅爱吃，而且吃法也还不少。除了上面那种一字上下位移的吃法外，测字先生另有一种吃法，即将求测的两个字上下位移，以此来占断吉凶。

请看周亮工《字触》中所收的这样一个测例：曾有一个入替别人牵线搭桥，但又不知“红娘”是否能做好，他听说马守愚测字极灵验，便有心请他占断一下。他特意写了吉祥如意“吉帖”二字去求占，谁知马守愚见后，并不忙于占断，他仔细推敲了好一会，这才解释说：“你求测的这桩婚事已经很和谐了。你想，若把‘帖’字的‘巾’旁放在‘吉’字的下面，那就是喜庆之象。但此事后来却发生了变化，恐怕不大吉利啊！因为要是把‘吉’字下面的‘口’字移到‘巾’字的上面，那岂不是吊丧的‘吊’字？！”

此测例，马守愚把“吉帖”二字或上挪，或下移，或断

为吉，或占为凶，真不愧为善于“移山”的“愚公”。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不论是横向位移也好，还是纵向位移也罢；也不论是单字“部首调济”也好，还是多字“自由组装”也罢，都突出体现出了测字先生拈弄文字、肢解文字的独特本领，而这些本领再辅以观颜察色，相机行事的字外功夫，便为他们赢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于是他们以此为生，定点为业，堂堂正正地干起了测字的行当。

第二节 字貌占断法

汉字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之中字形最为直观，它见之于目，感之于心，具有形象宛然、触目会心的特点。这里所要谈的字貌占断法正是建基于汉字的这一特点之上的。

那么，什么是字貌占断法呢？

它指的是依据字的外形特点去比附他字或他物来占断人事吉凶。由这个定义，我们又可把这种测法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此字象彼物；二是以此字象彼字。下面我们就一一来谈。

先看第一种情况。

我们知道，汉字的母型是象形，其后虽趋于抽象，但象形的因素并没有全然消失，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已然变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这种介乎似与不似之间的文字对我们中国人具象的、类比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人们有意无意之间常会在这一符码中获得智慧的灵光，引发出许多活泼泼的奇思妙想。比如，“田”这个字本来是“田地”的象形字，但在

诗人的慧眼中，它却成了“莲叶”的象形，大家所熟悉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句诗中，“田田”就是巧用来摹状莲叶之形的。又如，我们常说某人长的是“国字脸”，某人走的是“八字步”，某处有个“丁字街”，这里实际上都用的是比喻的说法，是说某人脸庞四四方方，宛如“国”字形；某人走路脚型不正，恰如“八”字形；某处有个街，其形正如“丁”字形。

在字谜中，这种形况也屡见不鲜。例如，“龙”被迁想为“狗被打折一条腿”，“工”被想象为“一桥飞架南北”，“丛”被联想为“海燕双栖玳瑁梁”，“闪”被妙想为“孤雁飞入屋舍内”，等等。

这种图象物品，描摹形态，以扣谜底的方法在测字术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测字犹如猜谜，测字高手也无异于猜谜高手，故而只要有可能，术士是绝不会放弃这种以字象物的猜谜方法的，只不过他们猜的是人生之谜、吉凶之谜。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兼：双燕穿帘；

卜：金枝玉叶；

乙：字如鱼钩；

弓：状如金蛇；

金：象断柄之伞；

亚：如纱窗之形；

儿：状如鸟巢；

火：形如蜡烛；

淋：楚汉相争；

“淋”字谜

盪：劝君更尽一杯酒，好唱阳关三叠曲；

这种对字形的迁想与字谜中的象形法几乎是同一机杼，如出一辙。

下面我们看几个具体的测例。

据《朝野僉载》中记载，洛州有一个叫杜元的人，他养了一头颇通人性的牛，心中十分怜爱它。有一天，杜元作了一个怪梦，梦见他的牛竟然冒出两根尾巴。他不知此梦将预示着什么，便去请术士李仙药求占。李仙药听说了此梦后，断言道：“牛字有两尾，正是一个‘失’。”此后没过几天，杜元还真的失掉了这头心爱的牛。此梦之谜，实际上就是一个字之谜，你看牛长两个尾巴，岂不正像一个“失”字？！

周亮工《字触》中也载有一个“失”之梦，据说有人曾做一梦，梦见自己坐在牛背之上，梦后醒来，不知吉凶如何，便请术士求占。术士占断说：“人在牛背上，正是一个‘失’。”后来此人还真的遭到了失物之忧。

一个“失”字，既像牛长两个尾巴，又像人在牛背之上，足见汉字象物不拘一端，术士测字也不拘一格，其间妙处全在于慧眼明鉴、机敏把握。

我们再看两个“荣”字的测例。

周亮工《字触》上说：

一士梦一树两焰并发，占者曰：“木两火，荣
（荣）耀之光。”果得登第。

此梦由“木两火”断出是个“荣”字，又由“荣”乃荣耀之

义，推断出土人必身显名贵，荣耀一时。

但同样是“荣”字，有时却并不荣耀，而是至凶之兆。《清稗类钞》上就有这样一个测例，有一巨商叫吴某，长期在浙江一带做生意。一天，他得到家书，信中说妻子病重，望他速速启程，赶回家去。吴某很忧虑，便去找大名远扬的测字高手陈钟年求测，他随手拈得一个“榮（荣）”字。陈钟年占道：“你妻子已经死了。”吴某一听，大惊失色，忙问道理何在。陈钟年解释说：“‘榮’字，上面是两个‘火’字，正像一对蜡烛；中间一部分，也宛如墓台；下面是一‘木’字，表示棺木。以此字象而言，你妻子岂有不死之理？”吴某一听，赶紧买船返回家中。结果，还确实如此。

另有一例，也用的是这种断法。有人曾写一“𪇔”字求占婚姻大事是否和谐美满，测字先生把字琢磨了一会，断道：“这桩婚姻成得倒很容易，只是有再婚的可能。”求测者听后，忙问字理何在。测字先生说：“据字象看来，此字乃颠鸾倒凤，象征婚姻极其美满。但字的上面是‘鸟’字，下面的‘几’是鸟巢，现在鸟已不在巢中，此乃换巢鸾凤之象，所以说这个女子一定是个再婚之妇。”求测者听罢，心里暗暗称奇，因为他的意中人确实是个再婚之妇。

元代张德元，测字极负盛名，据字象为断，可以说是他的“拿手绝招”。据说一次他的朋友病了，有人曾写一个“豐”字来求他占测吉凶。张德元一见此字，当即断道：“病人已经死了，讣告明天就到。”那人听后大惊，忙问何以断出，德元解释说：“‘豐（丰）’中有座‘山’，它代表坟地；又有两个‘丰’，它是坟前长的树；下面还有一个‘豆’，它是祭丧用的器皿。坟已筑好，树也长成，连祭器也已备好，病人

岂有不死之理呢！”在此测例中，张德元构想奇特，联想丰富，一个“豐（丰）”字或而像坟地，或而似树木，或而又如祭器，被他大卸八块，一一迁想成病人必死无疑的凶兆。此测例与上面陈钟年拆“荣”字相比，毫不逊色，各有千秋。

程省测字，名重一时，字象占断，亦时有所取。请看他自述的一个例子，一次，有位官宦来测婚姻，他写了一个“卜”字。程省一见，心里便有了谱。他从容断道：“此人必大贵，但非本地人，比大人似要显贵些，这桩婚姻必成无疑。”官宦听后，句句属实，心中暗暗称奇，便问字理何在。程省笑了笑，这才揭底说：“事理就在字理中。你看，‘卜’字之体为金枝玉叶，当中一竖是金枝，旁边一点为玉叶，故我推断是位千金小姐。再说，‘卜’又是‘外’字的一边，表明小姐乃外地之人。‘卜’字可上可下，婚姻自然顺畅。”在这里，用“卜”来比附“金枝玉叶”，确实形象得很。

以上诸测例都用的是楷书字形，倘用其他字体来比附，有时也很形象。徐珂《清稗类钞》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大不同，某拆字者之别号也。光、宣间，寓常州城隍庙，设摊营业，名噪一时，有某店伙之纱帐被窃，薄暮始觉，往来拆。时大不同已收摊矣，因令随举一字以拆。店伙写“の”字。大不同曰：“无妨，君所失为纱帐，今已有人悬于他处。君观‘四’字之形，固悬挂之象也。速觅或可得。”店伙曰：“否，否，君所拆者为真体‘四’字，而余所举者为草体‘四’字，无乃误乎？”大不同曰：“若然，则赃已难觅，夜可购各蚊烟一圈以御蚊矣。”蚊烟一

图，亦象草体“の”字之形也。

在此测例中，大不同先以楷书“四”字为断，因它有“悬挂之象”，故断为“纱帐”。店伙计以为他所断非所写之字，认为他可能是误断，大不同这才“言归正传”，据“四”字草书之体断为赃物难寻，只可备“蚊烟一圈”。这确是据草书之体占断吉凶的一个好例，也是测字证人本质的一次难得的“曝光”。大不同测纱帐下落，竟前测后测不一般，前言后语“大不同”，其窘状当不难想见。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字貌占断法的第二种情况，也就是以此字象彼字，据此以占断人事的吉凶。

在汉字的滔滔大观中，有许多字看起来差别很小，我们稍不留心，或漫不加察，就会误判错读，犯郢书燕说，指鹿为马的错误。因此，区分形似字便成了识读汉字、理解汉字的必不可少的“一课”。比如：“士与土、戌与戊、天与夫、日与曰、此与北、易与昜、晴与睛、天与夭、炙与灸、召与召、未与末、艮与良、戊与戌、盲与盲，等等，不胜枚举。

这种形近现象是似而非，是非而似，天然具有一种“谜”性，这对拈弄文字、摆布文字的测字“魔术师”来说，自然是设制迷宫、制造幻境的绝好机会。故而只要一有机会，他们自会见缝插针，有意利用这种形近现象去任意比附，占断吉凶。

这种占断法至少在测字盛行的宋代就已经相当流行了。宋代有一士人，妻子丢失了价值昂贵的珠冠，心里很是焦急，她听说谢石测字极灵验，就写一“失”字，让丈夫去求占。士人在测字摊上找到谢石，谢石接过“失”字一看，便断道：

“贵人亲属中，一定有叫朱氏的吧？因为‘失’字看起来，恰如一个‘朱’字。”士人一听，点头称是。这里，谢石采用的就是以此字像彼字的占断方法。

另据《夷坚志》记载：

文惠公（洪适）为参知政事，上章乞去，未谐。朱（朱安国，宋代有名的测字先生）访予（洪迈，适之弟）。予曰：“用书信中字可占否？”曰：“可。”即指书中“去”字使观之。其体带草，朱捧玩，咨叹曰：“此尊官是贵人，今所占何事？”予曰：“见任两府，方力求去。”朱曰：“正钻头出天上，将位冠百僚，无庸询休逸之请。”后两月拜相。

在这个测例中，朱安国运用的也是形近占断法。他先据草书“去”字像“天”字，便认为洪适眼下正钻头出天之上，将位列众官之首，因而劝他不要退隐。

明代张乘槎极善测字，他对这种占断法更是了然于心，娴熟于手。《拆字部纪事》载有他这样一个测例：

浙江旧有“拱北楼”，王参政莅浙，改为“来远楼”。初揭匾，命槎占之。槎曰：“三日内主有哀丧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王延槎问故。曰：“‘来’有‘丧’字形，‘远（远）’有‘哀’字形，走之二点相连，泪点也。”

此测例断凶丧，运用的全是字貌占断法。

与这个测例相比，下面一个例子更是奇之又奇、玄之又玄，它把字貌占断法发挥得几乎淋漓尽致。这个例子也出自《字触》之中。据说有一姓朱的盐道御史，其弟弟要返回京师，忽闻在途中身染疾病，朱某很着急，就写了一个“此”字去占断。测字先生断道：“‘此’这个字占问兄弟病情太不吉利，因为‘此’字看起来就像是‘比’字，比肩者，兄弟之称也。但‘比’字旁边多了一直，又是由‘止’字来领头，这分明是说你兄弟俩比肩之数将到此为止了。再说，‘此’字看起来，又像是‘死’字，这也说明死亡之凶神将降临到你弟弟身上，你弟弟又怎能活着回家呢？”朱某一听，叫苦不迭，忙问弟弟何时能回家。测字先生占断说：“‘此’这个字，看起来和‘北’字大差不差，据以为断，你弟弟即使现在没回家，也差不多远了。”过了几天，信就来了，果然一一俱验。在这个测例中，测字先生极尽形近占断之能事，一个“此”字一会像“比”，一会如“死”，一会又似“北”，真是愈断愈神，也愈占愈玄乎。

这种占断法到了清代，又有了新的发展。以前测字多半是以此字象彼字，着眼于字的整体外观相似来占断吉凶的。但到了清代，术士在不废此道的基础上，又径以字的部分相似来迁想比附，以扩大相似占断法的随意性，提高占断吉凶的“命中率”。

我们先看《字触》中周亮工的一个测例。曾有一人，孩子得了重病，心里异常焦急，就写了个“午”字去请周亮工占断。周亮工一见“午”字，顿觉此乃凶兆，他占断说：“‘午’字可不吉利啊！它上面像个‘人’字，但此人卧而不起；下面是个‘十’字，十者，数之终也。由此看来，此人

“卧病不起，一贫如洗。”后来，这人的孩子果然病故，成了“草中之鬼”。在这个测例中，周亮工先用离合法把“午”字一分为二，又用部分相似断法把“午”之上半部分比附成“人”字，根据人“卧而不起”的字貌特征，断出求测者之子必卧病不起。

比这个测例更是复杂一点的是周亮工的另一个测例。有一读书人，很热衷于功名，应试之前，曾写一“携”字让周亮工占测此番应试运气如何。周亮工一见，不禁窃笑，他占断说：“你这番应试，必然榜上无名，名落孙山啊！”读书人听后，吓了一跳，忙问道理何在。周亮工双目微闭，从容断道：“道理就在你写的这个字中。你想想看，‘携’这个字，说它像‘進（进）’吧又不全像；说它是‘秀’吧却又少了上边；说它是‘才’吧偏又出了头。据此来占断，你此番应试，自然是进士、秀才两无所中。”在这个测例中，周亮工把“携”字一分为三，用部分相似的断法断出这位读书人此番“高考”进士考不上，秀才也考不中。

倘能把整体相似的占断法和部分相似的占断法结合起来运用，其测面更广，自由度更大，测断的“成功率”也就更高。清初术士程省就有过这样一个测例。有一次，某人向程省说道：“我一心只想发财，请帮我测上一字吧！”程省笑着问道：“那么你想测个什么字呢？”那人并不答腔，只是傻乎乎望着别人发愣。程省觉得他很有意思，便对他说：“你既不愿写字，也不愿拈字，我就用‘求财’二字为你占测，你意下以为如何？”那人这才答腔，问了一句很“鬼”的话：“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生意的吗？”程省打量了一下对方，说道：“你或许是卖果子的，要不也一定是树上长的东西。”那人又

问：“我做的是哪方的生意？”程省答曰：“你从东南方向买来，又到西北方向去卖。先前也曾干过一段时间，有了一些本钱，但因技艺欠精，很快又亏了本，眼下是第二次做生意。现在生意虽还不错，但本钱又嫌不足，于是便想合伙干，情况是否如此？”那人听后，连连赞道：“先生真是神了！我确实是做水果生意的，从洞庭山买来，再贩到淮北去卖。前年买来的货大半都烂掉了，本钱亏了不少。眼下正想约一伙计，一起去做生意，但不知是否吉利，故来求占。”程省说：“你但做无妨。”这时，围观的人中，有人插嘴说：“先生言之有理，但不知此理何在，望先生明示。”程省环视一下围观的人群，不无得意地占断说：“‘求财’二字都有‘木’字形，故推知他一定是干果子生意的。‘求’字之中既有‘本’字之形，也含有‘不’字、‘永’字之状；而‘财’字当中只有半个‘本’字，同时又有半个‘贩’字，以此为断，便断出他做生意又亏了本。”这时，又有人问道：“那你又怎么知道他上次做生意技艺欠精，而这次又熟练了呢？”程省笑着断道：“道理还在字理之中。你想想，‘求’字看起来很像‘丧’字头，丧者失也，是凶象，据此来占断，就知道他上次做生意技艺欠佳亏了本钱。再说‘财’字又有些像‘射’字，射者，中也，据此又可断出他这次很可能会赚钱。”经程省这么一说，围观者才恍然大悟，对他佩服无比。

上面这个测例，程省对形似占断法做了“全方位”的发挥，一个“求”字或而像“木”，或而像“本”，或而像“不”，或而像“永”，或而又像“丧”字头；一个“财”字时而像“本”，时而像“射”，时而又如“贩”之半。这里既有字形整体相似，又有字形部分相类，随需取用，变化不可端

倪，突出体现出“测字先生造字手，字里字外翻筋头”的看家本领。

由上述各例，我们也不难看出，无论是以此字象彼物的断法也好，还是以此字象彼字的测法也罢，都无非是为了求得更大的随意性。它既可以一字多象，如“失”像“牛生两尾”，又像“人骑牛背上”；又可以多字多象，如上面所说的“求财”二字；还可以分拆一字，再多方比附，如“携”一分为三，便与“进”、“秀”、“才”三字相比附。这样一来，就可以由此及彼、“舍近求远”，赢得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平添了许多回旋的机会，其“命中率”自然也相对地提高了。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测字先生才每每启用这一法门，在字里字外竞相开演“连滚翻”的绝技。

这种绝技固然很绝，堪称一种相当高级的“文字魔术”，但究底探根，这种断法一如其他断法一样，是一种牵强附会的产物。从理论上说，这种测法是根据字的相似特征去形成新的字，或比附新的物，再据此去占断吉凶休咎。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比附、迁想的过程，是谁也无法用文字学的理论来解释、证明其合理性的。

从具体测例上看，这种断法虽然很绝，十分巧妙，但只有在信“魔”入“魔”的人看来，才会相信这种“魔术”的。而对明眼人来说，就不那么灵验神奇了。前面所说的大不同的那个测例，其前断后断“大不同”，连店伙计也疑其有误，就足以见出这一点。

我们不妨再来看这样一个测例：

苏子瞻（苏轼）谪儋州，以“儋”与“瞻”字

相近也；子由（苏辙）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黄庭坚）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谰谑之意。当时有术士曰：“‘儋’字从立人，子瞻其尚能北归乎？‘雷’字‘雨’在‘田’中，承天之泽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盖棺之义也，鲁直其不返乎？”后子瞻北归，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于颍，十余年乃终；鲁直竟卒于宜州。

此例见于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在这个测例中，人名与地名充满着巧合：子瞻的“瞻”与儋州的“儋”形体相近，故遭贬儋州；子由的“由”与雷州的“雷”之下面的“田”形体相类，故被贬雷州；黄鲁直的“直”与宜州的“宜”字形相若，故被谪宜州。人名、地名一一对号入座，不能不说巧之极矣。但我们据此便信以为真，那就大可不必了。事实上，并非人名、地名中已伏凶兆，而恰恰是先有被贬的事实，然后才有这一牵强附会的测例，这一测例正是苏轼、苏辙的政敌章子厚“谰谑之意”、特意编出来的。我们断断乎不可为这种倒果为因、牵强附会的测例所蒙蔽。

为了更好见出这一点，我们不妨再举《说海》中的一个测例：

（谢）石在徽宗时，尝特称承信郎。一日谓石，我亦能拆字。石诘之，则曰：“汝姓谢，所谓身在讨论之中；石则终生右选，不能出头。”闻者大笑。

堂堂一国君主，竟来了闲情雅致，为大名鼎鼎的测字高手谢石拆起字来。在这一拆例中，宋徽宗也启用了字貌占断法，他利用“石”像“右”却不出头，断出他“右选”（任高官）无望。显然，测字一道并非术士“专利”，只要是大脑灵光、锦心绣口主人都可以玩玩的，徽宗这次戏“拆”，效果还不错，直使举座同乐，上下并欢。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字貌占断法虽然很神，却未必很真，所以像徽宗这样的聪明人有时便对它采取了“迷”而不“信”、“信”而不“仰”的游戏态度。

宋徽宗尚且如此，我们又何必认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啊！

第三节 字迹占断法

古人写字用笔，正如“笔”字所示，是有“竹”有“毛”的毛笔，毛笔锋尖体圆，可提可按，罄控自如，故写来变化无穷，应会无方。

同样是一杆笔，在不同的人手下，其结体、笔划迥然有别。有的人字势端凝，有的人字体灵动，有的人笔划苍雄，有的人笔划秀雅。于是颜体不同于柳体，柳体有别于赵体，赵体又大别于欧体。

写字在中国是一门艺术，是一门可以袒露心迹、呈露个性的高深艺术。但这门艺术在测字先生手中，又沉沦为一种方术。

求测者来了，写上一字，测字先生常接过字来，摇头晃

脑打量一番，看此字写得是肥是瘦，是大是小，是正是偏，是工整还是草率，然后再据此推断来者是谁，是富贵之人，还是凡庸之辈，是儒雅之士，还是卑琐之徒，再进而沉入字内，看看此字该如何拆，人事该怎样断。

这种依据字迹特征来测人断事的方法，就是字迹占断法。

这种断法在古代十分流行，因而这方面的理论较之于其他断法，又显得格外的丰富，它似乎可以说是测字理论中最像理论的部分。

稍加研审，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据笔划特征来占断，它属字迹断法的微观层次；二是依体势来占断，它属字迹断法的宏观层次。这两个层次桴鼓相应，蒂萼相生，但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就把它“断”为两截，一一述之。

先谈第一个方面。

笔划又称点画，书写时体态各异，因人而殊，因而测字理论首先将这些点划特征与人事吉凶挂起钩来，并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在《新订指明心法》中，就载有这样一段《笔法筌蹄》歌诀：

笔画稳重衣食丰隆，
笔画平直丰衣足食。
笔画端正衣禄铁定，
笔画分明决定前程。
笔画圆静富贵无并，
笔画肥浓富贵无穷。
笔画洁净功名可决，

笔画轻快诸事通泰。
笔画刚健力量识见。
笔画精神必有声名。
笔画光发荣显通达。
笔画气势慷慨意志。
笔画宽洪逞英雄。
笔画尖小其人必了。
笔画如线有识有见。
笔画似绳一世平宁。
笔画挑剔奸巧衣食。
笔画鸟梅面相恢恢。
笔画懒淡兄弟离散。
笔画分扫破荡家早。
笔画弯曲奸巧百出。
笔势迷荡一生浮浪。
笔画枯槁财物虚耗。
笔画糊涂蠢蠢无谋。
笔画粘带是非招怪。
笔画大小有歎有好。
笔画高低说是说非。
笔画淡薄疮痍克剥。
笔画反覆心常不足。
笔画破碎家事常退。
笔画欹斜飘泊生涯。
笔画愚浊无知无学。
笔画如蛇常不在宅。

笔画偏侧衣食断隔。
笔似鼓槌至老寒微，
笔势如针此人毒心。
笔画勾丫官事交加，
笔画如钩害人不休。
笔画散乱财谷绝断，
笔格常奇诀以别之。

这首《笔法筌蹄》歌诀对笔画特征与人事吉凶的关系虽概括得很全面，但就总体上说，还似乎过于原则了一些，它更像是个笔迹学的“大纲”，因而测字高手固然不妨以“纲”为据，活解活用，但对一般水平的术士而言，恐怕就只能唱唱而已，一旦使用起来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正是有鉴于此，测字高手们又为“矮手”们列好了许多“细则”，以便他们“参照执行”。

笔划形态各异，写来人人有殊，其间变化之大，直令人感到困惑、茫然。如何细加裁断，具体掌握呢？其“细则”大致如下：

一看笔画轻重。

自点而言，如果字中点多，则主人淫滥漂荡，贪花恋柳，居止不定；如果点写得重，则主商贾发财，但有离井漂泊之患；如果点写得拗折，则主人无安身之地，恶死不得善终；如果水命人或金命人见点画轻者，主早年有水灾。

自横而论，如写得精细匀停，则有吉利之象；若写得两头尖，则有伤妻之兆；如写“十”字时两头尖尖，这便是所谓的穿心之象，主刑妻伤子，兄弟离散。

就竖而言，亦须粗细一般，倘直落两头尖者，则伤子，若字中竖画多者，则主人机巧聪明，多为工匠手艺之人。

其他笔画依此类推，“如法炮制”。

二看笔画长短

字中笔画有长有短，本来是相对固定的，但写来就不那么“固守一隅”了，这其中有个性，也有讲究。比如说，如果有的笔画当短，却写得过长，就表明此人慷慨大方会花钱，当为富贵之人；如果字中笔画当长，却写得过短，就表明此人鄙吝不堪，一毛不拔。

三看笔画增减

一个字笔画多少，本来是确定的，但求测者写字时，常多出一条腿，或少了一只臂，这其中也有个性、有吉凶。例如，字中如多出一画一撇或一捺，则主大发横财，或遇贵人，得成名利；如果字中少了一画一撇或一捺，则主其人要破财，丢弃祖业。

由“大纲”、“细则”再具体到求测之事，便有了相当具体的、更便于“操作”的一些占断方法。例如：

如果求测者来问寿，笔画写得长而且瘦，其人必长寿；如笔画写得很肥壮，则其人必耐老；倘笔画写得短促者，其人必是短命鬼。

如果求测者问官司，写的字或字中撇捺破碎不全，则主人有杖责之灾；字中撇捺长者、耸者，也有杖责之灾；如字写得很散乱，则官司容易了结。

如果求测者问生育，假使字中竖画成双，则主生女；如字中竖画成单者，则主生男；假如字中有的笔画写得纤断，则主产子时有惊险。

笔画占断法已如上说，我们接着来看体势占断法，它属于字迹占断法的宏观层次。

测字也称相字，相者，仔细观察之谓也。古代伯乐善相马，今人也说相媳妇，这里的相都是仔细观察的意思。测字既称相字，可见字不可不相，相的是否准确，对字如何拆，事如何断关系极大。

那么，字该如何相呢？

求测字的来了，写上一字或两字，测字先生首先看到的便是字。这个字因求测者身份不同，个性有别而呈现出不同的体势。它或滞重、或轻灵、或秀雅、或工稳。为了有效地把握这些体势特点，测字先生必须首先心里有个“谱”，把体势特征与不同类型的人挂上钩、对上号，这样便出现了“字如其人”的体式谱。

《古今图书集成·拆字部汇考》中就有这样的“谱”：

富人字多稳重，无枯淡；
贵人字多清奇，长画肥大；
贫人字多枯淡，无精神；
贱人字多散乱，带空亡；
百工字多挑趄；
商人字多远迹；
男子字多开阔，
妇人字多逼侧。

有了这样的“谱”，测字时就显得轻松自如、得心应手多了。测字先生曾不无自信地“唱”道：

笔清墨秀琢磨深，
方正无偏必缙绅。
疾走龙蛇心志远，
行藏慷慨位三公。

金木重重见贵神，
笔挥清楚主聪明。
竿直一行冲宝盖，
富贵荣华日日新。

方圆端正笔无尘，
年少登科入翰林。
只恐弱木逢金克，
缠身疾病不明萌。

木形之字有精神，
可云发达耀门庭。
火多年少心多燥，
水盛为人智必清。

一直居中勇更明，
少年龟勉得功名。
末笔再逢金土厚，
为官享禄更廉明。

笔端势小事无成。
粗俗须知业不精。
起头落笔如莺嘴，
心里奸谋刻薄人。

土形之字活而圆，
用神清楚是英贤。
笔底到头无间断，
一家荣耀有余钱。

字眩无神笔更联，
公门吏卒度余年。
勉强操觚无实学，
欺人长者被人嫌。

日月当头笔迹强，
精神骨骼字无伤。
国家栋梁何消息，
更有奇衰佐圣疆。

衣食身傍黑带浓，
最嫌软弱与无神。
字中人口如枯暗，
莫待长年主恶终。

下笔头高志必雄，

落头不是正经人。
尖头秃尾人无智，
老死衙门不得名。

字无骨骼少精神，
一生多耗病沉沉。
问名带草索连就，
满腹文章亦落空。

由这些《七言作用歌》，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体势断法，主要是看求测之字写得是不是端正、饱满、有精神有骨骼。倘是前者必是高贵之象，英雄之气；倘是后者，必是贫寒之兆，卑琐之人。前者就可断之以吉，后者便可断之以凶。这种占断法实际上是一种拟人化的占断法。正因如此，测字理论中在表述这一断法时，就径自用比喻来表达。请看《拆字部汇考》中《探元赋》中的这样一段：

体如鹭立，孤贫之士无疑；势如鸦飞，饶舌之徒可测。惊蛇失道，只寻入穴之谋；舞鹤离巢，自有冲霄之志。急如鹊跳，是子轻浮；缓似鹤行，斯人稳重。如篁蔚郁，休言豁达心怀；似水飘流，未免萧条家道。由此再加以附会，又产生出相应的人事吉凶。例如，求测者问行人，如“行”字写得脚短一般齐者，行人马上就会来；如果字脚写得或长或短，行人就不会来；如字画直落点多者，其人必陷身，倘字画少者，人便至。

如果求测者问失物，若字有“失”字体者，失物日久难觅。

如果求测者问生育，凡字中有“喜”字、“吉”字体者，均主吉利；若字写得粘连者，小孩便能“畅通无阻”生下来。

如果求测者问婚姻，凡字写得粘连者，其婚事必成；如字中间阔而不粘连者，其婚事难成；如字写得脚匀齐者，则婚事能成；若字写得四周齐者，婚事尤为吉利；如字写得上短下长者，其婚事日久方成；若字写得左边长者，主男家顺，女家不肯；如字写得右边长者，则主女家顺，男家不肯。

如果求测者问官贵，凡字有二数一点当先者，无阻事济；如所写之字相粘伶俐者，贵人顺；倘字写得点多者，事不成。

如果求测者问行人，凡“人”字写得潦倒者，行人便未动身；若写得“人”字起者，则行人业已动身。

以上我们对笔画占断法、体势占断法的大要进行了“展览”，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几个具体而微的测例。

测例之一，出自宋代，测字高手谢石之手。据周亮工《字触》上记载：

一人病，书“申”字以问，中带燥笔。客退，
(谢石)谓坐者云：“丹田既燥，其人必死。”或曰：
“应在几日？”曰：“不过明申时。”果然。

在此测例中，谢石除利用字形相似的因素外（“申”与“田”相似），主要依据的是笔迹占断法，他由“申”字中间带有枯笔，便断出此人“丹田必燥，其人必死”。

测例之二，出自宋代另一测字高手周生之手。宋高宗绍兴初年，宰相赵鼎、秦桧关系不和，相互攻讦，各欲引退。他俩各写一“退”字，请周生求占。周生这样断道：“赵鼎定会贬出京师，秦桧则一定安居京城。因‘退’所从之‘艮’可拆为‘日’和‘人’字。日者，君主之象；人者，臣子之象。赵鼎写的‘退’，‘人’离‘日’甚远；秦桧所写的‘退’，‘人’、‘日’紧紧相依，且‘日’字左笔下连，而‘人’字则左笔斜贯而上。据此以断，一去一留，北象分明可见。”后来果然一一应验。此测例先拆字形，后以笔势为断。

测例之三，出自元代著名术士何中立之手，据《杭州府志》记载，杭州有一叫桂茂之的督学，奉朝廷之命，赴宁波督察。临行时，他写一“去”字请何中立为他占测。何中立沉思片刻，断道：“督学将不会外出。”桂督学说：“先生差矣，我正要去呢。”何中立从容解释说：“据所写‘去’字来看，写得钩钩搭搭，牵扯不清，故我断知你一定去不成。”督学听后，哪里肯信，又写一“壬”字请他占测。何中立一见此字，连呼不好，说：“大人督学之位难保，三日之内将要卸官，可能还会遇到不小麻烦。”督学慌了心神，忙问道理何在。何中立解释说：“‘壬’上一撇，正是凶兆，将撇去您的官位；下面‘士’字共计三画，故知大人三日内要卸官。但大人为政清廉，声名甚好，此番虽遇麻烦，但不久将会复官。”后来一一应验。在这个测例中，何中立测“去”字用的是体势占断法。

测例之四，见于周亮工《字触》中。某人写一“西”字占问功名。字写得很有神采。测字先生说：“字迹轩昂而有神采，自然能够荣登高第。再说字有‘两’字势，当中两榜定

无疑，且字又有‘酉’字头，酉年自应中乡试。但酉从金（即五行中属金），旺在秋季，只能中秋榜。”此测例据“字迹轩昂而有神采”，便断出其人必荣登高第。

上面几个测例，都运用了字迹占断法，但明眼人一看，又可以发现，这种断法极少单独使用。按理说，在所有测字术中惟有这种断法理论性最强，也最具有使用价值，但为何这方面的例子却反而鲜见呢？

这实在是个值得玩味思索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主要是测字术士有意为之的结果。

我们知道，在光怪陆离、杂然纷陈的测字术中，字迹占断法相对来说具有一定合理的内核，因为字如其人的现象在各色人等中并不鲜见，因而据字迹来测断人的方法也大致不差，行之有效。笔迹学在西方颇为盛行，也正可证明这一点。从此意义上说，富人之字多稳重、贫人之字多枯淡、男人之字多开阔、女人之字多逼侧，以及笔画肥浓富贵无穷、笔画轻快诸事通泰、笔画发光荣显通达、笔画宽洪逞英雄等说法也确实是无可厚非的。

从具体测字程序上看，术士一般要“履行”这样几道“手续”，首先是“相”字，然后才是“拆”字，进而才是占断人事吉凶。由此程序，我们不难推知，字“拆”得对不对，辞断得准不准，主要取决于字“相”得是否对。由于“相”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再辅以察颜观色、见风使舵的字外功夫，故而“拆”对断准的可能性也还是有的。问题在于，测字先生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求测之字“相”得准（否则笔迹占断法的理论就不可能那么充实、全面，几乎可说是竭泽而渔了），可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把“相”字的功夫及所得的结果从

“拆”字断辞中“抹掉”，因为惟有如此，才能显出他们多么善于揣度字理，机测如神。这样一来，笔迹占断法便在术士故弄玄虚中几乎“销声匿迹”了。

为了把这点说透彻，我们不妨再来剖析一下《说海》中的一个测例。有一次，宋徽宗有意想试试谢石身手如何，是否真如传说的那样神不可测，就提起御笔写了个“朝”字，让一宦官去求测。原文接着写道：

石（谢石）见字，即端视中贵人（宦官）曰：“此非观察所书也。”中贵人愕然，曰：“但据字言之。”石以手加额曰：“‘朝’字离之，为‘十日十月’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当谁书也？”一座皆惊。

这个测例，从形式上看，谢石的确测得准，也断得妙，难怪中贵人要“愕然”，举座会“皆惊”。但细加推敲，就会发现这里有“手脚”。他之所以能测中，主要是依据两点：一是字迹，宋徽宗乃书法名家，字体独特，有“瘦金体”之称，对此谢石一见便知。二是求测者乃宦官，宦官出宫多是奉命行事，对此谢石也不会不知道，何况原文中明明白白写着“端视（仔细打量）中贵人”呢！正是有了这两点依据，他才心中有了底，再进而巧妙地用“朝”字附会出“十月十日”，据此断出写字的一定是位天子。

由此，我们就不难推知，测字先生之所以偶然会断中说准，其奥妙之处并不在表面上字拆得如何巧，辟断得怎样妙，而恰恰在于他们善于观颜察色、据笔迹而断的功夫，这，才是他们的“内功”啊！

再往深一层看，我们又可看出，笔迹占断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测字先生任意扩大、肆意推衍，遂使这一“跛脚”的“真理”变得更为荒诞不经、站不住“脚”了。字如其人本来未必不对，据字测人也还大致不差，但据字测人也罢，字如其人也罢，其所“测”所“如”只能是人的性格、身份或地位，与求测之事的吉凶并无多少关系。也正是在这点上，测字理论强拉硬扯、任意附会出许多荒唐的东西。例如，《拆字部汇考·探元赋》中说：

撇如罗带，际遇阴人；捺似拖钩，刑伤及己；勾
似锦靴，遭逢官贵；画成横枕，疾病临身。

这种推测只是利用某种形式上的联系，实际上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又比如，传统测字理论以为，字中有画当短而长者主人之慷慨，有画当长而短者主人之吝啬，字中多出一笔主发横财，这实际上也是由某种相似的联系引申开来、牵强附会的结果。

第四节 字音占断法

字音占断法也叫谐声占断法，它是利用汉字音同现象来占断人事吉凶。

这种同音现象对我国民间文化影响很大，人们常用它来制造文字幽默，又用它来制字谜、编酒令、巧设歇后语，逞巧斗技，玩得不亦乐乎。与此相映生“灰”，中国人对语音又

具有深刻的禁忌心理，一个字倘不吉利，人们总是尽量避免去说它，就连与它同音的字也噤若寒蝉，矢口不言。例如人们忌言“梨”“伞”，因它有“离散”之嫌；船家忌言“翻”、“沉”，因它有葬身鱼腹之虑；寿衣忌用“缎子”，也无非因它有“断子绝孙”之虞。

测字作为民间方术的一种，显然也是人们迷信心理的灰色产物。因此，只要有可能，测字先生是绝不会放弃汉字同音字多这把游刃有余的利器的，也定然不会漠视求测者前途未卜、心焦如火这一可乘之机的。

果然，在《元黄克应歌》中，测字先生留下了这样的“经验”：

逢梅可说娣媒动，
见李公私理不亏。
见肉定须忧骨肉，
见梨怕主有分离。

.....

明眼人一看，立刻就可发现，这些所谓的“经验”，无非是利用汉字谐音之便而占测吉凶的。具体说，“梅”与“媒”相谐音，所以“逢梅可说娣媒动”；“李”与“理”音相谐，因此“见李公私理不亏”

而且此风一开，便愈发而不可收，诸如“倒”与“到”、“秤”与“称”、“义”与“差”、“桃”与“逃”、“加”与“家”、“非”与“飞”等等，无不可在术士“非非之想”、胡编乱造中发生某种奇妙的联系。这样一来，测字的随意性更

大，占断的成功率更高。测字先生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古代测字理论中，自来就不废谐音之法，像“逢衣须说问良医”、“见梨怕主有分离”等，就是这种测法的概括。清初程省在《测字秘牒》中，曾借用传统造字“六书”之说，归纳出“心易六法”，即象形测法、会意测法、假借测法、谐声测法、转注测法，其中谐声测法就是利用汉字同音现象来占断吉凶的方法。程省还举例说，如以“莺”占问天气如何，是雨天还是晴天，那就可断为天雨难晴，这是由于“莺”、“阴”谐音，“主天必阴，难问晴矣。”

从史料记载上看，这种测法早在《晋书·易雄传》中就有运用，该传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易雄为舂陵（湖北枣阳）令时，曾举兵抵抗王敦，终因势单力薄，城池被陷，自己也被俘获。就在被俘的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乘车，车旁还挂了许多肉。梦后醒来，他自我占断道：有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车”旁有“斤”正是“斩”字，我大概要被斩吧！此后不久，易雄果然遭斩。在这个测例中，筋者斤也就用的是谐音占断法。

宋代是测字术的成熟期，因而谐音测法的运用更为普遍，名噪一时的谢石、汪龙等测字高手莫不娴熟此道。据载宋建炎年间，谢石当了利路尉，与武将王进混得很熟。有一次，王进邀他小聚一番，谁知几杯浊酒下肚，王进兴起，便让谢石以其名“进”字来占断吉凶。谢石稍一思忖，占断说：“家欲走，若图事必败。”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进”繁体字写作“進”，从“辵”从“佳”，“辵”乃“走”的意思，而“佳”与“佳”形近，“佳”与“家”谐音，故有此测。它的意思是说你上佳之策是离家出走，倘要结党图谋作乱，就一

定会惨败。后来，王进不听谢石指点的迷津，仍图谋不轨，终于被捉拿收审，成了“瓮中之鳖”。此测例之所以玄，之所以准，仰仗的也正是“佳”、“家”同音的“一臂之力”。

周亮工《字触》上收有一个测例，也煞是有趣。一次，瞎子汪龙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是追捕强盗的差人。差人用《易经》中“文王”二字求测强盗所逃的方向。汪龙私下念道：“文王，西伯也。西伯与“西北”相谐音，强盗必在西北方向无疑。但转念一想，弟子让他这次别说实话，就随口向两位差人数衍说：“你们去东南方向追捕强盗吧！”结果，差人“南辕北辙”，一无所获。

汪龙使用谐音法更为“猖狂放肆”的是如下一例：

有一权贵九子，知龙名，以门生袁姓者——补南工部员外，寄一白围棋子，托问后嗣。袁至，微服付棋子占之。龙曰：“公姓袁否？”曰：“然。我何如人？”龙以手周围摸之，曰：“员外。”曰：“我所占何事？”曰：“此白物也，应自北来，必自北京当局之贵人。其第一著所卜者，惟其子乎？”曰：“有无何如？”曰：“此物非木非石，经水火锻炼而成，全无生气，安得有子？以理而推，亦当谢局，须急下官著可也。”已而权贵卒于任，竟无子。术之奇确如此。

在这个测例中，汪龙频频使用了谐音法。首先，他断定求测者姓袁，而且是个员外，这是因为白围棋子是圆的，圆既与“袁”相谐，也和“员”相谐。其次，他又断出权贵来自北方，

这也是由于围棋子是白的，白与“北”音谐。复次，汪龙又断权贵所卜是其子，道理如上，因为“棋子”恰可谐音“其子”。一个测例竟使用了四次谐音，而且一一断对，屡试不爽，这未免巧过头了。我们真不能不怀疑这究竟是汪龙眼瞎而对谐音（其实是“邪音”、邪说）特别敏感呢？还是后人故神其说，精心附会的呢？不管怎么说，谐音之法用得如此之多在古代测例中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宋代以后，测字更为普及，在民间尤有市场，凡疾病、婚姻、官司、六甲（生育）等事，均要占卜测事。在类似的测例中，谐音测法亦屡见不乏。请看《字触》中所收的这样一个例子：

有以“陀”字问讼吉凶，曰：“此察院状词也。以形而观，虎头蛇尾也；以意而论，其庇在他；又音与‘拖’同，不成完，恐不能完结，扯长而已。”

此测例断得有板有眼，先从字形上着眼，“陀”所从之“它”，上像“虎”字头，下像“蛇”字尾，虎头蛇尾，当然对求测者不利。接着又从意义上立论，由“陀”者他 also 的义训，得出官府会庇护他方的结论。为了使形、音、义密合无间，使占断无懈可击，测字先生又灵机一动，由“陀”、“拖”音相谐，得出此官司可能会拖延的结论。而且这一结论又立刻在字形上产生“效应”，因“陀”所从之“它”正像是“完”而未“完”啊！这样一来，占断的结果就愈发显得天衣无缝，不由你不信。这里，谐音测法正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清初江阴人程省，据说曾从“异人”那里学到了测字秘

法，此后漂泊江湖，以测字为生。他不仅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而且有丰富的测字经验，此中就有谐音一法。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测例。一次，一个求测者拿一枚铜钱放在桌子上，并倒指着钱上的“顺”字，让程省给测一下婚姻是否圆满。程省看了看钱，又瞅了瞅“顺”，当机立“断”道：“你的婚姻一定能成，而且已经成了。”求测者忙问字理何在，程省解释说：“钱乃团圆之物，外圆内方，有天地交泰的意蕴。况且你刚才是倒指‘顺’字的，这表明你手到（谐音“倒”）即顺，婚姻又岂能不顺畅无碍、和谐美满呢？”在这个测例中，程省见机行事，由倒指“顺”字，联想到手到即顺，用的也还是他自己在《测字秘牒》“心易六法”中所说的谐音测法。

统观以上几个测例，我们不难见出，字音占断法能脱离求测字的本身，用另外的同音字来进行占断，因此它牵强附会的机会更多，左右回旋的余地更大，说准断中的成功率也就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字音占断法在法式纷纭、品目繁多的测字术中，仍不失为“一枝独秀”。像上面所举的汪龙以“西伯”谐“西北”、程省以“手倒”谐“手到”的测例，都是直接用谐音法来占断的。

径以谐音法占断吉凶的测例还有许多，我们不妨援引几例，以供观览。

据《因话录》上记载，唐柳宗元从永州司马调任柳州刺史之前，曾夜梦柳树仆地，以为不祥之兆，遂请术士求占。术士占道：“夫生则为柳树，死则为柳木。木者，牧也，君当为柳州牧。”这里“木者，牧也”就用的是谐音法。

另据《青箱杂记》上记载，李文定长得一嘴好胡须，他在御试前一天晚上，竟梦见自己胡须被人剃光了，心里好生

懊恼，遂延请术士求占。术士占道：“老兄别难过，此乃吉祥之兆。你想想剃须也就是剃髭，现在状元名叫刘滋，剃髭正可谐音‘替滋’，这分明是说你要替代刘滋而考中状元啊！”后来果然如此。

同书另有一个测例，也用的是谐音法，而且恰巧也出在“剃”字上。据说马亮为江宁知府，任职期满，曾做一梦，梦见自己舌头上竟长出许多毛，有个僧人知道后，曾这样占道：“舌上生毛剃不得，‘剃不得’谐音‘替不得’，先生当会再任。”

《葆光录》中也有一个测例，煞是有趣。有一叫张司直的人得了疾病，病中曾做一梦，梦见自己怀起孕来了。他醒后怅然若失，心里十分不快。术士得知此梦后，就告诉他说：“你别不快，此梦非凶兆。因为‘怀孕’就是‘妊娠’，‘妊娠’可谐‘壬辰’，这分明是告诉你，你的疾病当在壬辰之日就会痊愈的。”张司直听后，将信将疑，到了壬辰之日，病果然就痊愈了。

从另一角度来说，字音占断法虽是“一枝独秀”，自成一法，但常常还得乞灵于它的“左邻右舍”，和字形占断法、字义占断法相辅为用，才能见功奏效，说准断中。在这一点上，字音占断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定位导向的作用。如车旁挂肉本与“斩”字了无关涉，但有肉必有筋，筋者斤也，经过如此一谐音，车旁挂肉便和“斩”字之形、之义挂上了勾。这，便是谐音法导向定位的妙用。“陀”字之断，本来字形已呈虎头蛇尾之兆象，字义也有庇护他方之意涵，但为了占得透、断得准，测字先生又启用谐音之法，他先以“陀”、“拖”音同为导向，把这场官司定位在拖延、扯长、没完没了上；又进而借此谐音之便，把“陀”所从之“它”巧妙地导向于

“完”字之中，从而得出“它”字似“完”字而不成，因而官司难了结的结论。这更是谐音测法定位导向功能的妙用。

对测字先生的这些测法，我们固然可以叹其机敏，赞其高妙，但切切不可信以为真，因为测字方术说到底不过是骗人的玩意。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使瞎子汪龙不是恰巧碰上古书中有“文王者，西伯也”这句话，假使古书上写的是“文王者，南伯也”这句话，那么他对那两个追赶强盗的差人真不知又该瞎说些什么了。

第五节 字义占断法

所谓字义占断法，倘要为它下个“紧身”的定义，那末，它指的就是根据字本身的意义或字所代表物的属性、性质来占断人事吉凶的测字方法。

由这个“紧身”的定义，字义占断法实际上又包含着两种情况，一是径自用字义来占断吉凶；另一种是以字所代表的物的属性、性质来占断凶吉。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

大家知道，汉字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之中，尤以意义为关键。测字既然玩的是文字“魔术”，对字义当然就不能不格外“垂青”。从一般意义上说，不论是字形占法也好，还是字音断法也罢，最终都不能不“曲终奏雅”，落实到意义的解释上。但也有的时候，测字术士嫌字形占法过于迂曲，字音占法又相当随意，运用起来并不那么顺手，于是便寻求“捷径”，径以字义来占吉凶。对这些术士来说，“见肉定须忧

骨肉”、“见果断之能结果”自然是再简单明了不过的了。

下面就请看这样一个直接了当的测例。

曾有一人，身染重病，历时半载尚未好转，家里人心急如焚，遂写一“命”字请求占测。他到测字先生家，先作揖行礼，后拿出“命”字求测。术士见此情状，立刻断道：“你家病人只怕大命难保。”家人惊问何故，术士解说道：“你刚才持‘命’作揖，正是垂死之兆啊！”他的意思是说，求测者测的是“命”，“垂”的是手，“垂”“命”相合，就是生命垂危的意思，所以断为“垂死之兆”。

在这个测例中，既没有分拆字形，也没有利用谐音，而是径自从字义上占断吉凶的。这，便是字义断法。

南宋初年有个朱安国，他极善测字。有一叫赵彦通的书生，曾以《周易》应明经之试，结果名落孙山。他心灰意冷，便萌生改习赋以应考的念头。刚好此时朱安国来此，赵彦通就写了“易”（易）字去求测。朱安国见字后，占道：“莫非你已有改弦易张的意思了？‘易’这个字从且从勿，当且勿易，不能更改，最后定能如愿以偿。”

这个测例较之于上一测例，稍显复杂一些。它先由“易”字的“改易，更易”之义断出对方有“改弦易张”的念头，接着把“易”（易）拆为从“且”从“勿”，再以字义加以解说，从而得出对方“当且勿易”（应当姑且如旧，不可改弦易张）的结论。

由上述两个测例来看，以字义占断吉凶虽然直接了当，但远不如分拆字形、利用谐音来得灵活，其测面不广，随意性也不强，这对玩文字“魔术”的术士来说，又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正是有鉴于此，测字高手们在字义测法上又采用了一些变通求活的方法。

方法之一，是扩大字义的意涵。《春渚纪闻》所记“也”字例，谢石在测断中就用了字义占断的方法。谢石断“也”道：“此字非贵人所写，而是出自内人之手。”官员心中称奇，口中却问道：“你这样说，字理何在？”谢石不慌不忙，有板有眼地解释说：“焉、哉、乎、也，都是语助词，由‘也’是语助词来推断，自然是出自你内助之手了。”此测例，“也”作为语助词，并不是它的意义所在，而是它的语法属性。这种属性不仅“也”字有，而且“焉”、“乎”、“哉”、“矣”也同样具有。谢石之所以用语助词来释“也”，正是想扩大它的意义蕴涵，是“绝处求生”的权宜和变通。事实上也恰是有了这一变通，“也”和“内助”才因“语助”的“居中斡旋”而发生了奇异的联系。

明代测字高手在字义变通上另有新招，请看《字触》中所收的这样一个测例：

明代后期，宦官当政，政治腐败，魏忠贤大权独揽，不可一世。他听说郑仰田测字很灵，“知名度”极高，就召他来测字。他写了一个“饥”字，让郑仰田给测一下。郑仰田稍一思索，从容断道：“观乎此字，写字的人一定是个不凡之人，但也是一个不良之人。”他的意思是说，“饥”所从之“几”像“凡”字而不成，故断为“不凡之人”；“饥”从意义上说，有饥饿、饥谨、饥贫等意思，故又断为“不良之人”。据说魏忠贤听了这一占断之后，颇感惊异，又十分恼火，便借故把郑仰田遣送走了。

在这个测例中，“饥”本来并没有“不良”的意思，郑仰

田为了牵合“己意”，便把“饥”活解活用，先由“饥饿”联想到“营养不良”，又由“营养不良”迁想附会到“品性不佳，为人不良”，其结果字的意涵扩大了，优柔含讽的目的也达到了。

字义变通求活的方法之二，是不在字内求变通、而在字外求活法，具体说，就是援引古书中现成的话，借用其语境来扩大所测字的意义涵量。徐珂《清稗类钞》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曾有一人，妻子有孕在身，他一心只想得贵子，便写了一个“風”（风）字去请测字神手范时行给占一下，看看是否能如愿。范时行看了看“風”字，稍稍沉思片刻，占断说：“你所写的‘風’字，如果将中间的‘虫’字挪到右边，就很像是个‘虺’字。《诗经》上有这样一句话：‘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据以为断，你妻子怀的定是个女孩。”

这个测例很有意思，“虺”本来是一种毒蛇，此蛇扁头大眼，色如泥土，大者长九尺。从字义本身占断，怎么也得不出生男或生女的结论来。但范时行不愧是测字高手，他见字内难求通变，遂引经据典，用《诗经》中的话来扩大“虺”字的意涵，得出所生之儿必是女的结论。

字外求活法，另有一招，就是不援经据典，而征用人情事理，以此来扩展所测之字的意涵。在《清稗类钞》中，正好有这样一例，而且也恰好出自范时行之“手”：有一个理发匠，曾穿戴整齐、衣冠楚楚地去找范时行测字，结果拈得一个“村”字。范时行占断说：“‘村’可拆为‘寸’‘木’，木以长材为贵，一寸之木又有啥用呢？”这位理发匠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一寸之木”是说他的剃刀的刀柄，于是惊慌失措，脸色大变。范时行见此情状，不慌不忙接上话头，说道：

“无论何事，倘能尽力去做它，那么即使是方寸之木，也可让它高过楼房大厦，你又何必自暴自弃呢？”听了这番话，理发匠便安心于本职工作，后来果然发家致富了。

在这个例子中，范时行不说字理，不解字义，却偏谈“物理”（木以长材为贵）、“事理”（无论何事，如能尽力去做，那么即使方寸之木，也可让它高过楼房大厦），这种见机行事，对字义的追加和附会，其实正是测字术士故弄玄虚的伎俩。《清稗类钞》上说范时行拆字“所言不烦，而悉有意义”，这个“意义”，显然已不是汉字本身的意义，而是一种追加的字外的意义。

由《清稗类钞》中的这句话，我们也可看出，字义占断法的最主要的作用是“所言不烦”，直接了当，这正是它有别于其他断法的作用所在。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字义占断法的第二种情况，即用字所代表物的属性、性质来占断吉凶的测字方法。

这种测法在古代十分流行，因而见之于测字奇珍秘笈中，这方面的经验还真不少。《古今图书集成·拆字部汇考》中，载有《元黄克应歌》，其中有云：

若见丹青神鬼像，
断他神鬼事相随。
若画翎毛花果类，
必然妆点事须知。
有时击磬敲椎响，
定有佳音早晚期。
寺观铃铎钟鼓类，

要知仙佛与禳祈。

倘是携来鱼雁物，

友朋音讯写相思。

.....

这分明告诉相字之人，要善于据物联想，由物之属性、性质去测断人事的吉凶休咎。如果见到“鬼神像”，当然要占“鬼神事”；倘若遇见“鱼雁物”，自然要断“相思”情。

再扩而广之，万事万物皆有属性，各具“个性”，据此以断，自能悠柔不迫、应对裕如了。所以，在测字秘术中，又有了这样一些经验之谈。例如：

天：凡事空虚，然利于行动。若问功名，宜于晴朗之日。

地：凡事有成，但嫌其迟缓，家宅田禾吉利。

人：凡事可成可败，只在认真努力。

水：流通无往，独不利于冬。

土：万物之母，事事有根基，但迟滞，不能速就。

金：世之宝，人之累，久炼则良。

这些“心得体会”，自来被术士奉为枕中之秘，他们之所以断起来头头是道，常常正是得力于此。

据《几神验存》上记载，一人去求测，刚好头上飞过一只鸟，此人便以“鸟”字求占家中之吉凶。术士想了想，断道：“恐怕尊夫人贵体欠安。”此人听后，深感惊讶，说道：

“贱内确实身染疾病，我出门在外，不知眼下是否康复，所以特来求占。”术士停了会，说：“贵夫人病况很重，应速速赶回才是。”此人一听，忙问妻子是否会大命难保。术士回答说：“恐怕性命难保，而且时间很快。”此人听后，怏怏而去。第二天，他果然听到了噩耗，妻子已经去世。此人恸哭之余，又去术士那儿，请问字理何在。术士告诉他：“鸟是禽属；‘禽’字拆开来，便成‘内人凶’三字，‘内人’即妻子，‘凶’乃凶之象，故断妻子必病重。再说，‘鸟’是‘鸣’去‘口’，以此推测，你妻子必难生还。何况你昨日指的是飞过之鸟，而飞过之鸟，其音必速，故我又知你夫人会很快死去。”在这一测例中，术士就借助于鸟的属性（鸟是禽属）、特点（飞过之鸟，其音必速）来占断吉凶的。

在徐珂《清稗类钞》上，也载有这样一个测例：

乾隆时，上海有沈衡章者，善拆字，问休咎者趾相接。一日，有罪犯越狱宵遁，捕役往问，拈得“鸚”字，沈曰：“鸚鵡，能言之禽也。舌慧而身不自藏，卒为人所繫。且鸟而婴，羽毛未丰，其能远逸乎？去此尚近，逮捕可得。”问何往，沈瞥见雀跨后檐，曰：“可往后面厠中觅之。”如其言，果获。邑令神其技，赠以“机测如神”之额。

此测例先不分拆字形，而是据鸚鵡“舌慧而身不自藏”的特点，推断出逃犯“身不自藏”、藏而不远的结论；又据麻雀飞走的方向，断出罪犯所藏之处。这在明眼人看来，全然是胡扯瞎说，但沈衡章居然还博得了“机测如神”的美誉，这确

实荒唐无稽，匪夷所思。我们平心而论，沈衡章这一测断并不高妙，在古代术士当中，还谈不上“机测如神”，充其量不过是“舌慧”而已。

比沈衡章高明的，还要数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位范时行。《清稗类钞》中正好有这样一个例子：一次，范时行那儿来了个当兵的，他拈得一个“棋”字，请范为他占测一下终生。范时行占断说：“大凡围棋子越下越多，象棋子却越下越少。现在你拈的是‘棋’而不是‘碁’，字从‘木’不从‘石’，可见是象棋子，而不是围棋子。既然是象棋子，当然就越下越少，以此为断，你家的人口只怕是越来越少了。”当兵的听后，连连点头称是，并问他日后情况如何。范时行又继续占道：“从你服装上看，你当是行伍中人，用刚才的棋子来比方，你就是棋子中的‘卒’。卒子在自己界内，只能行一步，但过了河界，就横直可行如‘车’了。不过，‘卒’虽然过了河界，可纵行横行，但也只能行一步。据此以断，你在外虽可得志，却难得大志。”此测例和上一测例相比，显然要圆融巧妙得多。在这里，范时行是根据棋子和卒子的走法来占断人事，运用的依然是字所代表物的属性和性质。

用象棋子中的字来占吉凶，在古代并不鲜见，我们不妨再举一例。据记载，明末朝政腐败，人民纷纷起义，京师形势岌岌可危。一次，临淮侯特意请来测字高手郑仰田，让他占断一下眼下的时局。临淮侯说：“北方张大司与入援京师，你看是否行得通？”说话时，临淮侯正和别人下象棋，于是便以棋子“马”字让郑仰田占。郑仰田略为沉思了一下，占断说：“棋子中的‘马’走的是日步，可今天却赶上下雨，以此为断，张大司马入援京师一定不行。”在这里，郑仰田不拆字

形，不用谐音，径自用棋子“马”的走法来占断吉凶。这种测法和上面两个测例几乎“如出一辙”。

在古代测字中，求测者有以物求占的惯例。在这种场合下，术士见的是物，所断也是物，因而物的属性、特点更显重要。假使术士对所测之物不很了解，或是很不了解，那么他几乎就无能为力，无从断起了；但假使他们能据物驰思，通晓物性、深研“物理”的话，那么，一旦占断起来就可能轻松得多，也如意得多。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测例。一次，有一个人提着一只“凫”（水鸭的一种）去术士那里求占，想问一下自己生意是否兴隆。测字先生看了下“凫”，便在大脑里浮想起来，等有了主张，这才从容断道：“凫鸟乘风，可以翱翔得意，但可惜的是它虽可得意飞翔，却没有终日飞腾之理。以此为断，你的生意可兴隆如意，却难以长久。”这里测字先生借凫鸟飞腾的特点来占断生意的好坏，它虽然测得很简单，但足见掌握“物理”对推断“事理”的重要。

清人周亮工《字触》中又收有一个这样的测例，宋代有一权贵没有子嗣，心里很焦急。他久闻汪龙测字极灵，很想请他给占测一下，于是叫一姓袁的门生，拿一粒白围棋子去求占。这位门生官为工部员外郎，他易服装扮成百姓模样，谁知刚进门，汪龙便劈面问道：“你是否姓袁？”袁回答称是，又让他说说自己是什么人。汪龙摸了摸圆圆乎乎的白围棋子，很肯定地说：“你一定是位员外。”袁某听后，心中暗暗称奇，又继续问道：“你知道我欲占何事吗？”汪龙又摸摸白围棋子，从容断道：“这是一粒白围棋子，白者，北也，以此为断，求测之人一定来自北方，而且是位贵人。此人所关心的恐怕是子

嗣吧？因为子者，子也，以棋子求占，必为子嗣。”袁员外更是惊奇不已，又继续发问：“那就请说说他有没有子嗣吧。”汪龙回答说：“恐怕贵人求子无望啊！因为此物非木也非石，经水火锻炼而成，全无一点生气，又怎么会有子嗣呢？”后来，这位权贵之人还真的没有子女。汪龙的这一测例确实很玄乎，其断法也相当巧妙。他首先根据围棋子是圆的，便断出来人姓“袁”，而且是个员外郎。接着又据棋子是白的，便利用“白”“北”谐音推断出这位权贵是来自北方。当员外问他权贵是否会有子嗣时，他又依据围棋子“非木也非石，经水火锻炼而成，全无一点生气”的特点，断出权贵定然要“绝后”。在这里，据物性为断的方法被汪龙拈弄得玄乎其玄，直使求测者如入云中雾里，还不得不信。

和汪龙相比，明代的测字高手郑仰田似乎也毫不逊色。下面就是他的一个测例。据周亮工《字触》上记载，明代有一叫倪鸿宾的官员，他在任职国子监祭酒时，与另一官员关系很紧张，因而工作不顺手，心绪也不畅，于是便萌发了退隐的念头。一次，倪鸿宾去赴宴，正巧遇上郑仰田，当时彼此并没有互通姓名。倪鸿宾拿着骰子中的“红四点”让郑仰田为他预卜一下未来境况如何。郑仰田看了看求测之物，占道：“京官四品中，能职掌大印的，惟有大司成，我想阁下只该是祭酒倪公吧！”倪鸿宾听后，心中暗暗称奇，连连点头称是。郑仰田又占道：“大人一定和某人合不来，那人姓名中可能就带有骨字，因为骰子是由骨头做成的，而且四面都棱角分明，不能圆转自如，故我推知那人一定和大人合不来。”郑仰田说到这里，看看对方满脸惊讶的神情，又从容不迫地断道：“阁下现在一定很想退隐，因骰子体方如‘口’，加上那四点，就

成了‘回’字，回者，归也，退也，所以我又推断大人眼下正有告隐还乡之念。”在郑仰田这个测例中，借所测之物的属性、特点来占吉凶的方法，也运用得相当玄乎，十分巧妙。比如，郑仰田根据骰子是由骨头做成的这一特点，便推断出与倪鸿宾关系不和之人的姓名中可能带有骨字；根据骰子有四面、面面有棱角这一点，又推断出那人个性强、不圆滑，所以和倪鸿宾合不来。

纵观以上所有测例，对照其中几种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字义占断法所重在字义，所求在物性，所归在人事，所断在吉凶。它“所言不烦”、直奔“主题”，对字形、字貌、字迹、字音并不注重，而是环拱于字义或字所代表的物性这个核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字义占断法迥然大别于其他占断法，它可以“独家经营”、“另立门户”，有时即使是“联营”。也仍然不失其“个性”。

这种测法尽管自成一统，活法很多，但总离不开牵强附会，它与字义引申规律或据形求义的训诂方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基本原理是扞格抵触的。所以即便是擅长此道的术士高手，如谢石、汪龙、郑仰田、范时行等，也无非是善于附会、巧于伪饰，把断辞说得玄、扯得溜、编得圆一些而已。我们不难设想，假使倪鸿宾求测之物不是骰子，郑仰田真不知何由见出姓名之中有骨字，两人关系合不来；假使袁员外求测之物不是圆圆的白围棋子，汪龙又何由能断出此人姓袁，又恰好是员外，在这些巧合的背后，分明隐现着编造的痕迹。我们须知，测字术士的推断，大多是事后附会的结果。谢石测“也”字更有意思，他由“也”是“语助词”，便断出写字者是“内助”。“语助”、“内助”究竟

有何必然联系呢？退一步说，“也”即使是出于“内助”之手，也决不是因为它是“语助词”，而更可能是由于它真的出自“内助之手”——女人写字自有女性的特点，对此谢石是不会不知道的。高手测字尚且如此“弄虚作假”，“矮手”断字又岂能不“贩卖假货”呢？

问题仅仅在于，古人迷信甚深，故常弄假成真，正所谓：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第六节 断字的辅助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测字就好比演戏，小小测字摊，是它的舞台；术士、求测者，是剧中的主要演员；术士的断辞，是戏中的台词。此外，测字还有道具，那就是书写工具；又有特定的背景，那就是测字时的所见、所闻。

我们这里要谈的道具、背景，就是断字的一些辅助方法。

先谈道具。

测字时离不开“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些道具虽说无助于拆字本身，但对测字常会提供某种意义“指向”。一般说来，求测者欲求测，常常要“当场表演”，写上一字；写字时，其笔、墨、纸、砚的使用情况如何，对测字先生来说不能等闲视之，漫不加察，因为这里面有“学问”，有讲究，它常常是预示吉凶、袒呈休咎的一种征兆。

正因如此，传统测字术中便由此而附会出了一整套吉凶的理论。尽管在今人看来，这些理论实在谈不上有“理”可“论”，但对术士来说，却自来奉为枕中之秘。《古今图书集成·拆字部汇考》中有所谓《元黄克应歌》，歌中有云：

出笔拔毫通远信，
笔头落地事皆迟。
墨断须防田土散，
财空写砚忽干池。

.....

在另一首《元黄歌》中，也有这样的诗句：

大抵画乃由心出，
以诚剖决要分明。
出笔发毫逢定位，
笔头若出于无成。
墨断定知田土散，
纸破须防不正人。

.....

把这两首歌结合起来看，我们就分明可见笔墨纸砚上都有很细致的讲究。具体说来，求测者开始写字时，如果笔头抽出落地，则主谋事迟滞，所谓“出笔拔毫通远信，笔头落地事皆迟”；写字时，墨水也不能断，否则“墨断定知田土散”，表明求测之人田土要散失；墨水又切忌没有，否则主人要破财，

所谓“财空写砚忽干池”；墨忌断，纸也不能破，“纸破须防不正人”，或有“口舌”之祸。

在写字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墨水了，添水时又有讲究，求测者切不可使用残破的器皿，否则主财物散失；如果不小心打翻了砚池，那更是一种不祥之兆。

有了这些讲究，测字先生就可“按图索骥”、对号入座，用这些辅助的占断方法来帮助占断。请看周亮工《字触》中的一个具体的测例：

一日，有罪犯同解子至门求卜。曾闻御史磨墨之说，亦取砚磨之。手重气粗，翻砚墨泼。（汪）龙曰：“不消磨矣，此乌台重犯也。”问能生否，曰：“虽不遽死，一身重罪，铁案难翻。”罪犯哭曰：“某时运若此，何用生为？”龙曰：“据此当迟七年，逢戌，遇吕姓官人号冤，可改军罪，丑年可回。盖‘哭’字双口为‘吕’，下有‘犬’字为‘戌’。‘运’字为‘军’，‘用’字为‘川’，‘罪’字为‘四川’，‘生’者有‘丑’字形也。”

在此测例之中，汪龙未断“哭”字之先，仅据打翻砚池这一点，就断出这个罪犯是“乌台重犯”。可见，“道具”之于断字正具有某种意义导向的作用，对后面的占断不失“一臂之力”。

这种“一臂之力”伸展到测字过程中，又有了更为多样、更为奇异的一些讲究。大致说来，约有如下四端：

一是目测。由上面所援引的两首“歌”中，我们可以知

道，测字之先要测人，看他是何打扮，有无同道之人，具有何样特征，有何异样表现，这对具体占断来说有化“弦外之音”为弦内之响的妙用。于是测字先生“唱”道：

更看来人何服色，
五行深处说根基。
有人抱得婴儿至，
好把阴阳两字推。
男人抱子占儿女，
妇人抱子问熊罴。
一女一子成好事，
群阴相挽是仍非。
若见女子携女子，
阴私连累主官非。
忽然写字宽衣带，
诸事从今可解围。
跛子瞽人持杖至，
所谋蹇滞不能为。
竹杖麻鞋防孝服，
权衡柄印主操持。

由此可见，测字先生对目测是相当重视的，会断与否，常取决于会看与否。这看字之中，就决定了断的“方向”。比如说，看到群“阴”荟萃来求测，便断“阴私相累主官非”；若见写字解衣带，便断诸事可解围；倘见写的是红字，便断血光之灾将要来。

目测不仅要测人，而且也要会看物。假使看到求测者携来的是鱼雁，那就断定他要求占的一定是“在水一方”的相思情；如果求测者写字时，恰好爬来了蝎子（蜘蛛的一种，长脚细身暗褐色），那就断定必有吉庆之喜。蝎子若在字右边，那就断定生女孩；蝎子若在字左边，则可断言生男孩。所以，《元黄克应歌》中说：

笔下忽然来蝎子，
分明吉庆喜无疑。
若在右边须弄瓦，
左边必定产男儿。

也有时，求测者携物前来，倘有异样表现，术士更要详观默察，把握时机。时机把握的怎样，正是术士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古今图书集成·拆字部汇考》中有这样一个测例：

昔有一妇，其夫久客不归，因诣李淳夫先生处求断易数，适值他出，问其子。其子见妇手中携一扇，其扇面忽然落地，因断曰：“骨肉分离，不得相见矣。”妇泣而回，恰路遇李淳夫先生。妇诉其故，李断曰：“穿衣见父，脱衣见夫，不妨，尔夫今日必到。”将晚，果然至家。可见各解不同，其断精微若此。

在这个测例中，求测之物是扇子，异样表现是“扇面忽然落地”。李淳夫父子据此为断，其解各不相同，水平也高下有别，可见目测之于占断，作用也委实不小。

具体到拆字过程中，目测来者如何写字，也常常是测字先生十分强调的，这种字外功夫的详审默察，常会给字如何拆、话怎样说提供一个契机。请看《拆字部汇考》这样两首《七言作用歌》：

战兢惕厉若临渊，
静里修持反有年。
写毕果然无俗气，
终须榜上有名填。

一字忙忙写未全，
有头无尾不须言。
作事率然多失措，
琢磨早失在当年。

由这两首“歌”来看，倘见写字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就表明他静里修持已有多年的；再见字迹没有俗气，便可断言他一定会榜上有名，一“名”惊人的。如果来者写字匆忙，冒冒失失，那么即使不分拆字形，附会音义，也径自可断此人办事必唐突、多率然，“有头无尾不须言”。

我们常感到测字先生断事如神，神不可测，其实他们神就神在字外功夫，善于观风使舵，见机行事，目测的功夫正是字外功夫的一端。

二是耳测。在传统测字术理论中，耳测的重要性并不下于目测的功夫。因此，测字先生要想干好这一行当，吃稳这碗饭，就不能不重视耳测的功夫，它可以说是术士断事如神、

神不可测的一项“祖传秘方”。《元黄克应歌》发端便这样“唱”道：

凡是挥毫落楮时，
便将吉凶此中推。
忽听傍语如何说，
便把斯言究隐微。
倘是欢言多吉庆，
若闻愁语见伤悲。
听得鹊声云有喜，
偶逢鸦叫祸无移。

这就清楚昭告人们，测字一道，虽主拆字形，但对“傍语”耳闻切切不可置若罔闻，听而不见。因为所断吉凶之“隐微”正潜藏于斯，蕴藏于斯。因此，测字先生就要耳听八方，深究“斯言”。倘是人言，便依“欢言”、“愁语”断吉凶；倘闻“物语”，便依“鹊声”、“鸦叫”定休咎。

据说耳测很灵验，因而讲究也真多。再比如：

求测时，若听见马的鸣叫，那就表明行人将至，所谓“马嘶必定行人至”。

求测时，如听见鸡的叫声，那就表明必然此人有喜，所谓“忽见鸡鸣知可喜”。

求测时，如听见猫在哀鸣，那就预示此人必被他人欺，所谓“猫呼哀绝有人欺”。

求测时，如听到狗在叫唤，那就预示此人必遇凶丧之事，所谓“犬吠一声防哭泣”，“犬吠如号忧哭泣”。

如果来者问疾病，切忌听到哭泣声；如果来者占财气，不宜听到破碎声。正如《新订指明心法上·有所闻》上所说：“如问病忌闻哭泣声，占财不宜破碎声。”

再联系所测之字来看，这种耳测功夫常会有助于术士该如何拆字，又如何下断辞。比如说，来求测的人写了一个“立”字，想占测病情，假使这时听见雨声或水声，那你便可占道：“‘立’加‘水’，便成‘泣’，必有哭丧之事将降临。”又比如，求测者写的是一个“言”字，想占测官司如何，这时如有狗在叫，那就不妨这样来占断：“‘言’加‘犬’，便是‘狱’，所测官司必不利。”

古代测字先生正是依据这一条条、一款款的规定来占断凶吉、预测人事的。仍以狗叫为例，据《清稗类钞》记载，有一巨商吴某，长期在江浙一带做生意。一天，他得到家书，说妻子危在旦夕，让他速速返回。吴某十分忧虑，就特意去请测字高手陈钟年占一下吉凶如何。谁知去的不是时候，陈钟年已“停止营业”。吴某使劲叩其大门，陈这才启窗询问来意。当时正好有一狗在旁边狂吠不已。陈钟年断道：“你的妻子已经死了。”吴某厉声叫道：“我字还没拈，凭什么乱说呢？”陈答道：“我俩刚才面对面、口对口在交谈，这便是两‘口’，又有一犬在旁狂吠，岂不是个‘哭’字？”此测例，陈钟年据狗在旁狂吠，就断出吴某妻子必死无疑，所仰仗的也正是“犬吠一声防哭泣”、“犬吠如号忧哭泣”的字外功夫。如此看来，耳测之于占断，岂不作用大矣？！

三是据时而断。测字是一种方术，也是一种迷信，因而断字之前，术士常要考虑到时间这个因素，何时来求测，何日来求测，求测时天气如何，都会对占断的结果产生影响。古

人相信“天人感应”，据时为断正是这种“感应”观的一种体现。我们由“感应”，自然又想起了那首“克应歌”，歌中有云：

晴日书日雨宜水，
夏火秋金总是时。
更审事情分向背，
元黄克应细详推。

这实际上是告诉求测者，写字时不可逆天时而行事，否则必会遭祸凶；这同时也是告诫测字“后生”，如遇求测之字乖违天时，那就只管往凶处断。

测字先生留给“后生”的这方面经验秘诀还有很多，如见于《新订指明心法》中的这样几首《比例歌》：

斗日来占事不差，
无心书鬼状元家。
功名第二推为政，
死字登科作探花。

辰时执笔若书才，
大振声名事必来。
正午书言真是许，
水傍写半见羹开。

逢三书八士能成，

照例推之理便通。

申车不乱推联接，

数逢三一始为真。

在《新订指明心法》中，又有“以时而言”一则，其文为：

如草木字，春夏则生旺有财，秋冬则衰替多灾，
风云气候之类亦然。

把测字先生的这些话综合起来看，所谓据时而断也实在是他们秘而不宣之“心法”之一。因而，只要术士能“如法炮制”，依此类推，占断时就能摇头晃脑，说得头头是道了。如果求测者无心书个“鬼”字，又恰好是斗日，那就可断他必是“状元家”，因为“鬼”字加“斗”字，岂不就是魁首的“魁”？如果辰时来占测，来者是“书才”，你不论其所占之字为何，仅据辰时，再据他“执笔”的动作，就可断言他一定能大振声名，因为“辰”加“手”，就是“振”。如果求测之字是“草”、“木”，你便可依据所写的季节来下断辞，若逢春夏，就断他“生旺有财”；若遇秋冬，则断他“衰替多灾”。据时而断的作用就在于此。

四是依地而断。古人多迷信，多禁忌，测字时不仅要考虑“天时”，也要注意“地利”。倘在不该写的地方去写字，那就会很不吉利的。从《新订指明心法》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依地而断的许多具体的“条款”。例如：

在树边就断断不可写“古”字，否则凶兆将来临，因为

“木”加“古”，便是“枯”，荣去枯来，又何谈吉利呢？

在楼上也切切不可写“火”字，因为楼属木，火正好是木的大克星，故写来必遭不祥，定有大祸。

在楼上又不能写别的字，因楼乃屋上有屋，写来就有重叠之事。所谓“或在楼上写来问者，有主重叠之事”。

在船上不可写“火”字，因为船乃木制，火木岂能相容，故写来定有不祥。

在船上又不能写别的字，因为船体空虚，写来主有虚惊之事，所以测字先生说：“或在船上写来，主有虚惊。”

在炉火旁也切忌用朱砂写字，因朱砂的颜色和炉火一样，同类相感相应，必然很不吉利。所以术士们说：“朱书更向炉边写，荧惑为灾信有之”；“有时戏在炉中写，遇火焚烧忽不宁”。

这方面的禁忌还有很多，比如说，占测之字不可在叶上写，因为“叶上写来多怨望”；也不可在花间写，因为“花下写来为色欲”；又不能在竹间写，因为“竹间阻节事迟疑”。

这样一来，对求测者而言，就苦不堪言，防不胜防了，因为禁忌一多，“下笔如有绳”，又怎能不苦不堪言呢？然而，反过来说，对术士就大开方便之门了，因为倘有犯“禁”者求测，术士便可据地为断，对号入座，又怎能不“断字如有神”呢？

惟其有神，测字术中对所谓目断、耳断、据时而断、依地而断才那样津津乐道，条分缕析，极尽网罗之能事。《元黄歌》在总结了这些辅助断法的作用之后，曾这样乐观地“唱”道：

此际真搜元妙理，
其中然后有分明。
应验只须勤记取，
灾祥议论觉风生。

从这一口吻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测字先生之所以重视这些辅助断法，就在于它能搜尽妙理，应验不爽，融入断辞，顿觉风生。这就无怪乎测字先生告诫“后生”对那些目见、耳闻，对那些“道具”切莫淡然视之，而要“勤记取”了。

但具有理性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一套所谓的理论的。因为这些辅助断法正如测字所用的基本断法一样，说到底不过是哄骗人的伎俩，是古人迷信的产物。试想狗叫之于哭泣，墨断之于土田散失、衣带解之于事解围等等究竟有何必然联系呢？倘要质之于那些“勤记取”的术士，恐怕也只能是哑口无言以对，或“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事实上，就在这理论之中，也不无扞格矛盾之处。比如说，猫叫是凶兆还是吉兆呢？测字理论中说“猫呼哀绝有人欺”，这只该是个凶兆吧！但测字理论中又说“或写字时猫叫，此人有添丁之喜”，这又分明是个吉兆。你看，一声猫叫，竟叫出两个极端的结果，岂不怪哉？！


第五章 占断方法（下）


第七节 易卦占断法


《周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本奇书，它的哲学原理、思维形式等对中国文化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它在方术活动中也具有突出的位置，不仅它本身就是占卜的记录，是众占之首。同时它的占卜方法也直接影响甚至促成了其他占卜活动。测字术中也受其沾溉甚多。

关于《周易》之创作有所谓“易更三圣”的说法，一般认为伏羲作八卦，文王作六十四卦并繇辞（即卦爻辞），孔子作传。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若落实下来还很难说。

《周易》以阴阳两个符号去概括天下的一切事和理，由（阳）和--（阴）两个符号组成八卦，八卦被称为经卦。由八卦象征自然中八种事物。朱熹之《周易本义》中曾有《八卦取象歌》，可便于记忆：

乾三连 

坤六断 

震仰盂 

艮覆碗

离中虚

坎中满

兑上缺

巽下断

八卦分别象八物：乾象天，坤象地，震象雷，艮象山，离为火，坎为水，兑为泽，巽为风。

不过，这只是八个基本象征物。《周易》试图以八卦去概括天下所有的事和物，兹将其要者略述如下，这将有利于下面的讨论。

乾为天，为君，为父，为日，为玉，为金，为马，为木果等。可以表现一切强健阳刚的对象。

坤为地，为臣，为母，为月，为牛，为布，为腹，为釜，为女。可以表现柔弱、顺从等一切的对象。

震为雷，为动，为龙，为长男，为人足，为运动，为出征等。它表示富于动感的对象。

艮为山，为止，为狗，为少男，为手，为山径，为石头，为笃实等。它具有稳定的意义。

离为火，为丽，为雉，为中女，为电，为文彩，为光明。它一般表现光辉灿烂的对象。

坎为水，为险，为猪，为中男，为耳朵，为车轮，为疾病，为荆棘，为盗贼，为懒惰等。它多表现危险、邪恶等意义。

兑为泽，为说（悦），为羊，为口，为少女，为巫，为妻

妾，为言语。它多表示喜悦、温存的意义。

巽为风，为入，为木，为股，为鸡，为长女等。它多表示男女情感、随风化雨式的教育等意义。

八卦具有的上述象征意义，在转化为测字形式之后，它的这些意义自然也带入测字过程中，这样就为测字占断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

由八卦两两相迭，则组合为六十四卦，又称别卦。六十卦的各卦均有上下两卦组成。每经卦三爻，两经卦所组成的别卦共有六爻。自下而上分别为初、二、三、四、五、上。《周易》就是根据爻与爻之间的复杂关系来判断凶吉，它们之间产生了中、当、乘、顺、应等关系，这些关系反映了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这样就变八卦之静止的象为运动的象，从而因而重之，推而广之，引而申之，以穷尽万事万物之理。

在简要地介绍《周易》一些基本知识后，我们再来看它和测字之间的关系。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分以下几点来看：

一、汉字笔画数和《周易》

利用汉字笔画数来建立汉字和易卦的联系，在测字术中运用甚为广泛。它的最早提出者是北宋哲学家邵雍，他在《易数一摄金》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易字之间的联系在邵雍的组合下显得很简单。他让求占者首先写两个汉字，而不是一般只写一个汉字。然后术士分别数这两字的笔画数，第一字的笔画数代表内卦（即下面的卦），第二字的笔画数代表外卦（即上面的卦），二者一合即为一别卦。

邵雍将笔画和八卦一一对应起来：

一画为乾，二画为兑，三画为离，四画为震，五画为巽，六画为坎，七画为艮，八画为坤。

笔画如果是八画以内自然按照上面去对号入座，八画之外的即先以八除其余数再转化为易卦，如十七画，除八的余数为一，则是乾。这样就非常简单地组合成一个新别卦。

如“山峰”二字，山为三画，三画为离，于是得内卦，峰为十画，除去八余二，为兑，于是得到外卦。这样新的一卦就是内离外兑，乃革卦（䷰）。

在《周易》占筮中，若要占出凶吉，一般还必须涉及到变爻。对此，邵雍也作了设计。《周易》占筮通过九九十八变的复杂推法，最后得出的数字有九六七八四种，九六二数变，七八不变，九为老阳之数，六为老阴之数。六爻中有变爻和不变爻，于是根据卦变的情况再来确定依何卦、爻辞为此次卜筮的根据。邵雍将汉字也与变爻联系起来，他的方法也很简单，将求占者所写的两个汉字笔画数相加，再除以六，其余数则为爻辞，如上举“山峰”二字共十三画，除以六，余数为一，即初爻为变爻，这样我们就可以以革卦的初九的爻辞为判断命运的根据了。如果有的数，被六除，余数为零，则以六算，从而得出上爻为变数。

根据朱熹在《易学启蒙》上归纳的七条判凶吉的方法，其中有一条，若一爻为变爻，则以本卦的变爻的爻辞为主，那么汉字易占法最后落实在本卦的变爻，而不是之卦的变爻。由内外卦直接组成的卦称为本卦，根据变爻再组成的卦叫之卦。如上面举的“山峰”二字得出革卦（䷰），为本卦，因十三画，余数为一，初爻为变爻，其之卦则为咸卦（䷞），内艮外兑。那么判凶吉还是以革卦的初爻为主。

不过汉字的笔画好数，《周易》的一整套占筮原理却实在复杂，一般测字者遇此便望而却步。邵雍这位被许多测字先生奉为圣人的哲学家又为一般人设计了一套简便易行的办法，这一办法在测士中流行甚广。它主要将《周易》卦、爻辞进行了彻底的简化，使其上口易记。现据《易数一撮金》，举两个例子：

一 乾为天

九二二爻 上上 得意宜逢贵，前程去有缘，利名终有望，三五月团圆。

九四四爻 中中 欲行不止，徘徊不已，藏玉怀珠，片帆千里。

上九六爻 下下 心戚戚，口啾啾，一番思量一番忧，说了休时又不休

二 天泽履

初九初爻 上中 不远不近，似易似难。等闲入手，云中笑看。

六三三爻 下下 桃李谢春风，西去又复东。家中无意绪，船在浪涛中。

九五五爻 中中 狂风吹起黑云飞，月在天心遮不得，时闲无事暂相关，到底依然无刻薄。

上面所举一是乾卦，一为履卦，上上、中中之类是命运的高低，上上最好，下下最差。接下来的一首歌则是判断吉凶的爻辞。这一简易占法每卦仅有三爻，这是根据需要设计的，

再多则为多余。

二、汉字形体和易卦的联系

汉字笔画的数字可以转换成易卦，但在此之外还有一种更简便的方法，即利用汉字形体与易卦之间的关系直接转化成易卦，如占得“水”字，直接想到坎卦，占得“火”字直接想到离卦，于是再联系易卦的特点来说解汉字。

如从前有一个人妻子临产，他便请测字先生为之算算妻子所生为男还是为女，何时得生。他向测士说明所占目的，测士让他随意写上一字，他便写了一个“欠”字。测士断道：“你夫人此次所生可是第二胎？”答曰是。他说：“你夫人明日一定会生产，而且将给你们带来一个男孩。”此人进问其由，测士道：“‘欠’加两点为‘次’，所以我知你夫人这是第二胎。‘欠’加‘土’为‘坎’，坎在八卦中为中男，所以我知道你将得一子。今天是初十，而‘坎’旁之‘土’可拆为十、一，所以我知道是明天。不过你夫人此番生产可能不太顺利。因坎卦有险阻之象，一阳为二阴所包，但是很快会转危为安的。”后来一一应验了。

这里就从汉字直接转化为易卦，因为易的卦名也是汉字，它和其他汉字在形体、偏旁上也有联系，所以这种联系在测字中是较常见的。

有时候测字先生还利用汉字和八卦符号的相似关系来占卜。如从前一个人生了几个女儿，就是没有儿子，心里非常着急，妻子又怀孕了，他不放心是不是又会给他带来个千金。于是他写了“元”字请测字先生算算，他选择这字是有意的，因为“元”有首、大等义，是男性的象征。测士看了此字，说：

“足下盼儿心切，但贵夫人此次所生仍非男孩。‘元’字若写扁，很像八卦中的巽卦（☴），巽为风，为顺，属阴卦，在卦象上又属长女，所以你夫人此次胎定生女无疑。”

有时候，测字先生利用八卦的卦象来组成新的汉字以判吉凶。周亮工《字触》卷二载：

钱姓代亲占讼，于易内指得坤卦。先生说：“此事从家起，祸自外来，幸有友消释，无大害矣。”友曰：“神哉！同胞兄弟因小事夜争，地方衙之，以裁兄妄报官，讼今半载矣，兹托一贵人求释。敬占请问内外之理何居。”先生曰：“六断之象，在‘门’字之内，在‘非’字之外，故从门内起事，而是非自外来也。又如朋解之象，所以有人教解。六断用于‘罪’字两傍，所以知己脱其罪矣。”数日后事息。

不论这位测字先生算得对不对，我们真不得不佩服其高超的想象力。求测者指坤卦为占，坤卦卦象为☷，即所谓六断之象。测字先生由这六断所联系的东西就多了：先是联系“门”，此字六小横在内，因此他判断祸从内起。再联系到“非”字，因六小横在外，而知是非从外而来。这之后，又联系“朋”字，也有六小横，从而得出朋友来劝解之结论。最后说到“罪”字，因六小横在下两旁，于是得出从官司中解脱之语。其推论可以说是严密无比，但殊不知这都是奠定在荒诞的逻辑基础上的。

三、汉字笔画形成和八卦的对应关系

和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一样，测字术从宋代开始大量引进易学原理，将汉字笔画和八卦一一对应起来，这样看到笔画形式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易卦。

有一首歌集中表现了它们之间的分属关系，叫做《八卦辨》：

口形为兑捺为乾，
三画无伤乾亦然。
三点同来方是坎，
撇如双见作离占。
土山居上名为艮，
居下为垠不必言。
蛇形孤撇皆从巽，
云首龙头震占先。
详明八卦知凶事，
学者参求理自全。

从这首歌中可以看出，“口”形为兑，如占得字有“口”，即可联系到兑卦。如有一人，别人为他介绍一个对象，古时男女未婚前是不得见面的。他有点不放心，就去找测士算算。测士请他随意拈取一字，他拈得一“舌”字。这人心中直敲鼓，想来这女子可能不是贤惠之辈，爱拨弄口舌。这时测士断道：“你将娶此女子不但品貌出众，而且柔顺非常。”此人进问其原因。测士道：“你占得此‘舌’字下有‘口’，‘口’

于卦则属兑，兑卦悦也，顺也，即她能使你欢心，并对你柔顺相待。”后果如测士所言。

而乾卦在易中属纯阳之体，故于笔画中的对应者应是坚定有力，测士们将一字收摄之捺归于乾。同时以“三”也归于乾，“三”归乾可能出于形象联想。因为乾卦之卦象即☰，与“三”正相类。故测士每逢“三”字及捺画均可直接联系到乾卦，乾卦所包括的一切特点均可带入字的占断中，这无疑丰富了测字的内容。

“三点同来方是坎”，三点水本来就有水的意思，而坎卦☵属水，故自然有此联想。故求测者若取一字有三点水，即可牵扯到坎卦，坎卦所包涵的意义如危险、曲折、中男、人耳、猪等内容可任测士挑选。

一字中如有两撇可当作离卦来看，所谓“撇如双见作离占”。如“化”、“作”等。这样就可联系离卦的内容来占断，如其象火，象日，象美貌，象附属等，均可任人挑选。

“土山居上名为艮”若一个字中有“土”或“山”字，就可当艮卦来看。这种联系是根据艮卦的特点产生的。因为艮卦象山，因而山字在一字的上部即可径自作艮卦看。“土”若在上也可以，因为土隆起则为山。比如说占字者占到“崖”、“岩”、“袁”、“圭”等，均可直接说到艮卦，将艮卦所象征的停止、稳定、人足、少男、狗等意义随意牵扯而来。

“居下为坤不必言”，是说若逢“山”、“土”旁的字不在一字的上端，即非艮卦，而属坤卦。坤卦是大地的象征，因此相对于艮山来说它毕竟是低的。如“埃”、“尘”、“壘”等字均可联系到坤。这样“至哉坤元”的柔顺、包容、忍耐、繁殖、育人以及一切表示母性特征的意义也可带入字的占断中。

“蛇形孤撇皆从巽”是说笔画中有曲折的均可归入巽，如竖弯勾、斜弓、走之等。双撇属离，单撇则属巽卦。巽卦的基本象征是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柔顺温存，善解人意，可表示多情少女，也可表示痴情男儿。这样占字的路也宽得多了。

“云首龙头震占凡”，这是说如占得一字中有“云”字或“龙”字，均可当作震卦来看。因为震象龙，而“云从龙，风从虎”，所以“云”也可以联系到震卦，如得震卦，就可从震卦中所包涵的雷、长子、马、运动等意义中随意选取而占。

以上是具体的笔画偏旁和八卦的对应关系，在测字时，求测者书写的轻重肥瘦斜正强弱等，也与八卦有关系，有一首《八卦断》写道：

乾宫笔法如鸡脚，
父母初年早见伤。
若不早年离侍下，
也须抱疾及为凶。

坤宫属母看荣华，
切忌勾陈杀带斜。
一点定分荣禄位，
一生富贵最堪夸。

艮位排来兄弟宫，
勾陈位笔性他凶。
纵然不克并州破，

也主参商吴楚中。

巽宫带口子难逢，
见子须知有克刑。
饶君五个与三个，
未免难为一个成。

震位东方一位间，
要他笔正莫凋残。
若逢枯断须沾疾，
腰脚交他不得安。

离是南方火位居，
看他一点定荣枯。
若还员净荣官禄，
燥火炎炎定不愚。

坎为财帛定卦位，
水星横笔占他方。
若见笔尖无大小，
根基至老主荣昌。

兑位西方太白间，
只宜正直莫凋残。
若然坑陷并尖缺，
妻子骄奢保守难。

这首《八卦断》将笔画和易卦联系起来，再以此来卜占凶吉。一般来说，一捺和“三”字为乾，但是如果求占者写一捺写得软弱无力，就如同鸡脚一般，那就有可能不顺利。因为乾道刚健，要求笔划劲健有力，如果柔弱变形则有妨乾之势。这样推演开去，即有可能妨害父母，如果他们以前尚好，那么以后也会有小吉之事的。即如歌中所云：“父母初年早见伤”，“也须抱疾及为凶”。

坤卦一般是有“土”字或“山”字旁的字，且不能在上。在与坤卦有关的字笔画必须写得柔和匀称，且应平整，因为这最符合坤卦的特性。如果写得带勾陈，即显出弯曲和勾，那么就可能招致不吉利。

艮卦一般是“山”、“土”在上。艮在八卦中主静止，所以笔画要写得沉稳有力。歌中云：“勾陈位笔性他凶”，即如果写得笔势不稳，或有倾斜，即违背了艮卦的基本特性，必主凶。

巽卦也以柔顺为特点，在笔画中，“蛇形”孤撇”为巽卦。如果在这些笔画中，下笔时笔画开口，那将有不祥之兆。尤其主子孙不孝，即使有三五个子女，到老后也无一能够靠得住。

震在八卦中，是除了乾卦之外的第二位具有阳刚特性的卦，在邵雍所作的后天八卦图中，震为东方，属春天，如春雷滚滚，是一切运动的象征。因此表现震的笔画也应坚强有力，如果笔画有“凋残”之象，或者有“枯断”之痕，都是大为不利的。

离卦主火，在后天方位图中属南方，主夏天，赤日炎炎，

阳光灿烂，万物均达到极盛。表现离的笔画（如双撇）。也应有离卦的基本特点。因为火势炎炎，阳气极盛，若笔画枯燥有火气，这样火上加火，阳气过盛，物极必反，会招致祸殃。若笔画写得圆净纾缓，以阴化阳，反能得吉，所谓“若还员净荣官禄”。

坎卦在后天八卦图中，属北方，为冬天，主水。是艰难险阻的象征，由汉字中的三点水可以直接转换为坎卦。坎为冬，冬为敛藏之时，占得坎对财帛有利。

汉字中的带口爪字可直接联系到兑卦。在后天八卦图中，兑为西，主秋天，秋天是万物凋零的时刻，因此笔画中要注意破此灾运，不能再使笔画凋残，要写得浑圆正直，这样便能逢凶化吉。“若然坑陷并尖缺，妻子骄奢保守难”。如果笔画写得坑坑洼洼，残缺不全，收笔尖细，都是不祥之兆。这样家庭会不和睦，妻室儿女不和，自己守成则难乎其难。

第八节 阴阳五行占断法

阴阳五行学说可以说对中国所有的方术活动都有影响，测字也不例外。

首先谈测字中阴阳学说的运用。

阴阳理论是中国哲学的基元之一。它发端于原始文化的氛围中，系统阐释和发挥要推《周易》，阴阳学说是《周易》学说的核心，即庄子所谓“《易》以道阴阳”。《周易》宣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元是万物构造之法则，《周易》于是就用“—”、“--”两个符号去涵摄天地万物。万物均可以

阴阳去概括，阴阳相摩相荡而有“易”（变化），而有万物之化生。先秦以后，阴阳学说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乡村野陌，妇孺老夫，均能或深或浅地理解阴阳之意义。

《红楼梦》中有一回描写贾府的才女、英豪阔大的史湘云和丫环翠缕的对话，很能体现中国人对阴阳的感性认知。史湘云对翠缕说，天地万物只是阴阳二气也。譬如天是阳，地是阴，火是阳，水是阴。翠缕问：“难道天地间什么都有阴阳？”她指了指眼前的树叶问：“这也有阴阳？”湘云道：“树叶正面是阳，反面是阴。”翠缕指了指湘云身上的玉麒麟，问它是否有阴阳，湘云道：“凡走兽飞禽，有牡有牝，也自然有阴阳。”翠缕问人是否也有，湘云说当然有，翠缕无师自通地说：“主人是阳，奴才是阴”。

从这番对话可以看出，中国人已视阴阳为万世万物产生发展之法则。那么被迷信者视为人的命运体现的测字，当然也离不开阴阳。阴阳学说也成了许多测士断字的基本依据。

中国古代测士认为：“夫押字者，人之心印也。古人以结绳为证，今人以押字为名。大凡穷通之理，皆与阴阳相应。”（《押字赋》）字虽然是人所创造的记录语言的符号，但却和天地阴阳之气紧密相联。

在测士的眼光中，阴阳实际上是非常好区分的。长画为阳、短画为阴；粗画为阳，细画为阴；重笔为阳，轻笔为阴。于一字之中，上面为阳，下面为阴；左边为阳，右边为阴。……

《古今图书集书·拆字部汇考一》、《拆字数》中“画有阴阳”条，兹引如下：

长中有短，为阳中阴；短中有长，为阴中阳；粗、

细轻重以此为例。阳中有阴则佳，阴中有阳反凶。

“壬”字头画是阳，中有阴。“任”字头是阴中有阳。

水笔不流，流则不佳。

以阴阳占凶吉的测字断法，依据的是传统阴阳理论的一般原理，以阳为主，以阴为次，阳为主则佳，阴为主则凶。阳动而阴从，阳正而阴邪，阳尊而阴卑。在一字之中，以阳包阴，即是以阳为主，此字自佳。如果以阴包阳，阴笔为甚，则阴气则浓，犹如牝鸡司晨，必是大凶之兆。如测夫妻，则有夫妻反目之事；若测整个家庭，则有邪气旺盛之相；若测前程，则有小人挡路之忧；若测科举，则存名落孙山之虞。总之阴气一浓，其果必凶。所以测字者往往首观阴阳，即了解字的大致取势，然后再从其他方面进行敷衍。

测士们在这方面总结了许多经验，当然是一些荒诞不稽的经验。若人来问寿，他的字写得很直，直为阳，寿定长。若写得歪斜抖动，则为阴，阴则短命。若写得肥硕重大，寿也定长，若写得短促轻微，那就难保长寿。

如一人来问前程，书一“人”字，笔势纵放有力者，为阳，此定有上佳前程。笔势萎缩者，为阴，前程暗淡无光。若果“人”写得正立，正为阳，也有凶运。如写得偏塌，则为阴，前途会一败涂地。

当然，测字中的阴阳又和占卜者的具体身份有关。按照传统的伦理观念，君子为阳，庶人为阴；男人为阳，女人为阴；主人为阳，仆人为阴。阳人占阳为吉，女人占阳则未必吉利。

《探元赋》云：

且夫天字者，乃乾健也，君子体之。地字者，乃坤顺也，庶人宜之。君子书天，得其理也。庶人书地，亦合其宜也。

这里强调的是阴阳合其位，不合位，则呈凶相。另外，在流传甚广的《元黄克应歌》中也谈到了人的阴阳问题：

有人抱得婴儿至，
好把阴阳两字推。
男人抱子占儿女，
妇人抱子问熊罴。
一女一子成好事，
群阴相挽是仍非。
若见女人携女子，
阴私连累主官非。

由人之阴阳，推到字之阴阳，再看人字之间阴阳相配情况，这样解说起来就有了相当大的自由度。

再谈五行和测字的关系问题。

五行问题的提出也很早，初见于《尚书·洪范》：“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以金木水火土为万物存在的基本元素。

至春秋战国时代，五行就从一般物质存在的基本元素超

出，具有更广泛的内容。不但将五行和天地自然联系起来，同时还用五行来解释历史，解释人体运动，人的思维等。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而为阴阳，列为四时，判为五行。以五行配方位：木为东，火为南，金为西，水为北，土为中。以五行配时间：木为春，火为夏，金为秋，水为冬，土居中。以五行配五音：木为角，火为徵，金为商，水为羽，土为宫。如此等等。五行模式，将时间与空间，自然与人伦，构成一内在联系的有机系统。

五行所代表的对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实体，而是互相联系的有机生命本体。五者之间相生相克，由此演成丰富复杂的内在生命运动。

五行相生的规律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相克的规律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被完全运用到测字术中，成为断字中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

在测字中，五行的地位仅次于字形的分拆，测士们认为：测字时，“先问人之五行，次看人之笔画，相生相旺则吉，相克相泄则凶”（《指迷赋》）。因为在术士看来，汉字深层埋五行，《指迷赋》又云：“字，心画也。心形如笔，笔画一成，分八卦之休咎，定五行之贵贱，决平生之祸福，知目前之吉凶。”五行和汉字的笔画具有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关系若简单讲，就是“立木，卧土，勾金，点火，曲水”。即横是土，竖是木，有勾者为金，有点者为火，有曲笔者为水。这只是大致情况，具体区分起来还很复杂。

前人有一首《辨别五行歌》很详细地谈到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内容如下：

横直连心土上称，
一挑一担具金金，
撇长捺短皆为火，
横直交加上最深，
有直不斜方是木，
学者先明正五行。

一点悬空土遁尘，
三直相连化水名，
孤直无依为冷水，
八字相须火可求，
空云独作寒金断，
好把心钩比木舟。

无勾之画土稍寒，
直非端正木休参，
围中横满无源水，
口小金方莫错谈，
四匡无风金五事，
用心辨别莫疑难。

穿心撇捺火淘金，
走之平稳水溶溶，

直中一捺金伤木，
踢起无尖不是金。
数点笔连休作火，
奇奇偶偶水源清。

无直无钩独有横，
水因土化复何云。
点挑撇捺同相聚，
共总将来化土音。
四点不连真化火，
孤行一笔五行同。

现在我们将五行和笔画的对应关系分别加以说明，上面这首《辨别五行歌》是我们分述的主要根据。

1. 土式

大地一望无际，绵延广袤，因而测字理论中以横为土的基本象征。土有几种形式：

①寒土。即上诗所谓“无勾之画土稍寒”，就是光秃秃的一横。为何称为寒土，因其无树木山脉，如人无衣，故称之。

②深木。即横与竖交叉，如“十”字，术士所谓“横直交加土最深”。此土可以栽木种禾。

③沙尘土。术士所谓“一点悬空土进尘”，一点不与他画联系，如“戈”、“弋”上一点，四面不着落，这就叫沙尘土。这也很形象，灰尘漫天是土，但它不着地。但是，点下有横则不属土属水，如“文”、“章”。此详下。

④一般土。即上歌所谓：“横画联勾作土称”。就是汉字

笔划一。

⑤×形土。即上歌所谓：“点挑撇捺同相聚，共总将来化土音”。

以上五土，以横为基本形式，并兼照其他几种形式。

2. 金式

金式的笔画形式比较复杂。虽说是“勾金”，但一般的勾又不属金。其形式为：

①基本式。上歌云：“一挑一捺俱为金。”汉字笔画的提和捺均属金式。但像“道”最后一画之平平的捺不属金属水，因为金要求捺要下垂，提要尖锋。

②小口式。上歌有云：“口小金方莫错谈。”如果象“围”、“团”的外部大口则不属此式。

③目式。《五行歌》说：“腹中横短作囊金。”如“目”、“日”等均属金式

④几形。《五行歌》称：“空云独作寒金断。”

⑤交叉式。《五行歌》：“穿心撇捺火陶金。”如“又”。

⑥三点水式。三点水下有提，提为金，故称。

3. 火式

测士们以点为火，因为火燃烧后，火苗上升，如点状。不过它也有许多变式：

①真火。如“然”、“熊”等。上歌云：“四点不连真化火。”在其他几种火式中，唯有此火从形式上看，有熊熊直上之势，故称“真火”。

《陶朱新录》中载有一“真火”例：

绍兴己酉，永嘉火灾。前数日，有熊自楠溪之

江浒，跃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惧人，命猎士杀之。时高开府世则寓城中，谓其倖赵允蹈曰：“熊于字为‘能火’，郡中宜惧火烛矣。”不以为然，已而延烧官民舍什七八，独州治存焉。

将“熊”拆为“能火”，实际上就受到五行学说的影响。

②一般火。凡撇不论长短，都属火之列。《五行歌》云：“撇长撇短皆为火。”

③余火。《五行歌》云：“八字相须火可求。”如“八”、“分”。周亮工《字触》卷三“晰部”载有一例，即是此余火：

瞿天师，名乾祐，陕中人，往往言将来事。尝入夔州市大言曰：“今日当有八人过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焚数百家。八人，火字也。

④炎火。《五行歌》云：“点边得撇为炎火。”点和撇要紧相连，不连则属火。这可能也是象征，点为火，撇为木，火下有木，故而说炎。

4. 木式

木的基本对应笔画是竖，所谓“竖木”。它也是取象外物所得，挺直而立的一竖很像树木的形状。《五行歌》云：“有直不斜方是木。”除了竖之外，木还有其它一些形式：

①冷木。测士们认为，象征木的一竖若无其它笔画相辅，称为冷木，尤如人孤苦伶仃，没有帮助。

②湿木。《五行歌》云：“三横两短右无钩，乃为湿木。”如“三”字。

③舟船木。如“乙”字，此字像两头翘的船。此形主要占卜一些在水面上进行的事。

5. 水式

测士们认为，曲笔多属水式，因为水的波纹，曲折有致，故取此象。但是还有一些其它的水式。前人将其分为几种形式：

①雨露水。主要是点画，如“文”、“章”等字。前人谓：“一点当头作水称。”但有的点则是土，如“弋”、“求”，所谓“一点悬空土进进”，与此不同。

②川字水。三直相连，均作水，如“川”字形，《五行歌》所谓：“三直相连化水名。”

③走字水。走之旁属水，《五行歌》云：“走之平稳水溶溶。”

④野水。如果求测者将四点连成一气，则不属火，而属野水。

上面是五行和笔画的基本对应关系，实际上完全是测士们的杜撰，而且没有严格的区分，其中交叉者甚多。靠这样的东西去推测人的命运，自然是胡乱牵扯、乏善可陈了。

对笔画作如此繁冗的区分，目的是以笔画为基础来判凶吉。这种五行占断的方法，有两个重要的占断依据，一是中国人对五行属性的一些基本理解，二是笔画的一些基本特性，如一竖写的直弯、肥瘦、方圆等。虽然都是信口雌黄，但听起来却是头头是道，奥秘无穷。

《花押赋》谈到五行笔式和人的祸福命运时说：

上大阔方，火乃发用，坚瘦有力，木乃生荣，金

要方而水要圓，土要肥，而木要正。故曰：炎炎火旺，玉堂拜相。洋洋水秀，金闕朝元。木盛兮仁全义广，金旺兮性急心剛，土薄而离巢破祖，土厚而福祿绵长。故曰：木长水多，根根折挫。金少火多，两窟三窝。金斜而定然子不少，木曲而中不财丰。盖书长兮像天居上，土卧厚兮像地居下，内木停兮像人在于中央。三才全兮如身居其大厦。……

这些分别的主要依据，就是五行之笔每笔均要有其本性特点。如土笔厚，像厚厚的大地，自然有坚实笃厚之运。木笔直，前途远大，人如栋梁。

测士们竞相“五行深处说根基”。要占得好运，写起字来就像小孩刚学写字，要横平竖直，笔画清晰完整，否则将带来恶运。如测士们说，木笔开口就可能被人打，就是一竖上下写得松散，锋没收住。如从前一人被卷入一件官司中，写一“干”字请测。测士说：“你命相属水，水为北，‘干’插‘北’为‘乖’，可能要有坏运。”求测者问将会有什么样的坏运，测士端详其字少顷说：“‘干’中一竖为水笔，水笔下松散不关笼，可能要被别人杖责。”这里就从五行笔式的书写上立论的。

测士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如问疾病，据说从字画的五行中即可探知。

如金笔，多心肺痰腑疾病；木笔多心气疾病和手足疾病；水笔多泻痢呕吐；火笔多热疾；土笔多脾胃毛病。而且所测字土笔多，就可能因病而死，这种判断方法实际上和人对于五行的认识有关系。如水流动不已，想到了痢疾；火炎炎直

上，想到了热病；土乃瘞埋之所，故土笔多主死。

人的其他方面祸福，据说也能从五行笔画中得知，如土笔多富贵，但不同的笔式又有不同的凶吉，无所依傍的寒土主前途暗淡，连勾的横画土主破财，浑厚的一横主根基好，写得飘浮的横又主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再如木笔长主富贵，木笔的一竖短则可能预示功名上不顺利。而湿木之三画多有才气。木笔的一竖如写歪了也不吉利。

五行判凶吉不仅是孤立地从一笔画中寻找命运的信息，还要看五行笔式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相生相克可能使凶笔转吉，也可能使吉笔转凶。

相生相克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具体的笔画之间的五行相生相克，二是求占者和笔画之间的五行相生相克。古代测字者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去占解，这类情况非常普遍，在那些技高一筹的测士中尤其如此。五行的介入为其它诸种占断方法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方法，而这一方法又最为迷信者所服膺，因为五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周亮工《字触》载有一测例：

有以“哭”字问病，曰：“是兄何人？”曰：“父也。”曰：“止生足下一人耳？”曰：“然。”曰：“不妨。”问何故，曰：“上面两口双全，下面一人。以时而论，戊日便好。哭为水。戊，土制之。不但如此，还应得一子，以犬字傍有一点也。”

测士何以说来者父亲戊日便好，根据的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他以“哭”为水，而土可克水。在十天干中，戊、己

配土，所以取戊日为其父愈期。为什么不取己，因为己日在戊日后，故取前不取后。

五行在测字中的作用一般多是辅助作用，但它有时别开洞天，使求测者听得云里雾里搞不清，感觉到其中定有奥妙。

如一人生病，托一亲戚去求测字先生算命，写一“永”字。这意思不说自明，即担心病情恶化，希望永生长寿。测字先生一看此“永”字写得毫无精神，断定是个病情严重的人所写，于是“测”开了：“你的这位亲戚可能情况不妙。想‘永’而不能‘永’。‘永’字下面是‘水’字，‘水’在五行中被土所克，土为埋葬之所，岂不是命将不长吗？”这位亲戚一听大惊失色，连问何日会死。测字先生说：“后天。水在五行中居三，土居五，水土相距只一日。”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字内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有时还体现在求测者属相、求测日子的五行和字中笔画的五行关系中。

在传统算命术中，一个人的命相与五行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分析八字中的五行盛衰关系是判断人的命运的重要依据。测字中由于五行和笔画对上号，因此不同的五行命相与字中笔画之五行将发生一定关系，由此萌出相生相克的运动态势。如水命人逢土，有时要招致凶灾，火命人逢水也不是很吉利。

如从前有一个父母早亡，孤苦伶仃，后得一重病，请人为他一占。那人来到测字铺前，拈得一个“一”字。测士问清来者所占何事、为谁而占之后，断道：“此人命实在不好。因为‘一’为‘木’字头，乃是不好的征兆。‘一’虽不是‘死’，但又是‘死’的起笔，说明此人已经向死亡靠拢了。且

‘一’在五行中属土，它上上下下没有其它任何笔画，属寒土，正是他孤苦伶仃的象征。”后来测士又问其生辰八字，推知其五行中水盛，便说：“这就更清楚了，‘一’为土，你的这位朋友命相为水，土能克水，岂能有久生之理？”据说后果验其言。

由于五行和时间、方位密相关联，有时测字中的时间、方位在五行中的定位和字中的笔画所属之五行中也会发生关系，由此成为判断吉凶的依据。

江南有一富人与一仆从去北方做生意，后来感到一个仆从不够用，又在苏州请了另一仆从，三人相协去北方。临行前，此富商求测士为其一占。测士说：“这一趟生意非常顺利。你有两个伙计，‘伙’与‘火’谐音，二火相加为‘炎’字，‘炎’者火势已浓。且你们都是南方人，南方于五行属火，炎炎之火再加火，其火太甚，恐怕招致不幸，若你在南方做生意必多失，但你去北方则无妨。北方于五行属水，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水能克火，太旺之火势经水势一克，便趋于正常，趋于平缓。所以说你此行必顺利。”

第九节 天干地支占断法

天干地支是中国古代用来记时的重要手段，据说产生于上古轩辕时代的大挠氏，不过这一传说未必可信，但天干在商周时代就已广泛使用则是信实有证的，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已有广泛记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天干地支具有更广泛的内容，不少人认为它与天地自然具有密切关系，又和人的命运

紧密相联，汉代谶纬方术流衍滋蔓，天干地支又和迷信活动牵扯到一起。后代又把它与算命术联系在一起，不了解干支就无法了解中国的算命术。测字中又少不了运用这种方法来丰富测字的内容。

天干共有十位，分别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位，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取法于天，地支取法于地。天干为主，地支为辅。天干犹树木之主干，地支犹树木之枝条。

由天干和地支两两相配，可成六十之数，旧称“六十花甲子”。它们分别是：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干支可以记年、月、日、时。如以地支计时，以晚上十一点至次日一时为子时，余下类推，每一地支包括两个小时。其安排顺序较为复杂，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里只谈谈与测字术有关的部分。

测字术中运用天干地支有几种形式。

其一，利用天干地支的记时功能推测事件出现的时间。

著名的测士汪龙，人称瞎子汪龙，善测字，其测字之事留下也很多。以下就是一例。一天一人来求占，称其友有病，请占其何日康复，汪龙请书一字，那人写一“尼”字。汪龙一听，说：“你友情况不佳，‘尼’字再加上‘夕’字就是个

‘死’（这里只是取其近似）字，就是说，你友只有一天的在世时间了。”此人听此，大惊失色，连说：“这字不算，再占一字。”于是写了个“生”字，心里想，这下可能就不会有此恶运了。哪知汪龙一听，微微一笑，说：“这个字正证明了我刚才说的话。‘生’字上可拆为‘牛’，下可拆为‘土’。牛为丑，人称子鼠丑牛。丑、土，意思说是丑日入土，明日正是丑日。”那人惊而退去。

唐张读《宣室志》所载一事广为传布：

元和元年，淮西帅吴少诚死，子元济拒命。十二年，召裴度将击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发地得石，上有铭文曰：“井底一杆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度以示从事，令辨其义，咸不能究。俄有一卒自行间跃而贺曰：“吴元济成擒矣！”度惊讯之。曰：“石铭其兆也。‘井底一杆竹，竹色深绿绿’者，吴少诚由行间一卒，遂拥十万兵，为一方帅，喻其荣也。‘鸡未肥’，无肉也。肥去肉为‘己’。‘酒未熟’，无水也。酒去水为‘酉’。‘障车儿郎’，兵革之士。且缩者，谓宜退守其所。由是言之，则己酉日当成擒也。苟未及期，则可俟矣。”度深叹异。是岁冬十月，李愬生得元济，校其日，果己酉。于是度益奇卒之辩，擢为裨将。

此卒由“鸡未肥，酒未熟”二句的拆字拼合中，推出“己酉”，再由己酉确定事件发生之时间，将天干地支和测字联系了起来。

如我们在后文《字梦》一节中所引述的那则“戊午解元”的例子，也是借干支来确定事件时间。张巽乃一书生，赶考前梦见神曾对他说：“成不成，平不平”数语，他本以为自己与功名无望，可能还有灾害临头，成是不能成，平安也不能平安，何以能有好命。他后来居然榜上有名，方悟此梦之根由，“成不成”者，像成又不是成，乃“戊”字。“平不平”，像平又不是平，乃“午”字。因而有“戊午”二字寓于其中，他所中之年恰好正是戊午年。

周亮工《字触》也载有一事：

真定周先生，讳根邵。游姑苏，书“甲”字问生平事。曰：“进士。”周曰：“何以见？”曰：“‘甲’乃‘墨’字之首，岂非高举者乎？”公笑曰：“然矣。知发自某科？”曰：“字像半成于‘庚’，全得于‘丑’，必是庚子、辛丑两科。”公叹服。

这位测字先生真是太富于想象力，他居然从“甲”中硬是看出了“庚”、“丑”二字。“甲”有点像“庚”的下部，而“甲”上方又可离合出“丑”字，由此推出其中第的时间。真不知他是怎样猜出如此之结论的。

从前有人以“亥”字来占卜自己孩子的疾病，测字先生说：“你写的这个‘亥’，是‘孩’中缺‘子’，大概是说你孩子不见了，不久将会夭亡。”来者大惊失色，便称自己的孩子确重病在身，便问孩子是否还有在世的可能，测字先生说：“看来是没有这个希望了。‘亥’为十二月中的最后一月，也就是说末日将来临，何能再长生？”中国古代记月常以十二地

支配十二月，亥为十二地支之末位，故有此联想。

再如一人妻子生病，其夫写了个“字”字去占其子何时出生。看来这人颇有点文墨，因为“字”在古代汉语中就有生育的意思。测字先生说：“‘字’为‘寅’在头，下面又是个‘子’字。看来贵夫人之生与子寅有关，可能在丑日，因为子丑寅卯，丑在子寅之间。”

从以上所引数例来看，测士们由求测者所给的汉字来占测命运，但在问及具体时间时，多要从干支上去联系，这种联系是至为曲折的，有不少更匪夷所思，但测士们为了和时间联系起来又不得不这样做。高明的测士一般不会为此而难倒，因为汉字的可塑性实在太太，随意分拆，而且有时也不求多像，因此硬联总是能联系上的。如“字”字联系为子、寅尚还能看出，至如“成不成，平不平”联系为“戊午”，“甲”字联为“庚丑”，可以说迂曲之至。但求测者对这种貌似实非的现象非常迷信，有一点相似的影子，就有神意寓涵，似而不似，其神秘性也就更大。干支的介入使测字中推算时间有了可说之处。

第二，以干支和五行相配来判凶吉。这一点也是一般算命术的基础。

五行配天干的具体方法是：木配甲、乙，火配丙、丁，土配戊、己，金配庚、辛，水配壬、癸。

五行配地支的具体方法是：木配寅、卯、辰，火配巳、午、未，土配辰、戌、丑、未，金配申、酉、戌，水配亥、子、丑。从过程上说，几个地支同属一行，但其先后却有不同。寅为初生之木，卯为极盛之木，辰为渐衰之木。巳为初生之火，午为极盛之火，未是渐衰之火。申是初生之金，酉是极盛之金，

戌是渐衰之金。亥是初生之水，子为极盛之水，丑为渐衰之水。辰为初生之土，戌为渐盛之土，丑为极盛之土，未为渐衰之土。

在测字中，点横竖撇等笔画形式都有与之相应的五行来表示，而五行又可配干支，因此笔画也跟干支具有密切的关系。下面我们简单地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加以描述。

木式主要以竖为主，分为湿木、冷木、舟船木等形式，测士们认为，一竖若写得强壮有力，且通上通下，如“车”中间的一竖，被称为甲木或寅木。如果一竖很短，不直通上下，中间被割断，如“幸”上下的两竖，则属于乙木或卯木。如果一竖通上通下，如“车”中一竖，要是写得不强劲有力，亦属乙卯木。至于湿木（如“三”）、舟船木（如“乙”），属于木的变体，不是其正体，所以一般不以干支来配。

火式的正体为撇，如一撇长而有力，如“广”字的一撇，称为丙火，或巳火。在阴阳关系上属阳。若一撇短而无力，如“短”上之一撇，则被称为丁火或午火，它属阴。须火（如“八”字）、真火（如四点）乃火式之变体，则无干支相配。

土式的正体乃是横，唯横有干支可配，其它变体均无。在横中，长横为戊土，如“聿”中之一横。短横且用笔轻，则为己土。

金式的正体为方口，方口为庚金或申金，一挑为酉金，一捺为辛金。方口属阳，一撇一捺偏斜属阴金。其它目形金、三点水金均不在此列。

水式的正体为点，点在上为癸水，如“文”、“章”；如在腹中则为子水，如“凡”字；点在中央则为亥水，如“景”。有一首诗云：“点在当头作癸称，腹中有子须分明。点足为人

腰在亥，余皆野水不同群。”

第三，干支本身直接表示凶吉。如甲、子为干支之首，为生神，占得此字，主事业发达、子孙绵绵。亥、癸为干支之末，此为亡神，占得此字，有诸般不利。丙为火，为煞神，得此字也多不吉利。

第十节 六神占断法

古代测字术在笔画的占断上出现了六神占断法。它在测字断法中运用十分普遍。测字先生在解断时一般不直接说出六神的依据，因为其断法深奥难懂，一般术士不易掌握，一般求占者也不易理解。高明的术士往往把它作为测断的内在依据。

所谓“六神”，由中国古代五个著名的星宿名称加上腾蛇所组成，其名称分别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勾陈、腾蛇。其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被称为“四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古代中国人所命名的四个著名星宿，这四个星宿分别坐落于东南西北四方。因此“四灵”又被广泛用来表示四种方位。其中青龙属东，朱雀属南，白虎属西，玄武属北。又可以表示较小的空间方位，此即古代中国人常说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四灵的方位又可与五行相配，青龙属木，白虎属金，朱雀属火，玄武属水，而四方位之中央属土。于是中国古代的五行模式，四灵又可与时间搭配起来，以空间的形式表示时间的概念。它们分别是：青龙属春，朱雀属夏，白虎属秋，玄武

属冬。四灵以空间到时间，并进而由自然到人伦，在中国古代天人相应哲学的影响下，自然的一切对象都成了和人类具有某种神秘的对应的实体，因此天象活动的轨迹可以反映人间活动的秩序。于是四灵说便和人间的文化创造联系起来。四神也因此成为一种融汇时间和空间、涵盖天道与人道的神秘的符号。

勾陈是北极星，北极星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它被视为与人的命运祸福息息相关的星体。而腾蛇则是传说中的一种神蛇，它播云耕雨，兴风作浪，它无定位，无定体，在天地自然中神游飘忽。由四灵和勾陈、腾蛇组成“六神”的概念，在汉时运用已是十分普遍了。从汉代开始，“六神”被运用到堪舆、占星、梦验、测字、六壬等占卜术之中，成了中国封建迷信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测字中的六神运用非常普遍，它的基本方法是将汉字的基本笔划和六神一一对位，将六神融入汉字的内在空间中。实际上，这种硬性勾连的基础，是人们认为汉字本来就不是简单的书写符号，它的里面贮积着大量的神秘意旨，它与天地人伦的精神息息相通。所以人们才会把它和“六神”联系起来，将它视为神灵的呼应形式。而这种联系的结果，又加强了人们对汉字神而明之的态度，由此也更加坚信能从汉字中掘取命运隐微，这便促进测字迷信的发展。它也给测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汉字无论是分拆、谐音，还是字义联系，涉及到的是汉字的基本构成方法，没有涉及到具体的一笔一画。如字形离合是通过由各形体所组成的整体汉字来占断的，如“杭”拆出“兀术”，它是通过笔画重组而得到新的汉字，它仍是一种整体的占断。而六神占断法不必由笔划上升到汉字，

而直接通过汉字的笔画来占断。如果说整体汉字占断是一种“测字”，那么六神占断则是一种“测笔画”。很显然，六神占断法实际上扩大了测字术的内在空间，为术士的随意牵连提供了新的便利。

六神和笔划的具体对应，前人曾以一首诗来概括，这首诗被测字术士称为“六神真妙诀”。今据《新订指明心法》上所收之《辨别六神歌》云：

蚕头燕额是青龙，
尖短交加朱雀神，
弯弓斜月勾陈象，
滕蛇长曲势如行，
尾尖口阔为白虎，
体态方尖玄武行。

这里用诗的形式大致地确定了六神中每神所包括的笔画，如青龙是“蚕头燕额”，这只是一个比喻，“蚕头”指丿，“燕额”指㇏。朱雀的“尖短交加”指乂。勾陈是“弯弓斜月”，指㇆、㇇等形式。滕蛇的“长曲势如行”指手书中的圆形笔画，如乙。白虎的“尾尖口阔”一般笔画上有方笔下有尾尖的形式，如兄、几等，“玄武”的“体态方尖”指么、云等形状。

另流行甚广的《六神笔法歌》也表达了大致的意思，其诗云：

蚕头燕额是青龙，

两笔交加朱雀凶，
玄武怕他枯笔断，
勾陈回笔怕乾坤，
腾蛇草笔重重带，
白虎原来坤位逢。
此是六神真数诀，
前将断语未流通。

这里不但将六神和笔画联系起来，而且还涉及到笔画的凶吉，但语焉未详。这里我们综合程省的《测定秘牒》和《古今图书集成》所录之《新订指明心法》等书，将六神笔画的吉凶情况略述如下：

1. 青龙形式

它的基本笔画形式是“蚕头燕额”，即丿和㇏两种形式。但这其中有两点要注意：一是撇捺必须是长撇、长捺，如果短撇短捺则不属于青龙形式。二是六神的笔划指的是一种手书形式，而不是印刷形式，因此并非长撇长捺都属青龙，它在书写上必须起笔有“须角”，不能光秃秃的，否则就会被划出青龙之外。

另外书写青龙形式还要停匀妥贴，若笔中间抖动不已，也不能算青龙形式。

在整个六神中，青龙形式最吉利。有一首诗描写它的吉凶情况：

青龙笔动喜还生，
谋用营求事事通，

人口增添财禄厚，

主人目下尽亨通。

青龙形式是“事事通”、“尽亨通”，上上大吉。他能使你前途远大、道路顺利、财源茂盛、官运亨通、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生育顺利、科举及第，总之心想事成，一切皆很如意。

如从前有一男子，三十多岁仍未婚娶，心里非常着急，去找测字先生算上一命。一摸摸的一“孤”字。他一看，心里凉了半截，“孤”者，岂不是让我鳏寡孤独，孑然一身。而测字先生看后，则吟吟一笑，连说：“有喜！有喜！”他告诉这位男子，你不仅有妻室之望，还可有子女之喜。“孤”字拆开，即为“瓜”、“子”。其生子女如瓜瓞绵绵。依六神言之，此字最后一笔是长捺，又写得须角长尾，是青龙形式，青龙主喜事。

2. 朱雀形式

它的基本笔画形式是“尖短交加”、“两笔交加”，如乂。另外不属于青龙的短撇也属朱雀，不过这短撇起笔要有一个小尖角。

《新订指明心法》认为：“朱雀主官司”，并详细说明它的凶吉：“朱雀临身文书动。主失财，有口舌，生横事，忌惹人，有忧惊之事。”有一首诗概括其凶吉特点：

朱雀交加口舌多，

令人家内不安和，

若逢水命方无怪，

他命逢时有怨疴。

这也就是说，测字时出现朱雀，就会出现和别人争吵乃至打官司的现象，所谓“文书动”，起草官司文书。从一个家庭来说，也会带来内部的纷争。“若逢水命方无怪，他命逢时有怨疴”的意思是：朱雀在方位中属南方、值炎夏，属火。如果一个水命的人取朱雀，即不会有事，因水能克火。

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个测例来看，一人要进京赶考，临行前找测字先生为之一占，术士名王权，人称王仙人，测字非常灵验，自称得管辂轨革之法。他摸得一“又”字。王仙人一见，面有严肃之色，此书生已知命相不好，进问其由，王仙人说：“您这次赴京赶考可能甚为不利。依字言之，‘又’是‘文’星不见。即是说，‘又’似‘文’，然而又少一点，而这一点正是文曲星。”说到这里，他面有惊色，说道：“您这次不但考不取，可能还会卷入一桩倒霉的官司中去。”他细致地问了书生的生辰八字，知其命相属水。于是说道：“这桩官司不打紧，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与你无关。”书生请王仙人解释其中原因。王仙人说：“‘又’两笔交叉，属六神中的朱雀形式，朱雀主官司，故我知您有官司之忧。朱雀属火，而你命相属水，水能克火。所以我又说你能为转忧为喜，化凶为吉。”这书生听此话，开始有所不信，后来他的朋友告他有欺辱良家妇女之罪，此事告到官府，官府查下来，原来是诬告。但他却误了考期。

3. 白虎形式

“尾尖口阔为白虎”，白虎的尾尖口阔是就一个笔画而言的，如“几”字左边一撇上方用的是方笔，并略开小口，撇

的尾部尖尖拖出，即为白虎。亦即书写时起笔散，收笔细。

自其凶吉上说，“白虎主丧灾”。是六神中最不吉利的一神。白虎属西方，于五行属金，于季节属秋。中国人认为，“悲者，秋之为气也”，“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天总是和悲相连的，正像春天（青龙）总是和喜相连的。所以这里的白虎主丧灾，就是据此而敷衍出来的。而其所像之笔划，起笔散，收笔细，也有暮秋萧瑟之态。有一诗描写其凶吉说：

白虎逢之灾孝来，
出门凡事不和谐，
更防失却家财损，
足疾忧人百事乖。

《新订指明心法》言其凶吉时说：“凡白虎主有不祥之（兆），招产病，有孝服及官鬼，惹口舌，在囚狱。”总之一切都不顺利。

4. 玄武形式

清人为避康熙皇帝讳，又称元武形式，其基本笔形是“体态方尖”，如么、幺、云，呈三角形的构置，《六神笔法歌》说：“玄武怕他枯笔断。”玄武要写得笔形方正，笔墨酣饱，不能呈枯燥之状；也不能中间断断续续，否则也不属玄武之列。

关于玄武形式的凶吉情况，术士们认为：“玄武主盗贼”。物品失落而且很难寻找，使家庭穷困潦倒，甚或流离失所。得此形式还要预防小人之离间。也有一首诗谈到其凶吉情况：

玄武动时主失脱，
家宅流离慎方活，
更防阴小有灾危，
又主小人生拮据。

这里我们也举一例。有一人与其亲戚共开一爿商店，后来他想分开单干，但又拿不准是行还是不行，于是去求测字先生。摸得一个“公”字。术士解释说：“看来你不能和你这位亲戚分开，‘公’加‘言’就是个‘讼’字，不但不能给你带来好处，可能还要吃官司。若从六神的角度来看，你所拈‘公’字下部为玄武之形。玄武主失，如果你要分开，可能给你带来很大损失。”听了这一番话，他再也不敢提分开单干的事了。

5. 勾陈形式

勾陈的基本笔形是“弯弓斜月”，汉字中的横折钩、竖弯钩、斜钩等就属于勾陈形式。

关于勾陈形式和人的命运的关系，术士们认为：“勾陈主留连。”正像字形弯弯折折一样，勾陈象征做事不顺利，坑坑洼洼，跌跌撞撞，总使人感到不舒服，《新订指明心法》认为：“勾陈主惊忧之事，迟滞，忌土田是非，未决，并惹闲非。”前人有一诗云：

勾陈逢者事交加，
谋事中间件件差，
田宅官司多挠括，
是非门内有喧哗。

也就是说，它虽无大灾大难，但却也小祸连连。

6. 腾蛇形式

其基本笔画形式是：“腾蛇长曲势如行。”即是书写时的绕笔、圆笔，如蛇行宛延曲折，乙，乞等就属于此种形式。

腾蛇形式“主妖怪”，其字形盘桓翻卷，像鬼怪张牙舞爪。它的这种象征也与腾蛇的本来特点有关，腾蛇本是天上兴云作雾的神蛇，它在人间，则成了妖怪的象征。测字时遇到腾蛇这种形式，就会忧虑不堪，梦见不祥之兆，心灵不安，愁思不断。这也有首概括其凶吉的诗：

腾蛇遇者主虚惊，

家宅逢之尽不宁，

出入官谋宜慎取，

免教仆马有灾形。

以上我们简单描述了六神的基本笔画以及它们和人的命运的关系，显然这种勾连没有任何根据，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迷信。但是，六神在测字术中却占有相当的位置，成了占断吉凶的基本依据之一。术士们在运用六神时，还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占断习惯。这里我们试举几点，对六神占断法进一步地了解。

第一，每个汉字有很多笔画，在占测时，术士们比较重视的是最后一笔，这最后一笔俗称结笔，乃一字之结穴，所以此笔乃关键。如末笔是勾陈，就以勾陈占此字；末笔是玄武，也从玄武的基本特点去推理，其它类推。

有一首《五言作用歌》描绘了末笔占断的基本规律：

末笔是青龙，万事不成凶。
名利皆如意，行人在路中。
末笔是朱雀，公事有著落。
只恐国门中，有病无良药。
末笔是勾陈，淹留费苦心。
行人音信杳，官讼混如尘。
末笔是滕蛇，远客即来家。
忧疑终不免，官讼若嗟呀。
末笔是白虎，疾病须忧苦。
狱讼必牵缠，出住多拦阻。
末笔是玄武，盗贼须提防。
水土行人利，家中六畜康。

第二，除了占断以末笔为主观六神之外，也存在着六神的综合占断方法。即占一字，其笔画可以同时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神，从而综合其凶吉取象，再作决断。

如一妇人丈夫远出，久久不归，便请测字先生为之一测，拈得一“風”（风）字。术士断道：“此字含六神中之三神：勾陈、玄武和青龙。左边一撇，撇长而头有须角为青龙，右边之‘乙’形属勾陈，而‘虫’下又是玄武形式。勾陈主迟滞，你丈夫可能还要在外耽搁一段时间，因为你丈夫可能遇到一点麻烦，他的东西被人偷了，玄武是主盗贼的笔画。不过，请您放心，他不久将会归来，而且一切都会顺利，因为字中含大吉之青龙。由凶为吉，化迟为速。”据说不久其丈夫果然归

来，诉说其因盗而滞留行期之事。应验了术士的话。这里就采用了六神的混合占法。

第三、六神占断法还常配以五行。按中国古代的五行模式，青龙为东方、春天，属木，朱雀为夏天，主南方，属火；白虎为秋天，主西方，属金；玄武为冬天，主北方，属水。勾陈居中，属土。腾蛇变化无常，无正位。

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六神形式的基本凶吉形式在配以五行时，又产生一些变化。如前居朱雀属火，若遇水命人，即化凶为吉，因为水克火。

因此六神和五行相配，存在着相生相克的问题。古代流传的一首《四言独步》歌云：“青龙在数，求谋不误，若无水来，反为无助。”青龙属木，五行中水可生木，因此有了水，即可有助。另有一首《五行六神辨别篇》专谈六神和五行的搭配关系。

其所谈搭配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六神之内的搭配，因为六神中有五神分属五行，一字中若有两神形式，即可形成相生相克的原理。如这篇辨别文字说：“假如青龙与白虎同行，求功名大得其宜。如庶人得之，反不免相争之咎，父母与妻子聚面，问赴选难从其志，若游子占之，又可触思远之忧。”青龙本大吉，但遇白虎则大都转吉为凶。因为青龙属木，白虎属金，金可克木，故会遇到麻烦。

另外一种六神和占者五行关系的搭配，《五行六神辨别歌》云：“玄武不遇火，阴中不美。”玄武主水，遇火命之人，二者相克，玄武本主凶，在此相克中，转凶为吉。

第十一节 占断定式

测字时要随机应变信如神，左右逢迎，巧舌如簧，变是测字的根本特点。但是对于测士来说，并不是没有准则可依，几百年的测字历史，积累了大量的测字定式，它是一代一代测士经验的凝结。后代测字者每遇一字，常常想到那定式，若不能适应，再求变通。测字者是有定式可依但并非死于定式。

下面将一些测字的基本定式鲐列如下，当然这些定式大都迷信之至，但或可能帮助进一步深窥测字术的真实面貌。

字体诗诀

天字及二人，作事必有因；
一天能庇盖，初主好安身。
地字如多理，从此出他乡；
心如蛇口毒，去就尽无妨。
人字无凶祸，文书有入来；
主人自卓立，凡事保和谐。
金字得入力，屋下有多财；
小人多不足，凡事要安排。
木字人未到，初生六害临；
末年财禄好，切莫要休心。
水字可求望，中防有是非；
文书中有救，出入总相宜。
火字小人相，中人大发财；

灾忧须见过，日下有人来。
土字日下旺，田财尽见之；
穿心多不足，骨肉主分离。
东字正好动，凡事早求人；
牵连须有事，财禄自交欣。
西字宜迁改，为事忌恶人；
心情虽洒落，百事懒栖身。
南字穿心重，还教骨肉轻；
凡事却有幸，田土不安宁。
北字本比和，不宜分彼此；
欲休尚未休，问病必见死。
身字主己事，侧伴更添弓；
常藉人举荐，仍欣财禄丰。
心字无非火，秋初阴小灾；
小人多不足，夏见必灾来。
头来须鄙衰，发可却近贵；
要过日日前，凡事皆顺利。
病来如何疾，木命最非宜；
过了丙丁日，方知定不危。
言字如何拆，人来有信音；
平生多计较，喜吉事应临。
行字问出入，须知未可行；
不如姑少待，方免有灾惊。
到字若来推，出入尚颠倒；
虽然吉未成，却于财上好。
得来问日下，宁免带勾陈；

凡事未分付，行认信不真。
开字无分付，管谋尚未安；
欲开开不得，进退两难。
附字问行人，行人犹在路；
为事却无凶，更喜有分付。
事字事难了，更不带勾陈；
手脚仍多犯，月中方可人。
卜字求测事，停笔好消详；
上下俱不足，所为宜不祥。
望字逢寅日，所谋应可成；
主须不正当，却喜有功名。
福字来求测，须防不足来；
相连祸福迫，一口又兴灾。
禄字无祖产，当知有五成；
小人生不足，小口有灾惊。
贵字多近贵，六六发田财；
出入须无阻，宜防失落灾。
用字主财用，有事必经州；
谁识阴人事，姓王并姓周。
康字未康泰，要防阴小灾；
所为多不逮，财禄亦难来。
宁字占家宅，家和人口增；
财于中主发，目下尚伶仃。
吉字来占问，反教吉又凶；
因缘犹未就，作事每无终。
宜字事且且，须知在目前；

官非便了当，家下亦安然。
似字众人事，所为应不成；
独嫌人力短，从众则堪行。
多字宜迁动，死中还得生；
事成入修靡，两日过分明。
古字多还吉，难逃刑克灾；
虽然似喜吉，口舌却终来。
洪宜人共活，火命根基别；
事还牵制多，应是离祖业。
香字忌暗箭，木上是非来；
十八二十八，好看音信回。
清字贵人顺，财来蓄积盈；
阴人是非事，不静更多年。
虚惟头似虎，未免有虚惊；
凡事亦可虑，仍防家不宁。
远字事多达，行人有信音；
为事既皆遂，喜吉又来临。
同字如难测，商量亦未然；
两旬事方足，尚恐不周员。
众字人共事，亦多生是非；
所为应不敛，小口有灾危。
飞字须可喜，反覆亦非多；
意有飞腾象，求名事即宜。
秀字多不实，无事亦孤刑；
五五加一岁，还生事不宁。
风字事无宁，逢秋愈不吉；

疾多风癘攻，更防辰戌日。
天字已成天，亦多吞噬心；
事多蒙庇盖，行主二人临。
元字二十日，所为应有成；
平生刑克重，兀兀不安宁。
秋字秋方吉，小人多是非；
须知和气散，目下不为宜。
申字是非长，道理亦有破；
终然屈不伸，谋事难有祸。
甲字利姓黄，求名黄甲宜；
只愁田土上，还惹是非。
川字如来问，当知有重灾；
仍防三十日，不足事还来。
墟字若问事，虎头蛇尾惊；
有人为遮盖，田土不安宁。
辰字如写成，主有变化象；
进退虽两难，功名却可望。
青字事未顺，须知不静多；
贵人仍不足，日久始安和。
三字多迁改，为事亦无主；
当知二生三，本由一生二。
八字如问测，分字亦安让；
凡事多费解，仍防公挠忧。
字须有学识，初主似空虚；
家下不了事，名因女子中。
士为大夫体，未免犯穿心；

拮据是非散，番多吉事临。

字画经验

数字

昔在任宰清拆之云：“此字十日内放笔。”果以十日罢任。

家字

凡人书之，家宅不宁，空字头，豕应在亥月者也。

荆字

甘而刑，不利小人，大宜君子。

砚字

有一字，夫出之乱尔，见名之兆。

典字

曲折多，四十日内有兴进之兆，贵人必加官进禄，雅宜便四十日内有进纳之喜。

果字

凡事善果拔荆，盖口中无才，又云进小口。

馬字

昔有马雅官写馬字无点，馬无足不可动。

來字

來帶两人之才，皆未见信，行人未应，三人同来，财午未年发。

葵字

逢春发生。又占名利，逢癸可发。占病不宜，二十日有惊恐之兆。

但字

如日初升，常人主孤；凡事未如意，十日身坦然。

谦字

故人嫌，盖无廉耻，日下有事多是非。

亨字

高未高，了未了，须防小人不足及外孝不祥。

達字

二十日未达，并即日不顺，少喜多忧。

奇字

占婚奇偶未谐，应十一日难，为兄弟字不全。

俊字

一住一利，交友难为，父兄反覆，文书干连，变易凶。

常字

占病堂上人灾，有异性异母，上有堂字头，下有哭字头。

每字

昔曹石達人相此字，异日必为人母，后果然。

城字

逢丁戌日，六神动；忌丁戌日，田土不足，进力成功。

池字

凡事拖延有日，逢蛇（蛇）必利，盖添虫为虵。

春字

高宗写此，时秦桧用事，石云：“秦头太重，压

日无光。”檢聞名，召而達之。

一字

土字一字，王也。

益字

有吏人書益字，二十八日有血光之厄，至期果然。

田字

有人出此相，言直看是王，橫看是王，必主大貴。

元黃筆法歌

反旁无一好，十个十重灾；
傍里推详看，临机数上排。
走逸字如何，须防失脱多；
若还来问病，死兆不安和。
丝绞同丝绊，干事主留连；
却喜财公问，傍看日数言。
附邑傍边事，当从在右推；
兑官知事定，震位事重为。
四点皆为火，逢寅过午通；
若还书一画，百事尽成空。
卓立人傍字，谋事倚旁成；
若还来问病，死去又逢生。
三逸身必动，看其内必凶；
问病也须忌，其余却少通。
弓伴休乾用，反处口难凭；

先自无弦了，如何得箭行。
穴下灾祸字，占家更问官；
更推从来用，凶吉就中看。
两点傍边字，还知凝滞攒；
要问端的处，傍取吉凶看。
双口相排立，因知恸哭声；
各逢于戈日，亦主泪如倾。
户下尸不动，休来占病看；
其余皆是吉，即断作平安。
阜邑傍边字，当为仔细推；
兑官知事息，震住又重为。
礼字傍边拆，必定见生财；
疋字如逢见，须从人正来。
骨傍人有祸，囚狱一重来；
门内生荆棘，施設不和谐。
自家身傍限，分明身不全；
有谋难得遂，即日是多煎。
定逸自来看，身必有所动；
吉凶意如何，相里临时用。
山下灾祥字，占家宜用官；
更推从西用，凶吉数中安。
欠字从西体，须知望用难；
吹嘘无首尾，不用滞眉看。
禾傍刀则利，春季则为殃；
夏日宜更改，人中好举扬。
耳畔虽有纪，轻则是虚声；

旺事宜重用，取謀合有成。

第六章 测字类型

——测字与命运

测字是占卜人的命运，几乎人类一切活动形式都可以去以字来占测，国家是不是太平，近期是不是有战争，当朝君主是不是贤明，大臣中有谁是奸佞，这次科考能否得中，那位后生有无前途，以至于病人是不是能痊愈，官司能否打赢，孕妇怀的是男还是女，和你在一起的人是否够朋友，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测字来预测，测字无所不能，无所不到。对于迷信者来说，测字中能探知神灵的信息，神还有什么不能做到呢？

测字的形式复杂多样，这里将其主要内容分为四种类型，以便对测字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第一节 国家大事类

古人相信文字的“魔力”，崇仰测字的“神力”，首先就突出体现在国家大事常乞灵于测字上。

张爱玲在《必也正名乎》一文中曾这样指出：“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

在古代，一个朝代之兴衰，常为视为与年号密相关涉。倘遇国运亨通，术士们便分拆年号之字来寻找其安宁的根据；倘遇国势衰颓时，他们又常据字分拆，把衰颓之势怪罪于年号取得不好。这样一来，年号用字的抉择就成了国家的头等大事。

据《石林燕语》、《容斋续笔》上记载：宋神宗赵顼时为改年号，曾极尽权衡方才确定。熙宁末年，旱情严重，为求好运，神宗便想到要改元。开始拟的是“大成”，神宗反对，因“成”字于文，乃“一人负戈”，一派兵戈肃杀之气，当然不可。于是又拟“丰亨”，神宗还是反对，因“亨”字于文，为“子”而不成，这当然也不吉利。最后才确定年号为“元丰”。对此，满朝官员均未表示异议。由此一例，就足见改元在古代是多么慎之又慎的大事。

说来也怪，尽管年号用字煞费苦心，但经得起术士“推敲”的却极少，因为这些术士非凡庸之辈，特善拈弄摆布文字，好端端的一个字在他们左拆右拆之下，便俨然成了凶兆。仍以“亨”字为例，不用说这是一个吉利的字眼，宋神宗只是疑神疑鬼，才不敢用这个字。但假使到术士那里，此字的“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在他们看来，“亨”字很不吉利，因为它“高未高，了未了，须防小人不足及外孝不祥。”（《拆字部汇考·字画经验》）

下面我们看几个实例。

宋太宗赵光义登基，改元为“太平兴国”，但据《贵耳集》上记载，当时就有术士把它拆为“一人六十卒”，后太宗五十九岁而死。

北宋末年，宋钦宗改元“靖康”，一年而亡。据洪迈《容

斋续笔》上记载，时人在追溯靖康之难时，也怪罪到了年号，因“靖康”可拆为“立十二月康”，这分明是短命之光。

同书又载，南宋乾道九年，改元为“纯熙”，有人认为纯音作屯，屯者难也，不宜用。故此号发布天下六日后又改了。

类似拆例史不绝书，而且大多载于煌煌正史，足见古人十分重视年号用字。清人赵翼说：“年号用字，固取吉祥，然又有当慎择者。”（《陔余丛考》）明人谢肇淞更是告诫人们“命名之始，可不慎哉！”（《五杂俎》）

为何“当慎择”，正因年号关乎国运之盛衰隆替；为何“当慎择”，也恰因“中国是文字国”，有着“高手如云”的测字先生。

测字先生是不是专找国家“茬子”呢？那倒也未必。事实上，在古代，许多军国大事，重要的官员去取就常需他们的神推妙算，他们对国家也不时会有所助益。例如，谢石为宋徽宗拆“春”字，将它离析为“秦”头太重，压“日”无光，这显然具有讽谏的意味。（见《说海》）又如贾似道心怀异志，曾以“奇”字求占，术士将它拆为“立”又不“可”，“可”又不“立”，这也明显带有讥讽的意味。（见《草木子》）这表明，测字先生中不乏正直之士，有时还专门去找权臣奸邪的“茬”呢！他们找“茬”的方式也极独特，就以“歪门邪道”的测字去起到那“歪打正着”的效果。

这种妙用在下面一例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据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上记载，明代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故纷纷揭竿而起，使统治者坐卧不宁。一天，崇祯皇帝派一宦官微服出走京城，一路打探民情。宦官一见测字先生，便有意一占，于是说了个“友”字，让术士占断。术士问他

欲占何事，他答曰：“国事。”术士摇摇头，断道：“‘友’字不吉利，它是反贼已出头。”宦官一听，大吃一惊，连忙改口说：“我测的不是这个‘友’，而是有无的‘有’。”术士笑了笑，断道：“此‘有’更不吉利，你想想吧，‘有’是‘大’字掉了一半，‘明’字去了半边，大明江山已去一半，岂不是亡国之兆吗？”宦官一听，心中叫苦不迭，又改口说：“非也，非也，我要测的是申酉的‘酉’。”测字先生断道：“这字更糟了，你想，天子乃至尊之人，现在至尊的‘尊’截了头，去了尾，这不是更糟吗？”一番断辞，使宦官哑口无言。

此测例表明，古代术士中有不少人还是颇为正直的，他们关注时政，体察民情，并以手中“利器”代人民立言，传时代心声。这也同时表明，测字干政有时会独具妙用的，它和许多字梦、字谶一样，体现出古人对政治的关切，起到广泛的社会影响。

古人相信测字的力量，故每遇朝廷“大选”，人们常去测字先生那儿去求占，看看当选者为谁，当选者有几人。明代郑仰田极善测字，他遇到这方面的求占者还真不少。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天启初，将卜相。南乐指“全”字为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画，当相四人。”问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画为‘土’，当有姓带‘土’者。省四画为‘丁’，当有姓‘丁’者。省两画纵横为‘木’，当有名属‘木’者。以所省之文全归之，当有名‘全’者。”南乐曰：“木非林尚书乎？”曰：“独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

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

神宗末年，錦衣獨相。時枚卜韓蒲州、劉南昌二公，留中不發。叶福唐里居，召令試之，示以“筭”字曰：“吾有二友欲得官，可如意乎？”鄭對曰：“‘筭’字上有兩‘个’字，一‘个’臣者宰相也，其兩宰相乎？但‘君’不开口奈何？如欲大拜，必也君不成君乎？”后神宗于弥留之际命下。

古人特重战争，把它和祭祀看成是立国的两件大事，测字在这里也大有“用武之地”。每当战局胜负未卜，人们就常借测字之灵，来占测前景如何。清人周亮工就遇到过这样两个测例。据《栢公笔记》上记载，清代时，建宁城曾被叛贼王奇占据，尽管清军前来攻打，但无奈城固人众，一时尚难以攻下来。此时周亮工正好在绍武城上，许多人都关心建宁是否攻下，清军能否取胜。于是有一司理何棟便写一“筆（笔）”字请周亮工占断。周亮工看了看字，断道：“建宁已被拿下，时间是二十日。”何棟忙问道理何在，周亮工解释说：“筆”上为“竹”字头，若写成草书体，正好是“卅”，故推知二十日拿下建宁。再说，“筆”之下半，乃“建”破之象，故我又知建宁确已拿下。”后来果然如此。

同书又载，一次，福建省城突然来了许多海盗，把城围得水泄不通，后来不知何故，他们又悄悄撤走了。撤走的第四天，忽然白雾弥漫，当时清军尚在泉州南部，那帮海盗也没走远，大家都很惶恐，害怕海盗再来侵扰。于是抚军心生一念，想请术士占断一下前景如何，便让司理何棟写一

“白”字，让周亮工求测。周亮工断道：“清兵将要来了，因‘白’有‘兵’之形，又为‘泉’之首，据此推知清军必从泉州南部救援而来，让大家只管放心。”何榛又问清军将何时入城，周亮工答道：“‘白’上一撇乃‘入’字之半，下面的‘臼’是‘早’字之首，现在月初和上旬都已过了，估计清军将于二十四日早晨入城。”他的这番妙测，使大家吃了“定心丸”，很快就消除了惊恐之感。说来也巧，这番断辞竟一一俱验。

古人迷信测字，又何独战争为然。举凡国家大事，都可以据字为占。据《春渚纪闻》记载，宋哲宗是在位较久的皇帝，他当政年久，皇位的“接班人”尚未确定，他很为此事操心，遂派人去秦州府天庆观请人称徐神翁的术士求占。术士但书“吉人”二字，交给这位朝廷信使。他返回皇宫，秘呈哲宗，哲宗一看，心领神会。此后，当大臣问起后嗣之事时，哲宗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将此事搪塞过去，别人也不敢再问了。后来哲宗驾崩，徽宗继位。徽宗，名赵佶，佶者，也就是徐神翁所写的“吉人”。

徽宗登基后，一如乃父，也曾就许多国家机密的大事乞灵于测字，求占于谢石。《铁围山丛谈》中就载有一例：

徽宗令中官索东宫书一字来，乃以“太”字进问石。石曰：“此天子也。”上询谓何，曰：“‘太’字点微横，此必太子。他日移置诸上，岂非天子邪？”

宋代是多灾多难的朝代，也是测字术最为盛行的时代。其时，最高统治者每遇外患，或遭逢内忧时，总是首先想到测

上一字。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引两例为佐：

庆历四年，贝州卒王则据城叛，召明镐加讨，久无功。参知政事文彦博请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贝’字加‘攵’为‘败’，卿必擒贼。”未逾月，捷报闻。诏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贝州为恩州。

此例很有意思，文彦博请求讨伐贝州叛贼，宋仁宗欣然表示同意，理由不在其他，恰在他拆字的结果。在他看来，“贝”州叛贼由“文”彦博来讨伐，对方岂有不“败”之理？这是以拆字定人选、平内乱的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下面一例：

建炎间，术者周生善相字。车驾至杭州时，金人惊扰之余，人心危疑。执政呼周生，书“杭”字示之。周曰：“惧有惊报。”乃拆其字，以右边一点配“木”上，即为“兀术”。不旬日，果传兀术南侵。

统治者在金人惊扰之余，人心危疑之际，不思如何抵御，反而求诸于测字，大宋王朝又岂有不败之理？！

由宋代这一突出的历史“断面”，我们就十分清楚地看到，测字在古代军国大事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古人对它又是如何地“一往情深”。

更不可思议的是，古人不仅迷测字，而且笃信字梦。大凡君主登基，外邦入侵，或逢战事，常常编出一些字梦。

据史书记载，赵主石季龙，尝青天白日作了一个怪梦，梦见一群羊背着鱼从东北方向而来。他作完“白日梦”后，怎么也猜不透此梦之谜，于是请精通术数的僧人佛图澄给占一下。佛图澄占道：“此乃不祥之兆，‘羊’和‘鱼’相拼合，乃是鲜卑族的‘鲜’，恐怕鲜卑将入主中原啊！”后来果然应验。

古人梦完了外患，又梦来了内安，好一个“一梦三千年”！请看朱元璋的一个怪梦：

明太祖谓刘基曰：“吾夜梦，有三人共弁（戴）一血帽，何与？”基曰：“三人首弁血帽，‘衆’字像也，是谓得众之兆。”越数日，海宁果以城降。

你看，古人清醒时要测“字”，躺下时又梦“字”，真不愧是“文字国”啊！文字与国家关系实在太密切、太密切了。

也正是在这样古老的“文字国”里，有人甚至忍不住拆起“国”字来了，而且一拆再拆，十分离奇：

天授中，则天好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上书云：“‘國’字中‘或’，或乱大象，请‘口’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

“‘武’退在‘口’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作“囹”。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子于上阳宫。

这段记载见于《朝野僉载》。一个“国”字，不过是个符

号，但这里却一拆再拆，武则天则或大喜，或愕然，其中的心态和前面所说的宋神宗改年号的心理正复相同，它突现出人们对文字的极端迷信，也恰是测字、字梦、字谶所由生、所由长的心理根源。一个“国”字的符号尚且如此“当真”，那样去拆，更遑论真的国事了。

第二节 科举名第类

我国素有“官国”之称，是个官本位的国家，官崇拜的心理是中国人十分重要的文化心理。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①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认为：“当官的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大约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文明可以与之相比。”^②

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陶染下，盼望做官、热衷仕途便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在传统观念中，有所谓“四喜”之说，即“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金榜题名正是“四喜”之中尤可“喜”者。因为中国人自幼接受的也就是做官教育。《神童诗》开篇就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男儿当自强，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郎。”这里“唯有读书高”一句，曾被人改为“唯有做官高”，这一戏改倒也十分恰当地道出了这种做官教育的实质。因为旧时的训蒙私塾说到底不过是“制造官的工厂”（胡适语）而已。

这样，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何古代测例中比比皆是的就是

① 《学界的三魂》

② 《中国古代的科学和社会》

求科举、占名第的内容。

古代的仕途对士人来说并非很宽敞，倒似乎更像一条“羊肠小道”。芸芸学子拥挤在“唯有读书”一条道上，熬尽“十年寒窗苦”，祈盼“金榜题名时”。每当临考前，他们都显得有些心神不宁，神情恍惚，吃不准此番应试前景如何，是“金榜题名”还是“金榜题名”，于是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测字。

在那些迷信的学子看来，测字十分灵验，也相当简便，你只要随手拈上一字，或信手写上一字，经术士如此这番、三言两语一断，你的“前景”就洞然明悉。

宋代是测字术盛行的时代，士子求占科举名第的测例在有数。汪龙就有过这样一个测例。一次，有四五个举子赴京赶考，恰好遇上了汪龙，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写了个“貴（贵）”字，让他占测。汪龙见后，不假思索地断道：“好，一定会中！”举子中有一个人是独眼龙，临行时，汪龙将他留下，私下里说：“你们同去赶考的人当中，唯有你相公一人能中。”独眼人一听，心中一阵狂喜，忙问道理何在。汪龙笑着回答说：“君不见‘貴’字是‘中一目人’吗？”后来果然应验。

宋人胡宏极善测字，言多奇中。有一次，他在途中遇见两位将赴乡试的读书人，读书人请他占测此番应考前景如何。胡宏断道：“你们两人当中一人能考中，一人将遇丧事而不能应考。”读书人开始不信，后来果然一一俱应。有人问他道理何在，胡宏答曰：“那位丧父者讯问时，正好有人汲水而过，‘水’加‘立’便是‘泣’，故我推知此人将有哭丧之事而考不成。那位考中人询问时，正巧有人站立在旁边，‘人’加‘立’成‘位’字，所以我又知他必中无疑。”

《陶庵梦忆》中载有这样一例，也很有意思：

新安朱安国善拆字，绍兴三十二年六月，至鄱阳。是岁壬午，当举场开，士人多在州学，从之占问。段毅夫示以“飛（飞）”字，朱书其侧曰：“二九而升”。扣其说，对曰：“‘飛’之为字，从二，从九，从升，但据笔画言之，不能知其义；未可便决祸福。”及秋试，以第十九名荐选，朋友贺之曰：“十九者，二九也，君必正遇。”已而省试失利，乾道元年乙酉再举，复中十九名，遂登第。始悟二九而升者，两次十九方成耳。

此测例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朱安国到鄱阳，正赶上临考前，因而士人求占的很多，这表明士子占功名、求科第当然已甚为流行。其二，段毅夫求占时，写的是“飞”，这正如前面那个例子中四五个举子共写“贵”字一样，体现出十分强烈的功名欲望，这也恰好是中国人官崇拜心理的一个明证。其三，朱安国拆“飞”字为“二九而升”，但不言“其义”，这本是他耍滑头、敷衍了事的地方。但可笑的是，段毅夫及其好友不仅看不出这一点，反而觉得高深莫测，并妄作解人，或以“十九”解“二九”，或以“两次十九”释“二九”。这就突出表明古人对测字迷信极深。

也正因如此，读书人不仅临考前要求占，改习科时也要求占。还是那位朱安国，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求占者：

赵哲彦通以《周易》应乙酉举遭黜，谋改习赋。朱（安国）适再来，因书“易”字求相。朱曰：“得非有更易之意乎？”

此字从‘且’从‘勿’，当且勿易，终必得遂。仍旧预贡。鄱阳书生赵彦通，本以《周易》应明经之试，因未能中试而心灰意冷，遂萌生改习赋以应考的念头，但经朱安国一番拆字，又打消了这一念头，可见测字之于读书人所系之重。

宋代以后，测字更是风靡朝野，深入人心，以科举功名求占的测例亦屡见不乏。据《字触》上记载，曾有一世家子临考前去术士那儿，从袖中取出汗巾求占。术士问道：“你家莫不是三代进士吧？”世家子点头称是。术士接着断道：“恐怕你一心想考中吧？但无奈你肚中货差了点，只怕难以考中啊！”世家子一听，忙问道理何在，术士解释说：“你求测之物是汗巾。从‘汗’字来说，它从‘三’从倒写的‘士’，故我知道你家必三代进士。再说‘巾’，它比‘中’少一横，故我又知你考不中。”后来果然如此。

同书另有一测例，一个读书人应考前去求占，所写之字是“携”字，测字先生问道：“你恐怕是为科举之事而来吧？”读书人点点头，术士占道：“既为科考而来，结果不大妙啊！你看，‘携’这个字，说它像进士的‘进’却少了走之旁；说它是秀才的‘秀’又没有下面的‘乃’；说它是秀才的‘才’偏又不出头，所以我推知你此番应试必不中。”后果然。

不难想见，这两个断辞对两位切盼金榜题名、一“名”惊人的读书人来说打击该有多大，他们心理所承受的压力又该有多么沉重，测字在这里分明是判了他俩科第仕途上的“死刑”。

本来，求占科考，要么不中，要么必中，概率各占一半。但说来虽简单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当事人”身上却不啻是云泥之判、霄壤之别了。我们看下面一个并非“死刑”的测

例：

纪文达于乾隆戊辰捷礼闈，未廷对时，在董文恪公座，偶遇浙士，乃善拆字者。文达书“墨”字，乞占殿试名次。浙士谓之曰：“一甲无望矣。‘墨’字上截似‘里’字，以‘里’字倒拆之，为‘二甲’。四点为‘庶’字之脚，‘士’乃‘吉’字之首，必可得庶吉士。”果应其言。

纪晓岚乃清代大名鼎鼎、聪明透顶的读书人，他偶遇测士，便想测字，足见他对测字迷信也甚深。聪明绝顶的人尚且如此，其他的人也就不难概知了。

古人迷测字，不仅临考前要求测，应考后同样也要去求测，而且此时心情更为迫切。这方面的测例有很多，这里试举《清稗类钞》中的两个例子：

乾隆丁卯，福建乡试场后，士子谢廷光闻洪山桥有善拆字者，偕友人诣之，拈得“因”字，以询乡试之售否。曰：“国内一人，今科解首也。”友跃然曰：“我亦就此‘因’字拆之。”曰：“此科恐无分，后有恩科，可望得志。彼之因，出于无心；君之因，出于有心也。”

乾隆己亥，江南乡试题为“巍巍乎唯天为大”二句。胡元音望捷心切，同人守榜。汪某在座，见其神情迫切，戏之曰：“吾为君拆一字，如何？”元音

口报“巍”字。汪某沉思良久，指画再四，曰：“得之矣。上为‘出’字之半，半出学也。偏旁有‘禾’无‘乃’，‘秀’字半出也。有‘女’无‘子’，是半好也。加以‘魁’字，有‘鬼’无‘斗’。其必中副车无疑。”越三日，揭晓，果以副榜第五名报雋焉。

这两个测例值得玩味。前一例士子谢廷光一听说附近有一善拆字者，就立刻和友人一道去求测。后一例胡元音应考后，“望捷心切”，“神情迫切”，和人同守榜前。汪某为他戏拆一字，他竟然也愿意求占。这就异常分明地昭示我们，古代读书人是多么迷信测字，简直“信”得入“迷”了。同时，胡元音“望捷心切，同人守榜”的此情此举，又为我们提供了古人企盼功名，热衷仕途的绝好画面。

也许是古人太相信测字的“灵力”了，所以一次考试能中几人，中者为谁等等更为复杂的问题也要去测字先生那里请求占断。这方面的测例也有很多，请看《字触》中所收的一例：

乙酉十一月，以“静”字占乡试中几人。曰：“十二月方揭晓，‘争’字是‘解’元头，中七人，城内五人，城外二人。”已而果然。或问故，曰：“测此字时，偶念及小学‘天子争臣七人，诸侯争臣五人’，城内侯地，故五人，城外远于京师，故二人。以远于京师北直，故不言七人，止合城内为七也。”

此测例，测字先生之所以断对，显然出于偶然，但古人并不这样认为，所以才有“故问”探因的好事者。

有时应考之后，术士不便找到，于是读书人就干脆自作解人，测起字来。这虽然带有一点游戏的意味，但也恰好表明测字一道多么深入人“心”。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乾隆庚戌万寿恩科，共有进士102名，其中江南30名，安徽10名，会元乃歙县的朱元翰，胡先声中39名。尚未揭榜前，大家聚在编修翟公树寓所中，所谈话题自然是谁能中，中几人。这时翟公树写一“道”字，问在座的谁能断出这次安徽进士可中几人。他话音刚落，胡先声“先声”夺人，他一口断定考中的有10名，其中有人中会元，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家忙问道理何在，他解释说：“‘道’字外面是进士的‘进’字的框子，当中是一个‘首’字，这表明有人能中进士，有人能中会元。再说，‘首’字上两点是‘八’字，当中是‘一’字，下面是‘自’字，这表明我自己也定在进士之列。‘八’字再加一点一横，就是十，故我又知考中进士的有10名。”后来揭榜时，竟全然如此。

古人热衷仕途，不仅“求救”于测字，而且也乞灵于字梦。每当大考临头，他们常要抽出极为宝贵的时间去附近某个神庙，或某一名人的坟墓，在那里合上双眼，静静等待着好梦的到来。

说来也怪，他们求来的梦，不是难解的怪梦，就是令人不悦的恶梦，但他们还是愿意去求梦，因为这些梦大凡都可变为好的“现实”。

据《耳谈》上记载，明孝宗弘治乙丑年，有一谢公丕的

士人，为求科举，曾去丞相庙里求梦，梦见自己独自一人坐在田中，而脚却伸到了田塍的外边。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去求圆梦者占断，圆梦者说：“你此番应试，定可名列前茅。你坐于田中，为一‘田’字，脚伸田外，正是‘甲’字。”后来他果然高中，得了第三名探花。

再看《字触》中这样两个字梦例：

一士应举，求梦于墳，梦公使卒缚之曰：“恶人也，去其心。”士悸而醒，以为不祥。寻中式，见扁额亚魁字，始悟“恶”字去“心”为“亚”也。

一士应试，梦人以粉书大“十”字于门，以为不祥。寻中亚魁，“亚”字中白“十”字也。

这两个字梦例，求梦者开始都“以为不祥”，后中亚魁才知乃大吉之兆。此可谓“恶梦醒来是早晨”。

有时，同乡士子同去应考，途中如有神庙，自然也得去求个好梦，兹举一例：

弓與，漳州人，乾道四年冬，偕乡里六七人赴省试。过宜春，谒仰山祠祈梦。梦至官府，见柱揭纸一片，书“弓與不得”四字，但“不”字稍联接上下而中乃空。既觉，殊不乐，自谓必下第。及入试，與中选，同祈梦者尽黜。始以语人，谓梦不验。好事者曰：“‘不’字断乃‘一个’也，神言‘弓與一个得’耳。”

也有时，读书人并没祈梦，而其梦自来。这方面的例子更为习见，请看这样两个例子：

解学士缙会试时，有庐陵举人沈举发解南省居首，及将廷试，忽梦头上生羊角。同年曰：“头角峥嵘，在此举矣。”傍一人曰：“非也，羊角乃‘解（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复居首邪？”迨传胪，果得解缙也。

林诤环字崇璧，福建莆田人。永乐四年丙戌，廷试第一。环将试春闱，梦友李文渊送犬肉一片，环弯一臂受之。盖片火为“狀”字，弯一臂类“元”字。后官文渊阁学士，始悟李文渊乃先兆。又往九仙观卜兆，路遇道士云：“为代占梦，赤犬化为龙，明年应作状元也。”乃诡说之词，及赴试，适符给语云。

这两个例子均收于周亮工《字触》中，其中后一例最有趣。林崇璧应廷试之前，又是作梦，又是卜兆，又是巧遇道士，真忙得不亦乐乎，古人倘不迷信这一些，又何必如数家珍般地悉加罗列呢？

是的，他们太相信这一套了，我们从他们结想成梦到主动祈梦再到考前考后忙于测字的文化行为中，不正可以看出这一点吗？！

第三节 婚姻六甲类

婚姻、六甲（生育）属传统文化的同一母题，它们一横一纵架起了“承前启后”，传宗接代的桥梁，因此，我们将它们放在一起考察。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是人“性”之常，人情之常，但我国传统文化却另有“追求”。它是以宗法家庭为背景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关注”的重点显然是家族的绵延，而不是男女双方感情的结合。男婚女嫁其目的用古人的话来说，不过是为了“广家族，繁子孙”，为了“以大昏（婚）为万古之嗣。”（《礼记·哀公问》）这样一来，传统文化就历史地带有这样的品格，即“性”的淡漠和“姓”的发达。中国一方面对“性”秘而不宣、禁锢甚严；另一方面对“姓”又异常瞩目，并为世界提供了最多的“产品”。

在古代，男婚女嫁既不讲感情的结合，却讲究门当户对，因而成婚与否就不在本人，而取决于家人，这样一来，测字尽管很灵，人们一般也无需去乞灵它了。这，便是有关婚姻测例非常之少的主要原因。

宋代是测字术全面成熟的时期，同时又是封建礼学异常盛行的时期。其时，“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使“善男信女”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人们尽管相信测字灵验，却无人敢去就自己的终身大事请求占断，这方面的测例几乎“一穷二白”即是明证。

宋代以后，这种情况才略略有所改观。据《元散堂诗话》记载，有一书生沈云卿，曾梦见自己吃羹，但羹不热，吃后感到口中很寒。他抬头一望，但见天上映着“无二”两个大字。梦后醒来，他觉得此梦不可解，遂请好友迺秀给占一下。迺秀贺道：“老兄有桃花运了。”沈云卿不信，请他说说道理何在。迺秀说：“吃羹觉得冷，无火也，‘羹’字无‘火’，就是‘美’字。天上有‘无二’两个大字，即‘天’去掉‘二’，也就是‘人’字。二者合在一起，岂非要走桃花运？”后来，沈云卿果然遇一佳人，二人一见钟情，心相爱乐。这个字梦例似乎是一个预兆，它表明有关婚姻的测例有可能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

事实也确实如此。

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张先生书“女”字问婚事，问姓，曰张。断曰：“张姓清河属水，‘女’得‘水’为‘汝’字，正汝之婚姻也。”问貌，先生曰：“子日占得‘女’字为‘好’，‘女’加‘立’字成‘妾’字，‘女’乃‘婢’字少‘卑’字，此人为妾可立，即居婢亦不卑，且必沉默寡言，能治内政。”公喜而未信，事谐复来顾曰：“言无不应，此女原买为婢，今见其沉重贤能，将立为妾也。请问何以知其寡言？”先生曰：“‘女’字乃如夫人‘如’字，不露‘口’耳，是以知之。”

—《几神验存》

萧有某，往九鲤湖卜其女婚事何日配合，梦仙人书一“婦（妇）”字。醒不知谓何，圖者曰：“‘女’旁有‘山’，下乃‘出’字，君之女当出横山耳。”后女果适惟新里横山地方。

——《九鲤湖志》

也许正因为求测婚姻的人多了一些，所以测字先生也多少积累了一点这方面的经验，《拆字部纪事》中有“问婚姻”一条，其文曰：

凡字写得相粘者，可成；又字画直落成双者，可成；字中间阔而不粘及直横成双者偏旁长短者，不成；凡字写得脚匀齐者，皆就；字四齐者，尤吉；字上短下长者，日久方成；字乾上有破，父不从；坤宫破，母不从；左边长者，男家顺女家不肯；右边长者，女家顺男家未然。

这段记载，若撇去方法不论，我们不难看出，求测婚姻的人虽有一些，但大多带有私订终生的意味，这表明，人们已渐渐把婚姻看成是“自己”的事，而不再那么一味驯服于父母的意志了。这，正是传统婚姻观念的一种微妙变化。

果然，明清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阶层迅速崛起，民主意识逐渐强烈，人们婚姻观念上也渐渐民主起来，“有情人终成眷属”已部分地成为了现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私订终身、讲究情感结合的测例出现了。

清初程省就遇到过这样两个测例。一次，有人写一

‘茆’字来求占婚姻是否圆满，程省占道：“这桩婚事很顺利，也很圆满，只是那女子并非良家之女，而是烟花中人，你又何必留恋她呢？”那人听后，不好意思地说：“她确是一个美妓，与我交往有年，现有从良之愿，故想娶她为妻。先生确实不凡，请问字理何在？”程省解释说：“你写的‘茆’，上为‘花’之残，下为‘柳’之败，残花败柳自然非良家女子，而只能是烟花中人了。再从末笔看，它很像是‘節（节）’字的右下脚，以此为断，她可以从善守节，你可以娶她为妻。”

又一次，有人以“鄉（乡）”字求占婚姻，程省说：“这桩婚姻容易成，男女之间也情投意合，但不知你一个童男子何以要娶一个再婚女子呢？好在‘鄉’字最后一笔还是个“節”字形，由此可知这女子最终还是能守节的。”求测者笑了笑，说道：“先生所说不错，这女子确实作过童养媳，但未成婚就死了丈夫，现在她的翁姑想把她嫁出去。不知先生何以见得如此清楚？”程省解释说：“你看‘鄉’字，正所谓牛郎织女巧相逢，但其中‘郎’字完全，而‘織（织）’字仅存半边，这分明是女子与前夫虽有相逢之巧，却无成婚之命啊！”求测者听后，点头称是，接着又问道：“那么，先生何以知道她最终能守节，却为何不能为前夫守节呢？”程省回答说：“因为‘節（节）’字耳旁是笔直的，而‘鄉’字耳旁却多了一个曲折，所以我知道她要再次出嫁。”

这两个测例从内容上说，一个娶的是烟花女子，一个娶的是再嫁女人，而且都讲究情投意合，这显然带有“离经叛道”的民主色彩。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徐珂《清稗类钞》中这样一个例子：

有女郎将与入私，虑其未谐，而就拆字者问休咎，拈得一“口”字。问欲卜何事，女曰：“有一事，可得良好结果否？”拆字者曰：“依字而断，恐无圆满之望矣。欲成‘可’字，无‘丁’；欲成‘如’字，无‘女’；欲成‘何’字，更无‘人丁’。”

这位女人为自己的私情来求占，这在当时确实是很有胆量的，倘在宋代则是绝难想象的。

下面我们谈六甲。

六甲即有关生育之事，古代女子有孕在身叫身怀六甲。这方面的测例和求占婚姻的测例相比，要明显多一些，它突出展示出古人对种族绵延的高度重视，也是传统文化中“姓”的发达的集中体现。

在宋代，求测婚姻的几乎没有，但以六甲来求占的却极为常见，谢石、汪龙等测字高手都常为人们占断六甲。从内容上看，这方面的测例有两种情况，一是妻子怀孕过月或生产不利而来求测；一是为生男生女而来求占。下面我们逐一谈。

妻子有孕在身，丈夫自然心喜；但倘若怀孕过月，“产品”未能按时“交出”，丈夫可就急坏了。在此情况下，就要一决于灵之又灵的测字。谢石遇到的两个求测者，都是为此而来的。如前文所举一例，有一次，来了位朝中官员，他拿着妻子手书的“也”字来求占，说他妻子怀孕过月，“囊中之物”还不出来。谢石据字为断，说她怀的不是人，而是物，殆蛇虫之类的怪物。朝士一听，大为惊诧。幸亏谢石有灵丹妙

药，才“驱逐”了“囊中怪物”。

另据《说海》记载，有一次，谢石行走途中，遇一男子，其妻生产不利，故请谢石占断。他在地上了写了个“日”字，谢石断道：“日者明也，明生地上，必得男孩。”后果然。

据《栢公笔记》上记载，清人周亮工也为人占断过这方面的事。请看下面一例：

有怀孕逾月，书“莖”字视栢公（周亮工）。公曰：“再迟廿一日，方生。盖‘艹’在头，‘一’字在‘日’上，且下‘一’字颇长，为‘生’字脚故也。”时在五月廿日占，若依期则太迟矣。其人犹豫，复曰：“是男乎女乎？”曰：“女。盖莖草为母，此女极易生长，他日必为人母。”后果生一女，时六月十一日，正廿一日也。

这方面的测例还有不少，这里就不再一一说它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第二种情况，即求测者请求占断的不是“囊中之物”何时“交出”，而是所孕之人是男还是女，这里正有着我们民族独特“追求”。

、 传统文化特重传统，讲究有“统”可“传”，对一个家族而言，就是讲究种的绵延。在古代，最不能容忍的事便是断子绝孙，所谓“无子出妻”的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熟语，都突出地体现了这一观念。

正因如此，每当妻子有孕在身，丈夫盼子心切，便耐不住性子要去求占，看看将得贵子呢，还是得个女孩。宋代测士汪龙就有这样一个测例。一次，有求测者书一“竹”字，求

占六甲。汪龙断道：“‘竹’字可拆为两个‘个’，两个是双生，而且都是二月生。两个‘个’皆奇数，故所生之子均男孩。但可惜的是，这两个男孩都活不长。”那人一听，懊恼而归。有人问汪龙，何以知道这两个男孩活不大。汪龙回答说：“‘竹’下无根，岂能久活？”

我们再看清代的一个测例。据《栢公笔记》记载，周亮工在一友人家作客，茶余饭后，有人赶来写一“九”字，让周亮工给测一下他妻子怀孕是男还是女。周亮工把字打量了一会，断曰：“您恐怕还没有孩子吧？不过请放心，您将有个不凡之子。‘九’这个字，看似‘兄’而不成，故我知道您以前一定没有孩子。‘九’又是阳数，故我又知您将得贵子。再说，‘九’像‘凡’而非‘凡’，所以我还知道您所得之子定非凡庸之辈。”

古代术士有一惯例，只能为他人测字，不能为自己测字，自测据说就不灵了。这一点和字梦的自占性并不相同。但有时，测字先生倘要为自己测字的话，那就要由别人来写上一字，然后才自行测断。

据《栢公笔记》记载，周亮工因涉嫌某事，被困于秣陵。一天，他的一个家门侄子来看他，询问他的事是否了结。此时，周亮工夫人正身怀有孕，但不知是男是女，他有心自测，便请侄儿写一字。侄儿望他早日得子，便写了一个“喜”字。周亮工看过此字，自断说：“据‘喜’字来看，你婶婶可能于二十日后生一女孩。”侄子不信，请他解释。周亮工解释说：“‘喜’字拆开，下面有‘卅’，正是二十日。下面又可拆为‘一’‘口’，从测字一行的观点看，一丁为男，一口为女，所以我知道必生女孩。另外，你婶婶此次生育，一定顺利，因

‘喜’字上端正是一个‘吉’。”

此测例，周亮工自断自测，足见古人迷信之深。

在古代，也常有这样情况，男子功成名就，也已成了家，但就是久久未得子嗣，在此情况下，他们自然就更需要去术士那儿请求占断了。

据《睽车志》记载，有一姓汪的人，科考中举，也已成家，只是久未得子，甚是忧虑。他听说皇甫坦精通术数，预言祸福莫不奇中，便去求他占断。皇甫坦不言不语，只写了一个“湧（涌）”字给他。不久，汪某被授与吴江簿一职，在那里，他喜得一子。也只有在此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湧”字拆开来就是说他将在吴“江”得一“男”孩啊！

当官的无子要求占，为民的没子自然也要求占。《清稗类钞》中就有这样一例，有一次，一平民百姓去请术士朱某求占，他随手拈得一“武”字，便请占是否会有子。朱某一看，摇摇头说：“你恐怕不会生儿子了。因为‘武’字拆开来，就是‘一代无人’啊！”不难想见，当这位求测者听到“一代无人”的断辞时，该有多大的痛苦。因为在古代有无子嗣，直接关乎种的绵延，此所谓“无后为大”啊！

第四节 日常生活类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会遇到一些麻烦，也不时会遭逢一些意外之事，同时还会出现一些十分关心、亟待了解的事。在此情况下，人们又常常会想到测字，想借助于它的“灵力”化未知为已知。

这方面的内容最多，也最能体现测字的民俗意义，下面我们分类来说。

一、疾病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谁都难免会得病。倘病不重，请个郎中，抓两副药，也就打发过去了；但若是遇上大病，人们就不那么自信了。他们或是请巫婆神汉，或是拜佛烧香，或是画符念咒，或是请术士求占。这种小视“自己”高估“异己”的迷信心理在古代是极为常见的，因而以疾病求占的测例在古代测字内容中就占有了很大的“地盘”。

· 细细研之，以病求占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子代父母疾病而求占

这方面的测例很多，显然与古人讲孝道的文化观念有关。下面就看几个测例。

从前有一人，父亲得了重病，心里异常焦急，便去请术士求占。来到测字摊前，说明来由，术士让他写一字。求测者心想，父亲一生为茶农，就写个“茶”字吧。谁知术士见后，双眉一皱，占道：“‘茶’，上为草，下为木，中为人，草木中人，怎能期望免于一死呢？”孝子一听，吓得面如土灰，后果如其言。

又有一个孝子，父亲得了病，他便以瓜子去求占，看看父亲大人的病情能否好转。测字先生断道：“死期近了，合‘瓜’‘子’便是‘孤’，孤者寡也，所以你父亲定会死去，你也一定会独自一人的。”

为母亲疾病求占的测例也不少。前面我们曾举过这样一例，某人母亲患了疾病，儿子心里很着急，就写了个“磨”字

去求占。术士断道：“‘唐’，上为‘康’字头，下为‘居’字脚，你母亲康居无恙，你只管放心。”

另据《顾曲亭纪闻》上载，有一个姓闵的人，其母亲病了，就以自己的姓来向周亮工问吉凶。周亮工占道：“以‘文’临‘门’，非吊即庆。现在病人在床上，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值得庆贺的事，恐怕将有丧吊之凶。再说，‘闵’字乃‘门内有女不成’之象，你母亲只怕就卧床难起了。”

其二、家人为儿子疾病求占

这方面测例很多，它突出表明古人对种的绵延的高度重视。清人周亮工就遇到过这样两个测例。有一次，一人写“午”字来求占儿子的病情，周亮工断道：“‘午’上乃‘人’字，卧而不起；下为‘十’字，十者数之终，据此为断，你儿子只怕活不成了。”

又一次，某人儿子病情很重，他心急如焚，便赶到周亮工那儿用“天”字求占。周亮工琢磨了一下，断道：“‘工’下之‘人’不断，你儿子不会断命的。”后果然无恙。而且碰巧的是求测者正姓“工”。

据《几神验存》上记载，一人书一“七”字为儿子的眼病去求占。测字先生断道：“你儿子一只眼坏了，另一只眼将会痊愈。”这人一听，大惊失色，说：“我儿子果然坏了一只眼，不知先生何以见出？”测字先生说：“‘七’是‘北’字的一半，北者败也、坏也，故知你儿子必损一目。”求测者又问：“那先生又怎么知道我儿子另一只眼会好起来的呢？”测字先生说：“‘七’乃‘皂’字去掉了‘白’，皂（黑）白已分，岂有不好之理？！”后来，一一如其所断。

其三、夫为妻病求占

这方面的测例略少一些。兹举一例。据《清稗类钞》上记载，有一湖北人，姓方，长期幕游在外。一天，他接到一封家书，说他妻子得了重病，让他速速启程，返回家中。他正犹豫不决，正巧此时来了个会测字的朋友，就口占一“粉”字，让友人给断一下。友人断道：“粧妆台留半面，红粉已分离，你快快返回吧，迟了可就见不上妻子的面了。”他听后，立即返回，情况确实如此。

其四，代友人病情求占

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十分讲究人际关系，重视朋友的情谊即是其中的一端。在古代，一人得了病，友人代求占，正是这种情谊的生动体现。

据载有一姓杨的人，曾来了游兴，便邀友人乘船远游。谁知抵达邗关时，杨某的鼻子却流血不止，其友人心急意乱，忙写“己”字请求占断。术士见字摇摇头说：“这可是个不吉利的凶兆啊！以字来断，你朋友的命将难过明日。”友人听后，不以为然，反问道：“鼻子流血也会匆匆毙命吗？”说完就匆匆离去。第二天，这位友人又赶来，向术士说：“你的测断是对的，但我不知道理何在？”术士解释说：“‘己’加‘一夕’就是‘死’，所以我知道他难以活到今天。”

再看《栲公笔记》中周亮工的一个测例：

陆君士冲病垂危，友人书“好”字视栲公（周亮工）。公曰：“但余子女矣，奈何？”卒不救。

此测例，友人书“好”求占，显然是希望他朋友的病能早日康复，尽管结果无情，但他的“友”情倒也莹然可观。

二、官讼

中国人具有一种官崇拜心理，人们一面敬官、慕官，盼子成龙想做官；可另一方面又十分害怕官，常言道：“无事见官，脱落四两肉”，更何况“有事”！所以，古人最怕打官司，倘遇官司，也总想私下了结。实在了不了，那就得去请测字先生测上一字，看看结果如何。

下面我们就来看这样一个测例：

聂善充被王姓见控，求和弗允，书“元”字。断曰：“官讼欲和不允，后反胜矣，逢七遇八结，子当高枕。”十七日讞，原控人醉，触讞者怒，朴逐之。聂大喜归，问字理。曰：“‘元’字加官字头为‘完’，故毕竟见官始完也。字如‘允’字不成，故欲和不允。王姓见‘元’字为‘玩’，彼姓王，故我反胜矣。字乃‘六’头‘九’足，所以知逢七遇八，讼结在六九之间。”聂深服。

此测例十分典型，聂善充被王某控告，本不想打这场官司，他先“求和”，被对方拒绝，这才被迫去打这场官司。他打官司时，心里又吃不准结果将怎样，于是才书一“元”字请术士占断。这就十分突出地袒示出古人害怕打官司的心理，而这也正是官崇拜心态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从前一个人以“毛”字问官司，测士一看，对求测者说：“你可要小心啊，你可能要遭到对手的暗算。”这人问是什么原因。测士说“你所写的‘毛’字，从字貌上看，像个反

‘手’。反手反手，不就是你的对手吗？故以为占。”

又有一人书一“戲”（戏）字问官司，测字先生说：“你这场官司是不是起于打仗纷争？”求测者回答说是。测士又道：“你这次官司开始很有点麻烦，因为‘戲’左上为‘慮’字头。但是这不打紧，不久就完事了，因为这字叫‘戏’，作戏罢了，你不要当真。”据说这后来都应验了。

三、生意

我国自来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因而相对来说行商做生意的测例要少一些。在古代，交通运输多有不便，生意人也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为了保险起见，人们便去测字先生那儿测上一字，占断一下运气如何。

据载江南有一富人带一随从去北方京都做买卖，后来又在苏州找了另一随从。这番生意，事关重大，富商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写一“火”字去求占。测字先生占道：“此番生意大吉大利。你有两个随从，随从又叫伙计，伙与火音谐，两火相加，乃一‘炎’字。北方五行属水，所以你此行有‘既济’之相。”这位富商问道：“北方属水，以水合炎炎之火，正是不相容之势。这且不说，再看‘水’旁加‘炎’字，岂非生意淡而无收？”测字先生答道：“不是这样。二炎相加，火势已重，若去南方，南方属火，以火相煽，则势太过；若去北方，北方乃水旺之乡，以水来制止炎炎火势，阴阳相结，方可大吉大利。”

合伙联营要占测，散伙单干也离不开测字。据载：曾有一人与其亲戚共开一片商店，赚了不少钱，他想另起炉灶，“独家经营”，可又拿不准前景如何，便去请术士给他占一下。

他信手拈一“公”字，不禁吃了一惊，这莫非还要我一起“公”干？术士见了“公”字，略略想了一下，占道：“你分开干可能会吃官司。”此人一听，顿时紧张起来，因为他以前确实瞒着对方藏了不少黑钱，莫不是已被对方察觉。术士打量了他一眼，解释说：“‘公’加‘言’就是‘讼’，只要对方告你一下，你就得吃官司。再说，‘公’字下面是个‘厶’，‘厶’乃元武之形，表明有小人暗中挑拨，闹得你们矛盾加深。以此为断，你还是不分为好啊！”此人一听，再也不敢单干了。

四、行人

古代交通、通讯很不发达，行人在外音讯杳然，重山阻隔，“在水一方”，彼此“联络”极为不便。这样一来，迷信的中国人又不能不求助于测字的“千里眼”了。

这方面的测例很多，因而术士积累的经验也还不少。《新订指明心法》中有“行人远信”一则，其文如下：

如“行”字写得脚短一般齐者，人便至；字脚或不齐，行人皆不至；字画直落点多者，其人必陷身；字画少者，人便至。同书另有“行人”一则，内容是：

“人”字潦倒，未动；写得“人”字起者，已动；人以“来”字问者，未至；“行”字问者，且待。凡字中有“言”字者，有信至，人未至也。

这些经验有时还十分管用，只要再辅以观言察色、“临场发挥”的功夫就可以了。请看下面一例：

方楼冈先生问一来人，以两指在膝间虚书“行”字。先生曰：“来人必兄弟行，非二即三。”时太翁先生同在座，骇问曰：“何以知之？”先生曰：“两指在膝间写字，乃膝前手足之象也。写字未曾及第四指，所以断在二三也。”公曰：“奇！果系问三舍弟归期。”先生曰：“‘行’字乃‘吾’已出‘衙’之象，今当在途间。”未几如断。

此测例见于《几神验存》。在这里，术士的占断确实很巧，也显得很神，但骨子里仍是套用了上面所引的“‘行’字问者，且待”这条经验，明眼人一览便知。

从求测内容上说，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弟弟在外，哥哥求测；二是儿子在外，父亲求测；三是丈夫在外，妻子求测。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人伦关系，其情其谊粲然可观。下面我们再举一个儿子在外，父亲求测的例子：

里父之子商于楚，数稔不归。马（守愚）适在东藏寺。里父拽杖之寺，访马求卜，适覩面，以杖倚米箱揖之。马问云何，具以对。马曰：“汝子已抵家，汝可速去。‘米’贯‘一木’，非‘来’而何？”里父归，其子前候门矣。

此测例，父为子测归期，本是人情之常。但有意思的是马守愚据“来”字便断出其子已经归来，这又分明给上面的经验找来麻烦，因为“行人”一条中明明白白地写着“人以

‘来’字问者，未至”，可见，术士的所谓经验大多是“经”不起“验”证的。

古人迷信测字，不仅用它来测行人，而且也常用它来测归人，不论当官的也好，为民的也罢，都莫不如此。清人周亮工就遇到过这样一例：

令君眷属返里，行数日矣，书“欵（钦）”字视
标公（周亮工），俾决途中。公曰：“无恙，殆不成
行。‘欵’为‘欠金’，欠金者必还。”语未终，苍头
报前途寇阻，眷属返矣。

在这个例子中，县官大人的眷属已走了多日，他仍放心不下，不让人去送行，偏要“求救”于测字，足见测字魅力之大。

五、寻人

人丢了可不是一桩小事，于是人们又去测字先生那儿求占，看看是否还能“物归原主”、“完璧归赵”。

据载，有一个姓冯的人，其收养的儿子突然失踪，于是他就在一个仆人的手上写了一个“走”字，让他和另一仆人同去求测。测士占道：“你们两人加一‘走’字，就成了‘徒’，徒者徒然也，以此为断，寻找丢失的人是徒劳无益的。再说，此人跑了，也犯不着去找，他不久就会死去的，因为‘走’字拆开就是‘土下人’。”后来没过几天，据说那人果然死在大堤之下。

有一王友家的妻子，大清早出去购买物品，但却一去不复返了。王友十分着急，便赶到测字先生那儿去求测。他随

手指着账簿上“叁拾”二字求占，测字先生断道：“此人逃走了，当速速去追才是。”王友又信手打开账本，指着“陆拾”二字乞占妻子出逃的方向。测字先生占道：“此人必逃往太平。”王友立即派人去追寻，果然在太平找到了妻子。王友十分感激这位先生，特跑来向他致谢，并询问他何以断得如此准确。测字先生说：“‘叁拾’为‘大三十’，‘大三十’合在一起，就是‘奔’，所以我知道此人一定是出逃了。再说，‘陆拾’为‘大六十’，‘大六十’三字合在一起，就成了‘太平’二字，故我又知此人必逃往太平镇。”

吴崧《几神验存》中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一武林中人，名叫刘友，他曾写一“代”字让术士占一下某人的下落。测字先生看了下字，蛮有把握地占道：“你此番求测的一定是你的好友；此人德行很高，但遇到骨肉之变，于是躲藏起来了。”刘友听后，十分惊奇，他感叹说：“先生真是神了！情况确实如此。我有一个好友，其兄弟关系紧张，甚至你争我夺打起官司，官司一打，没完没了，我今天求测的就是这位好友，他在家是老二，长年持斋奉佛，宽爱待人，他见兄弟间明争暗夺，互不相让，就竭力从中劝阻，但屡劝无效，就突然不见了。我今天来求占，就是想知道他的下落，望先生明示。”测字先生听后，笑了笑说：“此人没有走远，仍在杭州一带。”刘友一听，赶紧问道：“那么，他们兄弟何时才能相见？”测字先生说：“等到明年九月就可以了。”刘友见他推断得如此准确，便问他道理何在。测字先生解释说：“道理就在‘代’字中。你看，‘代’这个字字势相连甚紧，休戚相关，据此来断，此人必是你的好友。‘代’左为‘信’字旁，右为‘義（义）’字下，信义兼具，自然是个德行很高的人了。再说，‘代’字

左为‘傷（伤）’字旁，右为‘殘（残）’字边，有伤有残，自然会有骨肉之变。‘代’左为‘伏’字旁，右为‘藏’字下，既有伏藏之象，岂能不躲藏起来呢？”停了会，术士又说：“杭州附近不外两个去处，要么是仁和，要么是钱塘。‘代’字左为‘仁’字旁，右为‘錢（钱）’字边，字在‘仁’‘钱’之间，此人一定没有走远，他迄今仍在杭州。至于何时相见，道理也还在字中。‘代’左为立人旁，‘人’可谐音‘壬’；右为戈字边，‘戈’看起来像‘戌’，明年九月正好是壬戌，故我推断相见必在此时。”后来，这些测断一一俱验。

由这几个测例来看，古人对测字是非常迷信的，所以，不论是人丢了，还是人溜了，抑或是人有意躲藏起来了，总会有那些虔诚的“信徒”去术士那儿求占的。

六、寻物

看过《红楼梦》的人，大概都记得其中的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贾宝玉竟把宝玉给丢了，使贾府上下慌成一堆，乱作一团。为了找到它，贾府管家林之孝便去街上找摆摊测字的刘铁嘴求占，结果拈得一个“赏”字。刘铁嘴占道：“丢了东西不是？‘赏’字上面是个‘小’字，下面是个‘口’字，可见此物嘴里放得，想必是珠子宝石。‘赏’字下面是个‘贝’，‘贝’字拆开不成‘见’，可不是不见了！因为上面有个‘當（当）’字，那就快去当铺里找。‘赏’字加个‘人’字，又成了一个‘償（偿）’字，只要找到当铺就有人，有了人便赎了来，可不是偿还了吗？”

这位自称刘铁嘴的测字先生这回可是说漏了嘴，因为宝玉丢

失原是和尚在捣鬼。但由此也可见，求占失物的人在古代还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早在宋代，求测失物的测例就已然出现，请看下面一个例子：

士人樊将妻失珍珠冠，书“失”字命夫诣肆。（谢）石曰：“盛门姻戚，岂有朱氏乎？”樊曰：“吾妻朱氏也。”“有第二十八者乎？”曰：“妻兄也。”曰：“然则从此取之。”樊曰：“此人素持行检，家丰富，岂肯为此盗事？”曰：“不然。必因与之交关，误持去，其物固在，可得也。”樊因语妻，妻询之侍婢。云：“数日前，二十八舅曾借物否？”婢云：“昨欲出门，曾言借帽子，既而不用就还，原未尝开匣也。”漫启视之，冠在帽下。盖妻因晒帽，误置其中，久而忘之矣。

我们再看《清稗类钞》中的一个测例，一次，某店堂伙计的纱帐被人偷走，直到傍晚时才发觉，他心里很急，就赶到城隍庙去找大名鼎鼎的测字先生大不同，请他给占一下纱帐的下落。当时大不同已收摊“停业”了，见他如此着急，就让他信手写一字来测，伙计信手写了个“の”字。大不同看了看字，说：“没关系，只管放心，你丢的那顶纱帐已被人挂在别处。你看，‘四’字多像悬挂的样子啊！你快快去找，也许还可找到。”伙计听后，摇摇头说：“不，不，你测的是楷书‘四’字，而我写的是草书体‘の’字，先生恐怕断得不对吧？”大不同见他不信，无可奈何地说：“既然如此，你丢

失的蚊帐可就难找了。你只好去买盘蚊烟去防蚊子了。”大不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草书体“の”看起来像是一圈点燃的蚊烟。

这个测例很有意思，古人连丢了蚊帐也要求测，足见测字在古代无所不能，也无所不包。

第七章 测字的广义形式

测字不仅有求测者写字或拈字请测士占断这种专门的方术活动，还有其他一些形式，如字梦、字谶等，这些形式和专门的测字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引发或推动了测字术的发展，又是一种广义的测字形式，丰富了中国古代测字术的内容。本章主要选择字梦、字谶两种形式来加以描述。

第一节 字 梦

人没有不做梦的，梦缥缈缈缈、虚虚幻幻，似真非真，似幻非幻，来无影，去无踪，梦似乎和人的现实生活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因此，从很早开始，人类就对梦产生极大的兴趣。在一切现实出于神的早期社会中，梦被看作联系人和神的中介，它通过神秘的途径向人传达了神的意旨，人们从中获得命运的启示和生存的基础。梦成了维持人类心灵平衡的重要方式。清陈士元《梦占逸旨》卷一云：

人之昼兴也，魂丽于目；夜寐也，魄宿于肝。魂
丽于目，故能见焉；魄宿于肝，故能梦焉。梦者，神

之游如来之镜也。故曰神遇为梦，形接为事。

梦成了神的栖息之所。因此人们不得不对梦另眼相视了。

《后汉书·艺文志》云：“众占非一，惟梦为大。”占梦成了众占之首。占梦术的这种独特地位，即与人们对梦的迷信有关。由于视梦为传达神意之媒介，因此从梦中掘取神意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梦可解又不可解的特点，增加了说解的难度，又提高了人们说解的兴趣。古往今来，人们说梦、圆梦、解梦，在这基础上又形成了占梦术。占梦术的流传渊源有自。我国在周代开始，就有了占梦术。《周礼·春官》上说：“大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致梦是说解梦的由来，觭梦是说在梦中得到什么东西，咸陟是说从一个梦中得到普遍的启示。周时就设立了占梦之官，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相当高的位置，君主和公卿遇有梦事均要请占梦官说解。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的理性色彩的日趋浓厚，宗教生活失去了它原有的光辉，但占梦术丝毫没有因此而淡薄起来。人们依然十分看重这如影如雾，如电如幻的做梦行为，梦预示性理命运的功能也没因此减弱，正史中大量地记载，社会重大事务与梦幻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民间中也将梦幻视为最神秘的一隅，均想从梦中掘取现实生存的力量。

梦本来和汉字毫无关系，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梦很神秘，汉字同样很神秘，正像我们在前文所说，汉字也被中国人神圣化，也以为其中涵有极为神秘的意旨、包括着命运的隐微，因而梦和汉字的联系，在中国方术活动中似乎又是十分自然的事。以梦而及字、因字而追梦，字、梦相融，使本

来就迷离恍惚的占梦术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我们把融合着汉字的梦称为字梦。

字梦在本质上和测字是一脉贯通的，测字是占卜人的命运，字梦也是为了占出人的命运。同时，测字的主要方法是分拆字形和利用谐音等。为了占命，这同样是字梦的根本方法。从说解的过程看，拆字是人直接书写字或由物转化为具体的字，最终都落实到对汉字符号的说解上。字梦不论方式多么迂曲、涉及物象多么复杂，它最终也落实在具体的汉字上。

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测字是预测未来命运，字梦不仅可以预知未来命运，又可以解释已知事，从后一个角度看，字梦实际上是一种梦谶。

字梦可以预测命运，是这一迷信活动的最重要的功能。如十六国时，有个人名叫索统，精通各种方术，尤擅为人占梦。王公贵人、黎民百姓都曾请他占过梦，《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七载有一例，说是有一个叫张宅的宦官，阿谀奉承、陷害忠良，人们都很痛恨他。一夜他梦见自己骑马上山，后回到自己的寓居，转悠了三圈，突然自己的寓所没有了门，但见屋前松柏林立。张宅认为这梦也许还不坏，或许其中预示着什么好运，急去寻索统为之圆梦。索统听过陈述，故意卖关子，害得张宅急得一头汗。索统心想，都曾说这宦官骄纵跋扈，今天杀杀他的威风。索统说：“你的这个梦是个不好的梦啊！你骑马，马在八卦中属离，离的卦象是火，而你的名字又叫‘宅’，火之遇宅，会出现什么情况，你心里是知道。你骑马上山，并不是什飞黄腾达。从字形上看，‘山’上‘人’，正像一个‘凶’字，岂不是说官人要受大凶之祸。你绕宅三

圈，是说你三年后方遇大凶。”张宅虽说不相信，心里早七上八下了。后来，果然在三年之后他大凶而卒。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和测字没有什么区别。

字梦是一种梦谶，才是它和测字的根本区别。有不少字梦，梦后开始不在意，事出后，忽然想见前梦，以为那梦中早现兆象，只是自己茫然不觉罢了。清褚人获《坚瓠余集》卷一载有一例即属于此类：

嘉禾张巽，素无文名。嘉靖戊午春，梦神语曰：“成不成，平不平，绿水湾头问老僧。”及邑试，竟置劣等。自郡城徒步归，过萧寺少憩焉。有老僧捧茶进曰：“解元请茶。”巽忽忆前梦，问曰：“此地何名？”僧曰：“是绿水湾。”巽喜且疑，已果发解，所云“成不成、平不平”，盖是“戊午”二字云。

这就是个梦兆，张巽开始对所梦不知其意，也不在意，至事出后，方恍然大悟。故此梦乃梦兆。“成不成，平不平”，两句诗就暗喻的是两个汉字：戊、午，因为“成不成”是说似“成”又非“成”，故得“戊”字；“平不平”，也是说似“平”而不是“平”，故得“午”字。当然，这也只是近似。

字梦尽管和测字存在着差别，但它在本质上是共通的。我们可以把字梦看成一种广义的测字形式。

从测字和字梦的历史发展来看，测字真正作为一种占卜活动肇始于宋，而字梦在两汉时即已初露端倪。字梦是测字的“前形式”，字梦对测字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引发作用。

最早的一则关于字梦的记载是有关黄帝的。《史记·五帝

本纪》《集解》引《帝王世纪》云：

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帝寤，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者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得力牧于大泽，进以为将。

这个梦中的风吹垢为“后”，即是字梦。当然这个梦的可信性只有天知道，黄帝的梦后人怎能得之？黄帝时是否有汉字？当然制造谶纬的人也一点不管这些，后代许多相信迷信之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黄帝的事是假的，但是汉时流行以字说梦现象却是信实有证的。传汉高祖刘邦初为亭长时，夜梦自己追赶羊群，追上后，突然抓住一头羊，拔去它的角和尾巴。醒后甚感蹊跷，找人为之圆梦。圆梦者云：“官人吉人天相，将有大吉大利。由字言之，‘羊’去头上二角和尾，正是一个‘王’字。”史书上载，汉光武帝刘秀也做过类似的梦。这种梦的制造，无非为了证明君王统治的合法，神授天机，梦中显相，当君王乃是合神的意旨。

《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公孙述早怀异心，欲代汉而立。他在蜀州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包括舆论上的准备。传他曾做过一个梦，梦中有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梦后觉得此梦非平凡之梦，“八厶”，岂不是个“公”字，“子系”正是一个“孙”字，莫不正是说我公孙述的，这“十二

为期”，可能是说做十二年天子。他为此深感遗憾，便将此心情告诉了夫人，他的夫人说：“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况还有十二年？”这梦坚定了他要称帝的信心。后来他果然于称帝十二年后被灭。

《后汉书·蔡茂传》记载，蔡茂为后汉时的一个大官，他在广汉（今四川广汉境）为官时，一夜曾做一个怪梦，梦见自己坐在一个大殿上，四周空空落落，没有一人，忽然见大殿的梁栋上有三棵谷穗，他很是奇怪，官殿何以生稻禾，于是攀而采之，得其一，刚上手又失落了。其友郭贺善占梦，知其梦而占之曰：“此为大吉之梦，从文字上看，‘禾’加‘失’为‘秩’，‘秩’就是官禄，你抓禾而复失，不是丢失官位和俸禄，恰恰是得到这些。”后来蔡茂果然到朝廷做官，为感谢郭贺，蔡茂还特地将他官加一等。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四“测字”条，在探讨测字的起源时，引述上二例，认为：“此后世测字之权舆，然未有专以此为术者。”这一判断基本上是真实的，字梦虽不是纯粹的测字，还不是一种专门为人占卜凶吉的方术活动，但是它已具备了测字的基本特点，以字圆梦的文化活动直接引发了后代测字的产生。

测字的真正产生在宋代，但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东汉时出现的字梦术是引发其产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东汉以降，字梦术绵延不绝，它将以汉字为媒介的方术活动推向了高潮。魏晋以还，字梦术愈加流行，圆梦中左牵右连，常不忘离合字形和寻找谐音联系，因而常常将一个很平常的梦变成了解析文字的游戏，使汉字和人的命运紧密的联系了起来。

据《三国志·蜀志·魏延传》记载，魏延是蜀军的主要将领之一，诸葛亮出兵北谷口，遣魏延为中军主帅。魏延率军征战途中，一夜曾梦见自己的头上长了角。醒后，为这梦弄得心绪不宁，是说自己头上长了反骨，欲反叛蜀主呢？还是其他吉运。他弄不准，便命手下人将赵直请来，赵直为蜀地著名占梦家。来后，问清梦的内容，便心内大惊，想这大元帅日后定有杀身之祸，又不好直说，便用几句话搪塞完事。魏延走后，他便对别人说：“魏延这个梦实在是个坏梦，以字来看，头上长角的‘角’乃是‘刀’下着‘用’，正是说他有刀下之祸。”后魏延果然被马岱砍了头。

《蜀志》还记载了一个字梦例，离合字形，将汉字大卸八块。这种拆字方法和后代测字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说是有一个叫何祗的人，字君肃，一夜作梦，梦见井上长一棵大桑树，他觉得这个梦很有意思，就去找赵直为之圆梦。赵直一听，连皱眉头，说：“桑本长在井外，梦中却长在井内，实在不是好兆头。‘桑’与‘丧’音相同，岂不是说有灭身之祸。且从字形上看，‘桑’又写作‘𣎵’，上面是三个‘十’，下面一个‘木’字，可拆为‘十’、‘八’二字，加在一起，乃是四十有八。这恐怕说您四十八岁时有生命之险。”后何祗果然活到四十八岁。这个例子，既利用谐声法，又使用字形分拆法，它标志着后代测字术的方法在这里已经基本具备了。

两晋南北朝时期，字梦越来越接近于测字术，占梦者援字以说梦成了一种习见的现象，典籍上对此多有记载。

如《西京杂记》上就载有不少例子，该书旧题为汉刘歆作，今考为晋葛洪撰。其上载有一克夫女，每嫁一次，她的丈夫都在新婚之夜死去，害得后来没人再敢娶她。一个叫曾

崇范的人要娶她，消息传开后，他的亲朋好友均来劝阻，曾崇范说因为一个梦，打消了他的顾虑，他说：“一次在无意中听到那位女子说她曾一梦，梦中有人对她说：‘田头有鹿角，田尾有日照，即是你的丈夫。’我听后一想，‘田’上有二角，下有一日，岂不是个‘曾’字。故我敢冒斗胆而娶她。”众人将信将疑，而曾崇范娶了这个所谓克夫女，不但新婚之夜没有死，而且生活过得很美满。

晋时的字梦更趋繁杂，在牵强附会上也更放胆，占梦者已到了只要想联系汉字便无所不能的境地，完全是后代测字先生那一套骗人的法儿。据《晋书·郭瑀传》记载，郭瑀曾和索嘏一道去救王穆，王穆得救后，却听信谗言将索嘏杀掉。郭瑀痛不欲生，忧思郁结，夜生一梦，梦中他骑着飞龙，腾地而起，至屋顶而停下了。醒后自思量，难道此梦是预示我飞黄腾达的吗？在如此昏庸之上司手下有何前途可言。后来突然醒悟到，此梦是不祥之兆，因为龙本应飞上天，此梦至于屋则停下，显系凶兆。另外，以字言之，“屋”是上“尸”下“至”，人至于“尸”，不死奈何？后自杀身亡。郭瑀由梦中的涉及的一个字，引出此种结论，真是迂回万端，匪夷所思。

传说，当时有个叫索统的人最善占梦，又最善在汉字中迂回求解，俨然后代之谢石、张九万。《晋书》记载：“索充梦见一虏脱上衣来诣，充以问索统。统曰：‘虏去上衣，下半男字。夷狄阴类，君妇当生男。’终如其言。”索统由俘虏脱衣，进而判断索充妻子将有弄璋之喜。其根据是：此俘虏乃夷狄之人，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我方为阳，敌方为阴。因而夷狄属阴，女性也属阴性，故联系到索充之妻。“虏”，繁体

作“虜”，俘虏脱衣，即脱去上部之“虜”，剩下的即是一个“男”字。所以说索充妻要生男孩。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字梦有时比正规的测字术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测字所测之字一般是对方所指定的一个或几个字，而字梦中涉及的字可以是做梦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字，只要有利于牵扯，就尽皆斟酌。

不过，索统在占梦有时不是任意选字，而是针对某个指定的字。《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上记载，有一个叫宋桶的人，夜为一梦，梦见一大字“内”，而这个字中却有个小人在穿衣服，自己却用两根木杖在上面打来打去。宋桶认为此梦不平常，请索统为之一占，索统说：“先生将有大口福，‘内’字中有小人，即‘内’加‘人’，正是个‘肉’字。两根木杖，乃木筷也。以木筷夹肉，即是此梦所示。”后果如其梦。《潜居录》上载，有一叫黄平的人，一夜做梦自己在写字，写的是一个“髮”（发）字，刚写上半部，后来就不写。他感到很纳闷，请索统为之一占，索统说：“您将有亡友之痛，‘髮’写一半，即少一‘友’字。”后来，他的一个密友果然去世了。这种就字释梦占凶吉的方法，与后代的测字几无二致了。

完全可以这样说，测字虽正式产生于宋代，但是在宋以前已经有了广泛的市场，字梦的流行对测字术的真正产生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而且在各方面为测字术的出现作了准备。测字术正式产生以后，字梦并未泯然其中而销声匿迹，而是在自己独有的途径上发展着。

以字圆梦的方法很多，一般是从梦中撷取一个或几个字，再将这些字从形体上剖析，或从谐音上联钩，从而获取占梦者所要说明的内容。其主要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是梦物联字。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不像测字，一般是

求测者直接选取字，而梦中所呈现的大都是物象场景的组合和活动，占梦者如果需要联系汉字来说解，就由物及字，以字说梦。从梦中涉及的一组物像中选取一物，由此物像符号联系到文字符号。《隋书》上记载：

北魏拓跋顺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初，庄帝在藩，顺梦黑云从西北直触东南，日月俱破，复翳诸星，天地尽暗，俄而云消日出，西南隅甚明。云长乐五日，又见庄帝从阊阖门入，登太极殿，唱万岁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谒帝，惟顺在集书省步廊西槐下脱衣冠卧。既寤，告元晖业曰：“夜梦不佳。”因解曰：“黑云，气之恶者，是北方之色，终于百敌乱京师。害二宫，残毁百寮。日，君象也；月，后象也；众星，百官象也。京邑其当祸乎。彭城王勰有文德于天下，今梦其儿为天子，积德为报，此必然矣。但恨之不久。日出西南，以时易年，不过三载，但恨我不见之。我卧槐下，‘槐’字‘木’旁‘鬼’，身与鬼并，复解冠冕，宁不死乎？然亡后乃得三公赐耳。”后果如其言。

这篇复杂的解梦之例，将汉字串入其他方法之中，弥补了圆梦中的局促。梦者倚槐而卧，说梦者将由这一槐树意象直接联系“槐”这个字，再对字形加以解析，得出“木”旁“鬼”之结论。梦中往往意象很多，占梦者选取什么，完全根据你的需要，泛应曲当，随遇皆适。完全不在乎什么是重要意象和次要意象，有时占梦者偏不选重要意象，而选取次要

意象，使求占者感到神秘无方、奥妙无穷。

《酉阳杂俎》上曾载有一梦例，江淮之地，有一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生，善占梦。一日当地一个叫张瞻的富贾求王生为之圆梦。他说这次在外地做生意时，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在石臼里做饭吃。王生听后，占道：“您在石臼里做饭，表明您没有釜（即锅），‘无釜’可谐音为‘无妇’，或许您妻子已经不在。”他急忙赶回家，妻子已经嫁给了别人，他果然“无妇”了。从这则字梦来看，占梦者没有直接从石臼这一主要意象上引发，而是曲曲折折联系到“无妇”这件事。从此占例，也可看出字梦术的欺骗性，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联系，“无釜”何以不能牵扯到“无父”？何以不能牵扯到商贾之人日后必贫穷？因为“釜”下似“金”，“无金”岂不要守贫穷。另外，从石臼这一主要意象也可以联系，只要你需要，几乎没有占不出的。

字梦中由物及字的运用，更多的是通过一组物象之间的关系运动来显示汉字符号。如《晋书》上记载，张邈曾经奉命外出，临行前曾做一梦，梦见一条大狼咬了自己的脚。张邈疑为不祥，请索统为之一占。索统说：“狼咬脚，即吃肉，‘脚’去‘肉’（月），即是个‘却’字。看来这梦不好。”却可通“劫”，后张邈因而不敢出去。另据《玉海》记载：“宋主有疾，夜梦河水干，忧形于色，以为人君龙象，今河无水，是龙不获水居矣。时有占梦者曰：‘河无水，乃可字，主君之疾当痊可。’帝欣然，疾果愈。”

上二例相似于本书前文所说的测字之减法。下面数例则类似于前文所说的增法。据《宋纪》云：“杨文广被蛮困于柳州百日，夜梦奔二山。术者云：二山，出字也，明日果脱。”

《晋书》云：“郡主簿张宅梦走马上山，还绕舍三周，但见松柏，不知门处。索统占曰：‘马属离，离为火。火，祸也。人上山为凶字。但见松柏，墓门象也。不知门处，无门也。三周，三期也。后三年必有大祸。’果以谋反伏诛。”索统的占解真可谓妙牵众门，望而不竭，其中人上山为凶，即为字占。其他如由马联系到火，因《周易》中马可象离，而离卦之卦象主火，而水、火在古代中国乃灾祸的象征，同时索统由“火”及“祸”也利用了谐音关系。三期即三年，古以一期(jì)为一年。《晋书》又载，王敦叛逆，夜梦一木刺破青天。占梦者为之占云，以字论之，“木”刺破“天”，可得一“未”字，由此劝王敦不能轻举妄动。

有许多字梦不是两物的组合，而是数物相合而成一字。据《稽神录》记载：“江南李令，年老无复宦情，筑室广陵法云寺之西，为终焉之计。尝梦束草加首，口衔一刀，两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异之。俄而孙儒陷广陵，儒部将李琼屯兵法云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马殷据湖南，琼为观察使，用令为荔浦令。果应草头三刀入水之梦。”草头加三刀（应为力，此取近似）为“荔”，浦乃水地。故释。据传从前有个人，老大不小的，也未婚娶，孤身一人，怪寂寞的，一夜他做梦，梦见一条河里有四条鱼，便一一捉住。梦而觉，怡然而喜，常言道，鱼有女之象，该不是有什么艳遇吧。他怀着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请术士为之一占。术士一听，便说：“恐为不祥之兆，一条河有四条鱼，若以字来看，‘水’‘四’‘鱼’相合，正是一个‘鰥’字，恐怕你要孤独一生。”后果应验。

二是直接梦字。这种方式就更接近于测字术了，取梦中

一字让占梦者解析，与任写一字给测字先生说解没有任何区别。二者都出于一定的随意性，梦中示字，乃神授。随意写字、拈字，在随意之中即蕴涵着命运的隐微。

梦中示字，都是在飘飘忽忽中，或由神直接授予，或突然见到文字，不知从何而来，因此具有神秘性。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梦得一字，由此字而占解；二是梦得数字，通过数字之间的关系再组合成一二字，由此占解。

梦得一字，便直接以此字为核心，或形联，或音系，从而摄入圆梦者所要说明的内容。如从前有一人，年过不惑，仍未婚娶，便抱着被子去九鲤湖神庙祈梦，以期神授天机，急急行动。在庙下酣然入睡，果有一梦，梦见一白衣神使翩然而至，在手上书“婦”（妇）字以示之，便飘然空踪。得了此字，这个独身者大喜，说是“婦”，一定有妇人相伴，但她又在何方呢？急寻圆梦者以问，圆梦者说，“这个梦是说你有意中人在远方，在何处呢？在横山。何以言之，‘婦’右上侧乃是一横写的‘山’字，你的未来的夫人就在横山，快去横山寻娶吧。”这人果然在横山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据《耳谈》记载，兴化有个叫朱士容的人，为地方要官，妻子正有身孕，他想知道妻子将生男还是生女，孩子未来命运又如何。思之深切，梦中也有所显示。一夜他做梦，梦有神人从云雾中下来，便急急上前去将他上面所关心的问题告诉神人，以求开示。神人不言不语，但在手上有一块科举榜，将其举起让他细看，朱士容朦胧中看到是一个“魁”字，于是便请神人解答为何意，神人微微一笑，销声匿迹了。大梦方觉，朱士容大喜过望，看来自己会得一子，而且儿子会科举有名，说不定还会是个头名状元呢！后来，其妻果生一男，

朱士容见一愿已遂，心花怒放，精心调养，尽等以后将门出虎子了。儿子长大了，到二十岁那年，突然得了病，不久就死了。朱士容百思不得其解，便以早年之梦告占梦者，占梦者说：“神人所示之‘魁’字，并非科举得魁。‘魁’若拆开，可成‘二’、‘十’、‘鬼’三字，分明说你的儿子二十岁时为大限。”朱士容至此才明白。

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梦得一字，而是梦得数字。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人钱文敏在任少司寇时，遇母丧之不幸，星夜返回，回途中一夜在客棧歇息，做了一个梦，梦中迷离恍惚中，忽见一高高耸立的石碑，上面分明写着三个大字“哀哀哀”。醒后，总觉得很恐惧，是说自己为母亲的去世而悲哀呢，还是预示自己不幸的未来命运。回到家后，和自己的弟弟钱竹初谈到此事，弟弟说：“这梦是关于你未来前途的。”钱文敏听此话便吓得魂不附体。弟弟说：“不要紧，这非但不是恶运，却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梦。‘哀’字中间是一个‘口’，上下相合则为‘衣’字。三个‘哀’即有三个‘口’，合而为‘品’，这梦中之字是说你将来穿一品衣，将得上上富贵。”这话过几年即应验了，钱文敏死后，皇上下旨，赐以尚书衔，并给他立了碑。

《清稗类钞》另载，清时有个人名叫邓林梓，顺治年间，赴京赶考，临行前夜，抱上被子去当地的韦应物庙祈梦，韦应物是唐著名大诗人，来此祈梦是想这位韦公梦中指点迷津，好使他交上好运。那夜果然大梦降临，韦应物梦中出现，不言不语，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大字：“中式力田”。梦醒后，他感到很纳闷，觉得此梦也许不是好梦，他似懂非懂，但觉得“力田”二字，可能是说自己只是个种田的命。赶

考发榜后，果然未中，而和他同去赶考的陈溯潢却考中了。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因陈溯潢父名陈式，“力田”者，乃“男”字，全句的意思是“中式男”。

三是梦见诗谣。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诗渗透在各个方面，万术活动中也少不了它的身影。字梦中也有很多与诗有关。据《唐人传奇·谢小娥传》记载：

段居贞妻谢，字小娥。居贞与谢父同贾江湖，并为盗所杀。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梦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遍问内外姻，莫能晓。陇西李公佐隐占得其意。“车中猴者，申也。门东草者，兰也。禾中走者，穿田过，亦申也。一日夫者，春也。是杀汝父者，申兰；杀汝夫者，申春也。小娥以占求之，诸申乃名盗亡命者。小娥诡服为男子，与傭保杂物色，岁余得兰于江州，得春于独树浦。兰与春从兄弟也。小娥托傭兰家，致勤，兰渐倚信，小娥见所盗段谢服用故在，益知所梦不疑。伺兰、春醉，拔剑斩兰，急呼乡人擒春。

这里的“车中猴，门东草”、“禾中走，一日夫”，即为诗句。清褚人获《坚瓠余集》卷一“戊午解元”条云：“嘉禾张巽，素无文名，嘉靖戊午春，梦神语曰：‘成不成，平不平，绿水湾头问老僧。’及邑试，竟置劣等。自郡城徒步归，过萧寺少憩焉。有老僧捧茶进曰：‘解元请茶。’巽忽忆前梦，问曰：‘此地何名？’僧曰：‘是绿水湾。’巽喜且疑。已果发解。

所云‘成不成，平不平’，盖是‘戊午’二字云。”这也是有关诗谣的字梦。

四是音联圆梦。这种方法在字梦中运用也比较普遍。汉字同音字、近音字极多，因此圆梦者就如测土一样，常常利用这一方便去说解。唐张亢《独异记》载有一事，传说隋文帝杨坚未作君主前，一夜乘船而行，于舟中做有一梦，梦见自己左手被砍，醒后甚感不安，以为恶运将至，上岸至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鹤发童颜，举止言谈中显示出具有高深的道行，因将此怪梦告知，请为之占解。老僧起身叩拜，并说：“此乃上二大吉，无左手者，即为独拳，独拳与独权音通，知先生当为天子。”杨坚登基后，为谢老僧，特在草庵处起吉祥寺。

《青箱杂记》中载有二字梦，均与谐音有关，有一人名李文定，胡须飘拂潇洒，人称美髯公。他参加御试前夜，突然梦见自己的胡须被全部剃去了。为此他闷闷不乐，一占梦者为之占曰：“您将会富贵亨达，乃为新科状元。您梦中剃须，亦即剃髭，可谐音为‘替滋’，现在的状元名叫刘滋，您这个佳梦正是预示您会高中榜首，代替刘滋。”后果应验。另一个故事说，有一人名叫马亮，乃江宁知府，任期届满，正待离任，夜做一梦，梦见自己舌头上生毛。醒后他被这怪梦弄得心烦意乱。后来他将此梦告诉一位过路的僧人。那僧人说：“这梦不是什么坏梦。舌上生毛，是剃不得的，‘剃不得’，可谐音为‘替不得’，是说您还要留任知府。”后果如其言。

从以上数例来看，谐音的联系大多是荒诞不经的，由此也可看出字梦占解的虚伪特性，占梦者可以说是“主观先行”，先通过观颜察色，预测对方所要关心的事，然后再下结

论。谐音和其他方法一样，只是随使用来证明其结的工具，只不过谐音的方法比其他方法更荒诞、更缺乏可信性。

五是形近占法。如同测字术一样，占梦者要利用梦中所见，重组新字，以求占解，有时并不求准确，只求相似，如上文所举的“人上山为凶”、“木刺天为未”就是如此。《三国志·蜀志·蒋琬传》记载，蒋琬为刘备手下的重要将领，一夜曾作过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牛头正在流血，血流如注，染红了一大片地。他觉得此梦实属奇怪，恐非佳兆，并找到赵直；请为他占解，赵直是当时有名的术士。赵直说：“先生此梦并非恶兆，而是吉相，梦见流血，则红白分明，说明您办事公允分明，牛头上有角，正像一个‘公’字，是暗示您位在公卿，不久您将蒙拔擢，恭喜恭喜啊。”蒋琬听后，将信将疑，后来诸葛亮死后，为尚书令；正是所谓“三公之位”了。这里以牛头推演出“公”字就采取的近似占法。

六是混合占法。在字梦中混合其他占法，如观相、阴阳五行、周易等，以字说解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或者只是一种辅助证明的工具。这种情况在占梦中也比较普遍。《晋书》卷一百十四记载，苻坚的弟弟苻融也善占梦，其中载有一事：

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返，过宿妻家。是夜妻为贼所杀，妻兄疑丰杀之，送丰有司。丰不堪楚掠，诬引杀妻。融察而疑之，问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以不？”丰曰：“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返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于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窃以为不祥。还之夜，复梦如初。问之

筮者，筮者云：‘忧狱讼，远三枕，避三沐。’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寝。”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为水，马为离，梦乘马南渡，旋北而南者，从坎之离。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坎为执法吏。吏诘其夫，妇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阴一阳，离二阳一阴，相承易位。离下坎上，既济，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礼而生，无礼而死。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推检，获昌而诘之，昌具首服，曰：“本与其妻谋杀董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是以误中妇人。”

这就是一则混合占法的典型例证。这里主要是利用《周易》和汉字合占的方法。先用《周易》的卦变和卦象方法推出事情原委，再以汉字断出杀人凶手。占断非常迂曲复杂。

下面谈谈字梦术的特点对测字的影响。

首先，字梦具有非常神秘的特点，这对测字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知道，字梦和测字都是通过汉字的分拆和音联来推知命运，但测字中只是直接地面对汉字，从一些简单质实的文字符号中探知命运的隐微。而字梦却有很大不同，字梦中无论是梦中直接见字或是由其他途径推知汉字，都面临着迷离恍惚、神妙奇幻的氛围，文字从这一氛围中抽绎而出，这样就使它平添几分神秘的色彩。“梦者，幻也。”^①梦具有不着

^① 陈士元《梦占逸旨》卷一。

形迹的特点，在梦中，人的心灵可打破一切时空界限，无所不能，无幽不贯，无处不至。由这一氛围转出的汉字，使人似乎回到荒荒亘古的文字草创时代，似乎感到造字感天动地、泣鬼通神的场面。从神秘的梦境浮凸而出的是具有神秘意义的汉字。同时，梦中常见神人示字，神飘然而至，授予一二大字，便渺然而去。这也使汉字获得非凡的来历，神将命运的密码附着汉字符号之中，占梦者所要做的即是通过文字符号去咀嚼神的意旨。

如前所言，字梦是一种测字术的广义形式，测字术的产生直接受到字梦的影响。后来，二者虽沿着各自道路发展，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字梦的渗入，对于迷信者来说，弥补了测字术中神性的不足，神秘的字梦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汉字崇拜观念，使迷信者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汉字中有神的意旨，有自己的命运隐微隐含其中，因此才会将它押向自己命运的天平上。

其次，字梦中的许多方法丰富了测字术的形式。东汉以来出现的字梦中的大量方法都被后代测字术所借用。如谐音联系法、近似占法、字形增删法等。不仅如此，在一些思维认知形式上也给测字以启发。如测字术中有所谓“反体”，以喜字来问得凶，以哭字来问得吉。此方法运用十分广泛。其实，反体的运用在字梦中也十分普遍，如著名的“梦刀”的故事。据《晋书·王浚传》记载，西晋大将王浚为巴陵太守任时，一夜曾做梦，梦见梁上悬着三把刀，后来又加上一把。王浚醒后以为此梦定为不祥，刀为杀伐之物，也许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血腥的未来。主簿李毅知此梦后，对王浚说：“您这梦虽反而实正，三把刀合起来，乃是一个‘州’字，再加一

把，即为‘益州’，您可能要去益州为官。”后来益州太守皇甫晏为张弘所杀，王浚调任益州刺史。后来“梦刀”即成为升官的代用语。此字梦所用的就是反体。《晋书·邓攸传》另载一字梦也属反体：

（攸）梦行水边，见一女子，猛兽自后断其盘囊。占者以为水边有女，汝字也，断盘囊者，新兽头也，故兽头也，不作汝阴，当汝南也。果迁汝阴太守。后为中庶子。

字梦也有不少反体，做梦者初以为吉，终则为凶的。据陈士元《梦占逸旨》卷五引《野乘》说，

北魏孝昌（525—527）年间。广陵王克渊总兵十万，去攻打葛荣。出征之前，他梦见自己王公的衮衣加身，倚槐而立，志得意满。寤而思之，心甚喜之。以此梦告杨元慎，元慎诈以吉梦，私下里对旁人说：“王克渊此行必死无疑，‘槐’为‘木’旁‘鬼’，不死又如何？”后王克渊为葛荣所杀。

字梦中的反体比测字术运用得较早，也比较普遍，测字中的反体法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正来源于字梦，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是比较清楚的。

第二节 字 讖

与汉字有关的讖纬术也是一种广义的测字形式，测字术的产生与它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讖纬方术比较流行的国度，它产生时代早，流布范围广，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大。因为纬是和中国古代的至高文化规范经相提并论的。经是儒家正统典籍，纬是用来阐释经典的，虽非经典，乃是经典之辅助矣。汉刘熙《释名》云：“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清俞正燮《癸巳类稿·纬书论》：“纬者，古史书也。纬如后世灵台侯、省寺案牍，先儒所采以辅证经义者，皆淳古之文，他或不逮也。”纬书作为经典的辅助工具，因而加强了纬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按照先儒的解释，中国文化之发轫，就与纬结下了不解之缘，《易·系辞上传》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是神之瑞应，圣人仿其文、追其踪，而创造了社会文化。纬的大量产生是在西汉哀、平年间，其时纬书迭作，讖言日起，王莽、公孙述辈竞相以纬惑众，而社会上的硕儒鸿士也多作纬论，假托古人，大行纬举，其时有《易纬》、《尚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论语讖》等，煌煌大观，大约有几十种之多，今据《古微书》等辑录的就有六十七种。这些纬书在后代影响甚大，其根系伸入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人们的思想、思维方式等均具有较深影响。人们认为，既然中国文化的起源就与讖纬密相关涉，人间的行为都有天意的证明，既然“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

教”的经典都需要谶纬的支持力量，那么制造谶纬、相信谶纬就不是一种错误的文化行为，像今人对迷信的清醒态度，在古代是较少见的，甚至包括那些著名的思想家。孔子获麟、河图洛书之类成了不可撼易的真理。

这样便出现一些奇怪的情况，纬说流行，邪异滋蔓，甚至闹得乌烟瘴气，影响了社会文化的正常运行，其支离怪诞之论蛊惑人心，使许多人沉溺其中而难以自拔。因而中国古代有几次对纬说大举清除，但纬书照样流行，谶纬的力量常常冒出来与文化的正常运转争地盘。

谶纬说中几乎没有不可以利用的工具，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乃至大自然的一切，都可以用来制造谶纬，而人的文化创造也不例外。汉字作为华夏民族最光辉灿烂的创造之一，而且据说其中还涵有神的密码，因此它自然成为谶纬制造者手中常常使用的工具。在中国古代，利用汉字所制造的谶纬，从西汉开始，即有产生，到东汉而达于高潮，此后代不乏人，与文字有关的谶纬蔓衍流布，自朝廷至民间，花样繁多，越翻越新。成了支撑一部分迷信者心灵的重要力量之一。我们把与汉字有关的谶纬叫做字谶。

字谶虽不是测字，但它实际上已经基本具备了测字的一些特点，字谶也是推知命运的。认为文字中涵有神秘的力量，为现实的文化行为提供神秘的解释。如《三国志·吴志》记载，有一人名叫阚泽，精通方术，在东吴一带颇有名气。魏文帝曹丕即位时，孙权有感于曹丕盛年即位，而自己已是年迈，时光不永，恐自己活不到代他而立的年龄。他召群臣进宫，说明了自己的心思，众大臣无言以对，唯阚泽上前呈言：“大王休虑，曹丕将为君所代，此为天意。”孙权急问其由，阚

泽云：“以字言之，曹丕的‘丕’乃上‘不’下‘一’，一为十数，即预知其当政不过十年。”后曹丕于当政七年后去世。众人皆以曹丕之名乃谶语，而阚泽之论实为窥破天机。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曹丕之“丕”只是一个简单的汉字，一个标示人的符号，其中没有什么命运的隐微和神秘的意旨，曹丕之死是事物自身发展所至，而不是神所左右，神更没在冥冥之中将神意附着在他的姓名中。若依阚泽之分析方法，曹丕的“曹”上部还可以拆出六个“十”字，那岂不是说曹丕可当政六十年。再言之，“丕”之“不”“一”的“一”，为何要代表十，为什么不就是一年呢？由此看来，字谶中以字证命和测字的以字算命实质是相通的，它可以算作测字的广义的形式。

有些字谶实际上就是道道地地的测字。它虽然不是求测者去直接拈字或写字占卜命运，但却起到预测命运的功能。据清周亮工《字触》引《酉阳杂俎》云：

翟天师，名乾祐，峡中人，往往言将来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当有八人过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焚数百家。八人，火字也。

这是一则字谶例，又可以把它当作测字。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这里以一字预测命运，又可以把“今夜有八人过此”视为一种谶语。

宋郭象《睽车志》上记载有术士名皇甫坦，此人精通天文地理，能言人凶吉祸福，且喜常常为别人写字，接受字的人开始不觉其奥秘，等事发后方知道，原先皇甫先生所赠之

字乃是一预测命运的谶语。有一个叫汪国正的人，功成名就，唯膝下无子嗣，请皇甫坦为其书一字。皇甫坦为其挥毫写下一个“湧”（涌）字。汪国正觉得此字无甚深意可就，也就不大在意。后来他到吴江任官，在此生一男孩。这时他突然想到皇甫坦写的那个“湧”字，这字若分拆，可成“江”和“男”二字，即江下有男，这时他才悟得那字的妙意。另一人要去参加乡试，行前请皇甫坦写个字，皇甫坦写了一个“落”字送给他，他嘴上不说，但心里很不愉快，直埋怨这位皇甫先生，这不是祝他落榜吗。然而揭榜后，他却榜上有名，中第二十三名。他想到皇甫坦写的那个“落”字，忽然悟知自己此次乡试的命运都暗喻在此字中。此字上部像“巾”，左像“三”，右边又近似于“名”。皇甫坦这种书字法与测字没有任何差异。

但是，字谶毕竟又与测字有所不同，其最大的不同就是：测字是预测命运，它是指向未发生的事；字谶虽然可推知命运，但它主要是证明命运，它是指向已发生的事。谶纬之所以叫做谶纬，就与它的这种特点有关。《说文解字》云：“谶，验也。”即是立言在前，取证在后，即是说，后来发生的事，它的征兆已经隐伏在以前的一句话、一个字、一首诗等之中。因此，对于迷信者来说，那发生的事是必然的，是冥冥之中神意的权杖支配的。如清徐珂《清稗类钞》上记载，清时京城一个花园内，生长着许多李树和樱树，一年春天，花园中的一棵大李树和一棵大樱树突然枝干相连，互相裹为一体。这一奇观引来了许多观光客，凡来此者莫不为此神异而称叹。后过了若干年，朝中出了个太监李莲英，权倾朝纲，陷害忠良。这时，一些迷信的人突然想起前些年京中花园出现的“李连

樱”的奇观，便认为那正是预示李莲英将出的征兆，“李连樱”和“李莲英”乃一谐音谶。由此可以看出，谶纬的重要特点就是应验。这是它和测字的重要区别所在。

字谶的形式多种多样，这里介绍几种主要的形式。

一、一般字谶

这里所说的一般字谶，是指除了年号谶、姓名谶等之外的一些字谶，年号谶等后文将专门讨论。

一般字谶有不少是关于国家大事的，朝代的更替，国势的兴衰，当然是每朝每代人们关心的重点，因此迷信者在这方面记载的谶纬也最多。

据传，晋开国皇帝司马懿官拜曹魏司空时，一天夜里，他正在读书，有人叩门请见，自称是白虎使者，来者浑身上下穿着白衣，只见他走到司马懿身边，从怀中取出一物，放在司马懿的手中，并告诫说：“两世慎勿开，墓中绝。”司马懿不明此话是什么意思，转眼间，那白衣使者不见了。急忙取出手中之物，乃一盒子，司马懿等不得白虎使者要他两世勿开的嘱托，便打开盒子，见一金笼子，金光灿烂，笼长三四寸，司马懿细视之，忽见笼背后刻有一行铭文，字迹虽苍古，然可辨认，分明写着：“父子从我受重火。”司马懿半天弄不懂，又觉得此话定有深意，便密访术士为之解，均解不得。待司马炎建立晋朝，术士们才想起当初司马懿所说的话，以为那句“父子从我受重火”之言即是谶语。^①重火者，炎也。

据《南部烟花记》记载，隋炀帝也是一位爱玩文字的老

^① 引见清周亮工《字触》卷一。

手，一日闲寂无事，与诸侍女共游，隋炀帝请诸侍女拆字为戏，侍女中有名杳娘者，天姿曼妙，聪颖伶俐，率先开了口：“就以我的名字‘杳’为例吧。它可以拆成十八日。”隋炀帝一听连连点头，便说：“你看‘朕’这个字能拆吗？”杳娘连称不敢，隋炀帝命其随便拆来，勿用多虑。杳娘说：“‘朕’左边的一画移至右边，不就像个‘湍（渊）’字吗？”隋炀帝思量片刻，虽觉其不全相像，但也觉得此种拆法思致颇佳。后来李渊代隋而立，人们认为杳娘那一拆实在是个谶兆。

唐张读《宣室志》所载一例，在中国古代流传甚广，那是一则铭文中的谶语。唐高宗上元初年，洛川郃城县的一个老翁上山采药，无意中拾取了一块石头，上面密密麻麻刻着一些字，文字大都漫漶不清，一些可以看清的字也弄不懂。老翁觉得此石也许有些来历，即献给县令樊文，樊文一看也不敢懈怠，于是献给州官，州官将其送给朝廷，后来直接呈给高宗。高宗也觉此石非凡，藏于内府。精通术数的人认为，此碑出于北朝后魏时的寇天师之手。这寇天师道术高深，能预知天下千百年事。这石碑是他所刻的许多石碑中的一块，这块碑中尚能辨析一些字，如：“木子当天下”、“止戈龙”、“李代代不移宗”、“中鼎显真容”、“基千万岁”，这些当时人们大都不能懂。到了唐代末年，人们这才知道，那碑上铭文乃是预示唐代一百四十余年历史的谶语，而且句句都应验了，“木子当天下”，木子为李，是说李姓将拥有江山。“止戈龙”，止戈为武，言武则天将为真龙天子。“李代代不移宗”，是说唐中宗铲除武则天，中兴唐世。“中鼎显真容”，乃是说武则天被剿灭后，太平公主的党羽也被翦除，睿宗李旦登基。“基千万岁”，基指李隆基，言唐玄宗在位时间长。这则谶语有不少

是字谜，如“木子当天下”、“止戈龙”等。

除了上述预言重大事件的字谜外，还有一些预言一般事件吉凶祸福的，典籍中记载也颇多。唐张读《宣室志》载，唐文宗大和年间，丹阳令王璠令手下人挖护塘河和加固城墙，掘得一石碑，上有许多铭文，便献给了王璠。王璠仔细辨认，发现其上有“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他不知其意，也并不在意。时有一老者，飘髯如雪，过丹阳境，与人言：“闻尊县令掘得一石碑，不知可否识得？”那人回答说：“老翁所言极是，本县令确曾得一碑，碑上铭文至今无人能识。”老者微微一笑，拈须而言：“此非佳兆啊！此三句话实概括了你们县令的整个家世。‘山有石’，石为金，山下一石，即‘豈’字，是说贵县令的祖父。‘石有玉’，璠者，玉也。此话言王豈有个孙儿名王璠，即县令本人。‘玉有瑕即休也。’王璠有子名王瑕，此言王家到王瑕那里要遭大祸，从此绝传了。”后果然于大和九年（835）冬，王璠及王瑕均被杀害。

另据记载，宋代大书法家蔡襄出守泉州，奉母命在此建一大桥，名万安桥。蔡襄感到此处海深有千尺，建桥立墩无有根基，为此非常着急。他是个孝子，也不想违逆母命。于是命手下文人写上一篇祈神颂给海神。那文人写好颂文，至海边痛饮至醉，卧于沙滩，任潮长潮落。后醒来，发现封存祈海神颂的套封已被启动，打开一看，海神颂一字不存，上面不知怎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醋”字。他将此呈给蔡襄，便屡称罪责。蔡襄视此字，突然朗朗大笑，众人惊悸，他大声道：“‘醋’拆开便得酉、一、日四字，莫不是海神让我二十一日酉时动工。”到该日该时，潮果然退去，因而建桥得

成。^①

从以上所列数谶来看，其内容是荒诞不经的。一碑可知几百年世事，一字可知未来的命运，自然世界发展的内在逻辑似乎不见了，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神的命运之手操纵的结果。汉字在这里成了制造谶纬的工具，是人们通过它了解神的意旨的桥梁。

一般字谶的制作方法，有的直接以一个神秘的字眼来体现谶兆。如《西湖志》上载有一例。南宋嘉泰元年（1201）辛酉，宋都杭州出现了一场大火，将京城的很大一片地方化为灰烬。事发后，人们寻找起火原因，迷信者总忘不掉灾异变化由天定那一套东西，一位术士说：“此次大火可谓天意，是上天对人间行为不慎的惩罚。问题就出在‘嘉泰’这两个字上。‘嘉’字拆开可得‘三十一万口’，‘泰’字拆开可得‘三二十八’。即是暗示在三月二十八日发生大火，烧掉三十一万口人的住处，这与受灾情况正好相符。这不是天意又是什么。”这种推演实在是荒诞不稽。

也有的字谶是一物或一组物，由物及字，就如同测字中的物占。据《陶朱新录》上记载，宋绍兴己酉（1129），永嘉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大火。据说此火灾未出现之前，当时就有人预测出了。说是在火灾前数日，有一只大熊从楠溪山上下来，渡过河而到城中，后官府怕伤人，让猎手杀了它。当时有一术士名高世则，见此情形，曾对仆人赵允蹈说：“永嘉可能要有火灾。”赵允蹈进问其由，高世则说：“‘熊’这个字拆开，上为‘能’，下面四点又从‘火’。能火者，岂不是

^① 此据周亮工《字触》卷三引。

娶起大火。”高世则让城中人注意，但无人听信，后酿此大祸。这则例子就是由物及字。

当然，大多数字谜是由一句话或一首诗等组成的，我们将在后文细述。

二、符应

符应在中国古代也甚为流行。它产生的思想根源是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和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先秦，符应之说即已产生，星宿落，大将死；佳卉出，贤人生。这类东西在先秦就不少。中国人很早就认为，天人是相通的，人有一事，天有一应，天人相类又相动，尤其对于大德之人，其出现就必然惊动天地万物，诸般符应便连绵而生，所谓“有德者必有符”是也。符应之迷信活动在中国古代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面，至今仍未响沉音绝。在民间，至今还有人相信这一套，如在夏日的夜晚纳凉，忽然一颗流星划然陨落，年纪大的人也许会说，一个星宿一个人，这也许又是一个人离开尘世了。如古代民间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描写，某某老者上山采药，得一灵芝，那地方几年后出一大人物。诸如此类，均是古代符应说之遗迹。

符应可以说是一种谶纬，它也是征兆在前，出事在后。但符应大多数是自然物的瑞应，具体语言的谶纬则属于谶语。符应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种预测命运的迷信活动。

在符应中，也常离不开汉字，有些自然物的出现，很难说清它和人的命运有什么关系，但汉字的出现往往就可以协调这种关系。如一家门口一年突然一棵大柳树长得特别好，而那家人恰巧又姓刘，那么这符应就造出来了。“柳”与“刘”

正好声音相近，于是迷信者就会感到有什么神秘的联系，柳树茂盛也许预示刘家将出大人物了。如果你懂阴阳五行，这就更好牵扯了。“柳”从字形上看，左为“木”，五行之一也。右为“卯”，又是十二地支之一，这样牵连的东西也许就更多了。

以汉字参与瑞应的制造始于汉代，王莽可以说是始作俑者。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十分重视符应谶纬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他是靠搞迷信起家的。《汉书·王莽传》记载了这位人君在通向金銮殿的道路上所玩的各种符应游戏，其中就有不少属于与字有关的符应。该传载，王莽未立前，他的家乡曾僵柳复起，大石自立，甘露降，灵芝生，符应连连，都是预示要有一个真龙天子出现，这真龙天子就是王莽。同时，王莽的老祖坟上也起了变化，本传说他的祖墓“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这里为什么要特地提到梓树，《汉书补注》引王光慎的话说：“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原来这梓柱长叶，象征着王家子孙王莽将划然而出，“梓”和“子”乃谐音，汉字充当了符应构成的重要因素。

王莽故弄神技，为自己粉墨登场张目，但却装得非常谦逊，自己本不想代汉而立，而老天偏偏让你来做，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据《汉书》本传上称，他未代汉而立时，有十二种符让他奉天受命，另立新朝，他都未去做，直到最后一次，他实在拗不过去，只得听命，在神学的幻影中，王莽被打扮成一个具有上上大德的贤明君主，是天命的责无旁贷的承继者。《汉书》本传称这最后一次符应呈现是：一天，“侍御王盱见人衣白布单衣，赤缙方领，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谓

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属皇帝。盱怪之，行十余步，人忽不见。”这飘忽不定的人穿的是白布单衣，这“白布”二字可说别有用心，即后代测字术上常称的“白为皇字头，巾为帝字尾”，布下即为巾。通过汉字的离合，隐晦地表达“皇帝”的意思。这也是汉字符应。

王莽受命登基被描绘成感天动地的过程：“于是新皇帝立登车至汉氏高庙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为字也，明汉劉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这里又玩得是谶纬的把戏，登基日为丁卯，丁于五行属火，卯又暗示劉，汉人以卯金刀为劉，登基恰好是丁卯，这便应了“以火焚劉”之瑞应。在王莽以及他手下的那些佞臣们看来，这年头正应是王莽得势的时期，天、神处处在庇护，处处在暗示，而对待刘汉，老天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惩治它的。

王莽可以说玩瑞应玩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神学目的论成了国家政治的支架，一切都假天之名而为之。他的手下人也熟知这一道，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不少人是利用符应的手段来请官要禄的。《汉书》上记载，有一个叫李丰的人，因称符命，说自己当为右臣，王莽尽管心里老大不高兴，只好应允了他。李丰的儿子李寻见父亲操符应而得官，也想效尤。他见到废汉平帝的皇后长得很美，便馋涎欲滴，想占为己有，也制造了一个符命，说上天答应把这废帝的皇后许配给他。王莽对他父亲已深恶痛绝，现在儿子又如此，他听后勃然大怒，即令人斩杀，李寻于是逃之夭夭，一年后才被捕杀。杀后发现他手臂上刻有“天子”二字，下官以为是符应，立即报王莽，“莽解其臂入视之，曰：此‘一大子’也，或云：‘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这

里同样利用汉字来制造符应，李寻玩符命玩掉了性命，当然不敌王莽这一符命老手。

王莽重符命，在神学的迷障中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王莽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是他重视符命谶言的做法则在后代薪传不绝，后代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每每要使用这一思想武器，以此为自己的政治图谋加上神秘的光环。王莽靠符命起家，东汉光武帝刘秀推翻王莽的统治，也没有忘记符命这一武器。

王莽认为自己姓王，就该为王，“一贯三为王，三者天地人，连其中者，君主也。”王这个姓上合天意，下合民意。而汉朝的“劉”却是一个很不好的字眼，王莽说：

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劉而兴王。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众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汉书·王莽传》）

顾师古注曰：“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有刀，故禁刚卯及金刀也。”王莽列举了“劉”字的种种坏处：好战、至财等，而且违逆了天地阴阳之义，故而当亡。

但劉汉却反唇相讥。《春秋汉含孳》这一出自东汉的纬书说：

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

在东方，阳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阴所立，义成功。刀居，字成章。刀击秦，枉矢东流，水神哭祖龙。^①

这里将汉字的离合和阴阳五行联系在一起，为刘姓张目。不仅这个卯是光明的象征，金是国家统治的基石，而且卯、金还分别代表仁和义。而那个引起王莽反复攻击的站刀，这里却说是专门用来击秦的，故神其说已到了极至。

刘秀和他手下的御用文人不仅在姓氏上做文章，而且还制造了大量的自然物的符应。首先他们在王莽所制造或所使用的东西上下功夫，如那个著名的“白水真人”的故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云：

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称为“货泉”。或以为“货泉”字为“白水真人”。

王莽看到西汉时使用的钱币上面有金刀图案，这便暗含了“刘”姓的卯、金、刀的意思。于是将其改为“货泉”。而刘秀手下的御用文人同样玩拆字游戏，将“泉”拆为“白”、“水”，将“货”（货）离合为“真”（真）、“人”。而刘秀正好在白水这个地方出生。言下之意：你王莽将钱名改为“货泉”，实际上是预示着刘秀要出，那钱成了一种符应。

刘秀还制造了一些其他符应。《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记载，刘秀出生那年，他的家乡出现了许多灵异的事。“县界有

① 《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李善德引。

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刘秀这名字就是为了合符应。这个符应与汉字也有关系。一禾九穗当然神奇，而且“禾”下加“九”（与“乃”形近）近似“秀”字。于是这刘秀当皇帝当然是上天之命了。

王莽、刘秀之后，符应成了政治斗争习用的工具，每朝每代更迭之际，符应也最多。符应虽然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人间杜撰，但它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却是未可小觑的。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一方面是远古社会万物有灵论的遗迹，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中天人感应学说的体现。有不少人相信它，是因为科学的力量尚未战胜神学的侵袭，尤其在民间，对符应的相信，还反映了人们渴望摆脱现实痛苦，向往理想境界的文化心理，神的力量填补了现实的空虚。在今天，符应说仍然有其一定的市场，如解放前的二三十年代之交，民间曾流传这样一种传说，说是某地一度遍地生猪毛，人们都十分惊奇。后来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人们才知道，那猪毛原来是个符应。这也是一个与汉字有关的符应。

三、姓名讖

讖纬无孔不入，姓名作为人的基本符号，自然也不能例外。

人莫不有其名，人生下来，起个名，于是也就有了代表此人的符号，这样在芸芸众生中，此人也就和他人区别开来了。名字只是标示人的符号，但是中国人偏不这样看。汉董仲舒说：“名者，命也。”一个人的名字和人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好名也许能带来一生的好运，一个坏名也许倒霉事尽跟着你走。一个名字起好了，可能里面就有荣华

富贵，也可能在这其中就埋伏着祸殃。所以名不可不慎，在中国人看来，名也就是人本身，晚上在外走路，也许家里大人会跟你说：“黑灯瞎火时，别人喊你的名字，你可不能理，一理有可能魂就被招去了。”好像名字就是魂。孙悟空当年不信这个邪，却吃了大亏，人家喊“孙行者”，他不敢理，喊“者行孙”，他想倒着可没事，答应了，于是，一下被收进了宝葫芦。

格罗特在《中国的宗教系统》中指出：

（中国人）有一种把名字与其拥有者等同起来的倾向，一种表现出与下述现象非常接近的倾向，即由许多事实确凿证明了的他们没有把图像或标记与它们使人想到的那些实体区别开来的能力。^①

格罗特视中国为具有原始色彩的民族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他提出的关于中国人对待姓名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即将标示人的符号和它代表的人等同了起来。

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的作用，以姓名制造缜纬的风习于是也流布开来了。偶然的姓名选择被视为命运的必然安排，人生瞬息万变的事实过程被凝固在静止的姓名小符号中，因果发展的逻辑被神秘化，一个新的事件出现的根源被追溯到名字之中。起名的审慎，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渗入增加了名字的神秘性，而长期流传的避讳风习也使名字平添了内在的魔力。于是中国人变得太爱“咬名嚼字”了。

① 转引自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中译本44页。

每一个名字都是由汉字构成的，围绕着姓名的谶纬活动，最终仍然落实到汉字上来，即通过汉字的字形、字音去制造谶纬。因此姓名谶实际上是一种字谶，以姓名的汉字来解释命运、推知命运，仍然保持与测字本同而末异的特点。

姓名谶流行年代久远，汉时这种谶纬就非常流行。像上文所举的王莽和刘秀关于“王”和“刘”的一些说法，实际上就有谶纬的性质。汉时还流行“代汉者当涂高”这句谶语，这谶语由谁而制，今已不得而知，当然制造谶纬的人也不会让你知道，不然人事掺入，神将焉附？这谶语显然是反对刘汉正统的，于是汉代有不少图谋篡汉而立的人，都想往这谶语上靠。先是有西汉末年的公孙述。《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公孙述认为自己这个“述”与“涂”音近，而且义也相通，均可训为路途之义。于是代汉而立，非我公孙述而谁？合了那个谶语，也就应了天命。后来又有东汉末年的袁术。《后汉书·袁术传》记载，袁术认为，他的名字也应了那个谶语，因而他也应替天代汉而立。据他说，他的“術（术），不但字形相近，也有路途之义。第三位是魏文帝曹丕。篡汉之前，他对群臣说：“魏”之古义乃宫门旁的观阙，谶言谓“当涂高”，当着路途上的高大之物莫过于宫阙了。他也说自己合谶。他们三位都是在玩弄姓名谶的游戏，其基点乃在于汉字的形音义。

《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汉献帝初平元年，袁绍认为自己字为本初，遂“自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他所鼓吹的一统江山的愿望，就落实在姓名的谶纬上。

两晋南北朝期间，利用汉字制造姓名谶的现象也比较普

遍。大文学家沈约也信谶纬这一套。《梁书·沈约传》记载沈约曾对萧衍说：“天文之事，表世运之征，永元（齐东昏侯萧宝卷年号）以来，尤为彰著。谶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历然在记，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行中水”，即“衍”字，乃萧衍之名，这个谶语说得这位未来的梁武帝连连点头。

后梁末帝萧友贞，后改名萧瑱，在位十一年，后为唐兵所杀。时有术士认为，萧瑱之死本乃天数，其姓名中即已藏征兆。“瑱”可拆为“一十一十月十八”萧瑱当了十一年的皇帝，于十月十八日被杀，即应了这个谶。“瑱”左之“王”可拆为“一十一”，“真”上可拆为“十月”（此取其近似），下部可拆为“一八”即十八。

唐时虽迷信之风不甚浓厚，然而姓名谶也未绝传。“李”可拆为“十八子”，即传十八代，喻其多也，谓江山万代永不变色。这一谶纬在唐朝十分流行。

黄巢农民起义也很重视谶纬的力量，这也是谶纬复杂性的体现之一。谶纬可以被统治阶级用来神化自己的统治，同时也可被那些受压迫者用来反抗反动的统治，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运动一般来说都很重视谶纬迷信，并把它作为一重要的工具，从黄巢起义到李自成莫不如是。据史载，黄巢起义时制造了许多谶纬，其中就有关于他自己的姓名的谶纬。唐僖宗有广明年号，黄巢对“廣明”二字有一番高见，他对手下将士说：“唐僖宗似乎知道我要代唐而立，改号‘廣明’。‘廣’这个字，是‘唐’去‘丑’、‘口’、而安一‘黄’字在其中。而‘明’者，日月也。可见‘廣明’二字的意思，乃是‘黄家日月也。’他的这番推论虽很荒诞，却很别出新裁。

他将“唐”和“廣”并而言之，均是广字头，今僖宗立“廣明”之年号，即是将“广”下的“丑”“口”移走，换上了“黄”字，他认为，这就是唐朝当灭，黄家当兴的征兆。

宋代由于迷信风习浓厚，故姓名谶也最多，宋何遵《春渚纪闻》卷二载有一“口误杀赵谗”的故事。有一年殿试结束，才子毕渐高居榜首，为头名状元，赵谗获第二名。张榜公布时，抄写人将“渐”旁的三点水写得不清楚，而古时的书写习惯又是竖写的，唱榜人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将第一、第二名混在一起读，于是变成了“状元毕斩第二人赵谗”，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毕姓人要杀赵谗。后来毕渐做了京中要官，赵谗因谋反，被判死刑。主斩人正是毕渐。有人记起当初唱榜人那句话，都说那是一句谶语。这则姓名谶也与汉字有关，它有似于测字术的减法。从这里也可看出，谶语中的确有些言中的，但这多半是巧合，它是偶然的合中，而不是必然的命运的征兆。生活中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并不是神的魔力在操纵。像这则例子中的唱榜人将“渐”读成“斩”，并不是暗示未来毕渐要斩赵谗，口误并不能杀人。他们走上了被斩和主斩的关系，是由他们在一起做官的复杂关系所决定的。我们从《清稗类钞》第十册所载的一个例子，或可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一问题：

张文襄枋政时，一日以尚未叫起，在退值室闲坐。某亲王曰：“我今日手甚冷。”文襄曰：“王爷手冷，即应烘。”王犹不知其为戏语也。一章京适以白事入内，闻而微笑。王顿悟曰：“我命值班苏拉取一火盆来，大家烘，可好？”文襄曰：“我不烘。”王笑

曰：“中堂年高，自然让中堂先烘。”文襄果于是年薨，成谶语矣。

正如亲王所云，张文襄确因年岁已高，而于那年“薨”去，并不是那次聚会人们让他“先烘”的缘故。这实在是偶然的巧合。今合肥人说“洗”为“死”，常常将“我洗我洗”说成“我死我死”，如果张文襄的那个谶语能成立的话，那么这里的类似谶语岂不是更多了吗？

宋时另一个姓名之谶是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的一则故事：这则故事已见之于前引，但与此关系密切，故不避重引：

苏子瞻谪儋州，以儋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谶谑之意。当时有术士曰：儋字从立人，子瞻尚能北归乎？雷字雨在田中，承天之泽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盖棺之义也，鲁直其不返乎？后子瞻北归，至昆陵而卒，子由退老于颍，十余年乃终，鲁直竟卒于宜。

清周亮工将此例归入测字类，其实这也是则姓名谶，由此也可见出谶纬和测字术之间的亲缘关系。从章子厚的谶笑和术士的析解中，均可见出，他们都是把人的名、字和其未来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似乎其中已经隐伏了他一生的命运的全部信息。无论是玩笑还是方术，其中都深深潜隐着中国人在姓名上的独特文化心理。

宋代不仅是测字流行的时期，谶纬也非常流行，明清继乎其后，虽在气势上不能与宋代匹比，但姓名谶纬的活动也屡屡不断，史籍中多有所载，其繁不录。今仅举清袁珂《清稗类钞》中所载之二例，以见明清时期姓名谶纬活动之一斑。

一则是关于张献忠的谶纬。清军入关时，张献忠为肃武亲王豪格所杀。事后，有些爱弄玄虚的人编出一个谶语，也是一姓名谶，无非是证明张献忠被肃武亲王所杀的必然性。说是张献忠以前曾在一个地方拆过一个宝塔，得一石碑，石碑上赫然刻有四句诗：

造者余化龙，
拆者张献忠。
吹箫不用竹，
一箭贯当胸。

这首诗正是预示张献忠被杀的谶语，张献忠确被肃武亲王一箭贯胸，应其末句。这首诗中的第三句“吹箫不用竹”是一文字游戏，“箫”字去“竹”，正是一个“肃”字。人们于是觉得张献忠为肃武亲王所杀是天意的安排。这则谶纬的正统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另一则姓名谶是一则有趣的误语，本无意中说出的，却击中命运之鹄。《清稗类钞》十册记载：清光绪年间，有一个叫刘葆桢的人，在赶考之前，听朋友的劝告，改名为刘可毅。他是武进人，他随武进地方考团进京赶考。考毕发榜前，主考者将考取的人通知各地方的考官，名单中就有刘可毅。哪知这地方考官心很粗，将“毅”误认为“毅”（杀），因二字形

近。便说：“我们武进没有刘可杀。”刘可毅考中作官，人们也常常拿那句话和他开玩笑。他心里常想：“这该不是谶语吧。”果然他后来在抵抗义和团的战争中被杀。不少人说，这正应验了那个谶语。《清稗类钞》中记载刘可毅一直为那句“可杀”的话忧心忡忡，可见，谶语在人们心理中的压力。

四、年号谶

年号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一般认为，年号以汉武帝之元鼎年号为其肇始，其后代代相沿，未曾或改，以作为年代记载之重要依据。

年号具有崇高的地位，每个朝代建立了，总要拟定年号，年号既定，国将始成。年号在古代又称元，建年号叫“建元”，改年号叫“改元”。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五“改元”条谈及“元”时说：

古人最重者元。《汉书·律历志》云：“历始曰元。《传》（此指《易大传》）曰：元者，善之长也。又曰：元，体之长也。三统合于一年。”古人所谓元祀元年，盖取诸此。董仲舒亦曰：“春秋谓一元之意，万物所从始也。”元者，辞之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是建元为重事，由来久也。

元乃万物之始，众辞之首，百善之长，故改年号曰改元，取其大也、始也、善也之意。因此元几乎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唯其重要，围绕它所产生的神而明之的心理也最丰富，而

其忌讳也最多。古人认为，一个年号的好坏，直接与国运密切相关，一个好年号，带来一片富裕美满，一个坏年号，种下一片祸殃。年号远远超出了一般记时的意义，和命运、谶纬等挂起钩来。国家不太平，皇帝大臣们不去励精图治、重振雄风，有不少却要改年号，似乎原来的年号就是不太平的根源，改了年号，也就可除旧布新了。

年号越重要，和国家命运牵扯得越紧，其拟定起来就越难。年号不能与前代重复，若重复也许会招致前代灭亡的祸殃。而年号用字都是一些大喜大吉的字，不但贬义字不能入选，同时那些可能引起贬义联想的字也不能入选，这样剩下的字也就不是很多了。纵观历代年号，无非是天啊、平啊、通啊、成啊这类的字眼，因此其重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类窘状我们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最重要的是，一个年号拟定了，那些文人学士便开始咬文嚼字起来了，左推右敲，或从谐音上牵连，或从意义上引申，或从形体上大卸八块。在文人这些伎俩中，似乎再善的年号也能被榨出皮毛里面的“小”来。因此，古往今来，只要文人想钻年号的空子，几乎没有什么钻不通的。

文人的利器就是汉字，年号不论如何重要，落实下来，仍然是两个质实的汉字，而汉字同音字多，意义复杂，其内在的文化累积也比较深厚，同时其形体具有可分可拆的特点。这些都给文人推敲年号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在正史、野史、方志等大量记载中，都留下了文人们推敲年号的印迹。他们不止一次的相信，某朝某代的战乱、灾荒或灭亡，都与年号有关，年号中就已埋下了失败或灾祸的种子，一个个年号的谶纬就这样出现了。而且这些年号谶纬大多是汉字的谶纬。

这里按照年代的顺序，介绍一下重要的年号谶，从中可以见出年号谶制作的特点以及它的欺骗本质。

据《晋书》记载，晋康帝名司马岳，改元建元。有人对当时重臣庾冰说：“这个年号不大好啊！以前郭璞曾有一个谶纬，叫做‘立始之际丘山崩。’立者，建也。始者，元也。岂不正是建元年号。丘山，合而为‘岳’，这不是康帝的讳名吗？”庾冰不大相信这话，年号跟国家的兴衰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不久晋康帝果然被灭。

晋元帝萧睿，小字铜环，于大兴元年即位，五年后改元为永昌，于是驾崩，由明帝继位。据说元帝改元永昌，是因为有一天夜里出了太阳，他认为此事太神异，故改永昌，意谓永照光明。而有人认为元帝立永昌号即死，就是因为此年号不好，永昌为其命运之谶。人言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而“昌”可拆为二日，岂能永照？

《晋书·五行志》也载有晋时一个年号谶：

哀帝隆和初童谣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足。”朝廷闻而恶之，改年曰“兴宁”。人复歌曰：“虽改兴宁，亦复无聊生。”帝寻崩。

这里从汉字的字义上制谶。

另据《晋书》记载，晋安帝年号“大亨”，或以为此年号为桓玄所改。桓玄欲篡位，自为丞相，改此年号，当时人认为：大亨大亨，其实并不亨通。“大”可拆为“一”、“人”，“亨”可拆为“二”、“月”、“了”，当然这只是近似，意为

“一人二月了”。据称，后来桓玄于次年春天兵败，应验了这一谶语。

南北朝时也多有以年号制造谶纬，正史中多有记载。据《梁书》、《南史》等记载，梁豫章王萧栋，在大宝二年（551）八月为侯景所立，到了十月又被侯景所废。这个侯景本来就爱玩文字游戏，赖此为神助，诳骗于人。他曾对人说：“我的姓‘侯’字，可拆为三个字，左边是‘人’，右上近似于‘主’，下为‘天’。这明明是昭示：此人为主天子也。”梁武帝反其意而用之：“侯景看来是会当皇帝的，但是干不长。”他将“侯景”两个字拆开，变成“小人百日天子”六个字，这话后来居然应验了，爱玩字术的侯景扶萧栋上台后，改年号为“天正”。几个月后萧栋被废，有人认为，这是侯景害了他。因为“天正”这年号很不好，“天”可拆为“二”、“人”，“正”可拆为“一”、“止”。这岂不是谶语：萧栋虽登基，实为侯景操持，此乃二人之相。萧栋在位不到一年，不正是一而止乎？

据《北史》记载，后梁萧琮即位后，改元为“广运”，意在图个好运气，鸿运广达，福祉无限。然而两年后，隋军打入皇城，将萧琮俘虏，带至长安。“识者”（这是古代给那些术士的特称）说，萧琮之运，已在其年号中见出征兆。“运”（运）可拆为“走”、“軍”，不正是为“軍”所俘“走”吗？

北齐文宣皇帝高洋，受魏禅，在位十年，建元“天保”。围绕其年号也有一个谶语。《北史》云：

初，帝践阼，改年天保，识者以字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过十年乎？又谶曰：“马子入石室，三

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马子，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帝曾问大山道士：“吾得几年天子？”答曰：“三十年。”帝谓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吾甚畏之。”及期而崩。

看到性格刚烈的高洋却成了谶纬的“羔羊”，为其俘虏，给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弄得魂不附体，且“甚畏之”。可见谶语的力量。

其实，高洋在位十年，和“天保”的“一大人只十”，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宋洪迈《容斋续笔》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齐文宣天保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终；梁明帝亦用此，尽二十四年，或冀尔一邦，非机祥所系也。

宋时迷信风气甚浓，但洪迈却是清醒的，同样是“天保”，一以十年，一则二十四年。说“天保”中有什么“机祥”，岂不惑乎！

据《北齐书》记载：

延宗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时受教，守并州。明日建尊号，为间日而被围，经宿至食时败。年号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

“昌”这个字由于义含吉祥，多被采用为年号。但制谶者，

或以此有“二日”之象，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延伸，吉字有了恶意。这里却从“二日”中得出两天之意。由此也可见谶纬制造的虚伪性，汉字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随人取义，只要能为其所用。

《隋书·五行志》记载，北齐后主高纬，在位十二年，为北周的部队所逼，将王位传与其子高恒，称太上皇帝，高恒在任城王阶受禅后，高纬又改称为无上皇，后被俘，封温国公，最后还是被北周所杀。死时才二十三岁。当时有术士分析其悲惨命运时说：“高纬之死乃天数，其年号中即已有暗示。他建元‘隆化’，此二字一离合，正成‘降死’二字，即投降后被杀死。”“隆化”变成“降死”，只是近似，这是竖写的变化。这一字谶虽很荒唐，但却是煞费心思的。

北周高祖武皇帝宇文邕，在位十八年，有保定、天和、建德、宣政等年号，改宣政年号后一年即死去。《隋书·五行志》云：

宣政改元，萧岿离合其字为“宇文亡日”，其年帝崩。

这种离合正是匪夷所思，萧岿将“宣”离合为“宇、日”，“政”离合为“亡、文”二字，于是便成了“宇文亡日”。

另据《隋书·五行志》记载，北周静皇帝，原名字文邕，改为宇文阐，在位三年，七岁登基，九岁就被害。《隋书·五行志》谈及他的早夭时说：

宣帝禅位，改元大象，萧岿离合其字曰：“天子冢”。明

年乃崩。

萧岍怎样将“大象”二字变成“天子塚”呢，真不得不佩服他的想象力。他是将“象”的上部移到“大”上，则近似“天”，“象”的下部则近似于“塚”。

隋代建国，杨坚曾被封为随国公，他建立江山后，嫌这个“随”中含有“走”很不好，因为江山要如铜墙铁壁，这个字易给人游走不定的联想，这怎么行？于是去走之而成“隋”。而识者谓“隋”和“堕”相似，古书中就有将“堕”写成“隋”字的，因而必然招致凶灾。

另外，“隋”虽去了“随”中之走之，但是其读音仍为“随”。随者，随人而走也；江山又如何坚固？这种谶纬大概是唐人的游戏。另外，隋炀帝杨广即位，建元大业，意思是成就千年不朽之功业。但他为政残暴，正是在他手中葬送了隋的天下。唐人所作的《隋书·五行志》云：

大业（业）改元，识者恶之，曰：于字离合为“大苦来”也。寻天下丧乱，率土遭涂炭之毒焉。

“大业”离合为“大苦来”，当然也只是有那么一点相象而已。若似若不似，对于迷信者来说，也许更具有魔力，因为神是不着形迹的。同时，谶纬的妙蒂往往在“隐”，似象非象恰能很好体现隐的精神。

史载宋代年号谶纬最多，这也是时代风气使然。如《贵耳集》记载，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建元“太平兴国”，其义至为明显。其时也有人据此年号制一谶，谓“太平”可拆为“一人六十卒”。“太平”二字竖写，“太”可拆为“一、人”，

其下一点与“平”上的一横和两点又可组成“六”，而一点加“平”，草写又像个“卒”字。后来赵光义于五十九岁时卒，应验了那个谶语。

另据《归田录》记载，宋仁宗赵祯登基后，建元“天圣”，后改元“明道”。有人认为这个年号表面看来尚好，其实不然。“明”可拆为“日”、“月”二字。日、月同时出现，有皇后、母后同时当政之义。其时正是肃太后临朝揽事，人们制造此谶，可能正是不满朝政情绪的表现。

另据《宋史》记载，北宋末年，宋钦宗赵桓改元靖康，此时金兵步步进逼，朝廷危在旦夕，时康王（亦即南宋建国皇帝宋高宗赵构）手下有良将辅助，欲重振国威。手下之人为此立谶语云：“靖康二字若拆开，可得‘十二月立康’，意谓一年以后可重振复国大业”。第二年康王于南方建立南宋政权，这一谶纬也就在民间流传开来。这一谶纬制造的根据是，将“青”拆成“十、二、月”，于是和剩下的部分即组成了“十二月立康”之谶。

《金史·五行志》也载有一年号谶：

卫王即位，改元大安。四年，改崇宁，既又改至宁。有人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变。

这则年号谶用的是谐音法。民俗中，人们将老虎又称为大虫，“大崇至”谐音为“大虫至”。“大崇至”乃大安、崇宁、至宁三个年号的简称。

明谢肇淛《五杂俎》载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号的字谶：

正德乃夏乾顺之号。自古以正为号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类，为其文“一而止”也。武皇虽终享天位，而海内多故，青宫天出，统卒移之兴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

博学多闻的谢肇淛也相信谶纬这一套把戏，他要让人们慎重地对待年号，就是因为他将年号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清吴伟业《绥寇纪略》载明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的谶纬：

崇祯时，有人诣通政司投疏，谓年号宜用古字作“𡗗”，盖以山压宗，故不安，从古文作“𡗗”，则宗社安于泰山也。人以为妖言也。

为了使国运亨通，竟然到了要用生僻古怪的字来改年号，这证明在一部分迷信者那里，年号之字似乎成了命运之根，字不好则国不安。其实，崇祯要亡，何干“崇”事，此种“妖言”在古代如此普遍，到了使人十分震惊的程度，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注视着这迷信心态所包括的文化心理。从以上罗列可以看出，这些“妖言”不仅出自野史笔记之中，而且大多数出自正史。这些年号之谶在一定时代一定范围内产生相当的影响。它反映了中国人对汉字的态度，认为其中是机祥命运之奥府。同时也反映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的命定论的观点，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人命运由天控驭，一国命运也是如此。不是文字的符号促使事物向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发展，文字符号只是传达超自然力意志的媒介，“一人百日了”、“降死”等等结局，都是有天命操持的。归根结蒂，是天命论思想在作祟。

五、诗谣讖

先谈诗讖。

中国是诗的国度，利用诗来制讖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其中也有不少是与汉字有关的。

据《嘉话录》记载，安史之乱前，有一志公大师，能预人吉凶，他作了一首诗在京城流传。诗云：

两角女子绿衣裳，
却背太行邀君王，
一止之月必消亡。

人们开始不理解，待安禄山起兵叛乱到失败后，人们才知道志公大师的那首诗的涵义。“两角女子”，即“女”上多两角，近似“安”字。“绿”谐音为“禄”。“太行”乃隐语表示“山”，“一止”乃“正”字。全诗是说安禄山反唐，后在正月被消灭。这是一首诗讖，但从其有意制作来预测命运这一点来看，又可以视为用诗的形式来测字的，由此亦可见，字讖与测字术的亲缘关系。

《会稽录》也载有一例：

初，董昌未败前，狂人于越州旗亭客舍题诗四句云：“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初人不晓其词，及昌败，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赵城，隋赵国公杨素所筑也。诸侯者，猴乃钱镠中生属也；白兔，昌卯生属

也；夏满，六月也；镜湖，越中也。

这首诗简直成了谜语，实在费解之至，但对于迷信者来说，这里又最有神意可寻。

另据《祐山杂说》记载，明嘉靖癸丑（1553）四月，倭寇进犯，官兵拼力抵抗，但渐不能支，军心衰顿。军中统率在慌乱中竟想起了谶纬这一方法，嘱军中文士编一首诗，诗云：

曲川地可耕，
长刀砍低树。
元来腹有文，
军口三十去。

此诗教给驻军周围的儿童吟唱。军士们听许多孩童都唱这首歌，感到很奇怪，以为非平常之诗。军士中有一十五岁的小士兵说能解此诗。众人急请他说来。他解道：“曲川地可耕，长刀砍低树”二句诗隐一“剿”字。“曲川”喻“剿”左上之“ㄣ”，“地可耕”乃“剿”左中之“田”字，“长刀砍低树”则喻左下之“木”和右之站刀。“元来腹有文，军口三十去”隐一“寇”字。“元来腹有文”像“寇”下的“元”和“𠂔”，“军口三十去”是说“軍”这个字下面除了“口”、“三”、“十”，只剩下“一”。从而合而为“寇”字。众军士听这么一说，以为是天意垂示，打胜已是必然，于是戮力进攻，击退来犯之敌。

很显然，军中将领出此主意不是迷信，而是为了实用的

目的。但是它却利用了人们相信谶纬的心理。中国古代的谶纬大概有两种形式，一是偶然的应验，如一人无意中的一句话后来却成为一些事件产生的先兆，这是巧合。二是有意的创制，古代大部分谶纬都属于这种形式，像上面的“剿寇”之例就属于此。不知情者以为“神”意，其实则是人为。

再谈谣谚。

谣谚在谶纬中活动最为频繁。大多数谣谚均是通过儿童的口传说的，因此童谣又是谣谚谶纬的主体。为什么童谣形式在谶纬中占有重要位置？因为中国人认为童言无忌，最无遮拦，因而也最易显真，在童言中有时却可包含未来事物发展命运的征兆。神灵也往往将神意通过儿童之口传达而出。

在中国古代，童谣甚至被说成是火星（即荧惑星）降临，是天神的代言人。《晋书·天文志》云：

凡五星盈宿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填星降为老人妇女，太白降为壮夫，处于林麓；辰星降为妇人。吉凶之应，随其象告

这里所说的荧惑星，不是今人理解的一般的星辰，而是一种附有神意的星体。它降而为儿童。童谣乃是荧惑星为儿童所造。因此儿童口中之谣，不是等同游戏，而是神灵的语录。因此古代典籍中多有关于童谣之谶的记载。

《晋书逸文》上载石勒未建国前，襄国曾有这样的童谣流传：

古在左，月在右。

让去言，或入口。

人听此言，皆不解其意。一术士解之曰：此为拆字之谣，“古在左，月在右”，乃“胡”字；“讓”（让）去“言”乃“襄”字，“或入口”则是一个“國”（国）字。这童谣是说胡人石勒将为襄国之主。

后燕慕容熙初理朝政时，他的国家到处流传着一首童谣，儿童们在口中唱着，也不知什么意思。童谣云：

一束藁，两头燃；

秃头小，来灭燕。

慕容熙听到此谣，知不是吉举，又不知什么意思，便不许儿童们再唱。后来，慕容熙为高云所灭。人们这才知道其详细意义。“一束藁，两头燃”，即将“藁”之上下两部去掉，剩一“高”字。这是拆字法。下面两句是隐语，高云小名叫秃头。全谣意思是说秃头高云将消灭后燕。

《会稽录》所记骆宾王所制童谣事，更是多为人知：

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有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绣，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妓女骏马，亦不语，乃将古忠臣烈士图共睹之。见司

马宣王，宾歎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童谣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片火、绯衣”之事白之。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与敬业等书，惟有“青鹅”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则天曰：“青者，十二月。鹅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

徐敬业欲反武则天自立之事，从开始的谋划到最后的起事，竟倚仗于童谣。而号称初唐诗歌大家的骆宾王面壁静思的结果，也是制造一首童谣。可见童谣谶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身为朝廷重臣的裴炎，在决定是反叛还是不反叛这样的大事面前，竟然将何去何从的主意压在童谣之上，这也可见童谣的力量。骆宾王是明知故作，假神之力，劝裴炎上船；而裴炎是蒙在鼓中，将人作神，压上了一生的命运，最后将性命都搭上了。裴炎若视此童谣为等闲小事，又何以会出现如此大祸。这则谶纬能够很充分地体现出谶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影响。

骆宾王所编之童谣实际上十分简单，“一片火，两片火”，两火相加，乃“炎”字。“绯衣”暗喻“非”下加“衣”乃“裴”字。此谣是说裴炎要做金銮殿。

中国古代类似这样的童谣极多，从东汉那首“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①的预言董卓将亡的童谣之后，便一

① 《后汉书·五行志》

发而不可收。几乎历代都有产生，而且大都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童谣之外，还有一些谣谚并不是以童谣的形式出现，直接在民间流传，来无影，去无踪，神神鬼鬼，活灵活现，上口，好读，表面上又好理解，因而在民间播传甚快。

如曹丕未当政之前，民间曾有一首歌谣流传，其谣词为：

日载东，绝火光；

不横一，圣明聪。

四百之外，

易姓而王。

曹丕当政后，人们方知道那是一首谣讖，也是用汉字构造起来的。“日载东”，乃“曹”字，篆文“曹”字上从两个“東”。“绝火光”，依五行，汉世属火。此言汉世当亡，曹魏崛起。“不横一”，乃“丕”字，意思是说曹丕将为王。“四百之外，易姓而王”，汉世统治了近四百年，至此应改朝换代。诸不知这首谣讖可能正是曹丕手下的人制作的。

王恭为东晋大将，善清谈，为人正直，当时司马道子、王国宝等惑乱朝纲、陷害忠良，王恭想起兵讨伐他们。有关王恭之事有一首著名的“黄头小人”的谣讖，在历史上广为流传。传说王恭未起兵时，身在京口（今镇江），其地流传着一首谣谚：

黄头小人欲作贼，

阿公城下指缚得。

黄头小人欲作乱，
赖得金刀作蕃杆。

后王恭起兵，朝廷派刘牢之统兵征之，后为刘所杀。王恭死后，人们方悟那首谣谚原是一谶语，预示着王恭将起兵最后为刘牢之所杀的经过。“黄头小人”即“恭”字。“黄头”，即取“黄”这个字的上部，“小人”乃“恭”的下部（应为人下加心，此取其近似）。合而为“恭”字。最后一句的“金刀”乃“卯金刀”的省略，即“劉”（刘）字，暗指刘牢之。这种谶纬显然也是有意制作的把戏。

另据《晋书·苻坚载记》记载，苻坚其人甚为迷信，对谶语这一套相信不疑。据说他的名字就与谶纬有关。《晋书》上说，他出生时，“有神光自天烛其庭，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于是他将老祖宗的姓“符”改成“苻”，以应“草付”之谶。又起名曰“坚”（坚），即是所谓“臣又土”了。合此谶文，意以后能称王于咸阳了。他在一生的频繁战事中也十分重视谶纬的力量。《晋书》载其与西燕主冲屯兵相加，相持甚久，不分胜负。《晋书》云：

城中有书曰《古符传贾录》，载：“帝出五将久长得”。先是，又谣曰：“坚入五将山长得。”坚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朕如此言，天或导予。……”

苻坚从这二语中得到信心，以为天助之力，率领众将士攻入五将山中，但兵受阻，最后被姚萏部下吴忠擒拿，在新平佛寺中缢死。此时人们才知道，那二语原是谶语，对苻坚

来说乃大凶之兆。“五将”即五将山，“长”乃“𦵏”的隐语，通过谐音而制作。二语均是说苻坚将被姚𦵏所俘。

以上分析了字谜的主要表现形式。下面则简单谈谈字谜的制作方法。

所谓字谜，最终都落实到汉字的身上，它无非是利用汉字的形、音、义特点来从事这种迷信活动，其中尤以字形为主。这一点我们在以上的分析中都穿插谈到了。以下再谈谈字谜的一些特别制作方法，这些方法有些是和一般测字术不同的，有的却是易为人们所忽视的。

首先谈谈字体谜的制作方法问题。

测字中有字迹占断方法，字谜中也有利用体势的变化来推知人的命运的。这一点一般情况下不为人注意，易为忽视。

清褚人获《坚瓠九集》卷四引《马氏日抄》云：

门字两户相向，本无勾踢。宋都临安玉牒殿火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勾脚带火笔，故搯火厄。遂撤额投火中，乃息。后书门额者多不勾脚。

将一场大火归之于“门”字的一个勾脚，真说得神乎其神！

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宋徽宗登基，次年改元崇宁，由当时丞相蔡京书写，并以其体刻字。蔡京将“崇”写得像个“崇”字，将“寧”（宁）中的“心”省去。后来蔡京权倾朝纲，陷害忠良，民间流传一句民谣：“有意破崇，无心宁国。”人们开始不了解它的意思，后来才知道，这两句民谣正是针

对蔡京所写的年号而发的，借此隐讽蔡京。其中所采用的制谶方法就是书体的变化。

清周亮工《字触》所引一例也与字体谶有关：

罗浮先生轩轅集，唐宣宗召入内廷。问曰：“朕得几年作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书“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

这笔一勾，勾去了二十六年。

其次再谈谈字图谶的制作。

字谶的制作在很多情况下是和图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它与测字术的差别之一。如《推背图》就是图和文字并行的，是字谶和图谶的结合。中国人把“河出图，洛出书”作为中国文化之源，其实那也是图谶而已。图谶在谶纬术中运用普遍，这是和谶纬与具体的自然现象具有直接关系这一点相关的。

兹举《推背图》的个别例子予以证明。如“既济”一谶，“既济”本是《周易》第六十三卦之名，这里用以说明朝代更替之事。此谶上有一图谶，图上画一高山，高山上有一猛士张一弓箭，箭矢正对山下。山下有一肥猪，肥猪上骑一美女，荒唐又可笑。下方为文字谶，共两首诗，第一首诗乃三言，诗云：

红颜死，大乱止。

十八子，主神器。

第二首诗是一七言诗，诗云：

龙争虎斗满寰区，
谁是英雄展霸图；
十八孩儿兑上坐，
九州离乱李继朱。

这则图讖、诗讖曾引起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治纷争。朱元璋的第十八子欲为王，搬出了此讖，以为上面说的“十八子”即是指他。另外，明成化年间有一李子龙的人，以为自己姓李，李可拆为十八子，故可合讖，以致做了反叛朝廷的事。这个讖是图讖和文字讖结合在一起的，图讖使文字讖的内容形象化，文字讖又进一步说明了图讖的意思。在这一图和文字相结合的讖纬中，汉字仍然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从形体上说，“十八子”合而为“李”字。从字音上说，图上之猪显然是以谐音的方式指“朱”。从字义上说，“红颜死”，这里的“红”实际上是“朱”的隐语。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七也载有一例：

术士李某者，亦传管辂轨革法，画卦影颇有验。
今丞相倾尝问之。卦影画水边一月，中有古字。未
几除知湖州。又卢龙图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
州，虽不同而其影皆符。

这里画的水边一月，中有一个“古”字，合而组织成“湖”字，这是典型的字画结合的例子。

复次，再谈谈谶纬制作中的隐语方法。

谶纬是一征兆，后来事发后被应验了。因此一般来说，谶纬开始人们并不详知其情，只是事出后才恍然大悟。如果谶纬的制作，人们一览易知，这样就不可能使人们感受到其中的神秘。正如《易大传》所云：“变化不测谓之神。”既然是神灵凭倚，那就应该具有恍恍惚惚、奇奇怪怪，似象非象的特点，这样人们才可能将命运的几微和谶纬联系起来。所以，谶纬包括字谶在内，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隐”。

以汉字来制谶，能够很好的体现这一特点，所以才能受到那么多谶纬制造者的注意。字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字谜，造一字谶就等于造一谜语，而术士解字谶，实际上也就是猜谜语。“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一喻涵“董卓”二字的谶语，实际上就是字谜。所谓“一束藁，两头燃”（高），与字谜并无二致。

字谶这一隐的特点，不但是制作谶纬的基本方法，也是维持谶纬神秘性的基本手段。它给人们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又给人们的附会增加了一定的兴趣。

第八章 测字的价值评判

第一节 测字的负价值

测字术的负面价值是十分突出的。对于测字，只要不是太迷信的人，都会说，这是一种骗人的把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迷信，是应该弃而不顾的糟粕，对待测字只能用批判的眼光相待，研究测字，也应立足于批判，去寻找这一方术活动赖以产生的根源，揭示其种种惑弄人的内在货色。

这里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测字的虚伪本质：

一、汉字中到底有没有神

测字迷信是建立在如下逻辑基础上的：它的根源是汉字崇拜，以为汉字是神灵的创造，汉字中蕴育着神意的密码，它不是一般的语言记录符号，而是一种神灵凭依物。这是测字迷信的逻辑起点。其次，既然汉字是神的符码，神是无所不能的，它在冥冥之中注视着人间的一切活动，支配着人的一切。有意求神神不得，无意求神神自来，测字中通过求测者随意一写或无意拈取，在这偶然性中就蕴含着必然性，通过

这无意的选择，就接通了神灵的汉字和个体命运的内在联系，于是那个汉字就成了显示自己命运的符号，或者说神通过一个汉字将你自己尚闻而不知的命运呈示给你。由神的汉字到蕴含自我命运的汉字的转化，这是测字迷信的逻辑中介。测士只是传达神的意旨的中间人，因为他们都弄得神神鬼鬼，懂天文，识地理，熟知易数，所以能“认读”出神所附在汉字中的道理。测士的高明就在于他比普通人更具有通神尽人之心。而求测者的相信，可以说是测字术的逻辑终结。测字者何以能相信，就因他感到汉字中经测士剔发出的成分与自己的命运有暗合之处。

从这个迷信心理逻辑出发，支撑测字术的根本是人们以为汉字是神灵的符号，没有这一点，仅仅把它当作语言符号，测字术就不可能存在。这就像用易占筮一样，如果人们将八卦、六十四卦当作一些普通的符号，那么易占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汉字里究竟有没有神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正如前文所说，汉字的造字神话是人们虚构的，汉字乃神灵的符码乃是人们想当然的结果。汉字是先民智慧的产物，是集体创造而成，早在先秦，荀子就指出了这一点。汉字正像世界所有语言符号一样，都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创设的。汉字是“老寿星”，产生于荒荒亘古，漫长的历史，没有具体记载的造字过程，扑朔迷离，恍恍惚惚，似乎总有点神秘难测的味道，但这并不能证明汉字为神创造这一假设。

撕开测字的面纱，驱散笼罩在汉字身上的神秘色彩，那么测字术的荒诞便显而易见了。到文字中找命运、找神灵，显然是不可能的，将自己命运颤颤巍巍地交给一两个汉字，其

能算是一厢痴情而已。

汉字中本无神，本与自我命运无关，但迷信者为何偏偏这样来看问题呢？因为只要心中相信神奇怪异的现象，他就可以把一切都变成神灵的凭依物，星星坠落，月亮明暗，花开花落，水流鱼跃，山风远火，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视为神的降临，命运的启示，何况这不知从哪儿来又造得如此精致高明的汉字呢。

二、为什么传下来的测例都说灵

从古代野史笔记到测字的汇集著作，读者几乎找不到一个测字不灵的例子，每个测例都说灵，个个求测者都称灵灵。

这是不是反映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呢？

我们不能说测字都不灵。从概率上说，也有碰巧的时候，如你问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有两种可能，测士不论说男还是女总有 50% 的概率。如问科举考中还是考不中，问客人来还是不来，问病好还是不好，问官司赢还是输，等等，都有一半的概率。至于一事有三种乃至更多种可能的话，虽然概率小了，那也有说对的可能。

但是，汉字中并没有命运的信息，测字先生不可能从这里掘取求测者需要的东西，他们煞有介事地以汉字来说解人的命运，基本上是一种骗局。因此他们不可能将每一个测事都说灵，即使再走运，也不可能钻了所有概率的空子。因此，古代测字包括一些名测字先生的测字都有大量说得不对不准的情况，实际上连测士自己有时也承认，如测字中为测得不对的现象制造了一些隐语，如“不端”，即未说对；“破碎”，

指牛头不对马嘴；“将康”，指骗人。

但为什么史籍中几乎没有这种不灵的测例记载呢？这是记录者有意识的选择。因为在测字中，测对了，人们都说灵，一传十，十传百，“好事”的文人把它记录下来，于是一个测字的神话就树立起来了，而对于那些测不准的例子大家都缄口不语，讳莫如深，为“神者”讳。于是这些不灵的例子就被“隐”去了，“走麦城”的例子退居后线，剩下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测林”中出现的都是高手。这种有意识的有选择的承传，大大强化了测字的神话，增加了它的欺骗性。

三、“灵”的测例根源何在

如果说测得灵的例子都是走了概率的运，这也并不客观。因为这样一来，测字就变成了完全碰运气的行为，测士的高下也完全不存在了。如果“测林”中躺着的都是些靠运气吃饭的糊涂虫，那么只要你识字，什么人也能做测士。

问题好像并没有这么简单。

中国古代测字术中有不少测得准的测例并非靠运气获得，而是靠测士的“内功”。如一人来测字，他写一个字，于是你就看这个字，拆开这个字，或者再用谐音法联系，或者再联系五行六神之类的劳什子，如果你这样做，要想算准，只有靠运气了。要靠这样养家糊口，必定喝西北风。测士能测准的根源不是从汉字中挖出，而完全凭得是字外功夫。

首先，一个高明的测士必须精研时代以及求测者的心理，熟悉外在环境。如周生至杭州，有人以“杭”字测国事，他将字离合成“兀术”二字，言金兀术将进犯。这一结论不是他从“杭”字中看出的，而是从当时飘摇动荡的形势中看出

的。但是应该承认周生的机智，他将由形势分析得出的结论，和汉字离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使人们误认为，测士是由字中测出这一结论，以为是命运使然。测士们打的就是这种“时间差”。因此，一个高明的测士必须能对汉字结构有熟练地掌握，同时要反应机敏，善于佯虚避实。这种情况在古代测例中很多，如谢石由“春”测出“秦头太重，压日无光”，明代一测字先生由“有”字测出“大明已去一半”，都属这种情况。

其次，要变相字为相人。测字是通过字来推测人的命运，这其实只是个幌子，其真实情况是通过人来推测命运。因此相字从根本上说是相人，文字的离合等只是提供了说解由人得出结论的一个媒介。

因此，测士的荦要功夫在于见风使舵，观颜察色。这样才能在“字里字外”翻出新颖的筋斗。

在测字中具有指导意义的《元黄克应歌》就曾授与测士观颜察色的机宜，测士们对求测者要观其服色，察其脸色，辨其“成色”，是官宦要向官路上说解，见穷夫要为其觅生途，气宇轩昂者必定有上佳前程，情绪压抑者似有伤心之情。测士们要观之度之，从而轻语判之。一些测字先生将这一点发挥得更好，开始时是不置可否，其后是略显倾向，再观对方颜色，若显和融，再向前推演，若有皱眉，即刻煞车，再寻他途。当然也有不看求测者反应的，这就要看测士有无把握断定求测者所测之事的基本属性：高明的求测者能从对方的言谈举止中找出绝处逢生的地方。

观颜察色的方法在测字中运用十分广泛。如宋徽宗曾请谢石测字，以一“問”字求占，谢石感到此人很眼熟。后想

到他就是当朝皇帝，有此结论后，他便开始盘算汉字了，最后二者豁然贯通，说：“右为君，左为君，圣人万岁”。说得宋徽宗眉开眼笑，神也知道我当皇帝？

而马守愚为一媒人所测“吉帖”二字，来者占他此次所介绍的婚姻是否顺利，马守愚见来者口齿伶俐，干事练达，于是判断他此事能成，便将“帖”字的“占”移向“吉”下，像个“喜”字，说此事必圆满，后来他又揣度既然媒人对此事成否尚有怀疑之处，也许会生出什么关节，于是又补充道，“吉”下之“口”和“帖”左之“巾”，岂不成个“吊”字，便断言婚后也许不太吉利，后果然如此。这里虽不乏机智，但也看出马守愚占卜时的确有观颜察色在作帮助。

复次，要使测字“灵”，还有个问的功夫，只要测士有意识有选择地提问，再精明的求测者也会露出蛛丝马迹的。

清程省在《测字秘牒》中总结了一套问的功夫。如有求测者来，先不测字拈字，而是问对方五行、属相、生年以及一切相关的东西，这就如同一般算命术中的切问一样，就为测字占断奠定了基础。

四、为什么同一字占出不同结果。

在测字中，一字占出不同的结果的例子举不胜举，一方面它可以显示出占卜者的高深学问，另一方面也很奇警有趣，因此历来笔记小说作家都喜欢记载它。

表面看起来，汉字里神秘无方，随运示意，但实际上是测字者的外在辨别的结果。如上举宋徽宗以“問”求占，谢石说是“右为君，左为君”。而另一人为道士，道士之术谢石是很清楚的，当道士也以“問”求占时，谢石说：“门虽大，

只有一口。”这种解说很符合道士的特点，根本不是汉字中蕴含了不同人的不同的命运。再如我们在书中论及的两人同以“串”为占时，测士见前人很虔诚，书生气很浓，称其为“二中”，科举连中。后一人完全是投机取巧，所以测士才说他有心为之，故为“患”，揭去其神秘的外在面纱，实在是观人、观色等的结果。

综上所述，测字行为是一种道地地地的迷信活动，它是以文字的形式来做一些欺骗人的事。这种活动显然是一种文化糟粕，对人们的心灵起到腐蚀作用。同时测字的流行还破坏了汉字的纯洁，剖文拆字的习惯更助长了人们对文字符号的“凌迟”，这与文字的正常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第二节 测字的正价值

测字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迷信活动，消极意义是主要的。但是，测字是不是一无是处，连一点研究问津的价值都没有呢？这也不尽然。测字作为一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文化活动，它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维特点具有一定的联系，它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一种曲折的反映。这是测字的正面价值。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看。

一、反抗心理

测字是一种迷信活动，它的触及范围比较大，不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均可以字求占，而且军国大事中也不乏测字的介入。

统治阶级不放过一切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方术也不例外。测字就常为统治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鸣锣开道，使其变成证明自己合法性的工具。但是测字作为一种方术活动，它的产生并没有贴上只供有权势者享有的标签，测字的大部分活动恰恰在民间。统治者可以利用测字去愚弄下民，老百姓也可利用测字去曲折地与统治者抗衡。在测字术以及与此相关的字谶、梦验等活动中，有大量的内容表现了下层人民对政局的不满，对奸臣贼子的抨击，对那些给百姓带来灾难的人的咒骂。测字术当然是一种迷信活动，既然有人相信，就可以在其中做文章。因此利用测字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实际上就在这愚昧的形式中包涵了一点积极意义。

首先，测字是由测士来承担的，因此它表达了测士的许多反抗情绪。在测字这一“阴暗角落”中，不乏一些阿谀奉承之徒，一遇到眉眼有点熟、像当朝皇帝的人，便急忙想方设法往“王”、“主”、“皇”这类的字眼上绕，说得一个个隐姓埋名的君主们眉开眼笑，以为神助。也有不少测士虽然操此歪道，但良心尚未泯灭，还有一些正义感。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六云：

谢石之拆字，小数也。然拆“抗”字，
知兀术之复来，拆“春”字为秦头之蔽日，
则事与机会，隐讽存焉。贾似道时术士拆
“奇”字，谓立又不可，可又不立。亦足
寒奸之胆矣，而不免杀身，悲夫！

谢肇淛在这“小数”中看出这些平凡测士的正气，他们

通过测字，寄托自己的“隐讽”，从而起到“寒奸之胆”之作用，倒也不失士人的耿介。

谢肇浙所举之二人，一是大名鼎鼎的测士谢石，一是“测坛”中的无名之辈，二人反抗奸佞的方式不同，但其结果却惊人得相似。

《说海》记载：

次日，（宋高宗）召见便殿，书一“春”字命相，石奏曰：“‘秦’头太重，压‘日’无光。”上默然，赐赉命出。是时，秦桧专权，闻之大怒，乃阴中以他事窜逐岭表，一卒押行……石竟不返。

谢石因拆字抨击奸相，最后被放逐，死于他乡。这位一生会测其他人命的人却没能算出自己的命，他在放逐途中还是让其他人为自己算命。谢石的测字压根就是一种骗局，只是骗得高明、骗得有水平，从这里的“‘秦’头太重，压‘日’无光”就可看出其不凡的拆字本领。但是面对宋高宗的心病，他却以骗的行为做了一件真实的事，表达了一个正直的文人对奸相当政的忧虑。他也许并不是没考虑到此一测的代价，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微言讽谏的勇气。谢石在后代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可能也与他的这种人品有关。

另一关于贾似道的测例也流传甚广。据《字触》所引此事云：

贾似道有异志，一术士能析字，贾以篆画地作

“奇”字。术士曰：“相公之志不谐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不‘立’。”贾默然，求其罪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诸途。

谢石测字遭放逐，这位术士则因此丢了性命。他巧妙地 从“奇”字中拆出“立”、“可”二字，编出“立又不可，可又不立”之语，给贾似道奸心以当头棒喝。他明明知道眼前站着的是权倾朝纲的奸臣，又明明知道自己测后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结果，但他却利用这一曲折的方式对贾似道予以有力的抨击，这就是中国士人背后所隐涵的凛然难犯的精神。

中国士人为什么有时候选择那样曲折甚至是邪门歪道的方式去批评朝政，这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关。中国文人士大夫立身处世，都以立身报国、有功于世为总体目标，都有一种难以拂拭的日日萦绕脑际的政治关怀意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们在政治关怀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促成了他们产生一些独特的行为方式，如利用隐晦曲折的途径讽谏朝政成为文人习用的方法。因为在王权的大厦面前，士人的命运轻如草芥，他们要表达对政治权威的不同意见，若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有时难免碰得头破血流，因而优柔含讽、微言讽谏成了他们的唯一途径。假托测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政治的关怀意识，就是一种隐晦的途径。不但可分可拆的汉字具有隐的特点，而且他们手中还握有神的权柄。因此以这种方式干预朝政，成为一些下层文人惯用的“伎俩”。

像谢石和那位为测字丢命的术士还是不乏其人的，南宋时的瞎子汪龙就是其中的一位。汪龙眼虽不明，但心甚明，他傲视权贵，同情弱小，煞富人气焰，为穷人开解。如前举有

一朝中显贵，托一位姓袁的南工部员外去求汪龙占解，来者拿的是一白围棋子，汪龙在算出对方来意之后，占道：“这棋子非木非石，经水火锻炼而成，全无生意，你的这位上司休想再有茅嗣了。不但如此，还会招致祸殃，在任上暴卒。”汪龙对朝中显贵的求测，没有一点逢迎之心，反而痛下针砭，给他一个极坏的测语，丝毫不怕得罪那贵人。

其次，测字术不仅体现了测士抨击时政、“不畏权贵的精神，暂时也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反抗意识。这一点在字谜中表现得尤其充分。

《贵耳集》云：

“崇寧”，钱上字，蔡京所书。“崇”字自“山”，字一笔书，“寧”字去“心”。当时谚云：“有意破蕃，无心宁国。”

老百姓所编出这一谣谚既巧妙又尖锐，直刺这个奸相，通过拆字的手段起到了讽刺时政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朝廷昏聩，奸佞当道、灾祸连连，老百姓遭受无边无际的苦难，这种事频频发生。人心晃动，民怨沸腾，因此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情绪。方术活动则是他们所运用的方法之一。这似乎形成了屡屡不断的历史传统。

最早的一则表达下层人民不满的拆字例是针对汉末董卓的。董卓之乱，使民生涂炭，河山焦土，当时流传的一则谣谚是：“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以拆字为方法，以童谣为手段，表达了下层人民对战乱的厌倦和对战争狂人

的愤怒，这首民谣犹如“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上古民歌一样，充满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同时也代表了当时人们渴望和平的愿望。从字面的意义上说，它是消极的。从其产生的历史作用看，又是十分积极的。这首民谣被载入正史，世代流传，对后代很有影响。

安禄山之乱时，民间所流传的那首歌谣也表现了人民的不满，歌云：“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这与其说人们在给安禄山预测命运，倒不如说借方术表达人们希望战乱即早结束的愿望。

在年号谶中，这类例子也不胜枚举。中国古代有很多朝代是太后干政，宦官惑乱朝廷，有时候人们就利用年号去表达这种不满。如晋元帝时权从旁出，当时有“永昌”年号，郭璞就谶“昌”有二日之象，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必为不祥，语含讥讽。宋仁宗时，母后当政，当时人颇为不满，也在年号上作文章，当时的年号叫“明道”，这“明”有日、月之象，乃日月同道，于国不利，目标直指太后。仁宗朝又有“天圣”年号，有人将“天”拆为二、人，二人入圣。二人同圣，定为不吉，也有批判色彩。当时还流传一句民谣，叫做：“二人口耳任东西”，也就是暗喻“天圣”二字。“二人”为天。“任东西”，任意飘零，飘落了“人”，还剩“壬”，与“口”、“耳”合而为“聖”。这句民谣的真实涵义是：母后当政，朝廷混乱，民不聊生，人民任意飘零。

有的借年号抨击暴君。如隋炀帝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暴殄天物，人民早已愤怒难忍。时有“大业（业）”之年号，“识者恶之，曰：于字离合为

‘大苦来’。”^① 这大苦来真是对一个暴君的最辛辣地讽刺。

二、思维形式

思维方式存在于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最深的层次，在其潜隐处控制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认识习惯等。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在其民族的长期发展形成的，它在形成以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该民族成员在外在文化活动中总是要不知不觉地受到它的影响。

思维方式在人们大量的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不仅体现在有积极意义的文化活动中，也体现在消极的甚至被认为是糟粕的文化活动中。我们认识汉民族思维方式，常常从它的哲学观念、宗教意识、艺术传统等方面去追踪；这些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人们一般不屑于从方术这类的文化糟粕中捕捉我们民族的思维形式，但是在方术活动（包括测字）中思维方式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而且具体可感。对这其中的思维活动的挖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汉民族的思维模式。

在中国的思维形式中，最突出的就是辩证思维。这一思维形式蕴育于原始文化的氛围中，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如中国人考虑问题总喜欢从两个方面去看，有阴必有阳，有天必有地，有男必有女，有日必有月，有上必有下，有进必有退，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有大必有小，有贵必有贱，有长必有短……造化赋体，肢体必双，人们看待事物亦应如孔子那样叩其两端，于是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系列两两相待的范畴，如有无、高下、形神、道器、心物等等。正如朱

^① 《隋书·五行志》。

熹所说“两物相对待故曰文，若相离去，则不成文矣”。在民间，对对子成为一流传不息的习惯，文学中骈文异常发达，在思维中有一种求偶的习惯。对立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发生关系，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

这种辩证思维形式根深蒂固，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活动。在测字中这一点也得到充分体现。

测字中首先注意阴阳之变化，清程省在《测字秘牒》中将“察阴阳相推之理”作为测字首要之事。测字中不仅求测者有阴阳，求测之时间空间有阴阳，而且所拆之字也有阴阳，把握阴阳关系的变化，也就会极命运之机微，知天地之义理。

测字中将所有笔画、笔势分为阴阳二元，他们根据字画的阴阳关系来判定凶吉，如其将笔画分为浓淡、肥瘦、长短、阔狭、反复、顺逆、曲直、高下、大小、软硬、开合、清浊、虚实、凹凸、平正、斜侧、圆满直率、明白轻快、稳重跳跃、枯槁腴润、朴素艳冶、老硬细嫩……相反又相成，相对又相关，相互转化，神鬼变迁，全在于这二极的处理中。

测字将阴阳贯串在整个占断中，如五行的笔式，同一个木，有冷水和温木，同一个火，有炎火和一般之火之别。这其中都体现了叩其两端的思维习惯。

在凶吉的占断上也是如此。测字中有所谓“反体”。《新订指明心法》上说明此体云：

喜字来问者，未可言喜，有舌字脚。有以庆字来问者，未可言庆，有忧字脚。星字来问者，日在上，星辰不见，问病必凶。

这种“反体”的原则在测字中运用十分普遍。一般测字先生都能熟练运用此法。以吉利之字来占反得凶，以凶字来占反得吉，吉凶变通，超息转换，越发显示出测字的神秘来。如以“死”字来占，反得生子。拈一“恶”字，反得上上大吉。如此之测例，在一些测字著作中所载之多，前文已经述及，兹不赘述。

在字谶和字梦中，凶吉反复的现象也层涌屡出。如唐张元《独异记》记载的一例，隋文帝杨坚未登基时曾夜梦自己失去了左手，醒后感到是不祥之兆，后一术士告诉他：“你将为真龙天子。无左手者，独拳，即独掌权力，非王而何。”梦失手而有帝王之象。还有那个著名的梦刀传说，西晋大将王浚夜梦屋梁上有三把刀，一会又加了一把刀，把他吓得一身冷汗，以为是大凶之兆。后来术士说此预示他将为益州刺史，化凶为吉，化险为夷。反而得正，这正类似于一般测字中的“反体”。

在测字中甚为流行的“对关测法”也能比较充分地体现辩证思维的特点。清程省在《测字秘牒》中首先列出的“测字十法”中将对关法作为重要的方法提出。这种方法是在测一字时，将一个字分为头、脚两部分，从而组成两个新字，如“帛”为皇头帝尾，“淋”为楚汉相争，“茆”为残花败柳，“唐”为康头居尾，“钞”为披沙拣金，“梳”为中流砥柱，“秦”为枯木逢春等等。这种对关法也可以称为“一体二元”，将一字分为二，并在许多成对之字中发现相对的意义，如“楚汉相争”、“枯木逢春”、“披沙拣金”，意义相反。这种方法被程省称为“字中第一要义”，它实际上体现的还是辩证思维的特点。

中国民族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具象思维。中国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国度，以思维的具体性而著称，对具体感性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概念逻辑的兴趣，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不脱离具象，正如章学诚所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文史通义》）

日本比较思想家中村元谈到这一思维特性时说：

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是具象的，而在概念表达方面，他们也喜欢作具象的表达，即使是理论性的证明，也依赖于知觉表象，喜欢作图例式的说明。^①

中村元将汉民族具象思维特征和原本具有的象形特征的汉字联系起来，这是独具慧眼的。汉字胎生于象形，它是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基础上产生的，在现代汉字中，即使许多字已脱离了它原来的象形特征，但还是残留不少痕迹。这种语言符号盘踞在人们的思维深层，日浸月染，对人们的思维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测字中由于不像语言使用时那样，只是把它当作一般的语言符号，测字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将汉字本来取象的外物直接代入测字中，更促进了文字符号和外在世界的直接联结。如拆一石，联系石的特性，测到一水，则联系水的特性，在测字中所感受到的汉字更具体，更形象化。

① 中村元《比较思想论》，中译本，第169页。

如有一个人以“耕”字请瞎子汪龙占行人，汪龙说：“已经回乡了，在井旁。”那人回去一看，他所要占的人果然已经回来，正在井边。“井”本是“耕”字的一个偏旁，但在这里则被完全具象化、实在化了。

清时有赵介山、帅仙舟二进士，一向相处甚睦，中进士时又亲自接受皇帝的面试，对此他们不放心，写一“秦”字请测字先生为之占算。测士道：“二君定得重望，荣登鼎甲，因为字拆开则为‘二人’在‘三人’之中。”将一个并非象形的字完全具象化。

测字有时候也是“造字”，即通过物来组合新字。在这里，测士们在潜意识中实际上重新用起了先民造字中的象形、会意等方法，把具象性作为构字的基本原则。

如《元黄克应歌》说：“一女一子成好事”，因为“女”和“子”组成“好”。又说：“若见女人携女人，阴私连累主官司。”何以立据？因为三女为“姦”（奸）。又说：“木边书古为枯枝。”其理同上。

在测字中，以下这种组合非常常见：如以“立”字占，正遇下雨或挑水人，有“泣”之象。如一人以“四”为占，正遇狗叫，则有“哭”凶。如此等等。

这种对汉字的象形、会意等创造方法的“复归”，将汉字和外在世界紧密联系起来。这实际上促进了具象思维模式的延展。

在具体的占断中，重具象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测字中有一种方法叫做观梅法。清程省在《测字秘牒》中将其作为“观字十法”之一，他解释说：

观梅之法，活泼泼地。惟在人的心境光明，随物洞照而不遗纤毫。

这种方法要求测字者从一般字的符号中超升而出，而面对“活泼泼”的感性世界，以自己的心灵和感性世界相互映发，随物流转，最终把握吉凶之秘。如同观赏梅花，感受它的生机活意。

测字中普遍采用的字貌法即属于此，前已详论，兹不再述。凡此都可以看出测字中对具象的推重，体现出我们民族的具象思维特性。

三、游戏功能

人生在世，紧张的生活节奏、艰苦的创业道路，使人有时感到活得很累，总想轻松一下，于是产生了幽默。没有幽默感的心灵是一颗沉重的心灵，人类没有幽默很难想象她会怎样繁衍生息在这个星球上。幽默的形式很多，如俏皮话、双关语、漫画、趣闻佚事等等，而我们中国又特别推重咬文嚼字的幽默，特擅拣弄文字技巧，在语言文字的变化中显示出趣味来。在中国古代的幽默记载中，利用文字形式制造的幽默又最多。汉字是一个广涵深蕴的世界，是一座启颜逗乐的奥府，它既可分可拆，又可组可合，既可以音会，又可以义联，还可以模形状物，由此生发出般般奇趣来。中国古代著名的幽默大师如杨修、苏东坡、纪晓岚等无一不以擅长文字幽默而见称。

如传说曹操曾送给杨修“一合酥”，杨修便把它分给在座的人。在座的一人站起说：“皇上所赐嘉品，怎好拿来分人？”

杨修说：“这上面不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吗？”他把“合”字分拆为“人、一、口”。因此产生奇趣。

再如以前有一个苏姓人邀一朋友来吃饭，这朋友也姓苏，他让客人坐在桌子的北面，自己坐在其对面。不一会，他的夫人端来三盘菜，一盘韭菜，一盘红烧鱼，一盘红烧羊肉。主人将韭菜放到客人面前，另外两盘置于自己跟前。两人开始饮酒，桌子很大，筷子很短，客人吃不到那两盘荤菜，只能蘸点老韭菜。于是他对主人说：“你我都姓‘苏’，‘苏’字还有一种写法是将鱼放到右边作‘𩚑’。你看应该放到哪边好？”主人说：“古人制字，不拘一形，放到哪边都行。”客人又说：“‘群’字有一写法是把‘羊’放到‘君’下，你看放到哪边对？”主人道：“这也是异体字，放到哪边都可以。”于是，客人站起来，将鱼和羊肉挪到自己跟前，并说：“这是异体字。”主人这时方才知晓，大笑，几至喷饭。

汉字不仅能在形体上制造幽默，还能在声音上制造幽默。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载有一例：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与杨诚斋为金石交。淳熙中，诚斋为秘书监，延之为太常卿，又同为青宫寮审，无日不相从。二公皆善谑。延之尝曰：“有一经句，请秘书对。‘杨氏为我。’”诚斋应曰：“尤物移人。”众皆叹其敏确。诚斋戏呼延之为“蝥蛸”，延之戏呼诚斋为“羊”。一日食羊白肠。延之曰：“秘书锦心绣肠，亦为人所食乎？”诚斋笑吟曰：“有肠可食何须根，犹胜无肠可食人。”盖蝥蛸无肠也。一座大笑。

在这里“蟾蜍”与“尤表”音谐，“杨”与“羊”同音，杨万里和尤表这两位宋代大文学家正是利用谐音来相互打趣的。

测字是一种运用汉字所产生的方术活动，别看它是为人占卜命运，重要无比，马虎不得，怎么能拿人的命运开玩笑？但这也不见得，测字时，高明的测士能沉甸甸地给你说着未来命运，又能轻悠悠地开着玩笑。因为汉字是一种太富于幽默趣味的材料，朱光潜先生将这种文字称为“隐的文字”，在形体的组合和声音的系联中隐藏着一片有意义的世界，以字来制谜就充分体现隐的特点。也正因这“隐”，它才能发展成为一种方术的材料，才能被认为具有微妙难测的义理，人们才会去相信它，追溯它，从中掘取命运的确证物。测字从迷信上说，是一种算命术。如从它离合文字等特点上说，它又是在玩弄文字，利用这种文字的巨大可塑性来欺骗求测者，为测士弄口饭吃。

在测字中，肢解文字，任意解说文字，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字在测士的手中可以任意玩弄，像一个变幻莫测的魔方，颠过来说，倒过去说，这样听似乎有点道理，那样听似乎也有道理，同一个字不同的人测，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实际上都没有道理。求测者爱听这一套，就是觉得你把汉字弄得很神秘，玩得很精致，说得很在理（大多数时候是碰巧）。他们有时觉得测字对预测其命运很重要，又感到测字过程很有趣。测字本身的神秘荒诞性本身就构成一定的趣味，再加上汉字的“隐”的特点（这是制造幽默的必不可少的材料），使测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游戏功能。

我们从人们的接受心理方面也能看出测字的游戏功能这一特点。古往今来流传的测例成千上万，宋元以来野史笔记中对此有广泛记载，自宋以来，历代都有不少人对此感兴趣，至今仍不乏其人。喜欢迷信的人当然有不少是相信它能预测命运，但也有不少人把它当作奇闻佚事，当作吸引人的故事，看起来很有趣。因为幽默有趣常常产生于在平常的东西中找出不平常来，在人们习惯中“榨”出奇趣来。汉字就是和人们朝夕相处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只要是读书识字的人，都对他所接受的文字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如“三”这个数字，是表达一定数量的概念，但测字时偏不这样看，测字者就是要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定式，这样才能显示出神秘来。如一人就以这“三”字来占卜自己的婚姻，测士并不是说有“第三者”插足，而是说“始终如一”，因为“三”上中下三横都是“一”。这种占卜结果使迷信者感到很神秘，一般人则感到很有趣，真有一种“亏他想得出”的感觉。再如一人乃未婚男子，想占一占他未来的意中人如何，拈得一个“域”字，他是个识字的人，想想这也只不过是地域、领域的意思，和我那未来的女子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测士则不为这一习惯观念所束缚。测士道：“想小先生真是福份不浅，你不久必得一佳丽，有倾国倾城之貌。”书生进问其由，那测士说：“从文字上看，‘域’左为‘土’，‘土’乃‘城’之半。右为‘或’，‘或’为‘國’之内。且‘域’中二字均有倾斜之状，岂不是‘倾城倾国’。”这里完全摆脱了语言的缠绕，能快耳目，怡心扉。

“不是相信它，而是读起来有趣。”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谈到测字时所说出的这句话，这正反映测字的突出的游戏功能

的特点。

测字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游戏，是因为测士们常用一种游戏的心态来看待汉字，而许多人也以游戏的心态来接受。不少测士对待测字都有一种游戏精神。谢石就是典型一例。

传谢石拆字因得罪秦桧而被放逐，途中遇一人依山而立，举着一个为人相字的招牌，谢石心里很好笑，难道这深山处也有相字者吗？想考考对方，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情写了个“谢”字请测。那老者微微一笑，说：“你也是个术士。”谢石问：“何以见得？”那人道：“此字乃是寸言中立身罢了，以三寸不烂之舌惑弄人，糊口饭吃。”谢石又写“石”字请测。那老者说：“这实在不是好兆头，石逢卒为碎。今所押者为卒，岂不是碎字？”问那卒姓何，答曰姓皮，老者云：“石遇皮为破，你真是在劫难逃。”谢石听到这里，心慌意乱。老人说：“你也是个术士，测测我是什么人，就以我站在此处为占。”谢石说：“人立山旁为仙，先生莫非是仙人？”那人微微一笑，杳然不见了。人不可能遇到仙人，这则故事显然是个神话故事，是后代的“好事者”编造出来的，它的目的实在是对这位测字大师开个玩笑，其游戏功能是十分明显的。宋徽宗也曾和这位大师开过玩笑。当时谢石作承信郎。一天徽宗对谢石说：“我亦能拆字。”谢石问如何拆来，徽宗说：“你姓谢，即所谓身在讨论中，一直不能定选。”后谢石始终不能升官，知道的人大笑不已。这显然不是在拆字，而是利用测字在开玩笑。

其次，测字有时候还能体现出智慧的特点，这使测字的游戏功能富有更吸引人的色彩。求测者突然呈上一字，测士还要在观察后，巧妙地联系，迅捷地作结，撇开它的迷信本质不谈，其中确实也包含着使人慨叹厌心的东西，清赵翼

《孩余丛考》卷三十四曰：

少时见一测字者，一人踉跄来问其父之病，随手拈得“一”字。术者曰：“一者，生之尽，死之初也，汝父殆不起也。”问汝父生年云何？子曰：“丁丑生，属牛。”术者曰：“然则尔父不死，牛加一画则生矣。”其验否不可知，然思致自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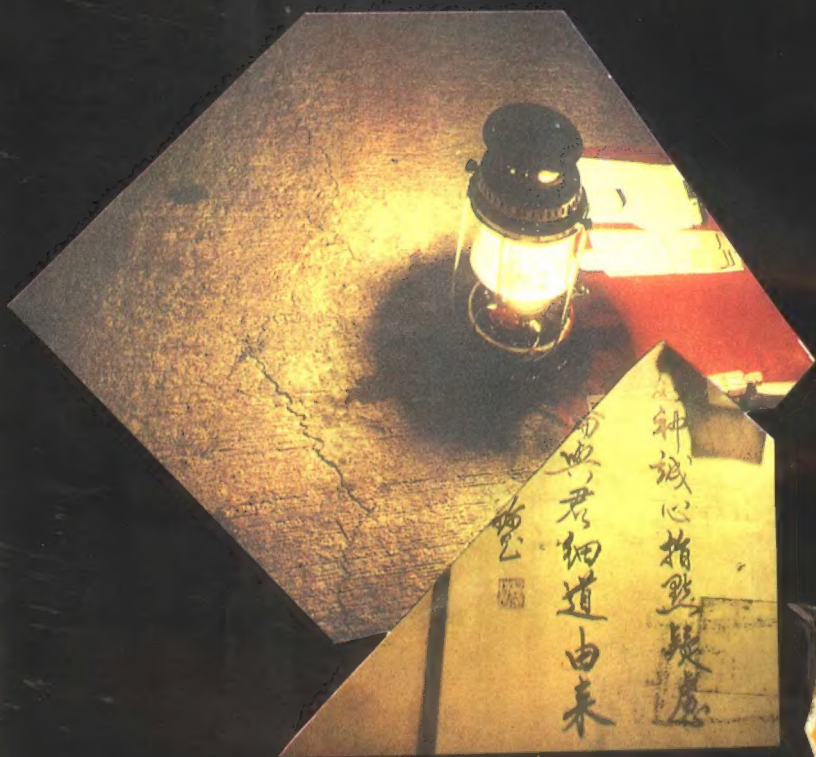
赵翼认为此例“思致自佳”，实不为诬说。由一个最简单的字，由生联系到死，又由死联系到生，这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其中确实展示了术者的颖悟能力。

而褚人获《坚瓠八集》卷四引《志怪录》之例，具有同样的特点：

有叩试事者，书一“串”字。测字者曰：“不特乡闹得隽，即南宫也应高捷，以寓二中之故也。”一士在旁，亦书“串”字。术者谓曰：“君不特不遇宾兴，当更得疾。”生问其故。曰：“彼无心，故当如字，君有心，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皆验。

这确实有点诡辩；其验还是不验，只有天晓得，但这则测例如同一则生动的故事，反映了编制此故事人的独特智慧。同一个字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而且天造地设，恰如神示，使读者从中领略了某种乐趣。

中国古代测字术



封面设计◎张仁华